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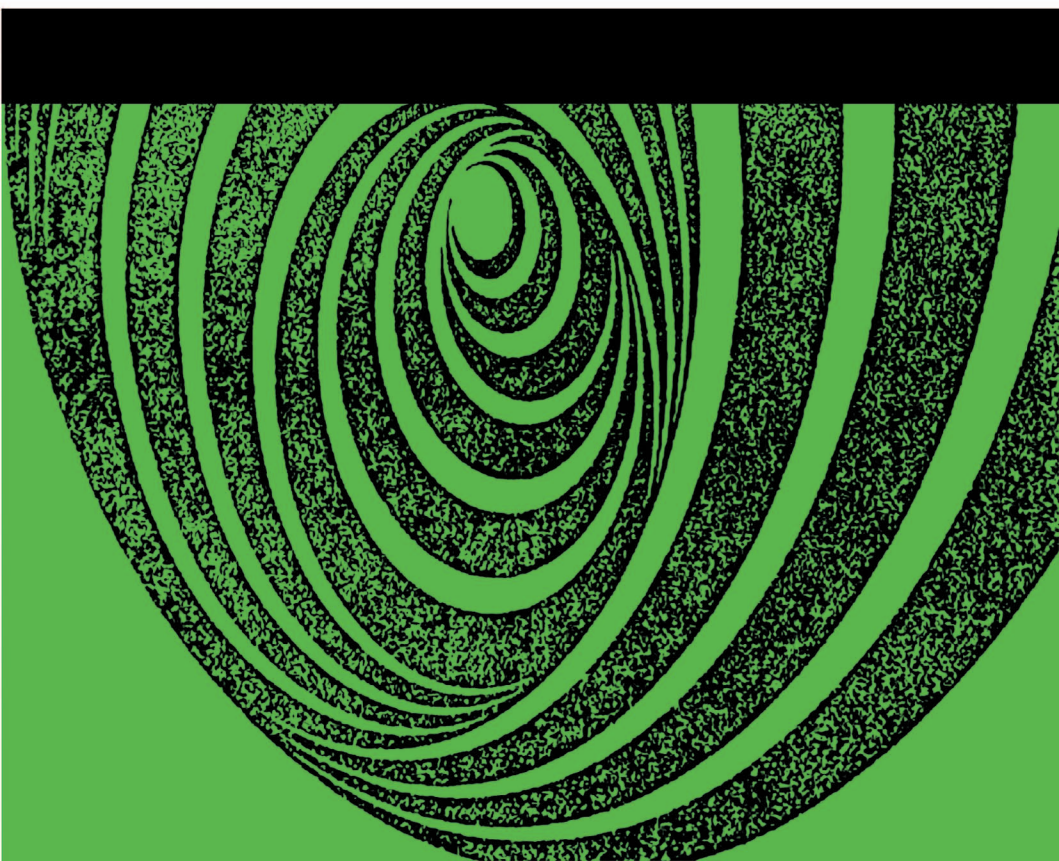


經濟科學文庫

JINGJIKEXUEWENKU

強波經濟論

陳東琪 著





經濟科學文庫
JINGJIKEXUEWENKU

強波經濟論
陳東琪 著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经济科学文库》

编委会

主编

黄 达

副主编

徐安琳 樊 纲 魏 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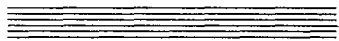
编委

(按姓氏笔划为序)

马庆泉	马建堂	贝多广
王松奇	卢中原	叶 坦
刘 伟	李 扬	李拉亚
李晓西	陈东琪	陈 莹
陈 淮	杨瑞龙	林 岗
金 碚	钟朋荣	郭树清
徐安琳	高海燕	常 青
梁 晶	黄小祥	黄 达
黄泰岩	蔡 昉	蔡重直
樊 纲	魏 杰	



经济科学文库·总序



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经济活动是人类一切活动中最基本的活动；当今世界上有的人把经济学称为“社会科学皇冠上的明珠”；我们正在进行着经济改革，有关经济改革和发展的一切，总是成为人们最关心的话题；经济改革的成败，关系着祖国的前途、民族的命运，经济学家们在这一伟大的历史进程中担负着无法推卸的重要责任，必须用自己特有的方式去为这一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我们这部《经济科学文库》，就是对中国经济学家思维成果的记录，是为我国经济科学的建设和发展服务的。

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伟大事业，不仅要求经济实践家们提出一系列直接针对当前现实问题的对策，也要求经济科学工作者提出一整套于理解现实问题有补、对解决现实问题有益的经济理论，作为战略研究和政策分析的基础；同时还要对各种历史和现实的问题进行细致的实证分析，用丰富、翔实的经验资料，对各种理论的科学性和各种政策的有效性，作出检验。过



去10年中我国的经济科学研究有了蓬勃的发展,进入90年代,中国的经济学家们正在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到经济理论和实证研究上来。这或许正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改革事业和我们的经济科学将有更大发展的一个前题。《经济科学文库》作为一块新的科学研究园地,愿经济学家们的心血在此浇灌出更多、更美的鲜花。

《经济科学文库》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原则,提倡追求科学、坚持真理、求实创新的学风,鼓励严肃认真的研究、扎扎实实的工作。相比之下,我们将更加重视研究成果的长久价值,希望今后人们能够看到这套丛书中的许多内容,经受了实践的长期检验而成为人类科学知识积累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既然是科学探索,就难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错误。但在科学发展的道路上,只要是严肃的探索,即使事后被证明是错误的,也会因为向人们表现了“此路不通”而为其他人通向真理扫清了障碍。正因如此,我们将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开展积极而严肃的学术批判和学术争鸣。我们将积极扶植学术新秀,使《经济科学文库》成为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的一块新的出版园地,我们还将尝试一些评价学术成果的新方式,加强学者与书版界的合作,在制度上保证丛书的质量。

希望作者和读者与我们一起,关心、爱护这套丛书,共同办好这部文库!

《经济科学文库》编委会

1991年4月



征的效率机制的转换，只是单纯的数量运动，周而复始，循环往复。这个见解道出了我国经济为什么一再出现大起大落而得不到效率提高的要害，可谓言人之所未言。

本书从政策、体制和发展等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解剖和综合分析。着重指出我国宏观经济繁荣和衰退的交替发生，主要不是企业推动，而是由政府推动，是基于政府行为和宏观政策变动的直接结果。政府纵向的行政干预和政策变动，在更深层次上都具有体制根源和发展背景。由于体制上的纵向干预、同向波动、放大效应，必然造成波动的累积，而微观单位一般只处于服从地位，平素缺乏随机调整，只有发展到矛盾突出时才来个“急刹车”。这种恰中时弊的分析，有利于推动经济改革的实践。与此同时，作者也客观地指出，从发展上看，后行工业化经济的增长过程，也难以完全避免强波倾向，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政策、体制现象，它是“体制”、“政策”和“发展”的综合产物。

总之，作者锐意创新，独辟蹊径，已取得良好的研究成果。同时，在研究方法上，将统计观察，理论假设，实证分析结合起来，在占有丰富资料的基础上展开探讨和论证，文笔亦较生动，从而使文章颇具说服力。书中也采用了西方经济学上的某些概念、范畴、公式，但不是照搬照套，而是取其要义，为我所用。这也是可行的。

本书对我国经济发展，未作专门研究，提出对策。但对宏观经济发展变化进行了有深度、有分量的分析，实际上也已指



出了克服“强波”应采取的政策措施的方向。例如，提出双向微调，提出如何通过调整改革，转变发展战略以及改换运行机制等途径，把我国经济的“强波动”型转变为常规波动型，以实现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的发展，等等。这些改革意见，尽管操作性尚嫌不足，而所谓“常规波动”也缺乏明确的界定，但所指出的方向是正确的，对现实经济发展也具有参考价值。

书中有些观点也还值得推敲，例如关于市场作用究应如何估价？但这属于学术观点，自当见仁见智，各抒己见。最后也应指出，写一本书不可能尽善尽美。像经济波动、周期这样的重大问题，在这次研究中取得的成果只能算是良好的开端。学海无涯，尚希继续努力，朝着更高水平前进。

杨坚白

1991年五一劳动节



目录

导 论(1)	
§ 0.1	增长与波动(1)
§ 0.2	两个背景(4)
§ 0.3	总量波动和结构变动(9)
§ 0.4	体制与政策(14)
§ 0.5	几个特殊因素(19)
§ 0.6	方法论概述(22)
§ 0.7	主线和体系结构(25)
1 章 中国经济的周期波动(29)	
§ 1.1	总量波动的形态(29)



§ 1.2	总量波动的特征(40)
§ 1.3	工业波动与总量波动(52)
§ 1.4	就业、物价与产量波动的关系(55)
2 章 强波经济中的投资(59)	
§ 2.1	投资周期的强波倾向(60)
§ 2.2	过度投资与加速增长(65)
§ 2.3	投资减速与经济衰退(81)
3 章 同向波动的强波效应(96)	
§ 3.1	三个抽象的结构性波动模型(97)
§ 3.2	产业间的波动趋势(101)
§ 3.3	同向波动的结构原因(110)
4 章 低效增长的循环(126)	
§ 4.1	生产率周期(127)
§ 4.2	低效增长的回升和衰退(135)
§ 4.3	“体制效率周期”假说(149)
5 章 波动累积过程(154)	
§ 5.1	经济形态与周期性质(156)
§ 5.2	纵向的要素分配流程(163)



§ 5.3	长期稳定后的大调整(171)
§ 5.4	结构失衡的积聚与同时性结构调整(182)
6章 政策波动与政府的周期行为(192)	
§ 6.1	政策波动(194)
§ 6.2	计划与周期(199)
§ 6.3	纵向行政干预(210)
§ 6.4	政府与企业:周期行为比较(216)
7章 工业化与产业周期(226)	
§ 7.1	工业化的“周期”现象(227)
§ 7.2	产业结构的非均衡运动(235)
§ 7.3	产业发展的生命周期(244)
§ 7.4	劳动力过剩经济的不稳定性(257)
8章 转向新增长阶段的周期政策(262)	
§ 8.1	效率与政策:三个论点(265)
§ 8.2	后工业化阶段的周期运动(271)
§ 8.3	稳定增长政策的体制基础(279)
附录 中国的工业化与长波(286)	



I	引言(286)
II	原始工业化(289)
III	“新式工业”的成长:扩张与衰退(293)
IV	中国工业发展的长波过程(303)
主要参考文献(317)	
后 记(324)	



和地区人均 17 080 美元的 1.93%，处在所观察的 121 个国家和地区中的倒数第 21 位，但是，较高的预期寿命指标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反映出我国老百姓综合生活水平已处在顺数第 80 位以上。当然，影响人口平均寿命的还有地理、气候、文化、社会及其环境的因素，但是存在着人口寿命长短与人均收入水平高低正相关的统计趋势规律。^①这说明，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实际上已经进入一个不能低估的时期，它在近 40 多年来尤其是最近几年来的增长实绩是令人振奋的。

与此同时，在中国经济快速成长的过程中，由高潮和低落循环交替构成的波动一个接着一个，要么是轻缓的扩张伴随轻缓的收缩，要么是急速繁荣跟着急剧衰退，大跃进推动大萧条，持续时间较长的过热总是接续着持续时间较长的紧缩。不但人们对 50 年代末、60 年代初那次大繁荣后的大衰退记忆犹新，而且 80 年代经济增长的“黄金时代”也一再向人们发出“周期”的信号，“大起大落”几乎成为景气分析专家们常用的词汇。始于 1988 年 9 月的治理整顿，在某种意义上为短缺经济创造出了暂时的有效需求不足，形成有限的买方市场。整个经济就象变戏法一样，10 个月前各地抢购风波迭起，10 个月后出现了令决策者们头痛的市场疲软。1990 年初，政府计划总物价水平上涨 14—16%，比 1989 年的 17.8% 再下降 2—3 个百分点，到年底

^① 参见世界银行：《1990 年世界发展报告：贫困》，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78—179 页。



观察,全年才上涨 2.1%。不管你怎样降低利率,取消“保值”,老百姓还是愿意(或是被迫?)将增长并不多的收入拿出很大一部分存入银行。不管你怎样刺激需求,无论是从启动中间需求转向启动最终需求,还是从注入流动资金贷款转向扩大固定资产贷款,或者直接从刺激生产转向刺激销售和消费,工业生产增长率最终还是下落到 7.6%,成为 80 年代扩张后的低增长年份。而且,1989 年 8 月—1990 年 2 月出现近半年的工业景气衰退还使经济界人士心存余悸时,又出现了自 1990 年 10 月以来的两位数工业增长率以及潜伏和累积了近 8 个月的信用膨胀压力,人们又担心再度产生膨胀和“过热”,带动新一轮“大起大落”过程。

当人们对某一现象认识越多,经验越多时,其驾驭这一现象的能力就会越大。正如 1989—1990 年的增长低潮没有重复 1960—1962 年的经济危机和 1989—1981 年的生产滑坡一样,1991 年以后的复苏繁荣同样不会简单重复 1958 年的“跃进”,1978 年的“冒进”和 1988 年的“膨胀”。然而,大起大落是否会消除?强波过程是否将停止?“持续、稳定协调增长”的期望是否变成现实?这是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而肯定的答案则又依赖于建立一系列假设条件,要求有一系列革新活动的发生。

严格说来,本书的努力主要不是给出推动这一系列革新过程的“对策意见”,而是力图根据经验观察对已有的强波事实及其存在背景进行剖析和透视,找到其问题的缘由,从而为确立实现长期稳定增长的假设条件提供分析基础。



§ 0.2 两个背景

1. 经济运行和调节机制

研究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的历史动态，愈益成为经济学家共同关心的课题。近几年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周期理论”代表了这一课题研究的最新趋势。这一研究旨在证明，增长过程的周期性波动是一种超越制度的普遍现象，因为无论是资本主义制度还是社会主义制度都是以社会大生产尤其是以机器工业体系为基础的，而经济周期，严格说来是工业革命以来的现象，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经济的波动主要是一个自然气候现象，是一个非经济过程。可以说，只要有社会化大生产，或者说只要有机器工业生产，经济波动就不可避免，对于市场经济是这样，对于计划经济也是这样。^①不同的制度选择可能导致不同的周期波动道路，但没有一种经济运行机制具有内在的“完全均衡”或“零和波动”性质。不但市场经济的总量过程总是以或上或下的趋势偏离西方均衡经济学家设定的稳定均衡增

^① “我们切不可把计划经济理想化，认为它是在风平浪静中无矛盾地发展。其实，计划性的对立物是自发性，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只能是而且也应该是在计划性与自发性的矛盾斗争中辩证发展。”（杨坚白：“价值规律和计划管理”，载《学术月刊》1990年1月号，第2页。）



长轨道，实际经济增长过程总是一幅繁荣和衰退、扩张和收缩循环交替的图画，现实社会主义经济的历史发展一再证明“计划者均衡”不过是一种反映计划者愿望的“事前假设”，而实际过程往往离这种“事前假设”相距甚远。计划经济也存在客观的波动倾向，尤其是，如果计划受到纵向行政干预的影响，还有可能存在强波倾向。近40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同样如此。尽管“文革”时期经济的起伏震荡带有很强的政治化色彩，政治斗争冲击了经济成长的正常秩序；但是，1958—1962年“大跃进”后的“大衰退”，1978—1981年“洋冒进”后的大调整，以及1989—1991年治理整顿中出现市场疲软和生产萎缩，则表明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起伏波动同样有其深刻的经济根源。因此，经济学家完全可以从“经济分析”的角度来对反映在一长串时间序列数据中的计划经济的“波动”或“周期”作出解释，尽管这一解释并不能完全从对象中分离出和政治交织的非经济因素。

如果对我国计划经济周期分析史作一个简单回顾，大致可以概括出两个研究阶段：(1) 1959—1962年；(2) 1986年以来。第一研究阶段是对50年代末、60年代初国民经济出现“大跃进”后的“大萧条”的反映。当时的经济学家虽然还处于古典社会主义经济学传统的熏陶中，忌讳使用“周期”一词来描述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的动态过程，把“周期”和“危机”看成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有现象，比较一致地用“波浪式”来概括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动态特征，但实际的理论贡献在于将增



长过程的“事前”和“事后”区分开，并证明“事后”过程不是简单地复制“事前”设定的“计划者均衡”。第二研究阶段的直接诱因是1984年总量经济“过热”和随后采取“软着陆”政策给增长带来的短暂滑坡。不过，这一阶段的研究富有更强的开拓性和创造性，更有可能利用足够长的时间序列数据来进行纵向和横向的比较研究，建立力图 and 西方标准的景气循环理论相类似的“周期”理论。与此同时，也有学者不赞同用“周期”来描述我国社会主义时期经济增长的波动趋势。其中一部分人，并不是出于某种简单的原则教条的考虑，而是认为标准的“经济周期”是一种商业和市场现象，是厂商根据规则的市场信号并在“自然”秩序过程中自发行动的结果，其存在的前提是竞争和自由选择。与之不同，社会主义经济（包括中国经济）缺乏这一存在前提，其运行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行政决定过程，不存在严格的企业实体和市场活动，经济的波动并不反映市场的景气循环和周期。持这一观点的人把握到了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在动态发展过程中的差异，但过于拘泥于概念的初始意义，其思维方式很大程度上依然停留在第一研究阶段。

事实上，我国近40年来社会主义经济的增长史不但存在一般的波动，存在常规周期，并且经常出现强周期波动。

考察社会主义经济和周期的关系，从政府机制中寻找周期性波动形成的原因，在此基础上就“社会主义经济周期”提出相应的理论假说和分析模型，东、西方经济学家在近二、三十



年中作出了充分的努力。人们已经发现，在现实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由于过强的纵向行政干预、信息的传输和反馈存在较长的时滞，要素结构调整经常过时，经济参数刚性化，过程的累积倾向很强，小波动累积为大波动，所以更容易产生强波现象。

2. “发展”背景

解释中国经济的波动现象，不但应当了解经济运行和调节机制背景，而且还应当了解其“发展”背景。对于一个发展中经济来说，宏观决策者的行为往往是以加速工业化、尽快从发展中经济向发达经济转换这个“发展”背景为前提的。离开了对“发展”或工业化背景的理解，就难以全面解释各级政府的扩张倾向和经济增长周期性波动中的扩张可能性，就很难解释即使当决策者已经认识到高速度对国民经济健康成长的负面效应时而高速扩张为什么又一再出现的原因。换句话说，如果政府领导人不能凭借手中拥有的权力对企业进行直接的随机干预，如果企业生产的扩张和收缩服从于标准的市场景气循环趋势的调节和影响，是不是就可以避免强波的发生，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扩张倾向是不是就会减弱。我们的分析表明，如果将1958—1962年非常规的过度扩张后的过度衰退，1968、1972、1974和1976年由于过度政治干扰而造成不正常的生产萧条撇开，我国经济的成长仍然内含着一股很强的扩张压力，无论政



府领导人在制定增长政策时头脑是如何的冷静，只要他不是视由人为的过度衰退为代价于不顾，这股扩张压力就会不可避免地推动高速增长。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如日本、南朝鲜、新加坡、台湾、香港和泰国的高速增长便是在没有“计划指令”推动的内在的扩张压力下而实现的；而他们和先行的欧美工业发达国家相比，其经济增长过程的稳定程度要低一些，强波倾向明显一些。中国是一个大国，人口和就业压力无与伦比，经济增长中的扩张倾向必然要比上述国家和地区大一些。因此，研究中国经济的波动和周期不能不将其“发展”背景放在重要的位置。

按照发展经济学的内容，发展的主题就是实现工业化，在国民收入（包括其他总量指标）和就业的构成中，农业份额逐渐下降，工业和服务业份额逐渐上升；就生产过程而言，工业生产的贡献越来越增大，成为整个国民经济成长的主要发动机。因此，现代发展中经济的增长过程，一方面是工业化涵盖规模不断伸延的过程，又是现代增长量级逐步上升的过程。在长期趋势意义上，工业化进程伴随的是扩张和繁荣。但是，工业化进程的连续和加速需要有相对充足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技术和食品的供给。如果这些资源供给遇到困难和瓶颈，扩展中的工业生产得不到相应的资源吸纳，比如资金短缺、技术不足，找不到熟练的技术员工，以及农业提供的剩余不足以支付新增工业工人的生活必需品，那么工业生产的扩展和加速就会受阻，工业化过程不得不出现在减速或中断，从而以工业生产作为引擎



的总量经济增长必然下降。对于一个人口过度增长，劳动力过剩的情形愈益严重，熟练劳动者在总劳动者中的份额一直很小，而农业生产率增长十分缓慢的国家来说，这种减速和中断会经常发生，而且减速和中断的时间通常会拉得很长，结果引出周期性出现的总量经济衰退。

说明和验证工业化进程的持续、中断与总量经济周期的扩张、收缩之间的关系，对我来说，具有相当强的理论诱惑力。因为根据这一假说，可以为范围很广的现代经济增长的周期历史提供一个不受体制差异限制的解釋体系。目前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发达经济”和“发展中经济”主要是一个先行工业化和后行工业化的差别问题，而实现工业化是各国都要经历的共同道路。当然，对于后行工业化经济来说，由于速度和结构跳跃，工业化进程势必缩短，他们将用较短的时间来完成先行工业化经济所走过的工业化道路，而这又会使经济周期的分布密集化，并使单个平均周期的振幅增强。

§ 0.3 总量波动和结构变动

1. 相关趋势

工业化既是一个国民财富增长加速的过程，又是一个产业结构不断升级、转换的过程。前面所讲的“工业化减速和中



断”，实际上表示由非农产业份额上升所代表的产业结构升级的长期趋势发生中断，甚至出现“结构复归”，如我国60年代初期的情形就是这样。由于工业化意味着以工业贡献份额增加所推动的总量增长加速，所以产业结构升级的中断和复归又必然导致总量经济波动出现低谷。另一方面，每一次真正的经济调整（不等于由政治干预引起的经济衰退）之后，总是会伴随新的结构格局，发生产业结构的转换，从而总量波动引致结构的变动。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工业化、总量波动和结构波动三者之间存在着非常紧密的联系。

顺便要指出的是，“工业化”是一个外来名词，最初的涵意是指与农业相对应的工业在产值和就业份额上的扩大，那时的服务业还不发达，规模还很小，“工业化”基本指的是以加工制造业为主体的工业产业的加速成长。当西方发达国家的加工制造业份额达到一定规模并趋于稳中略降而服务业份额快速扩大时，“工业化”的涵意又伸延了。为了区分，我们将前者叫做“前工业化”，视后者为“后工业化”。在前工业化时期，加工制造业或第二次产业份额的升降常常同时伴随着农业或第一次产业份额的降升，并同时引致总量波动升或降。在后工业化时期，情形有了一些变化，制造工业的升或降可以以农业份额不变为前提，因为它可能由服务业的降或升来抵销；同时总量波动也会因制造工业和服务业之间对比关系的多样化而多样化。但是总量波动仍然可以从结构变动中找到分析的基础。

在我国正式出版的统计资料中，我们还可以得到有关五大



产业（农业、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和商业）和“主要工业产品”及“主要农业产品”的连续时间序列数据，这对于我们的结构分析极为有用。据此可以从更宽泛的角度观察我国工业化进程中总量波动和结构变动的关系。统计分析表明，总量经济景气与否从产业结构的意义上理解可能有三种情形：（1）不同产业同时扩张，总量周期出现高潮；（2）不同产业同时收缩，总量周期出现低潮；（3）不同产业交叉变动，总量经济出现持续增长。在农业份额已经很小（总产值和就业的农业份额在10%以下）的工业发达经济中，这种结构性周期效应主要体现在非农产业内部，而在农业份额还很大（比如我国1989年以前农业的就业份额在60%以上，而农业的国民收入份额在30%以上）时，其结构性周期效应则主要体现在农业和非农产业之间，非农产业内部的结构周期效应已经存在但还不显著。这是我在本书中要进行论述和验证的重要假说之一。

2. 结构变动的层次

工业化进程中结构变动对周期的影响表现为一定的层次性，这是因为结构变动存在比较明显的层次性。通常，产业结构变动有三个主要层次：一是短期变动，它不涉及主导产业的转换，只是针对即期结构失衡而作出的短期调整；调整的目的不是创新，而是为了实现从非均衡到相对均衡的转变。在我国，短期波动主要是一种政策变更的结果，同时也有结构、效率等



因素的影响。二是中期变动，它涉及农业和工业这两大基本产业比例关系的较大的变化，而且与体制进行大的调整有关。三是长期变动，主要表现为工业主导产业的转换，其直接刺激因素在于各种形式的“经济革命”：新产业的兴起，新市场的开发，消费革命，技术革新，以及新生产场所的开辟等。产业结构的一次长期变动中包含多次短期变动和若干次中期变动。根据产业结构与体制和政策变动的相互影响，同样可将总量波动分成短波、中波和长波三个层次。

在西方周期理论中，周期类型主要有基钦周期（3年左右）、朱格拉周期（9—10年）、库兹涅茨周期（20年左右），康德拉季耶夫周期（50年左右）。这些周期类型划分的尺度，或者是“金融恐慌——银行倒闭或股票交易所崩溃”，或者是“投资机会的波动”，或者是“价格波动”，或者是“产量的波动”等等。^①在这些尺度中，前三种对中国经济不适应，因为到目前为止的中国经济还不是一种货币化经济，价格调节不充分，投资机会没有市场化。用产量尤其是工业产量的升降来确定周期的高峰和低潮比较适应于我国的情形，但简单地利用环比增长率只能确定出短期波动，不能帮助发现经济波动的长期趋势。

我国有学者根据“趋势法”将中国1952—1986年国民收入的波动分出4个大周期，平均长度为8.5年。这一分类的优点

^① [美]阿瑟·刘易斯：《增长与波动》，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8—9、16页。



是有助于从一个较长时间过程来把握经济增长的趋势性变动，但已有研究成果仍只是从总量趋势来确定总量周期，未能揭示总量波动的结构基础，也未能揭示中国经济波动过程的“体制”和“发展”背景。

而直接依照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来界定“康德拉季耶夫长波”也显得过于机械，这不仅是因为中国经济尤其是当代中国经济并不存在标准的熊彼特意义上的创新及其自发的工业突变和发散机制，而且在于分别出现在先行工业国家不同长波中的“机器革命”（第一个长波：18世纪80年代—1842年）、“蒸汽和钢铁革命”（第二个长波：1842—1897年）、“电气、化学和汽车革命”（第三个长波：1897—本世纪30年代）以及“航天技术和计算机革命”（第四个长波：本世纪30年代以来），几乎是以浓缩的形式或强或弱地出现在中国近一个半世纪尤其是近40年来的经济成长史中。^①这就是为什么很难按照康德拉季耶夫长波的时限将中国近百多年来的经济成长过程分出和西方发达经济同样的长波来。中国的关键问题是技术变革未能带动生产过程的全面创新，形成扩散效应，未能推动工业成长加速和产业结构升级。这并不意味着长波的出现，只不过是“发展的浓缩阶段”长波的基础发生了变化，长波的持续时间缩短了，

^① 我们将1840年作为我国工业经济成长和发展的起始年份，从而也作为经济长波过程的发端年份。在1840年以前虽然也有小规模工业生产，但那时主要是简单的手工业，还未产生以机器生产为基础的大规模工厂体系。关于这方面的具体论述，请参看本书附录。



标准的长波在中国采取了“准长波 (Quasi-Long-Cycles)”的形式。

因此，在理论上可以假定：同先行工业化经济相比，后行工业化经济通常会出现增长和结构转换的加速、跳跃，因为后者未能和前者在同一个时间起点上加入前三次经济革命，未能充分获得前三次长波带来的工业繁荣，在进入第四长波阶段时，既要利用最新的技术革命成果，又要对结构改造进行“补课”。这样一来，后行工业化经济的长波基础便发生了变化，产生了不同于先行工业化经济长波的长波。我在本书中将以中国为例提出和论述后行工业化经济的长波假说，而这一假说又是建立在结构分析的基础上。

§ 0.4 体制与政策

1. “体制周期”假说

无论是同英国、法国、德国、美国和日本这样的先行工业化经济相比，还是同新加坡、南朝鲜、台湾、香港和泰国这样的后行工业化经济相比，近 40 年来，大陆中国经济的总量波动和结构变动还受一些特殊因素影响，其中最重要的是来自体制变迁方面的影响。而体制变动恰恰是分析中国经济中期波动的基础。



从1949—1991年,中国经济体制经历了两次变迁或一次循环。第一次变迁是从1949—1958年,其主要特征是用公有制取代私有制,经由集体化和国有化这两个途径,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经济,城镇建立“全民”和“集体”并存的“二元所有制经济”。这一次变迁完成后,虽然公有化程度不断升级,直至1978年个体或私营经济的发展达到最低潮,但是1959—1978年的经济体制并未发生实质性变迁。第二次变迁是从1978—1991年(未完成),其主要特征是公有制(指产权和经营两方面)模式重新改造,建立“以公有制为主”、含有私有制经济成份的多元化经济体制。这两次变迁恰好形成一次体制循环,虽然它不是简单复归,而是“上升中的复归”,但经济运行机制中毕竟有一些因素是被抛弃后又重新拾回来了。我们的任务不是讨论体制变革本身,而关心的是体制变迁对总量波动和结构变动的影响,试图探讨这两次体制变迁的增长和结构效应。

预先提出一个这样的命题似乎并不过分:任何一种新体制在其刚刚诞生的阶段总是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具有号召力和刺激力,伴随而来的是强烈的经济扩张可能性和繁荣。如果这种体制符合生产者消费者的愿望和自由选择,那么这种生命力将会长久保持,繁荣的中断不会来自体制本身而将来自包括政策、结构和增长过程等非体制因素方面;如果这种体制不是真正的生产者和消费者自愿选择,而是依赖于从上到下的行政力量,那么体制性繁荣就必然停止,出现体制效率递减。在后一种情形下,我们可以得到一个“体制效率周期”假说。改革之



初，我国学者在分析 1978 年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的原因时，有一种观点认为是由于政策失误，甚至看成是少数领导人的主观错误所致。但实际并不简单是这样，其实更为深刻的根源是“体制效率周期”进入低潮。在这个低潮点上，不仅已陷于低效增长陷阱，而且产业结构也出现了严重失衡。这就迫使我们实行第二次体制变革。其结果是，经由体制效率的重新释放，总量增长再度繁荣，以主导产业变迁为核心内容的产业结构升级也出现加速。

我们的第二次体制改革之所以以结构调整为重点，其原因在于，在经过近 20 年的工业生产的加速扩张之后，以建立和发展现代经济“生产能力”（重工业为代表）为中心的产业结构发展阶段已基本完成，需要向新的以消费者偏好变化为依托的产业成长阶段过渡，而这又要求改变产业发展战略和体制结构，因为原来的产业发展和生产体制适应于“为生产而生产”但不适应于“为消费而生产”。这就是说，我国经济生活中体制的形成、发展和变革与产业成长阶段的转变有着内在的关联。所以，我们在考察总量波动、结构变动和体制变革的关系时，注意到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2. 政策变动

在总量波动和结构变动中，体制因素同样是一个较长的时间变量，用体制的变革不能解释短期波动。在我国近 40 多年的



经济发展时期，大的体制变革只有两次，而经济的短期波动却有 10 次之多。尽管每一次短波都是一个特殊的历史个体，不同短波在升降幅度和时间长度上不可能完全重复，并且有些短波与某些特殊的变量之间存在高度相关关系，如自然灾害、政治运动和某些突发性随机因素等，但是，所有短波在其形成上还是存在共有的因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些共有因素主要是市场参数变动以及企业根据利润预期对其作出的反映，在那里，政策变量的变化需经过市场参数变动来体现。因此，经济活动和产量的波动主要是由于市场的推动。在我国，由于不存在竞争市场和自由价格体系，企业不是一个完全根据利润预期采取行动的独立经济实体，市场的组织和运行以及企业的投资生产行为主要接受自上而下的政策指令调节，致使经济活动和产量的短期波动主要不是在于市场推动而是在于政府政策的拉动。政策变动诱发短期经济波动。

由于我国经济政策的形成和调整没有规则的时间边界，政策变动轨迹不是沿 4 年一次的政治选举周期而展开，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具有很大的随机性，就使得短期经济波动的时间规则很不明显，常常出现随机震荡。有学者将我国经济周期的持续时间概括为“平均 5 年”，这只不过是一种事后算术平均的结果，对未来景气趋势的预测和对过去统计资料的分析意义都不很大，因为在我们所观察的从 1949—1989 年国民收入环比增长率的 10 次短期波动（从 1990 年开始的第 11 次波动还未完成）中，周期时间为 5 年的概率只有 0.2。因此，将中国经济增



长过程中的波动设定为规则性周期波动的努力并不是很成功的。随机震荡是中国经济短期波动的一个基本特征，而它又是与政府政策随机变动（包括政府领导人的随机干预）紧密相联的。

政策变动表现为两种形式的交替：先是实行工业扩张政策，用高工业投资带动总量经济的高速增长，进入周期的繁荣和高潮期；一旦发现经济系统中总需求膨胀（通货膨胀、大量投资需求得不到相应的投资品供给等）和结构失衡（长线太长而短线太短，基础产业过份滞后等），政府就会在或迟或早的时候转而实行紧缩政策，通常是以削减工业尤其是工业中的基本建设或重工业投资为起点。如果紧缩政策的主要目标是解决“总量性不平衡问题”，采取的是全面紧缩；如果目的是解决“结构性失衡问题”，紧缩则会是结构性的。因为中国的经济成长始终是在“工业化的持续和中断”这个大背景上展开，所以政府的扩张政策实质上是工业扩张政策，而收缩政策往往是在强调农业投入和增长基础上的工业暂时收缩的政策。因此，几乎每一次短期波动的低谷年份都伴随着农业份额的回升。从长期趋势上看，农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相对贡献逐渐缩小，所以周期低潮农业份额的回升不能足以补偿非农产业主要是工业份额的回落，从而不能阻止总量增长率的下降。本书将以比较大的篇幅来描述这一分析结论，在回顾和反思我国工业化进程及其曲折波动的基础上，就今后工业化政策的若干主题提出设想。



§ 0.5 几个特殊因素

周期波动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现象,是由一系列因素引起的,既有内生因素又有外生因素,既有可控因素又有不可控因素,用单一因果假设或用不充足的自变量建立起来的回归模型虽然可以在一定限度内作出解释但总显得软弱无力。当然,如果我们将外生因素、不可控因素以及那些虽然是内生和可控的但是难于把握的因素作为解释模型的一个混合“余量”或“残差”,那么我们的周期解释同样可以集中在几个主要因素上。这样,周期理论才有了可为的创造空间。

除了上面提到的几个方面之外,影响中国经济波动的因素还包括人口、劳动力和效率这三个方面。表面看来,这三个方面与周期波动的形成并无直接的联系,但如果对我们提出的“工业化的加速和中断”的假说作一番细致的考虑,就会发现人口、劳动力和效率这三个方面亦可解释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为什么会存在比别的后行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更为明显的强波倾向。

1. 过度的人口增长

中国经济发展中一个最鲜明的特点是快速的人口增长,过大的人口规模,相对于资源(土地、资本、技术和消费品)供



给而言表现为典型的人口过剩。过剩的人口必然导致过旺的生活消费尤其是食品消费需求。在食品生产的工业替代技术还未得以充分发展,甚至城乡居民生活还处在从贫穷向温饱过渡、吃的问题还相当突出的阶段时,这种过旺的消费需求一再向农业生产加压,政府也感到“粮食不稳定,农民不稳定,全国就不会稳定”,对农业的资本和劳动的投入不得不保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但是又不得不把加速工业化作为增长政策的主要课题。结果出现“两难”:既要加速工业化,而过剩人口推动的过旺食品需求压力又要求工业化速度放慢。实际操作中,很难做到在同一个时点上对问题的两方面作出“双方对半”的均衡选择,实际上只能是不同时点上的交替倾斜,这样一来就形成了波动。

2. 劳动力过剩

快速的人口增长必然引起快速的劳动力增长。在就业结构为一定的前提下,如果资本形成或资本积累的增长赶不上劳动力的增长,劳动过剩将会以累积的形式扩大,资本短缺加剧。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虽然可以用“信用创造”或通常所说的“多发票子”的方式,扩大名义总量工资的规模,可以给实际上属于“剩余劳动力大军”的职工支付名义工资,但是由于农业生产率的提高缓慢,工业工人的食品供求关系中将出现缺口,而食品短缺又会加剧通货膨胀。为了稳定,政府又不得不严格控制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控制乡村人口向城镇迁移,



结果农业中的劳动力绝对规模越来越大，工业化的负担亦越来越重。考虑到我国乡村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快于城市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农业劳动力的成长势必较快，从而农业就业份额的下降必然相当困难，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压力也会相当大。一般来说，在比较收益法则的推动下，只要政府政策稍有松弛，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大量迁移是一种必然的趋势，等到政府感受到这种大迁移给城市生活带来突发性震荡（食品短缺、通货膨胀、交通拥挤等）时似乎不得不采取强有力的限制和紧缩措施，让农民工重新大批回到那小块耕地上。这种农业剩余劳动力的突发式迁进迁出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经常剧烈振荡的原因之一。

3. 效率问题

我国经济紧缩形成和工业化进程中断的另一个更深刻的原因是存在一个较为典型的“李嘉图增长陷阱”，^①农业生产率提高缓慢牵制着实现工业化的步伐，农业进步的缓慢迫使正在出现的工业化势头减退并消失。由于农业生产没有产生根本的技术革命，耕作方式落后，或者是低效的社区集体生产，或者是分散的个体小块土地经营，加上人均耕地数量减少以及土地肥

^① 石川滋：“部门间资源流动的类型和过程：亚洲实例比较”，载《发展经济学的新格局——进步与展望》，经济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78—79页。



力下降,就使得农业劳动生产率长期停留在比较低的水平上,农业剩余劳动力大批迁移时常同时伴随着粮食产量徘徊或下降。为了不至于产生过份严重的粮食危机,政府又不得不采取促使农民工“回流”的行动,结果工业化进程中断和总量增长减速成为不可避免的现象。

这就是说,人口和劳动力过剩、生产效率低下,与周期波动和结构变动存在着深层的联系。本书将从一个比较宽的视野来揭示这种联系。

§ 0.6 方法论概述

1. 历史、统计和比较

前面,我们根据理论逻辑的内在发展,描述了本书所要讨论的主要观点和假说。笔者试图按一种新的研究思路,探索中国经济特别是1949年以来的中国经济的周期波动过程;拟在独立设计出一个新的结构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弄清楚强波形成的内在过程,揭示出中国经济成长过程中总量波动和结构变动的关系。笔者深深感到,要想比较恰当地描述中国这样一个后行工业化经济的周期波动和结构转换趋势,就必须对“工业化的加速和中断”的内在过程有一个系统的认识和把握,将“总量分析”和“结构分析”以结合的形式立于“发展分析”的基础



上。没有对“发展”背景的理解，我们的周期解释就可能停留在就事论事的表面层次上。这倒不是为了标新立异，更不是想华众取宠，而是因为笔者一再体会到，用产生于工业发达国家的周期理论来解释中国这样一个典型的后行工业化大国经济的周期形成和变换过程，并不很贴切、妥当。

一定的分析主题要求有一定的分析方法，以工业化和发展为背景的周期分析首先是一种历史分析。基于这一考虑，笔者在描述和归纳某一思想认识时，力图做到以较强的历史感为基础，让设计的分析框架接近于历史变迁的主流，从历史过程中概括出周期，而不是相反。这一点对于我们的长波分析尤为重要。本来，研究课题涵盖的主要时限是在1949—1991年，但考虑到长波过程的历史连续性，它需要从一个比较长的时间跨度来把握，所以所把握的时间拉长了。当然，本书的任务不是探寻中国工业的起源，也不打算对中国是否存在过“工业化前的工业化”（Industrialization before industrialization）问题作过多的深究，所以并不关心其长波开始的起点位置。经济学和经济史学到底还是分属两个不同的行当。

在经济分析中，历史的方法和统计的方法常常被并用，统计样本中的时间序列数据实际上是一堆历史，而历史的记录自然又离不开统计。在规范的周期史研究中，总是离不开统计观察，单纯的定性语言描述和逻辑演绎对于模型推演有用，而于经验归纳则并不恰当。另一方面，由于统计口径不同，有些指标的统计资料支离破碎，而重新建立具有齐备性和连贯性的时



间序列数据并非单个人一朝一夕所能做到，这就迫使我们在涉及一个较长的时间跨度时不得不根据“定基趋势”作出近似的判断，只是这种判断不是远离而是想法接近历史过程本身。

除了历史的统计的方法以外，比较的方法也常常被采用。在比较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不同过程的差异性和一致性，包括不同经济类型、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异同。我们既注意观察后行工业化经济和先行工业化经济在周期形成、结构转换以及工业化进程上的异同，又注意在后工业化经济世界中中国经济发展过程的特殊性，并据此概括出某些特有的规律。这里的比较主要是统计的比较，而这也有一些因统计口径不同而带来的困难。国际上，特别是工业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通用的是 SNA 核算体系，其总量指标主要以 GNP 和 GDP 来代表。而我国主要采用 MPS 核算体系，不但没有 GDP 统计资料，而且即使是开始于 1978 年的 GNP 记录也只有当年价绝对数。以 1978 年为 100 的定基指数和三次产业构成三种，这对一个含更长时间跨度的历史动态分析来说并不方便，进行横向比较也有困难。采用某些技术性办法将已有的“社会总产值”（GSP）和“国民收入”（NI）调整成为 GNP 或 GDP，则又会产生“统计不足”的问题，主要障碍在于价格结构和收入—支出（尤其是服务领域的收入—支出）结构存在一些不可比的因素。因此，在不得不采用某种调整后的指标进行国别比较时，我们应当特别谨慎、小心，而且只能得到一个近似的比较结论。



2. 理论假说的重要性

要能从一大堆历史、统计数据中概括出思想，提炼出理论，需经过一个中介环节，即提出理论假说。没有理论假说，所进行的统计观察以及归纳出的统计结论就难以抽象出理论，难以捕捉到统计现象中的主流。同时，理论假说又不是凭空想象，它必须具有可检验性，既超越直观资料又来自直观资料。其意义不但在于分析结论反映实际，而且导致经济学家之间形成共同语言。这是当代西方经济研究的主要趋势。笔者在本书中试图朝这方面努力，在讨论中国经济成长过程中的某些重要现象和趋势时，拟提出若干理论假说并展开分析和证明。当然，我们的理论假说受到两个方面的限制，一是资料占有的不充分性，二是分析结构的要求。如果资料占有不充分、分析的角度不同，其理论假说则必然存在局限性。不过这并不能成为否认理论假说重要性的理由，因为任何理论类型都只具有相对的意义。

§ 0.7 主线和体系结构

前面以概括的方式描述了本书的研究基点和分析方法，试图表明笔者希望从一个比较新颖的角度、比较开阔的视野来考察中国 40 年来国民经济的增长与波动，现在拟就全书的主线和



分析框架作一个简单勾画，以便于把握全书。

鉴于西方经济学近半个多世纪来已在市场经济周期分析上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计划经济周期理论在经过大约 1/4 世纪的争论后也获得了一些重要进展，而我国经济学界有关社会主义经济周期的研究也有许多创新，所以我们不想拘泥于一般性周期问题的讨论，而只是抓住中国国民经济增长经常产生“大起大落”这一特征现象，来探讨一种特殊的周期波动——强波——的生成过程，从强波这一特征现象出发来剖析新中国经济成长的动态趋势及其背景，在同时考虑到“发展”、“体制”和“政策”以及“总量”、“结构”和“效率”等方面的关联和相互影响时，力图提供一些与现实比较贴切的解释。因此，我们的周期分析实际上就是强波分析。

本书除“导论”和“附录”外，分 8 章来展开。第 1 章“中国经济的周期波动”属于统计观察和经验描述，刻画新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具体形态和特征，从经验实证分析中引出“强波假说”，并注意到强波增长过程的阶段性变化，认为这一变化意味着经济体制已经发生了重要的调整和改造，以工业化为主题的经济的发展已产生了阶段性变化，同时政府的增长政策也有了新的转变，从而总体经济增长正处在从强波到常规波动的过渡期中。第一章概括出来的统计结论是以后各章分析的基础。第 2 章“强波经济中的投资”目的在于探讨总量波动的直接成因，从表层揭示强投资波动对强总量波动的影响，着重讨论过度投资与加速增长以及投资减速与经济衰退的关系。作者认为加速



投资是加速工业化所要求的，而在资源“瓶颈”、人力资本短缺、低收入水平带来消费不足以及投资需求过旺本身又会诱发和加剧通货膨胀等因素的约束下，加上纵向行政干预，突发式投资扩张势必或迟或早地伴随急剧的投资紧缩，而这种投资上的突进扩张和紧急刹车又必然诱发总量经济增长从过度繁荣转入过度衰退。如果说第2章是在“总量”层次上来研究强波形成，那么，第3章“同向波动的强波效应”和第4章“低效增长的循环”则分别是“结构”和“效率”角度来研究强波形成过程，这两章中提出了一些有关“周期行为”的假说，把层次单一的均等化收入结构、狭窄的消费选择空间、企业的同时扩展和同时收缩，以及区域间的同向选择看成是同向波动和强波振荡的重要根源，而认为低效增长又是强波不断再生的深层诱因。因为低效增长的实质是高投入创造低产出（有效供给），而追求产出的高速增长又进一步要求高投入从而使增长过程中的加速系数一再提高，而加速系数的提高又会遇到消费等方面的约束，这样一来繁荣后的衰退便成为现实。第5章“波动累积过程”着重探究集中计划机制是怎样将小波动累积为大波动的，指出价格、工资、就业、利率以及其他经济变量实行长期刚性后的普调必然会使周期波动具有强烈的累积倾向。第6章“政策变动与政府的周期行为”旨在证明承担稳定平衡任务的政府在现实过程中是怎样人为地制造宏观不平衡的。政府一方面在“扩张冲动”的诱使下促使增长加速，另一方面又会因为对“结构失衡”的恐惧而主动实行紧缩，在紧缩中政府是主动的而企业是



被动的。因此强周期波动首先是政府发动的。第7章“工业化与产业周期”拟在第6章分析的基础上从另一个侧面证明，对于一个面临着加速工业化任务的发展中经济来说，政府的“扩张冲动”并不是非理性的表现，而向下调整也有其合理的成分，把强波形成简单归因于“政策失误”经常会遇到一些理论上的困难。笔者感到，只要想加速工业化，想依靠工业快速扩张来推动经济迅速转向结构高度化的新增长阶段，那么，一定程度的强波现象就难以完全避免。第8章“转向新增长阶段的周期政策”在对体制改革时期的经济周期趋势进行概括的基础上，强调只有从体制上消除不平衡因素，在政策操作上实行一系列有利于平缓转折（从扩张到收缩、从收缩到扩张）的微调措施，改造经济运行和调节机制尤其是变纵向行政协调为横向的有科学计划指导的市场协调，才可能使实际周期波动尽可能向“常规波动”收敛，以致实现长期稳定（含常规波动）增长。最后的“附录”打算越出近40多年的时空，对1840—1949年中国经济的工业化进程和周期波动作一个历史回顾和分析，以补全书之不足。

当然，我们提出的这个分析体系还有许多方面需要精雕细琢，这里只不过是贡献一个新的研究思路。



考虑到我国正式的统计刊物未提供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资料，国民生产总值（GNP）的记录只是从1978年开始因而缺乏始于建国初的系统的时间序列数据，所以我们不用GDP和GNP这两个指标。有的学者采用社会总产值（GSP）指标，这比采用GDP和GNP指标分析起来比较方便，因为有关GSP的正式统计资料相对来说比较齐全一些。但是采用GSP指标包含相当大的重复计算成份，难以准确地再现总量经济活动的真实变动趋势。剩下的是国民收入（NI）这个指标。选用这个指标有以下几个优点：（1）时间序列数据最齐全，它从1950年始一直有口径一致的记录；（2）和GSP相比，NI指标重复计算的成份相对小一些；（3）和国际上通用的GDP指标基本接近。如果将我国正式公布的按可比价计算的NI增长率和国际金融统计提供的按不变价计算的中国的GDP增长率作一比较，可以看出，从1950—1979年二者的数字是一致的，1980年以后二者的差别也不是很大。^①这就为我们直接用NI增长率指标进行有关波动系数的国际比较提供了大体上一致的统计基础。

因此，我们采用NI这个指标，来描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时期（1950—1990年）总量经济的周期波动趋势。

如何刻画短期波动？目前学者们基本上一致地采用“投资是否出现萎缩”这一原则，将某些衰退期——如1955年和1974

^①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1987》，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1983·12，P158.



年——合并随后衰退期所界定的“周期”中。这一方法无疑有一定道理，但是难以全面反映我国经济波动的完整面貌。例如，有学者将 1979 年为构成一个周期波动的谷底年份，但实际上 1979 年的国民收入增长率比 1980 年和 1981 年高。^①

我们按增长过程的原形来刻画短期波动。

在图 1-1 中，我们以 $T-T'$ 作为一个周期(波动)，虚线 R 代表平均增长率， R 以上的 $i-p-j$ 表示高潮期，以下为低潮期 ($T-i$ 和 $j-T'$)，其中 $T-j$ 为回升， $j-T'$ 为衰退。在 1950—1990 年，中国经济的平均增长率 R 为 8.1%，因此在 8.1% 以上为高潮期，之下为低潮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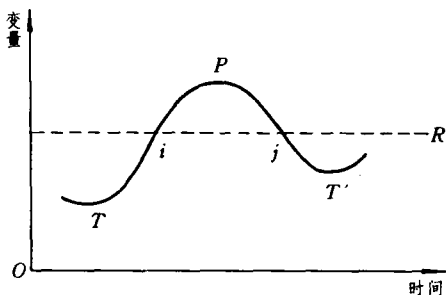


图 1-1 周期阶段的划分

在过去 40 年中，新中国总量经济的增长经历了 10 次完整

^① 张风波主编：《中国宏观经济结构与政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65 页；刘树成：《中国经济的周期波动》，中国经济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21 页；毕大川、刘树成主编：《经济周期与预警系统》，科学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2 页。



的短期波动（表 1-1）。在这 10 次短期波动中，有 3 次古典型

表 1-1 1950—1990 年国民收入历年环比增长率的波动

年份	增长率 (%)	波序	波型	波长 (年)	高潮 (年)	低潮 (年)
1950	18.6	I	增长型	5	4	1
1951	17.0					
1952	22.3					
1953	14.0					
1954	5.8					
1955	6.4	II	增长型	3	1	2
1956	14.1					
1957	4.5					
1958	22.0	III	古典型	5	2	3
1959	8.2					
1960	-1.4					
1961	-29.7					
1962	-6.5					
1963	10.7	IV	古典型	6	4	2
1964	16.5					
1965	17.0					
1966	17.0					
1967	-7.2					
1968	-6.5					
1969	19.3	V	增长型	4	2	2
1970	23.3					
1971	7.0					
1972	2.9					
1973	8.3	VI	增长型	2	1	1
1974	1.1					
1975	8.3	VII	古典型	2	1	1
1976	-2.7					



续前表

年份	增长率 (%)	波序	波型	波长 (年)	高潮 (年)	低潮 (年)
1977	7.8	Ⅶ	增长型	5	1	4
1978	12.3					
1979	7.0					
1980	6.4					
1981	4.9					
1982	8.2	Ⅷ	增长型	5	4	1
1983	10.0					
1984	13.6					
1985	13.5					
1986	7.7					
1987	10.2	X	增长型	4	2	2
1988	11.3					
1989	3.7					
1990	4.8					
1950—1989	8.1	10	古典型:3 增长型:7	平均 4.1	22	19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1)》,第34页;国家统计局编:《伟大的十年》,

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8页。

波动,7次增长型波动,波长最长的为6年,最短的为2年,平均长度为4.1年。以各年平均增长率8.1%为中值,41年中有22年高潮期,19年低潮期。以10年为一个观察区间,增长势头最好的是50年代和80年代,这两个时期不但没有出现负增长,而且高潮时间最长,分别为7年和6年。60年代和70年代经济增长的情况最糟,古典周期低潮都出现在这20年之中。



从 70 年代末以来,特别是在逐渐引入市场机制的 80 年代,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有所提高,不但按年度资料衡量的负增长情形消失,而且高峰期的峰值(1984、1985、1988 年)也大大低于 1950—1953、1956—1958、1964—1966 和 1969—1970 这些年份,大起大落的程度明显降低。

2. 中波

前面是按“环比法”测度的短期波动,即用每年的数值直接与上一年的数值相比。这里存在一个“基数问题”:如果上年的数值很大(比如 1952、1958、1970 年),本年的环比增长率虽然下降幅度大(如 1953、1959、1971 年),但并不等于经济不景气;如果上年的数值很小甚至为负值增长(如 1962、1968、1976 年),本年的环比增长率虽然以较大幅度上升,也不意味着经济活动总量达到了负增长之前年份的水平。就是说,“环比法”所反映的经济波动并不能真正反映较长增长过程的景气趋势。为了观察一个较长时期而不是某两个时点之间的起落变动,我们又采用“定基法”来测度周期波动,得到的结果是中波。

以 1950 年为 100,并把 1950、1951 年这两个众所周知的高速增长年份考虑进来,观察 1950—1990 年国民收入的波动情况,我们得到表 1—2 的结果。这个表告诉我们,我国 1950—1990 年 NI 的趋势周期或中波出现了四次:第一次从 1950—1962 年,其中趋势性扩张正增长年份 10 年,衰退(负增长)年



表 1-2 1950—1990 年国民收入增长的中期波动

趋势周期	时期	趋势性扩张 年份	趋势性衰退 年份	周期 时间(年)
I	1950—1962	1950—1959	1960—1962	13
II	1963—1968	1963—1966	1967—1968	6
III	1969—1976	1969—1975	1976	8
IV	1977—1990	1977—1990?	?	13?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1）》，第 34 页；《伟大的十年》，第 18 页。

份 3 年；第二次从 1963—1968 年，趋势性扩张年份 4 年，衰退年份 2 年；第三次从 1969—1976 年，扩张 7 年，衰退 1 年；第四次从 1977—1979 年，一直处于增长的上升过程中，1989 和 1990 年的环比低增长并未引起趋势性衰退，之前的 1980—1981 年的调整也未带来趋势性衰退，整个 80 年代的趋势性增长都是逐年上升的。从周期长度看，41 年中出现 4 个周期，平均周期时间为 10 年左右。^①这与马克思和朱格拉确定的周期时间大体一致，因此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同样存在“马克思—朱格拉周期”^②。人们通常将其称之为“中波”，它不同于前面的短波。

但是又应当看到，“马克思—朱格拉周期”实际上在中国发

① 我国有学者运用国际学术界常常采用的“趋势百分比法”，将中国 1952—1986 年国民收入绝对量波动测定出 4 个“大周期”，其划分的边界同样是 1962、1968 和 1976 年这三个古典型周期衰退年份。所以，直接用“定基法”来确定趋势周期是简单而可行的。（见刘树成：《中国经济的周期波动》，中国经济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30—33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从固定资产，特别是机器设备的更新来确定再生产周期的长短，他们据此将平均周期时间确定为 10 年。（请见：《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人民出版社 1976 年版，第 124—129 页。）朱格拉周期为 9—10 年。（请见：刘易斯《增长与波动》，第 8—9 页。）



生了变形。其中最为明显的是第Ⅱ、Ⅲ趋势周期表现为繁荣不足、衰退提前。“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政治夺权活动严重干扰了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中止了经济繁荣发展的势头,造成了人为的经济衰退。结果这两个周期的长度分别只有6年和8年。除了政治干扰导致经济繁荣不足和衰退提前的情形以外,在经济发展比较正常的时期,又可以看出我国国民经济的运行系统中存在着一种很强的内在扩张的趋势,这可以从第Ⅰ、Ⅳ趋势周期持续时间长达13年以上可以看出。因此,对于我国平均长度为10年的趋势周期现象,不能简单地用马克思和朱格拉提供的周期解释来说明,尤其是不能单纯用固定资产更新的规律来解释。我国经济增长过程的中周期的形成有其特殊的个性。考虑到前三个中周期的分界位置与前述短周期中三个古典型波动相重合,而第四个中周期的终点并不明确,所以我们的研究重点集中在短波分析上。短波研究清楚了,中波的解释也就内含其中了。但在系统研究短波形成过程以前,我们试图了解一下近40年中国经济的成长是否存在长期波动趋势。

3. 长波

了解中国经济增长过程是否存在长期波动,需要涉及一个较长的时间跨度,不能局限于最近40年的发展。^①但是中国始

^① 见本书的“附录”。



终未能出现引致产业突变的工业革命，以 1840 年作为我国近代史的起点主要不在于经济生活中发生了急速的技术变革和产业创新，而主要是因为以鸦片和大炮开路的外国工业资本的输入，随之民族工业资本加快了发育和生长过程。如果我们以 1840 年作为中国工业化和长波增长过程的起点，那么很显然，它的第一次长波发端时期大体和西方先行工业资本主义经济成长第二次长波的起点是一致的。但从中国自身的工业发展来看，它的第一次长波的起点又刚好是与先行工业化国家第三次长波的起点相一致的。从本书附录可以看出，19 世纪最后 10 年和 20 世纪开头 20 年（到“一战”结束时止），中国自有工业——包括官僚及商人所掌握的工业——出现了第一次扩张高潮，之后跟随 7、8 年下降。从本世纪 20 年代中后期到 30 年代中期，又出现一次工业扩张高潮，工业化加速，但在 1937—1949 年期间，工业和整个经济陷入空前萧条，几乎全面崩溃。因此，在 60 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工业生产经历了两次长波。而这两次长波并未与西方世界第三、四次长波完全吻合，因为中国经济生活中的长波不是按规则的时间长度发生的，它因偶然的和各种外部因素的影响而被打断。然而，在最近半个世纪（1949 年以来）的经济发展中，西方世界经历了第四次长波而我国经济也完成了第三次长波。就是说，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增长过程经历了一次完整的长期波动，社会主义第二次长波还未完成。其依据是：

- (1) 从国民收入和工业增长的趋势来看，1949—1959 年为



一次扩张高潮时期；之后整整 20 年基本上处于衰退、停滞和徘徊，某些年份增长被另一些年份的衰退所抵销，出现趋势性增长低潮；^① 在经过 1979—1981 年的调整后，国民经济于 1982—1988 年出现第二次扩张高潮时期；而 1989—1990 年又出现增长低潮。从第一次扩张高潮到第二次扩张高潮，前后持续时间大约 38 年。这种总量增长的长期波动趋势是前述短期波动和中期波动所难以涵盖的。

(2) 从产业结构的转换来看，1978—1980 年形成为一个明显的“拐点”。1952 年，工业对国民收入的贡献只有 19.52%，而 1978—1980 年年均贡献份额为 48.97% 为近 40 年中的最高值，之前呈上升趋势，之后呈下降趋势，下降最低的 1985 年为 45.06%，而 1989 年也只有 47.55% 这是因为服务产业对国民收入的贡献份额增大。以国民生产总值的三次产业构成看，1978 年第一、二、三次产业份额分别为 28.4%、48.6% 和 23%，而 1989 年为 26.8%、46.7% 和 26.5%，显然第三次产业份额增加不仅是由于第一次产业份额下降，而且是因为第二次产业份额也在下降。另外，从工业内部轻、重份额的变动趋势看，1950—1978 年表现为轻工业份额下降而重工业份额上升；从 1978—1989 年二者份额的变动趋势反过来：轻工业增加，重工业减少。所有这三个结构变动特征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工业长期

^① 邓小平同志说：“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的二十年里，农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整整二十年，生产力没有多大发展。”（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02—103 页。）



波动轨迹的改变。关于这一点，将在本书第 4 章展开论述，这里只是用产业结构的趋势性转换来证明总量经济增长的长波趋势。

(3) 建国初期，我们只有一个非常薄弱而且是支离破碎的工业基础，现代工业的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只占 10% 左右；在工业生产中，70% 以上是生产消费资料的轻工业（主要是纺织工业）生产生产资料的重工业占不到 30%。仅有的一小部分重工业也残缺不全，部门间不衔接，主要是采矿和原料工业，机器制造业很少。^① 经过 30 年的发展，到 80 年代初，中国已经基本建立起一个完整的、现代工业比重很大的新工业体系，走完了实现现代化的“第一步”。从 80 年代初开始，经过大约 50 年，即到 2030 年左右，要走“第二步”。这一发展步骤基本反映我国经济成长的长期波动趋势。“第一步”为一次长波，“第二步”为另一次长波，每一次长波开始一段时期都必然出现扩张高潮。

因此，中国工业化进程现在已进入了第四次长波的开始阶段。长波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过程，其成因既可能是来自技术革命和产业创新，又可能是由于产业结构转换和制度变革所致，有时战争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不过我们认为，要理解中国社会主义时期长波的形成，需要对产业结构转换和体制变革予以特别的重视。

^① 《伟大的十年》，第 70 页。



§ 1.2 总量波动的特征

由于长周期只反映一个很长时距的变动趋势，隐没了经常发生的实际起伏过程，而中周期的边界总是与衰退程度很强的短周期的边界相重合，它隐没了衰退程度稍弱一些的波动，所以我们主要考察短期波动的特征。

1. 纵向特征

时“冷”时“热”

在最近几年宏观经济景气分析中，人们常常使用“过热”一词来描述“1984年以来”国民经济运行的态势，但缺乏一个量的标准，我们以国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长 8.1%（1950—1990 年 NI 增长率的均值为 8.06%）作为中值，以 3 个百分点为一个量级，划分出 6 个景气区间：

- (1) 过热：实际增长率高于 13.1%；
- (2) 热：实际增长率在 11.1% 和 13.1% 之间；
- (3) 尚稳：实际增长率在 8.1% 和 11.1% 之间；
- (4) 稳定：实际增长率在 5.1% 和 8.1% 之间；
- (5) 冷：实际增长率在 2.1% 和 5.1% 之间；
- (6) 过冷：实际增长率在 2.1% 以下。



根据这一划分标准,我国 1950—1990 年国民收入增长速度在各年的景气分布情况记录于表 1—3。

表 1—3 1950—1990 年总量经济景气趋势在各年的分布

特征	过热	热	尚稳	稳定	冷	过冷
临界增长率	←	13.1%	11.1%	8.1%	5.1%	2.1% →
年	1950,1965	1978	1959	1954	1957	1961
	1951,1966	1988	1963	1955	1972	1962
	1952,1969		1973	1971	1981	1967
	1953,1970		1975	1977	1989	1968
	1956,1984		1982	1979	1990	1974
份	1958,1985		1983	1980		1976
	1964,		1987	1986		

从表 1—3 可以看出,改革期间只有 1984 和 1985 两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处于“过热”区间,1988 年处在“热”区间,其余年份均落在中值左右,只有 1989 和 1990 两年进入“冷”区间。因此改革过程中经济增长率的“离中趋势”较弱。与此不同,改革以前时期经济增长率的“离中趋势”十分显著,30 年中有 19 年落在“过冷”或“过热”区间,只有 8 年是稳定或基本稳定的,其余 3 年也是或冷或热。当然,有的年份出现急速扩张,增长率猛然上升,是因为前期负增长导致一个很低的基数,但是“过冷”后的“过热”恰恰表明经济运行系统极不稳定。我们不能要求经济增长总是处于“稳定”和“尚稳”区间,但是经常出现“过冷”和“过热”则说明我们的经济增长很不正常,说明经济系统存在着非常严重的震动源。



无规则波动

前面说,我国 1950—1990 年期间经济增长短期波动的平均长度为 4.1 年,这只不过是一个极为粗糙的把握。实际上,在 10 次波动中,有 5 种波长类型(见表 1-4)。其中,波长为 5 年的有 4 个,波长为 6 年的有 1 个,波长为 2 年、4 年的分别有 2 个,3 年的有一个。所以波动持续时间为 4 年的频率并不是一极

表 1-4 1950—1990 年经济波动的频率分布

波频(次)	波长(年)						总计(年)
	1	2	3	4	5	6	
1			*			*	9
2		*		*			12
3							0
4					*		20
总计(年)	0	4	3	8	20	6	41

资料来源:同表 1-1。

大值,频率极大值是持续时间为 5 年的周期波动,这可以从图 1-2 看得更为清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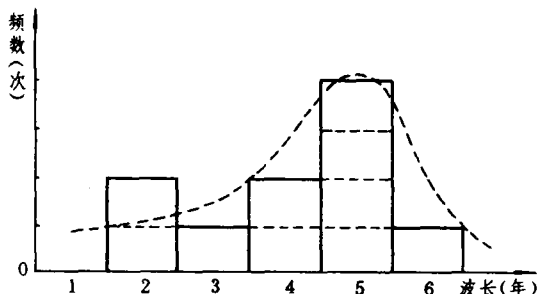


图 1-2 1950—1989 年中国经济波动的频率分布



由图 1-2 可以看出,中国经济增长周期性波动的波长频率边缘线,未能接近泊松分布曲线,不符合统计离中趋势的正态分布或近似正态分布。一般来说,正态分布要求平均波长的频率取一极大值,并要求其他波长频率取值从中位线向两边均匀递减,即如图 1-3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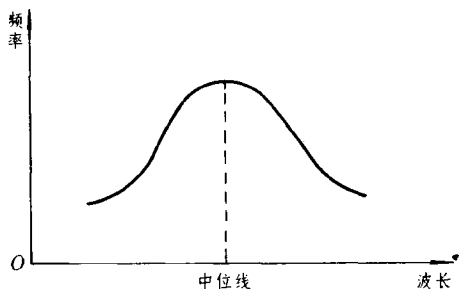


图 1-3 波频正态分布

以上的分析表明,我们按简单算术平均计算得出的“各次波动平均持续 4.1 年”这个判断并不可靠,因为实际上出现频率最大的是持续时间为 5 年的周期。另外,中国经济周期中各种波长的频数分布也显得相当无规则。

如果我们比较一下美国和其他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周期的频率分布(见图 1-4 和 1-5), 容易发现,它们非常接近泊松分布曲线,代表平均持续时间(约 3 年零 6 个月)的那个周期的波长,其频率取一极大值:离平均持续时间越近,频率取值越大;越远,频率取值则越小。这表明美国和其他市场经济的短波变化存在很明显的规则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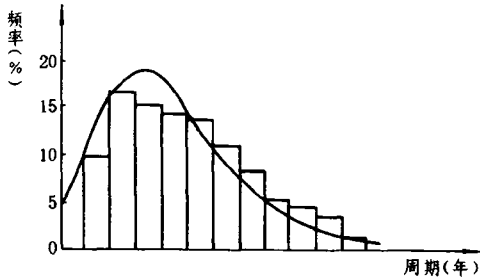


图 1-4 17 个国家 1920—1925 年经济周期频率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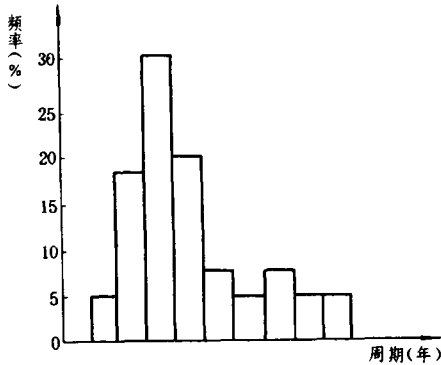


图 1-5 美国 1854 年 12 月—1980 年 1 月经济周期频率分布

资料来源：毕大川、刘树成主编：《经济周期与预警系统》，科学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1 页。

短波有规则地出现的经济涵意是：经济增长在短期内的扩张和收缩，遵循大体上一定的时间轨道，扩张到某一时点必然转向衰退，而收缩到另一时点又必然转向高涨，过度繁荣或繁荣不足以及过度衰退或收缩不足可能会发生，但概率很小。这



种规则性变化，为未来经济活动的景气预测提供了可能。

短波无规则地出现的经济涵意是：经济的扩张和收缩没有一个一定的时间轨道，过度繁荣或繁荣不足以及过度收缩或收缩不足经常发生，高峰或低谷经常是提前或滞后达到。经济系统的“随机震荡”很强，这说明中国总量经济的扩张和收缩受某种力量很大的随机干预因素的影响，系统的运行很不规则，缺乏秩序。这种无规则性变化，给景气预测带来很大难度。用对“过去”的周期波动观察所得出的认识来预测未来，常常不那么可靠因为未来经济活动发生周期变化的路线和方向都不会重复过去。不过，我们的研究关心的不是周期预测的可能性，而是力图寻找中国经济增长无规则波动的成因。

2. 横向特征：强波倾向

强波：简单的统计结论

中国经济波动不但起伏不定，而且存在强波倾向。我们通过比较 12 个国家 1950—1990 年经济增长过程波动的绝对系数和相对系数发现，中国均比别的国家高一些。^①平均增长速度比

① 绝对波动系数的公式为：
$$\sigma = \sqrt{\frac{\sum X_i^2}{N} - \bar{x}^2}$$

相对波动系数的公式为：
$$V_o = \frac{\sigma}{\bar{x}}$$

式中， X_i 为各年经济增长率； \bar{x} 为 N 年内的算术平均增长率。



较低的美国、英国、法国、原西德和印度,其绝对波动系数分别为:0.0219、0.0204、0.0290、0.0360和0.0338,相对波动系数为:0.0067、0.0081、0.0070、0.0091和0.0087;平均增长速度比较高的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泰国、日本、南朝鲜和新加坡,其绝对系数分别为:0.0311、0.0314、0.0296、0.0422、0.0453、0.0508,而相对波动系数分别只有:0.0072、0.0056、0.0044、0.0058、0.0052和0.0058。后一组国家的绝对波动系数大于前一组国家,但由于后一组国家的平均增长速度高于前一组国家,所以它们的相对波动系数低于前一组国家(见表1-5)。

表1-5 12国经济增长的波动系数比较*

国别	平均增长率 $\mu(\%)$	绝对波动系数 σ	相对波动系数 V_{σ}
中国	8.06(3)	0.0962(12)	0.0119(12)
美国	3.26(11)	0.0219(2)	0.0067(6)
英国	2.52(12)	0.0204(1)	0.0081(9)
法国	3.82(10)	0.0290(3)	0.0070(7)
原西德	3.96(8)	0.0360(8)	0.0091(11)
印度	3.87(9)	0.0338(7)	0.0087(10)
菲律宾	4.33(7)	0.0311(5)	0.0072(8)
印度尼西亚	5.58(6)	0.0314(6)	0.0056(3)
泰国	6.70(5)	0.0296(4)	0.0044(1)
日本	7.32(4)	0.0422(9)	0.0058(4)
南朝鲜	8.70(2)	0.0453(10)	0.0052(2)
新加坡	8.77(1)	0.0508(11)	0.0058(4)

* 本表除中国取国民收入指标外其余均取GDP指标。时间是:中国为1950—1990年,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印度为1961—1989年,英、美、德、法、日为1955—1989年,泰国和菲律宾为1959—1989年,南朝鲜为1960—1989年。



从表 1—5 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印象：

(1) 平均增长速度越高，绝对波动系数越高。例如新加坡、南朝鲜、中国、日本的平均增长率居于前 4 位，绝对波动系数也是最高的 4 位；而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平均增长率最低，其绝对波动系数也最低。但是，中国的平均增长率低于新加坡和南朝鲜，绝对波动系数也高于他们。这说明中国经济增长具有最强的不稳定性。

(2) 由于平均增长速度高，相对波动系数却可能低，除中国以外，日本、新加坡和南朝鲜的绝对波动系数最大，但相对波动系数却比较低。相反，英国、美国和法国的绝对波动系数最小，而相对波动系数却比较高。只有中国不但绝对波动系数最大，而且相对波动系数也最大。

(3) 平均经济增长取中速，其绝对波动系数和相对波动系数都可能比较低，经济增长的稳定性能比较好。例如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的平均增长率只有 5.58% 和 6.7%，均低于日本、新加坡、南朝鲜和中国而高于其他 6 个国家，但两种波动系数都很低。这说明中速经济增长倾向于使经济过程保持较好的稳定性。

(4) 如果按工业化先后作一个分类，先行工业化经济的增长过程具有比后行工业化经济的增长过程更好的稳定性（按绝对波动系数衡量），但在后行工业化经济中，中国经济具有更为明显的不稳定趋势，强波在中国显得最为突出。

因此，从整体上看，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经济是一个典型的强波经济。



强波的阶段性转化

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强波主要是在改革前的集中计划经济时期取得典型形态。随着改革的深入，政府对产权、投资、生产管理和流通与分配调节的单一垄断格局被打破，市场涵盖面扩大，价格信号调节加强，使得经济增长的强波倾向有所收敛。统计资料的分析表明，我国改革时期国民经济增长的波动系数已经大大降低。尽管最近一次国民收入增长率波动的峰谷落差高达 8 个百分点，即国民收入增长率在 1988 年达到高峰位置，为 11.3%，而处于谷底位置的 1989 年只有 3.3% 的增长速度，并且 1984 年和 1986 年的峰谷落差也有 5.9 个百分点，但由于这两次波动从谷底到高峰和从高峰到谷底的变化都伴随着微调政策的指导，结果没有重蹈 60、70 年代几度出现的“大繁荣”（15% 以上的增长率）后的“大衰退”（负增长）的覆辙，从而起到了熨平经济波动的效果，使国民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强波倾向有了一些明显的减缓。

下面，我们来对 1953—1978 年和 1979—1990 年两个不同体制时期的经济波动趋势进行比较（见表 1—6）。

表 1—6 告诉我们，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头 29 年中，经济运行系统的非均衡程度很高，改革时期的非均衡程度降低。按照前面提出的规律，平均增长率越高，绝对波动系数亦越高。但在这里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改革时期的平均经济增长率比旧体制时期提高了 0.4 个百分点，而绝对波动系数和相对波动系数却分别下降了 7.95% 和 1.03%。如果将表 1—6 中的 (3) 和表



表 1-6 两个增长时期经济波动程度比较

时期	平均增长率 $\mu(\%)$	绝对波动系数 σ	相对波动系数 $V\sigma$
(1)整个时期 (1950—1990)	8.06	0.0962	0.0119
(2)旧体制时期 (1950—1978)	7.94	0.1124	0.0142
(3)改革时期 (1979—1990)	8.34	0.0329	0.0039
(3)—(1)	+0.28	-0.0633	-0.0080
(3)—(2)	+0.40	-0.0795	-0.0103

资料来源：同表 1-1。

1—5 作一比较，容易发现，中国改革时期经济增长的绝对波动系数高于美国、英国、法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泰国，但低于其他 5 个国家，尤其是低于新加坡、南朝鲜和日本这样一些高速增长的国家地区。当然，如果是作同期比较，这些国家的波动系数可能还是会低于中国。但是无论如何，中国经济的绝对波动系数从 0.1124 下降到 0.039 的确是改革带来的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它也表明我国国民经济增长的格局已经发生了明显的阶段性变化。

如果我们的研究更细一些，进一步观察小阶段之间的变化趋势，上面的结论可予以更深一层的验证。

我们将 1950—1990 年这 40 年分作四个观察期，每一观察期含一个“年代”（10 年），按升序对各观察期国民收入增长率



进行排列, 即有 P_1, \dots, P_{10} ; 然后求高低对应差, 即: $P_{10}-P_1, P_9-P_2, P_8-P_3, P_7-P_4, P_6-P_5$; 同时还可以求出中项的均值。

表 1-7 和表 1-8 表明, 国民收入增长率按升序排列的分布的高中趋势, 60 年代最强, 这 10 年中 5 个高低项均是正负对应, 所以高低对应差最大, 其中 $P_{10}-P_1$ 为 49 个百分点, 中项 P_6-P_5 也有 12.1 个百分点; 80 年代最弱, 这 10 年中增长率的分布在 3.3% 至 13.6% 之间, 在中项均值 (9.1%) 上下起落的幅度只有 3 至 4 个百分点, 5 项的高低对应差也最小: $P_{10}-P_1$ 只有 10.3 个百分点, 中项 P_6-P_5 只有 1.8 个百分点; 70 年代 P_9 至 P_5 之间各项的高低对应差也比较小, 但是高项和最低项之间的差达到 26 个百分点, 这是因为 P_{10} 的值高达 23.3%,

表 1-7 4 个观察期经济增长率按升序排列的分布 (%)

项序	第 1 观察期	第 2 观察期	第 3 观察期	第 4 观察期
	1950—1959	1960—1969	1970—1979	1980—1989
P_1	4.5	-29.7	-2.7	3.3
P_2	5.8	-7.2	1.1	4.9
P_3	6.4	-6.5	2.9	6.4
P_4	8.2	-6.5	7.0	7.7
P_5	14.0	-1.4	7.0	8.2
P_6	14.1	10.7	7.8	10.0
P_7	17.0	16.5	8.3	10.2
P_8	18.6	17.0	8.3	11.3
P_9	22.0	17.0	12.3	13.5
P_{10}	22.3	19.3	23.3	13.6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1991)》, 第 34 页。



而 P_1 的值为 -2.7% ；50 年代引人注目的现象是中项 P_6 和 P_5 的均值相当大，其差最小， $P_{10}-P_1$ 的对应差高于 80 年代而低于 60 和 70 年代，这表明在整个 40 年之中 50 年代高速增长的趋势最强而稳定性比 60、70 年代好但比 80 年代显得差一些。如果按稳定程度给 4 个年代打分，结果是：50 年代为“良好”，60 年代为“最差”，70 年代为“较好”，80 年代为“最好”。

表 1-8 4 个观察期经济波动差比较 (%)

高低对应项 求差式	第 1 观察期 1950—1959	第 2 观察期 1960—1969	第 3 观察期 1970—1979	第 4 观察期 1980—1989
$P_{10}-P_1$	17.8	49.0	26.0	10.3
P_9-P_2	16.2	24.2	11.2	8.6
P_8-P_3	12.2	23.5	5.4	4.9
P_7-P_4	8.8	23.0	1.3	2.5
P_6-P_5	0.1	12.1	0.8	1.8
中项均值*	14.05	4.65	7.4	9.1

* 中项均值 = $\frac{P_6+P_5}{2}$ 。在不同观察期间，相应的高低对应差越大，波动差越大，经济增长的非均衡程度则越高；中项均值越大，意味着经济增长率集中趋势越强，增长率水平越高。

资料来源：同表 1-7。

无论从哪一个角度观察，其结论都是同样的：以体制改革为中心任务的 80 年代在稳定趋势上比前 30 年要强得多。虽然改革初期连续 3 年调整使经济增长率进入相对衰退区间，1986 年的“软着陆”放慢了增长速度，1989 年又出现增长率的大滑坡，但由于增长过程中繁荣期延长而衰退期缩短，使得改革时期经济波动系数大大降低，基本上和日本、南朝鲜、新加坡和



其他工业发展中国家的波动程度差不多。这说明，我国经济增长的波动过程在改革的推动下已开始向新阶段转轨。

§ 1.3 工业波动与总量波动

按照我国国民经济核算和统计体系，以国民收入增长率起落变化反映的总量波动，其直接推动力是农业、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和商业这五大产业，是由它们创造的收入加总后的变动所致。就产业关联而言，有以下几个重要特征：（1）建筑业、运输业的发展与工业发展之间存在高度的产业关联性，工业的扩张和收缩总是会在或迟或早的时候以或强或弱的程度影响建筑和运输业的发展；（2）由于我国农业性商业一直发展缓慢，农业产值很大一部分是通过直接自给而不是通过市场来实现，所以商业创造的国民收入就其主体内容而言是以工业活动为基础的，工业波动直接带动商业波动；但是其三，建筑业、运输业和商业对国民收入的贡献近40年来一直是在20%左右，有的年份只有15%左右，而工业份额由1952年的19.52%提高到1989年的47.55%（最高年份的1978年达到49.4%），农业份额则由57.73%下降到32.07%。所以，工业增长对整个国民收入的增长起着—个枢纽作用，工业的起落变化会直接引起总量经济增长的起落变化，工业波动决定总量波动。

图1—6刻画了工业波动与总量波动的变化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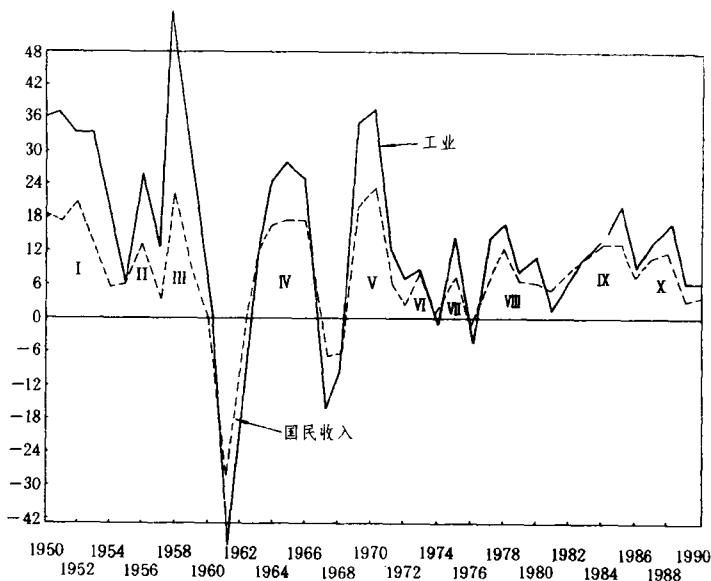


图 1-6 1950—1990 年工业和国民收入的波动趋势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1)》，第 34 页。

从图 1-6 中可以发现如下趋势性特征：

首先，从总体上看，工业波动与总国民收入的波动方向一致，工业生产繁荣，总国民收入增长加快；工业生产滑坡，总国民收入亦随之下降。只有第一次波动国民收入比工业生产早一年到达谷底，当 1955 年工业生产进入谷底时，国民收入已转入回升的年份；而 1954 年工业生产虽然比 1953 年减速但还呈现高潮时，国民收入增长却已经进入谷底，这是因为 1954 年农业生产中稻谷棉花和大豆等农作物出现负增长，建筑业也出现



绝对衰退。农业生产不景气直接推动总量经济也不景气，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工业对国民收入贡献的份额较小(为 22.71%)，而农业贡献份额占一半还多(为 52.92%)。随着农业份额缩小而工业份额增大，工业波动按同一方向直接推动总量波动。

其次，工业波动的强弱直接影响总量波动的强弱，但是前者的离散程度大于后者。当工业增长率在正值区间时国民收入增长率轨迹在工业增长率轨迹之下；当工业生产出现绝对衰退，产量绝对减少时，国民收入增长率则在工业增长率轨迹之上。这说明在整个国民经济运行系统中，工业生产具有较大的不稳定性，而其它产业如农业和商业具有比工业较强的稳定性，但这些产业的增长率水平较低一些。

另外，在整个 10 次波动中，前五次的大起大落更为突出，工业的大起大落强于国民收入总量的大起大落；后五次波动出现收敛，工业和总国民收入均收敛于零值以上某个数值轨道，而不是直接收敛于零值线本身，尤其是 1977 年以后基本上杜绝了负值增长，这表明我国近 15 年来无论是产业成长还是总量增长的稳定性已经大大提高。这是为什么？本书以后各章的分析表明：这既有制度和政策的原因，又有结构转换和工业化阶段性变化等方面的原因。

最后，尽管工业波动和总国民收入波动出现了收敛趋势，但二者路线未能出现持续性平滑斩折和过渡，而是奇峰突起。就总国民收入的增长态势而言，80 年代出现了 1982—1986 年的平滑转折，但在这之后又产生了“增长高峰”后的“增长峡



谷”。而就工业而言，“高峰”和“峡谷”依然明显存在。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直到现在，我国国民经济运行系统还没有转入稳定增长轨道，而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工业增长不稳定。

§ 1.4 就业、物价与产量变动的关系

在西方规则的市场经济中，物价、投资、就业、工资和产量之间存在一个比较严格的相关关系：物价上升，利润预期提高从而投资扩张，投资增加推动就业水平提高从而工资水平亦随之提高，而投资和就业增加必然导致产量增长。反之亦然。在这个相关链中，物价是一个关键信号，这就是为什么西方许多周期问题研究专家用物价变动来刻画经济景气变动的缘故。然而，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无论是在改革前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中，还是在改革期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市场调节的混合经济中，都不存在一个明显的“相关链”，都难以看出是价格的变动引起投资、就业和生产增长的变动，还是“生产增长的变动引起了价格的变动”的必然联系，因为价格、就业这些测度宏观景气变化的变量被人为地管制着，产量的周期性变化不是自发地跟随市场过程而是受行政秩序所支配。

由于实行充分就业政策，我国的就业增长速度与人口及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基本上是同步的。由失业率调节的总就业量波动现象几乎不存在，存在的是在既定的人口增长推动总



就业量增长的前提下而发生的城乡之间、农业与非农产业之间的“结构性”就业波动。正式统计刊物中的“城镇待业率”并不表示按国际通行统计口径计算的“失业率”，因为我国新要求就业者在城镇基层政权组织登记后到被安排工作时并不具有成为失业者的时间长度。另一方面，由于价格实行政府管制，价格的形成和调整不是服从于买者和卖者直接参予的交易过程，而是由代表政府意愿的计划和物价部门决定，并且就业和产量水平的上下变化并不直接受物价变动的的影响和调节，就业、物价与产量之间不具有充分的相互调节的相关关系。所以，我们无法直接描述“菲律普斯过程”。

在表 1-9 中可见，我国 50 年代的就业和生产规模扩展都很快，但总价格水平上涨并不快；从 60—70 年代就业和生产扩展加速，而价格增长率持平，10 年中各年平均只上涨 0.91%。这是由于从 1952 年开始就实行管制价格政策的缘故。从 70—80 年代，就业、产量和物价增长同样加速，而价格上涨速度更快，这并不意味着三者之间已经形成相互的自动调节关系，并不表示

表 1-9 中国就业、产量与物价波动的一般趋势(%)

项 目	年 代			
	50	60	70	80
社会劳动者增长率	4.48	2.69	2.35	3.49
国民收入增长率	13.30	2.92	7.53	8.91
全国零售物价增长率*	2.52	0.91	0.68	13.78

* 物价上涨率按 1950 年价格定基计算，50 年代只包括 1951—1959 年这 9 年，其余均为 10 年。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1)》，第 34、63、229 页。



它们的景气变动机制转轨。我国的物价水平,无论是处于固定不变状态,而是走向下降和上涨,不是市场供求数量波动自发调节所致,而是政府有意识调整所致。一个与市场调节原理相悖的事实是:我国有的时期商品极度短缺,这时的商品价格不但没有急剧上涨,反而“稳中有降”;而另一个时期货物相对更丰富一些,供求缺口大大缩小,但物价反而逐年递增。

反映我国就业波动的一个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大批迁移和回流,这种大迁移和大回流共发生了6次:第1次1953和1954年迁移,1955年回流;第2次1956年迁移,1957年回流;第3次1958年迁移,1959年回流;第4次1966年迁移,1967和1968年回流(包括知青上山下乡);第5次1981年迁移,1982年回流;第6次1983至1988年迁移,1989年回流。

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大迁移和大回流,对经济波动的效应是:迁移时,农业增长减缓,非农产业增长和总量增长加速;回流时,农业增长加快,非农产业增长和总量增长放慢。因为农业劳动力从种植业和养畜业中分离出来,主要不是以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为前提,农业增长的质量还很低,特别是种植业生产还处于低技术贡献阶段,所以,农业劳动力的迁移和回流总是相应地伴随着农业总产值增长率的下降和上升。由于我国非农产业增长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粗放要素投入尤其是依赖于劳动要素投入,资本和技术相结合替代资本和劳动结合的程度还很低,大幅度紧缩非农产业的就业规模总是伴随着大幅度收缩非农产业的资本



投资,结果在经济繁荣期进城的农民工一旦大量回流不可避免地减缩城市资本投资规模,使非农产业增长急剧下降。这样,我们得到有关就业和产业波动的关系,见表 1-10。

表 1-10 就业和产量波动趋势

	总量经济		农业		非农产业	
	就业	产量	就业	产量	就业	产量
工业扩张期	↑	↑	↓	↓	↑	↑
工业收缩期	↓	↓	↑	↑	↓	↓

问题不在于一般意义上的就业与产量的同向变动,而在于农业和非农产业之间就业、产量存在反向变动,在于工业收缩时其就业变化不是反映在总失业率提高,而是使工业中出现的景气性“过剩劳动力”推回农村,沉淀在农业领域,虽然这时可以相应地推动农业总产量回升,但由于农业中劳动力已经出现拥挤,实际上农业劳动生产率已经下降,从而导致农业中隐性失业率大大提高。如果说工业紧缩时直接导致公开的工业失业率会引起工业劳动力价格下降,从而为工业回升准备廉价劳动力的话,那么劳动力回流到农村则难以使工业劳动力价格下降,因为前者存在劳动者竞争而后者没有这种竞争,而简单的劳动力回流只会使得劳动技能下降,而不会为工业回升准备一个高质量的劳动后备军。

由于就业、物价和产量间不存在自动的竞争性调节关系,所以它们的变动不存在符合市场法则的“相关链”。



总供给波动的社会总需求波动主要是投资需求的波动。投资需求波动是经济波动的直接主因。

§ 2.1 投资周期的强波倾向

讨论投资的周期波动前，先交待有关概念。

我国正式统计刊物中只有“全民所有制单位投资”（包括固定资产、基本建设和更新改造等分类）的完整记录，“全社会投资”这一指标的数字很不完整，这就给我们直接研究“总投资”与“总消费”及国民收入之间的动态关系带来了困难。有学者用“全民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来说明总投资与总供给之间的动态相关关系，这可以说明问题的主体部分，但不是过程的全部，因为从投资方面影响总供给的形成和变动除全民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之外，还有全民所有制单位流动资产投资及非全民所有制单位的投资，而这些指标的时间序列数据也不齐全。弥补资料难题的可行办法是用统计中的“积累”代表“投资”。因为“积累”表示一定时期内物质生产部门和非物质生产部门新增加的固定资产（扣除固定资产磨损）和流动资产，为国民收入减去消费的剩余部分，所以我国统计中的“积累”实际上相当于宏观经济学理论上把握的“投资”。下面就根据 1953—1989 年的资料来考察我国总积累、总消费与国民收入的动态关系。



我们分别对我国 1952—1990 年消费 C 与国民收入 Y 及积累 I 与国民收入做回归分析，得到如下结果：

方程 1：

$$Y = 374.5325 + 2.6957I$$

$$(61.8960)(0.0416)$$

$$R^2 = 0.99$$

$$\bar{R}^2 = 0.99$$

$$D.W = 0.84$$

方程 2：

$$Y = -47.582 + 1.465C$$

$$R^2 = 0.99$$

$$\bar{R}^2 = 0.99 \quad D.W = 0.709$$

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积累（总投资）、总消费与国民收入之间的动态变动存在着高度相关关系，我们从总投资和消费与国民收入的动态关系来研究投资周期波动的特征，从投资波动的特征来解释总量经济波动的特征——强波——是有意义的。

图 2—1 可以对上面回归分析的结果作进一步的直观说明。从图中看出，积累和国民收入之间的上下波动是同向同步的，积累上升，国民收入亦上升，积累下降，国民收入亦下降，这种同步振荡在各周期性波动中几乎无一例外，这说明两点：（1）从国民收入形成的观点看，积累波动直接决定国民收入波动；（2）从积累形成的观点看，国民收入的波动又直接决定积累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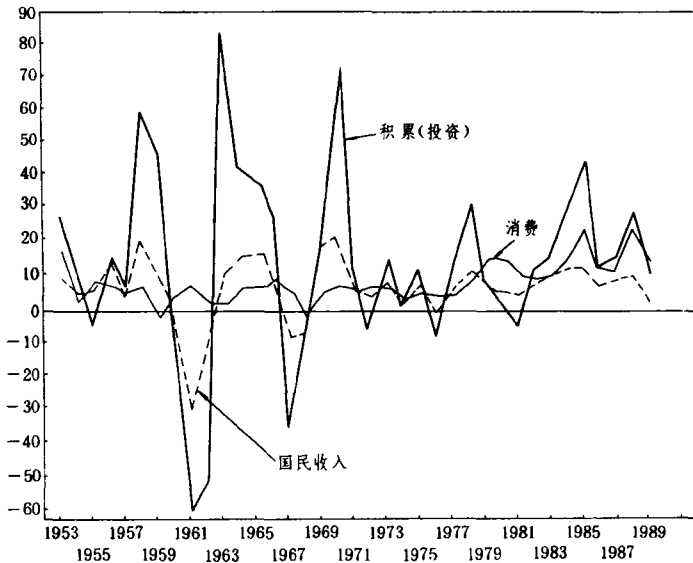


图 2—1 国民收入、积累和消费波动的相互关系*

* 图中“国民收入”为国民收入生产额的增长率。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1）》，第 34、40 页。

波动。因为时滞常常只有几个月，年度资料反映不出以月数计的时滞，所以图中刻画的积累与国民收入变动的相关关系更显出“同步”和“同时”性。

与此不同，消费波动与国民收入波动之间的关系有两种表现：有时是正相关，有时是负相关。正相关又有三种情形，当国民收入增长急剧减速甚至出现负增长时，消费增长也减速，但不如国民收入减速那么急剧；当国民收入增长加速度较小而投资加速也较小时，消费增长加速也比较平缓；当国民收入和投国民收



入和投资同时加速很强时,消费增长加速有时强有时弱。总之,消费增长与国民收入增长的相关程度比较低。(见图 2—1)

从图 2—1 中看到的另一个突出现象是:消费增长波动的轨迹比较平缓、稳定,除 1959 年和 1986 年出现负增长外,其余年份都在零值线以上;国民收入增长稳定性较差,而且出现了 3 次以负增长为特征的低潮;积累增长最不稳定,经常是奇峰突起,急剧扩张伴随急剧收缩,在 10 次波动中出现了 6 次负增长低潮和 1 次零增长低潮,每一次高峰在其他两个变量的高峰之上,大起大落极为显著。

如果对消费、国民收入和积累三者的波动系数作一比较,以 1953 年—1990 年为观察期,积累的绝对波动系数最高,为 0.2883;消费的绝对波动系数最低,只有 0.0617;而国民收入的绝对波动系数为 0.0953,居上述二者之中。即使考虑平均增长率的高低,积累的不稳定程度也是最高的,它的相对波动系数是 0.0200,分别高于国民收入的 0.0131 和消费的 0.0073。(见表 2—1)因此得到一个统计结论:在增长波动的强度上,消费 C 最低,国民收入 Y 居中,积累 I 最高,即有关系式:

$$C < Y < I \quad (2.1)$$

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我国统计中的“积累”相当于新资本形成,相当于总投资,所以积累的强波动实际上就是总投资的强波动。总投资包括总固定资产投资和总流动资产投资两部分。从所有制形态来看,总固定资产投资又分作全民和非全民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两类。而全民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又由



基本建设投资和更新改造投资两个部分构成。表 2—1 也提供了全民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和基本建设投资的波动系数。显然,全民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的波动系数(绝对的和相对的)高于全社会总投资波动系数,而基本建设投资的绝对波动系数又高于固定资产投资的波动系数。因此我们得到另一个统计结论:在投资波动的强度上,基本建设 B 高于固定资产 F , 固定资产高于总投资 I , 即有关系式:

$$I < F < B \quad (2.2)$$

这说明,在社会的生产和投资活动中,国有经济部门的投资活动,尤其是基本建设投资活动具有更强的波动倾向。投资强波直接造成经济增长的强波。

表 2—1 1953—1989 年五项指标波动系数比较

	平均增长率 $\mu(\%)$	绝对波动系数 σ	相对波动系数 $V\sigma$
国民收入	7.26	0.0953	0.0131
积累	14.44	0.2883	0.0200
消费	8.4	0.0617	0.0073
全民所有制 单位固定 资产投资	14.07	0.3252	0.0231
全民所有制 单位基本 建设投资	15.54	0.3365	0.0217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1)》,第 33、40、147 页;《1950—1985 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9、43 页。



§ 2.2 过度投资与加速增长

1. 过剩需求

投资是总需求的一个组成部分，要了解过度投资首先必须对过剩需求有一个清楚的认识。所谓过剩需求是指超过总供给的那一部分需求，从国民收入的观点看则是其使用额 Y_1 超过其生产额 Y_2 的差额，形成“赤字收入”，它表明全社会本期的开支即投资与消费之和大于本期生产所创造的收入，表明当前向未来“借贷”，存在“国民收入超分配”。如果某经济自始至终存在这种“赤字收入”或“超分配”，则意味着它是一个典型的需求过剩经济，经济系统的非均衡状态表现为经常性的供给短缺，实际需求水平总是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超过实际供给水平，供求差率为负。^①

现根据上述定义，对我国国民收入生产和使用的变动趋势作一观察（见图 2—2）。

^① 计算供求差率的最简单公式是： $\frac{s}{d}$ 或 $\frac{s-d}{d}$ ，如果供给 s 小于需求 d ，用前一公式所得计算结果为正数小数，用后一公式则为负数；如果 $s=d$ ，用前一公式得到的计算结果为整数 1，用后一公式则为零，如果 $s>d$ ，用前一公式得到计算结果为大于整数 1 的数，而用后一公式则得到一个正数。通常所讲的“供求差率”是用后一公式计算得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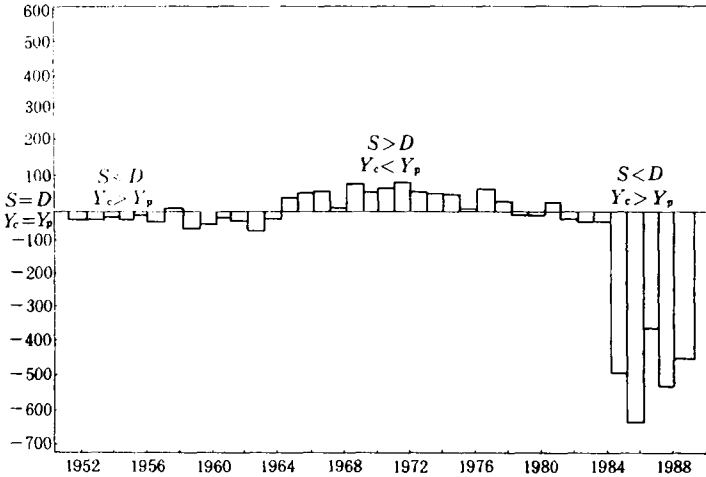


图 2-2 1952—1989 年供求差变动趋势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1）》，第 32、40 页。

图 2-2 表明，我国 1952—1989 年期间供求对比关系的变动有两种形式：一是供大于求，二是求大于供。前一种形式存在于 1965—1978 年期间，后一种形式存在于 1952—1964 年和 1979—1989 年这两个时期，在这两个时期中只有 1958 年和 1981 年国民收入的生产额大于其使用额。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说“社会主义经济必然是一种短缺经济”，不能笼统地认为“中国经济属于需求过剩经济”。事实上，在社会主义集中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可以通过管制、配额和许多限制性措施抑制需求的形成，用低水平需求去适用低水平供给，以创造出人为的供求均衡甚至创造出有效需求不足来。但是，只要政府放松



直接控制，取消定量配给，实行价格自由化下的供求自动适应政策，像1965—1978年那样持续14年的“供给过剩”情形就难以出现，常规形态必然是需求过剩、供给不足。1989和1990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市场疲软，人们似乎感觉到有效需求不足的严重性，但实际上只不过是结构性有效需求不足，因为在总量上国民收入使用额仍然大于其生产额，“赤字收入”并未消除，财政赤字亦有增无减。因此，如果我们放松体制假定，让1965—1978年具有与该时期以前以及该时期以后同样的制度背景，那么可以说，需求过剩是仍然存在的。

在这里，我们感兴趣的不是短期“供给过剩”为什么会产生，也不是想一般地说明中国为什么会产生产长期意义上的需求过剩，而仅仅想从需求构成角度探讨我国过剩需求到底具有什么样的特征：是全面性（包括投资和消费两个方面）需求过剩？还是结构性需求过剩？就是说，是否存在消费需求不足下的投资需求过剩？如果两种情形都存在，那么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投资需求过剩是我国总需求形成的基本特点，过度投资是一种常态，而过度投资又势必成为强波高潮期形成的基本因素，成为国民经济大起大落过程中“大起”的直接诱因。

下面还是想从统计观察出发来讨论过度投资及其与强波增长的关系，因为我始终认为来自经验观察所得出的结论总是要比来自头脑中先入为主的“推论”要可靠得多。



2. 投资需求过度:经验分析

从图 2—2 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我国 1952—1989 年总供给和总需求对比关系的变动有两种情形,一是总需求过剩、总供给不足;二是总供给过剩、总需求不足。我们已经指出,1965—1978 年期间出现的供给过剩是政府通过种种措施强行抑制的结果,它是一种反常规的现象。现在,我们要进一步证明的是,即使是在非常规的“供给过剩”时期也会存在投资需求过度,只不过它是以提高消费不足程度为代价。因为总需求 D 等于投资需求 I 和消费需求 C (包括政府消费和私人消费)之和,即有 $D=I+C$ 。在 D 为既定并且让 I 和 C 之间存在一个均衡比率,让 I 和 C 中任意一个高出这个均衡比率,我们就认为二者之中任意一个存在过度需求;如果 C 低于它的均衡比率而 I 高于它的均衡比率,我们则认为存在消费需求不足和投势需求过剩。因此,即使是在总量需求相对不足的情况下,如果实际消费率低于其均衡比率以及投资率(积累率)高于其均衡比率超过供求正差率,那么投资需求过剩就会成为客观现实。下面依据经验资料对此予以进一步的分析。

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根据世界银行《1990 年世界发展报告》公布的数字,我国国内投资的增长速度,不仅比高、中等收入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增长速度要高,而且还高于其他低收入国家,只是 1965—1980 年中国投资增长率比低收入国家低 0.2 个百



分点；而且从1965—1980年到1980—1988年，其他国家的国内投资增长率基本上表现为减速（只有高收入国家加速了0.3个百分点），但中国却加速了3.7个百分点。从消费和GDP的增长的相互关系来看，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消费增长基本上快于GDP增长，而中国的消费增长虽然1980—1988年比1965—1980年有较大加速，但仍慢于GDP的增长。另外，从消费和投资各占GDP的份额来看，1965—1980年中等收入国家为79：21，下中等和低收入国家为81：19，高收入国家为80：20，中国和上中等收入国家都为76：24。在1980—1988年期间，中国的投资率比其他国家的平均投资率要高出10个左右的百分点。总之，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我国的消费率和消费增长率相对于GDP增长率及投资率和投资增长率而言是最低的，据此可以认为，中国存在比较明显的消费需求不足和投资需求过度的现象（见表2—2）。

最近几年，我国经济学界流行着“双膨胀”观点，按照这一观点，在传统体制条件下，经济运行中的需求膨胀只是单元的投资需求膨胀，而在体制变革中特别是1984年以来需求膨胀已经转变为二元式了，即不但存在投资需求膨胀而且存在消费需求膨胀。实际上，持这一观点的人是被改革时期消费增长速度加快这一现象所迷惑，他们没有看到GDP增长速度和国内投资增长速度加速更快。按照世界银行的口径，1980—1988年与1965—1980年相对，我国GDP增长加速了3.9个百分点，投资增长加

表 2-2 国内生产总值、消费与投资增长的国际比较(%)^{*}

国 别	国内生产总值 GDP		政府总消费 C _g		私人消费 CP		国内投资 I	
	1965—80	1980—88	1965—80	1980—88	1965—80	1980—88	1965—80	80—88
中 国	6.4	10.3	5.6 (14)	9.4 (7)	5.2 (61)	7.4 (56)	10.7 (24)	14.4 (38)
中等收入 国家和地区	6.1	2.9	7.7 (11)	2.5 (15)	6.6 (67)	2.5 (59)	8.6 (21)	-0.6 (25)
下中等收入 国家和地区	6.5	2.6	7.4 (10)	2.7 (12)	6.2 (71)	2.2 (64)	8.5 (19)	-1.6 (23)
上中等收入 国家和地区	5.6	3.3	8.0 (12)	—	7.1 (62)	2.9 —	8.7 (24)	-0.5 —
低收入国家	5.4	6.4	6.3 (11)	7.0 (10)	4.1 (70)	5.2 (65)	8.8 (19)	8.0 (28)
高收入国家	3.7	2.8	2.7 (17)	2.6 (17)	3.9 (63)	3.0 (61)	3.4 (20)	3.7 (22)

* 括号外为增长率,括号内为份额,并且分别取时点1965和1988年,同期的C_g+C_p+I=100,但有一些小的误差。
资料来源:《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贫穷》,第180—181、192—193页。



速了 3.7 个百分点,而私人消费增长只加速了 2.2 个百分点,即使是加速较快的政府消费也只多增长了 3.8 个百分点,比 *GDP* 还低一个百分点。这就是说,改革时期我国消费尤其是私人消费仍然表现为不足,因为消费增长速度并未超过 *GDP* 增长速度。如果我们观察消费率,1980—1988 年比 1965—1980 年实际上还下降了 5 个百分点。

我们再以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来证明我们的判断。表 2—3 告诉我们,1953—1990 年期间我国消费年均增长率为

表 2—3 中国国民收入、消费、投资(积累)增长的阶段性变化*

	国民收入 Y	总消费 C	总投资 I
1953—1964	5.38	5.74(74.38)	15.24(25.62)
1965—1978	7.71	5.29(69.96)	13.35(30.04)
1979—1989	9.28	15.18(67.54)	15.75(32.46)
1953—1978	6.64	5.90(72.00)	13.95(28.00)
1953—1989	7.26	8.40(70.67)	14.44(29.33)

* 括号外为增长率,括号内为份额,同期的 $C+I=100$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1)》,第 32、40 页。

8.4%,比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的 7.2%略高一些,但年均投资增长率更高。其中,改革时期的消费增长率为 15.18%,比同期国民收入增长率高 5.9 个百分点,而投资增长率高达 6.5 个百分点。这里的问题是,我们判断一国消费需求是否过度不能单纯看“增长率”,因为这有一个基数低的问题,所以还应当看“份额”,而在选择依以比较的参照份额时又应当考虑到世界各国消



费率的平均水平。根据对表 2—2 进行估算,这个“平均水平”大体为 75—80%左右。但是我国近 40 年来的消费率平均只有 70.7%,比国际平均水平低 5 至 10 个百分点,从这个意义上看,我国平均消费需求不是过剩而是不足。按阶段来分析,我国消费率呈下降趋势,1953—1964 年为 74.4%,1965—1978 年为 70%,下降 4.4 个百分点,1979—1989 年又进一步下降 2.5 个百分点,为 67.5%可见,我国近 25 年来消费占国民收入的份额呈下降趋势,而投资份额呈阶段性上升趋势。而且在二者的份额中,消费率的水平仍然是不高的。

以上的分析表明,我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需求过剩主要表现为投资需求过剩,除 1953—1964 年的消费率(74.4%)基本上达到正常水平外,其余时期均表现为消费需求不足。在改革初期有关发展战略的讨论中,许多经济学家建议政府采取降低积累率(投资率)的措施,从 1966 年至 1980 年连续 15 年 30%以上的积累率下调到“25%左右”,后来实际上难以办到,于是又有人主张“选择 29%左右”的积累率,似乎 30%应当作为积累率的警戒线。这个主张在实际中只有 3 年(1981—1983 年)生效,1984 年以来又高升到 34%左右,实行治理整顿的 1989 年仍保持在 34.4%的高积累水平。这说明,在我们这里存在着引致投资过度的内在机制。这个机制造成强波高潮期的形成。

在西方经济学界在关于国民收入增长和消费增长关系的问题上,存在着杜生贝利与凯恩斯的争论。按照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定”,国民收入增加,消费会随着增加,但消费增加不及



收入增加那么快，单位收入增量中消费占的份额愈来愈小，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消费率下降。他写道：“总真实所得增加时，总消费量也增加，但不如所得增加之大。”杜生贝利根据他所建立的长期消费函数证明：在长期中，由于消费者行为的不可逆性及消费者行为的示范效应，消费量会随收入增长而同比例地增长，消费率是稳定的，不会下降。^①在中国，我们看到的情形和凯恩斯讲的差不多，即消费率在1953—1989年期间是下降的，但从增长率看，我国同期的消费增长略快于国民收入增长率，不过并没有验证杜生贝利的“消费率保证不变”的假说。这里的重要原因不在于消费者的自发行为，而在于政府的过度干预作用。在我国改革以前，经济活动都由政府控制，消费者并没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当政府为了加速工业化而不得不实行过度投资政策时，就自觉不自觉地将消费需求尽可能压低，将一部分本应流入消费领域中的收入转入投资领域，形成为资本，结果消费率总是处于比较低的水平。关于这一点，我们以后讨论政府的扩张行为和工业化对周期的影响时，将予以进一步的分析 and 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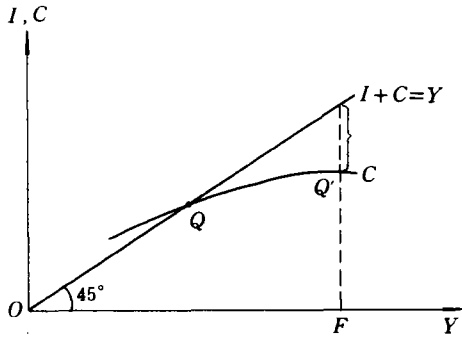
3. 过度投资形成：模型解释

前两小节的研究表明，在我国，过度投资存在于两种宏观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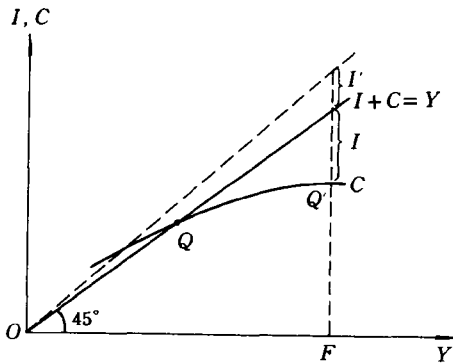
^① [英] 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9页；宋承先等：《当代西方经济思潮》，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0—34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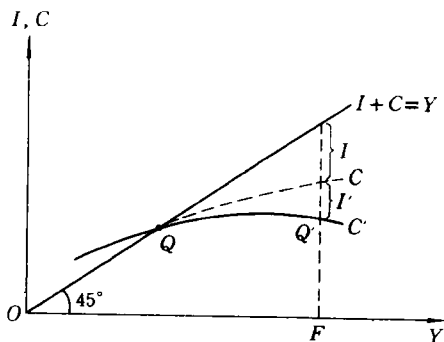
济状态中：一种是总需求过剩，另一种是总需求不足，现在我们进一步从理论抽象的角度论述这两种宏观经济状态下过度投资需求是怎样形成的。为了表述的简洁，我们直接根据图 2—3 中所给出的三个模型进行解释。



(a) 均衡投资



(b) 货币过剩推动过度投资



(C) 消费抑制下的过度投资

图 2—3 均衡投资与过度投资模型

模型 (a): 均衡投资

我们以轴表示国民收入 Y ，以纵轴表示投资需求 I 和消费需求 C ，由于 $Y=I+C$ ，当 Y 增长 1 个单位时， I 和 C 增长之和亦为 1 个单位，这里只存在 I 和 C 在份额配比选择上的多样性，二者份额之和在理论上不会大于也不会小于单位 1，所以存在一个斜率为 1 的 45 度线，这条线上的任意一点表示 $I+C=Y$ 。曲线 C 表示消费率变动轨迹，当它在点 Q 时意味着 $I=0$ ，全部国民收入用作消费 C ；从点 Q 往左下移，意味着负投资，并且实际消费需求超过实际供给所能满足的水平；从点 Q 往右上方移动表示投资率逐渐提高，消费率逐渐下降，移至点 Q 时，消费率水平达到最高位置，随着国民收入的加速增长或者说当收入



达到使消费者选择空间难以相应扩大从而出现消费极限^①时，投资率 I 将会逐渐有所提高，而消费率则会出现一个从长期来看的下降趋势。^② 在模型 (a) 中，遵循两个重要假定：(1) 不存在货币过剩；(2) 不存在消费需求不足，这里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分别与国民收入所能提供的相应供给完全一致，达到理论上的均衡。因此，这里的投资属于均衡投资，相反，模型 (b) 和模型 (c) 的投资均属于非均衡投资或过度投资。

模型 (b)：货币过剩推动下的过度投资

这个模型的特征是，消费曲线保持不变，实际消费率仍然和国民收入所能提供的消费品供给水平相一致，从消费本身的供求关系看，既不存在短缺，又不存在过剩，就是说消费品市场处于结清状态，存在供求均衡；但投资品市场存在求大于供的非均衡状态，产生了过度投资需求 I' ，这里的总投资需求不仅是 I ，而是 I 和 I' 之和。这种过度投资的形成完全是由于货币超发造成的，即政府通过创造货币的办法来支撑超过国民收入实际所能提供的投资品供给水平。这种情形之所以能成为现实

① 我这里讲的“消费极限”是一个需要在相对意义上来把握的概念，它主要是指人的生理和精神消费需要已最终满足，而是一个受体制、政策、结构（生产结构和消费结构）和其它社会经济因素所影响而产生的现象。

② 这一定律可以用经验统计来证明。从高收入国家（地区）和 OECD 成员国的情形看，从 1965—1988 年，其消费占 GDP 的份额的平均水平，均是从 80% 下降到 78%，而较低收入国家和地区则是从一个较低消费率进一较高消费率。大致看来，我们模型中 Q 点的消费率大约在 80% 以上。当一国的消费率达到 80% 时，随后可能出现消费率下降趋势。



乃在于经济运行中价值形态和实物形态经常会发生分离。严格说来，模型（b）中只存在投资品市场的短缺现象，因为这里的投资过度直接是因为货币过剩所推动。

模型（c）：消费抑制下的投资过度

与模型（b）不同，模型（c）中假定存在货币均衡，即货币没有超发，而过度投资 I' 是靠抑制消费来实现的，投资过度与消费不足并存。政府在进行国民收入分配时将本应留给消费者的一部分收入转至投资者手中，即将消费曲线 C （虚线）移至 C （粗黑线），创造出过度投资 I' ，所以这里的实际投资需求也是 $I+I'$ 。如果说模型（b）只在投资品市场存在一个供求缺口的话，那么模型（c）存在两个供求缺口：一是投资品市场需求过度、供给短缺；二是消费品市场供给过剩、需求不足，因为按照马克思的“两部类学说”，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虽然在价值形态上可以相互通约，但其实物形态上的均衡是不能互相替代的。无疑地，由消费需求不足来支撑的过度投资势必伴随巨大的国民收入使用上的损失。

4. 过度投资与加速增长

在均衡投资模型中，经济增长的起伏波动照样存在，但这种波动采取常规形式，经济的扩张和收缩之间形成的转折将是轻缓的，不会产生机制性大起大落，因为这一模型不但要求投



资和消费实现“均衡增长”，不致出现“结构失调”，而且要求货币的增长与国民收入的增长相适应，保持货币的供求均衡，这样，市场上的价值实现和供求变动不会产生，因为严重的短缺和过剩并存而引起的突发性震惊和灾变，增长和波动总是渐进式的。

相反，在过度投资的情况下，经济增长过程很容易产生非常规的强周期波动。就货币过剩推动过度投资而言，货币增长加速扩张无疑会在短期内推动投资加速扩张并使经济增长很快进入高潮期，但这个增长高潮很快会因为“结构不平衡”而停止。比如通过银行多发票子在同一个时期上一些超越现实可能的大项目工程，用命令的方法集中动员资源，把本来应分布在一个较长时距的资源以浓缩的方式分布在一个较短的时距中，开始时呈现大繁荣景气，但要不了多久这种繁荣将变成虚假繁荣，最后因为短缺超过容忍限度而停止。这是因为以缩小时空的方式集中动员资源必然诱发“纵向的结构失调”，许多已开工项目在获得初始投入后难以得到性质相同的追加投入，许多环节受到“短线制约”而不得不中断，结果是大量的资本投入半途而废，生产和建设不得不部分地或全部地收缩，政府也会因此作出让项目突然下马和让银行突然抽紧银根缩减信贷的决定，以避免资本损失再累积地持续下去，同时避免短缺和通货膨胀之间出现社会难以承受的恶性循环。美国经济学家哈伯勒曾谈到原苏联实行过度投资政策的情形：“他们不愿意用现有的、带有原始式的方法来生产消费品，他们宁可把供作目前消



费的生产减到无可再减的程度。他们在生产中所注重的不是食品、房屋、衣鞋等等，而是发电厂和钢铁厂，他们所要努力改进的是交通运输系统”。但在五年计划执行中途，由于人民生活水平下降，政府不得不改变政策，“尽可能迅速地从事于生产消费品。这时关于发电厂、钢铁厂、拖拉机等等的建设工程将不得不中途停顿，将尽量加速从事于制造简单工具，来增加食品、房屋、鞋子等等的产量。这样将有大量资本被陷入半途而废的建设工程，在资本方面将受到巨大损失”^①。然而，就在这时，经济增长从高峰向低谷急剧转折的事实已经发生了。哈伯勒所描述的苏联早期的情形，在中国改革以前的时期同样存在。

就消费抑制下的过度投资而言，其情形与货币过剩推动过度投资的情形类似，所不同的只是，在消费不足的情况下存在的主要是“横向的结构失调”，即消费品市场存在需求不足、供给过剩，投资品市场存在供给不足、需求过剩。在货币均衡的条件下，通过抑制消费需求来扩张投资需求虽然可以在一个比较短的时期内生效，但由于市场的结构矛盾以及消费者的不满和抱怨，它将难以为继，至少要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投资率提高消费率，而这一政策措施的后果必然是原来形成的加速投资意愿有一部分不能兑现，急剧繁荣为急剧衰退所中断。从实际情况看，即使是消费增长最慢，消费需求不足程度最高的 1965—1978 年期间也并不意味着消费率每年处于最低状态，而是有时

^① [美] 哈伯勒：《繁荣与萧条》，商务印书馆 1980 年版，第 61 页。



强抑制,有时又回升,有时达到高水平。比如,1969年消费率只有69.4%,1967—1969年3年平均增高78.1%,1970和1971年又连续两年下降,到1972年又回升,1973年和1975年分别下降而1974和1976年又分别回升,1977—1978年再次下降,等等。其升降变化的特征是:经济走向复苏和高潮时,投资率上升,消费率下降;经济走向收缩和低谷时,投资率下降,消费率上升,因此,我们得到有关经济增长、投资率和消费之间变动的相关关系式:

A 高潮期: 投资率 \uparrow , 消费率 \downarrow ;

B 低潮期: 投资率 \downarrow , 消费率 \uparrow 。

这就进一步证明经济周期与投资周期正相关,与消费周期负相关,而在动态过程中投资扩张倾向是不可能永久维持,而消费抑制也不可能持续不断。因此,过度投资过程将会一次又一次地从自己的起点出发,然后又回到自己的终点,由此而导致总量经济增长出现繁荣和衰退的循环交替。由于过度投资从扩张到收缩以及从低谷转向高峰表现为强烈震荡,所以总量经济增长的起落变化也表现为强烈的震荡。



§ 2.3 投资减速与经济衰退

1. 过度扩张紧跟着过度收缩

过度投资不可能无限地持续下去，不可能按同一速率不间断地延伸，它会因为各种“瓶颈”的制约和“失衡”的加剧而发生常常是突发性的中断。经济高潮期投资过度扩张的程度越高，随之而来的投资减速幅度亦会越高。我们将全民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基本建设投资与全社会中总投资（总积累）的增长率进行比较，可以看出，在10次周期波动中，谁在高峰时期的增长率越高，它在周期低谷的增长率就越低，从高潮到低潮的落差也就越大，因此周期内的投资减速幅度与其在高潮期的过度扩张程度紧密联系。表2—4中，总投资增长的扩张程度相对来说比较低一些，它在周期最低点的平均取值比全民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的低谷平均值略低一些，但比全民所有制单位基本建设投资增长率在低谷点的平均值要高一些，因此它的减速幅度（平均落差）也比较小一些。相反，全民所有制单位投资在高潮时的扩张幅度较大从而在低潮时的减速幅度也较大，结果高低落差也比较大。如果将总投资理解为全民所有制单位投资和非全民所有制单位投资两部分，那么可以知道，非全民所有制单位投资的扩张程度较低，它在低谷时



表 2-4 不同层次的投资波动 (%)

波动次数	总投资(积累)			全民单位固定资产投资			全民单位基本建设投资		
	最高点	最低点	落差	最高点	最低点	落差	最高点	最低点	落差
第一波	29.2	-5.1	34.3	110.3	2.5	107.8	107.6	1.3	106.3
第二波	17.3	7.4	9.9	52.8	-6.0	58.8	54.7	-7.7	62.4
第三波	62.7	-61.1	123.8	84.5	-62.5	147.0	87.7	-67.2	154.9
第四波	84.9	-35.3	120.2	42.2	-26.3	68.5	46.8	-33.1	79.9
第五波	73.1	-5.3	78.4	62.9	-1.1	64.0	77.6	-3.8	81.4
第六波	14.4	0	14.4	6.1	5.7	0.4	3.1	2.8	0.3
第七波	12.0	-9.9	21.9	17.6	3.8	13.8	17.7	-8.0	25.7
第八波	30.7	-5.1	35.8	22.0	-10.5	32.5	31.0	-20.8	51.8
第九波	46.3	12.0	34.3	41.8	17.7	24.1	25.4	9.5	35.1
第十波	28.3	10.5	17.8	20.2	-9.2	29.40	14.2	-1.4	15.6
平均值		-9.2	49.1	46.1	-8.6	54.7	46.6	-14.6	61.3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1)》,第40、147页。

期的减速幅度也较低,从而其峰谷落差较小。从全民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的内部构成来看,基本建设投资在高潮的扩张度高在低潮的收缩度大从而峰谷落差大,意味着更新改造投资的扩张度和收缩度都比较小从而其稳定程度好一些。如果分阶段来看,投资的前6次波动之所以落差幅度较大是因为它在全高峰期的扩张度相当大;后4次波动的落差幅度大大下降又是因为周期高潮期投资扩张的程度下降了。

总而言之,投资的过度扩张必然伴随着过度收缩,“大起”或“大上”必然跟随“大落”或“大下”。这一周期现象不但存在于中国,而且存在于其他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国家。匈牙利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内在他的《增长、短缺与效率》一书的中文本序言中写道:“我们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常常可以观察到如下



现象：加速发展时期后面紧跟着减速，开始是高速‘奔跑’，然后突然放慢，削减投资，压缩在建项目”^①。

进一步的问题是：为什么过度投资不能持续不断地坚持下去，而总是会在或迟或早的时候突然放慢？为什么周期高潮阶段投资过度扩张的程度越高伴随而来的是低潮阶段的突发性收缩？为什么国营单位投资的起伏波动要比非国营单位投资的起伏波动更强一些？为什么国营单位投资中基本建设投资的大起大落更为明显？有关这些问题的解释可以有多种答案，既有政策指导上的原因，又有体制结构上的原因，还有投资本身的效率方面的原因，这些原因既用来分析投资强波的生成，又事实上是对总量经济强波现象的解析，因为投资波动直接推动总量波动。不过我们在本节的研究重点只是集中在投资运行机制本身，制度和政策分析留给以后章节去完成。

2. 资源瓶颈

投资过度扩张不能持久的首要原因是存在如卡莱茨基所说的“供给约束”或如科尔内所说的“资源约束”^②。这种约束包括两个层面：一是表现为总量上的绝对约束，即总供给相对于生长旺盛的总需求而言存在着绝对数量上的短缺；二是表现为

^① [匈] 科尔内：《增长、短缺与效率》，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2 页。

^② 陈东琪：《东欧经济学概论》，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65—277 页。



结构上的相对约束，即短线变量相对于长线变量而言短线变量的供给数量不足，跟不上长线变量发展所提出的需求。通常地，第二种约束存在不等于第一种约束存在，而第一种约束存在则必然意味着第二种约束的存在。我们以总量短缺下的结构性约束为分析背景。

在最抽象的意义上，资源约束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来自物质形态上的资源瓶颈，二是来自劳动力和技术形态上的资源瓶颈。我们现在来考察这两个瓶颈对过度投资扩张的限制。为了使我们的表达更为清晰简练，我们根据图象模型来进行解析。

先看来自物质形态的资源瓶颈对投资过度扩张的限制。

假定有两种产品，一种是机器，另一种是电。我们用横轴表示机器的生产和投资，即有 I_1 ，用纵轴表示电的生产和投资，即有 I_2 。现在我们打算扩大机器生产规模，加速机器生产的基本建设投资，使机器生产的投资从 M_1 移至 M_2 。在理论上，当 M_1 向 M_2 移动时，必然要求 E_1 向 E_2 移动，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产业或产品生产的均衡。但这里要求有一系列前提条件，除了生产和投资存在充分的自由选择、生产要素流动是自由的、存在一个均衡的自由价格体系以及厂商行为自动接受平均利润率规律的调节等条件外，是资本供给充裕，投资的金融资源和物质资源存在一个几乎是应有的后备量。在这种资源条件下，当机器制造业扩张从而对电的需求随之提高时，电价亦随之上升，电价上升又会使电力生产者和投资者的利润预期提高，最终引致电力投资扩张加速，结果是 $M_1 M_2 = E_1 E_2$ （图 2—4）。



于 AB 的资源需求得不到满足，它的投资和生产实际上成为一种虚置，因为没有 BC 提供相应的资源供给，就不会带来实际的国民收入 AC 。 AB 的资本形成虽已完成，它已形成为真实的投入，但仍只能处于未开工状态，不能创造出实际产出。比如，机器制造业的生产规模虽已扩大，但因为缺少电力供应，其扩大部分不能投入营运，以至不可能形成一个新的国民收入增量。

消除“缺口”或“瓶颈”的办法，是将给定的投资增量（一个相当于 AB 长度的那个量）在 I_i 和 I_j 之间进行平均分配，将 AB 分解为 AF 和 FB 。模型中，因为 $FB=FD$ ， $FD=E_1E_0$ ， $AF=M_1M_0$ ，所以理论上的投资均衡分配是：在 I_i 和 I_j 中分别实行 M_1M_0 和 E_1E_0 的扩张。对于 I_i 而言，在新资本形成完成以后再进行适应于产业结构均衡的调整，即从 AB 减缩到 AF ，实际上意味着它已产生过度扩张后的衰退。这里的衰退不仅是结构上的，而且是总量上的，因为第一阶段的总量扩张为 AB ，而第二阶段的实际扩张不是 $AF+FD$ 而是 FD ，或 $\frac{1}{2}AB$ ，即第二阶段的扩张量比第一阶段的扩张量减少一半。因此，从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形成一次过度扩张和一次收缩，产生一次波动。这说明过度扩张的中止和衰退的出现是资源“瓶颈”的约束所致。^①

^① 在最近几年有关经济增长和周期波动的讨论中，人们常常谈论“长线”太长，“短线”太短，把短线约束当作理解周期衰退阶段产生的重要原因，有的学者据此主张由政府加强对“短线”产品或产业的支持，以减缓经济衰退程度，但实践中的“长短线问题”老是解决不了。这是为什么？对此，我们将在讨论“结构”的那一章中加以探讨。在专注于“总量问题”的本章，暂不涉及周期的结构因素。



当然，我们也可以走第二条路：在第二阶段上，不是收缩，不是从点 B 左移至点下，而是在维持 I_1 已形成的新资本规模 AB 的前提下，用扩大 I_2 资本规模的办法来实现产业均衡，让 $BC = AB$ 。这就是说，过度投资按等速进行。不过，这里的假定是：第一，资源供给是无限的，加速的投资增长随时都有足够的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予以满足；第二，由高速投资需求推动的高通货膨胀不会遭到群众的反对。然而，事实上，这两个假定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并不能成立。退一步说，即使这两个假定成立，在设定的时间过程中，也会存在以扩张和停滞循环交替为特征的产业周期。如前面图 2—4 所示，第一阶段， I_1 扩张 AB ，而 I_2 停滞；第二阶段， I_1 停滞，而 I_2 扩张 BC ；第三阶段 I_1 扩张 CG ，而 I_2 停滞；第四阶段， I_1 停滞，而 I_2 扩张 GK ，……，如此循环往复，以致无穷，产生一次紧接一次的产业周期波动。我们在本章集中要讨论的不是“结构性产业周期波动”及其特征，而是从“总量”上弄清楚经济周期波动尤其是强波的成因，因此我们不得不就上述两个假定发表一些切合实际的想法。

3. 人力资本短缺

前一小节，主要从“物”的方面讨论资源“瓶颈”对过度投资持续性的限制以及对周期低潮形成的效应。本小节拟从“人”的方面来进一步展开这一讨论。

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教授舒尔茨于本世纪 50 年代末



就创立了后来愈益为人们所重视的“人力资本”理论。按照这一理论，“经济发展主要取决于人的质量，而不是自然资源的贫富或资本存量的多寡”。舒尔茨关心的是人力资本的形成，人的质量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未研究人力资本短缺对经济周期的影响。从我国的实际情形来看，弄明白人力资本短缺与扩张中断的关系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这里提出一个十分粗糙的研究思路。

我们借用西方微观经济学中的“等产量线”概念来建立分析模型。在图 2—5 中，令纵轴为劳动投入，横轴为资本投入，假定劳动力供给是无限的，存在资本限制。现在政府决定扩大生产规模，主要是扩展那些劳动替代资本程度高的产业。实际过程中，这种替代不会产生资本投入增量等于零而全部新增投入都表现为劳动投入的情形，因为至少为新增劳动者追加的工资开支（无论劳动力如何廉价这个开支总是会取得一个现实的量）就是一笔实实在在的可变资本，而且还需要有相应的生产工具投入，但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假定资本投入 K 取 K_0 ，只是单纯扩张劳动投入，从 A 至 B 。但是，这一扩张要求有充分可用的人力资本的储备，要求有足够的熟练劳动。如果人力资本不足，现实中所能提供的熟练劳动只能取 AC 量，不是 AB 量，大量剩余劳动力都是不熟练劳动，这样，原来形成的过度生产计划 AB 不能实现，生产规模的实际扩大只能是 AC ，因而新的等产量不能与点 B 相切而只能与点 C 相切（图 2—5）。在这里，人力资本短缺对生产过度扩张的约束是相当明显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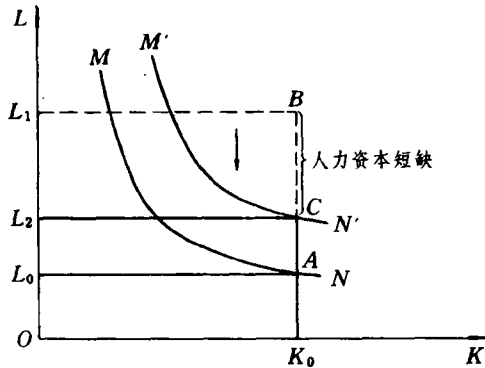


图 2—5 人力资本短缺对生产过度扩张的限制

我们进一步考虑一个这样的情形，决定实施一个过度投资扩张的计划，打算扩大一个 100 亿元规模的资本投入，这个 100 亿元分布于各为 50 亿元的两个投资阶段：第一阶段只需要简单劳动投入，第二阶段完全需要具有熟练技巧的复杂劳动投入。如果实际的劳动力供给只能完成简单劳动，那么过度投资计划的第二个 50 亿元就不能实现，但由于项目的整体性，要使第一个 50 亿元的资本设备实际投入运作就必须完成第二个 50 亿元的投入，否则就只能让已完成一半工程的投资项目下马，削减投资。这样一来，已展开的投资活动不仅没有创造出真实产出，未带来有效供给的增长，而且投资的扩张和收缩已经发生。这一现象在宏观经济上的效应是：投资的乘数效应 $K(\Delta Y/\Delta I)$ 下降，投资的加速系数 $\Delta i(I/\Delta Y)$ 提高，单位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减少，形成单位国民收入需要有更多的投资。这主要是一个经



济效率问题，对它的进一步论述已经超出本章的研究范围。关于效率与周期的关系将在第 5 章展开。

我们的分析表明，人力资本短缺既是有效供给增长的障碍，又是过度投资扩张产生中断的基本原因之一。一般来说，在经济的扩张时期，生产过程可以吸纳大量的简单劳动，这是因为扩张时期存在一个份额很大的初始建设规模，其中许多投资如厂房建设和其他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来说可以容纳比较大的简单劳动投入，对高技术劳动的需要相对小一些。一旦初始建设完成，对熟练劳动的需求就会增大，而对简单劳动的需求会相对减少。如果存在开放的劳动力市场，生产和投资过程中工艺和技术要求的变化将同时伴随着简单劳动投入的起伏波动。如果不存在这样的劳动力市场，进入对熟练劳动的需求增长时，那些只能从事简单劳动的劳动者就会处于“在职失业”状态，五个人干三个人的活，劳动生产率下降，但工资支出依然如故，可变资本投资有增无减。如果熟练劳动的供给不能满足它的需求，其投资选择，要么是按原来的速率继续加速扩张，其结果是投资效率下降，乘数效应降低，以致投资扩张的轨迹在产量扩张轨迹的上方离得愈来愈远；要么是保持投资效率和乘数效应的水平，缩减资本尤其是固定资本（严格地说是不变资本）的投入，砍固定资产投资，放慢高工艺、高技术设备投资的增长速度。在我国投资规模调整的实践中，这两种选择经常被间歇地采用。我国经济学界最近几年来有关投资效率低下和投资周期



波动的成因的讨论中，经济学家们更多强调的是“体制”、“政策”和“管理”等方面的问题，实际上，除了这些因素外，人力资本短缺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解释变量。

4. 来自消费方面的约束

前面谈到过消费需求不足问题。在那里我们强调，政府为了实现非均衡投资计划，不得不在抑制消费上作出努力，采取所谓“为了未来牺牲当前”的策略。实行这一策略，对于行政决定的经济来说是相当容易的，因为政府不仅掌握了宏观调节、收入分配、消费品供应上的定量配给权力，而且控制着全社会的主要产权。它可以通过相对价格结构和征购派购及义务交售等方式剥夺农民，用抑制农民的消费的办法来加速非农产业的资本形成；可以通过定量配给限制城市居民的消费增长，让一部分本应成为消费资源的国民收入流入生产过程中形成为资本投资；也可以凭借产权控制在做有关 C （不变资本）、 V （可变资本）和 M （利润）的决策时通过减少 V 来相对扩大 C 和 M ，实行低工资和低购买力政策。抑制消费的直接目的是加速投资。现在要研究的是，这种“抑制”和“加速”不是始终如一的，不是等速率的，在纵向过程的不同时点上常常表现为时强时弱，会发生间歇性中断。这不仅是因为消费抑制超过消费者容忍限度时，政府会担心挫伤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引起劳动生产率下降，甚至诱发居民的强烈抱怨和反抗情绪以致造成社会不安定，



而且还因为过份的消费抑制会破坏社会再生产过程的结构平衡。

生产过程要能顺利地实现扩张和加速，要使加速投资不发生阻滞，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保重产品的实现，不出现销售障碍和市场购买力不足，就是说，生产的扩张和加速，要求要有消费的扩张和加速，要求要有买者购买力的扩张和加速。如果居民的收入、购买力和消费需求的增长赶不上生产的增长，作为“生产过程直接结果”的产品的实现就无法完成，生产和消费中就会出现一个缺口。不仅消费资料的生产是这样，而且生产资料的生产也是这样，因为后者既为生产生产资料的部门提供产品而且为生产消费资料的生产部门提供产品，只要消费资料生产部门在销售上发生梗阻和困难，就会波及到生产消费资料的生产部门。相比而言，只有单纯为生产资料生产部门提供产品的生产过程离消费较远，可以进行“为生产而生产”的自我循环。当然，对于一个只重视生产规模和总产值的经济来说，比那种以产品价值实现和消费为目的的经济更有可能不顾消费者的需要而老是在“为生产而生产”中兜圈子，更有可能执行低工资、低消费、高投资、高生产的增长政策。但是在这一政策造成了严重的生产和消费失衡，老百姓已怨声载道时，政策又不得不在短期减缓对消费的抑制，提高职工工资和农民的收入，将国民收入更多地用作消费。这样一来，投资和生产增长的速度便放慢了，周期的低潮便来到了。

消费对投资和生产的制约表现为如下周期效应：周期上升



阶段，投资和生产的扩张加速，消费抑制加强，当消费抑制已达到和接近消费者容易限度（取决于政府的主观判断）时，政府便决定提高消费率降低投资率，通过各种渠道扩大消费基金，随之而来的是生产增长减速，进入周期低谷阶段。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计划经济的周期是一种“消费均衡周期”，只是消费量的周期波动与投资 and 产量的周期波动呈反向变化。对此，本章第一节已经给出了统计显示（见图 2—1）。

5. 通货膨胀的压力

政府之所以决定削减投资，压缩基本建设投资规模，让生产增长降温，除了上述由资源“瓶颈”、人力资本短缺、消费抑制而引起的“结构失衡”的原因外，还有“总量失衡”方面的原因。假定政府对以往奉行的国民收入分配政策进行调整，加速消费的增长，提高消费率，实行高收入、高工资和高消费政策（这是一个纵向比较概念）同时仍然保持比较高昂的投资增长速度。其结果必然是物价总水平上升，全面性短缺程度提高，通货膨胀压力增大。在以利润预期和价格信号为调节器的市场经济中，价格上涨会刺激产量增加，而产量的增加会在消除短缺的同时降低价格水平，从而自动实现供求均衡，并且过程末端的低价格水平与过程始点的高物价水平平均化后得到一个较低的平均价格水平，以致价格和产量的相互调节具有平抑物价水平的功能。这样，投资和生产的速率不致因为价格急剧奔腾



带来的危险而产生突发性下降。在我国计划经济条件下，占支配地位的不是“价格调节”，而是“数量调节”；产量的变化很大程度上服从于政府行政机构规定的指标，价格调整不是根据市场供求趋势作随机跟踪和反映，而要由计划和行政部门作总体安排，其时滞相当长，累积效应亦很强；没有随机的价格调整，产量的升降变化不可能是即期的，结果产量变化和价格变化常常是“分家”的，通货膨胀和产量之间没有相互调节关系，使得短缺和通货膨胀有可能同时加剧。面对此情况，采用传统办法已证明行不通，因为用定量配给来对付短缺只能取得暂时的供求平衡，它实际上是以隐蔽方式将短缺压力转移到未来，用冻结物价来对付通货膨胀也是这个道理，所以可行的途径是抑制需求，包括抑制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如果政府在收入分配和消费管理上继续坚持放权、自主选择的原则，那么杜生贝利所描述的消费“示范效应”及消费者行为的不可逆性就会发生作用，形成所谓“消费刚性”。这就迫使政府只好选择紧缩投资需求这一条路。从我国历次紧缩的历史来看，无论是为了解决“结构失调”问题，还是为了对付通货膨胀，紧缩的对象都不是消费需求而是投资需求，尤其是基本建设投资需求。可以得出一个这样的结论，经济扩张是从投资需求放松开始，放松信贷刺激投资增长加速，加速投资引致生产从低谷转向回升和高潮；经济紧缩则又是从压缩投资需求开始，用投资减速来迫使经济增长减速。特别是，这一扩张和收缩的周期过程表现出两个最引人注目的特点：（1）扩张不是渐进式扩张，而是“突进式扩



张”；(2) 收缩不是缓速制动，而是“紧急刹车”^①。这种“突进式扩张”与“紧急刹车”可以很快地达到控制者的目的，但经济系统容易产生突发性震动和灾变，就象汽车司机突然加大油门和紧急刹车可以很快起跑和很快停车但汽车的震动和磨损都将很大的原理一样。

^① [匈] 科尔内：《短缺经济学》上卷，经济科学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218—219 页；《Rush Versus Harmous Growth》，Amsterdam Publishers, North Holland, 1977



3

章

同向波动的强波效应

因为总量波动是各产品、产业和区域经济波动的加总，所以，要解释总量波动及其特征，就应当对不同产品、产业和区域经济波动的变化趋势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就应当从“结构”的角度来分析总量波动的形成过程。

一般来说，在不同产品、不同产业和不同区域之间，其经济波动关系在理论上可以概括为三种情形：同时上升；同时下降，升降交叉。前两种情形属于同向波动，后一种情形属于反向波动。在假定其它产业变动为一定的情况下，同向波动会引起国民经济总量波动加剧，形成强波；反向升降则会使局部波动相互抵销，抵销的程度越高，总量波动的幅度则越小，完全抵销则意味着总量水平上存在零和波动。

本章着重从结构分析角度来论证我国经济增长之所以常常出现大起大落的强波现象的表层原因。我们将在前几章尤其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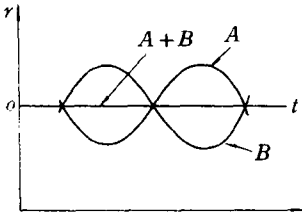
第 2 章已经得出的统计结论的基础上,通过对传统时期和改革时期进行比较进一步证明同向扩张与同步收缩的经济必然存在强波倾向,而在中国经济特别是改革以前的过度集中经济中,同向扩张和同步收缩是经常发生的。

§ 3.1 三个抽象的结构性波动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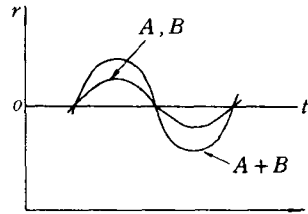
结构变化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无论是产品、产业和投资,还是收入、储蓄和消费以及其它经济变量,在一定的时间序列中,都会产生起伏变化,其变化过程有长有短,变化程度有强有弱,但是它们的周期原理一样,都存在一个适合各自性格特征的周期性波动轨道。如果我们的观察对象不是单个周期,不是单一经济变量孤立的变化趋势,而是两个或多个周期过程,我们便可以获得有关不同变量间的周期关系的认识,并可以了解这些个别周期的相互关系对总量经济波动形成的影响。

假设有 A 、 B 两种产品,其“生命周期”(指产品在市场上从开发成熟期到衰老期的整个时间过程)相等,各自份额一样,其波动的起终点及上升和下降的方向如图 3—1 (a)、(b)、(c) 三种形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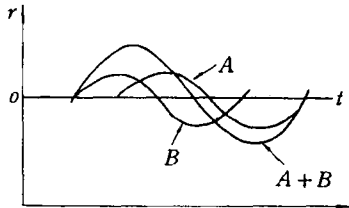
图 3—1 (a) 中,产品 A 和产品 B 的增长按相反方向变动,产品 A 为正增长时,产品 B 取负增长,并且相反变动的速率相等,其中一种产品的上升幅度等于另一种产品的下降幅度。结



(a) A和B反向波动，
总量波动为零



(b) A和B同向同速波动，
总量波动最强



(c) A和B同向波动，但不同
速，总量波动较弱

图 3—1 结构性波动模型

果升和降、扩张和衰退相互抵销，总量波动线与座标的零值线（横标）重合，出现零和波动。

图 3—1 (b) 中，产品 A 和产品 B 的增长按同一方向变动，产品 A 为正增长时，产品 B 也为正增长，产品 A 为负增长时，产品 B 也为负增长，并且同向变动的速率完全相等，致使总量波动线出现陡升陡降、大上大下。

图 3—1 (c) 中，产品 A 和产品 B 的增长按同样的方向变动，



但两种产品进入扩张和进入收缩的时点不同，当产品 B 从高峰向低谷转折时，产品 A 才刚刚开始回升并向高峰转折，当产品 B 从低谷转向回升（图中实际上是从最大负值向零值接近还没有出现正值回升）时，产品 A 还在向最大负值接近。这一模型中的总量波动由于存在累积而显得比单个周期波动要强一些，但不如图（ b ）中总量波动那么强。它是一种比较缓和的非零和波动。

以上模型只是纯理论抽象，现实经济的波动形态要比这些模型复杂得多。许许多多的产品生产，有一些产品的生产出现下降，有一些产品的生产出现上升，有一些产品的生产处于扩张繁荣期，有一些产品的生产却处在收缩衰退期，而另一些产品则可能刚好处在从高潮到低潮的转折点上；当然也有可能发生所有产品的生产全面繁荣或全面萧条的情形。但在不同时间点上，表现在宏观层次上的总量经济很难发生零和波动，常见的情形是上升和下降幅度参差不齐的非零和波动。这种非零和波动就是一种结构性波动^① 一般说来，只要存在结构，就会存

^① 1990年3月4日美国的《洛杉矶时报》刊登了一篇题为“‘摇摆式衰退’延缓了美国经济危机的爆发”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一位纺织厂经理用“摇摆式衰退”（Rolling recession）一词论述了美国现代经济中产生“某个行业出现下降，另一个行业则出现上升”的情形，例如，当纺织工业冷却时，而电子计算机工业却热乎起来。当纺织工业再次繁荣时，电子计算机工业却又开始走下坡路。在本书第1章讨论波动系数的国际比较时，我们得出了工业发达国家经济波动系数低于发展中国家经济波动的系数，而在发展中国家和高速增长的国家中，中国的经济波动系数最高的结论。解释这一现象时，我们也不妨从波动的结构特征角度作出一些分析，或许中国的景气和不景气依然是同时出现在大多数产业、产品和部门中。



在“结构性波动”，就会存在不同个别周期的相互抵消情形，所谓总量波动只不过是所有个别周期波动相互抵销后的“剩余波动”。在现实中，要完全取消“剩余的波动”即实现模型(a)几乎是不可能的，模型(a)通常只是总量经济波动中的局部情形，因为千千万万种产品的“生命周期”及其分布是千差万别的，由技术革新而引致企业创新、由消费者预期调整而引致市场的抢购和疲软。以及由政府政策的干预而引起投资的扩张和收缩都会使总量波动采取模型(b)和(c)的形式。

不同产业、不同行业 and 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波动和上述不同产品之间的经济波动情形类似，在理论上也可以抽象出零和波动和非零和波动，而非零和波动又可以分为常规波动和强波等形式。因为我们的任务是研究强波的形成过程，所以我们将比照第(a)、(c)种结构性波动形态的同时，主要讨论第(b)种结构性波动形态及其与总量波动的关系；同时，下面的分析不是停留在理论抽象层次，而着重于经验实证。考虑到我国集中计划经济周期表现为典型的强波形式，大起大落最为突出，而改革时期的周期波动强度已大为减缓，这就为我们对改革前后两个时期的结构性波动进行比较提供了可能，我们可以从结构性波动的不同特征中找到强周期波动和常规波动在结构基础上的差异。



§ 3.2 产业间的波动趋势

1. 工农业的交叉性景气变动

我国国民经济成长过程中首要的结构性波动是工业和农业这两大产业之间的波动，要了解宏观经济周期在结构层面的基本特征，首先应当对这两个基本产业的波动关系有一个认真的了解。

总的来说，我国工业增长和农业增长的波动关系有三个基本情形：（1）同时扩张；（2）同时收缩；（3）交叉变动。前两种情形导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大起大落，形成强波；后一种情形则会使两大产业的波动有一部分相互抵销，由于二者所占份额不同，反向波动的速率不同，所以现实中没有产生零和波动。按改革以前的经济体制时期（1953—1978年，简称“旧体制时期”）和体制变革时期（1979—1990年，简称“改革时期”）来观察工业和农业增长的波动关系，得到下面表3—1的结果。

从表3—1可以看出，在改革时期，我国工业增长和农业增长的同时扩张率高于改革以前的过度集中经济时期，而同时收缩率比后者低。改革时期和旧体制时期的同时扩张率和同时收缩率分别为0.42、0.32和0.44、0.08。这说明改革时期工农业生产的扩张势头强于旧体制时期。从景气循环的交叉变动



表 3—1 1953—1990 年工农业扩张、收缩变动的关系

时 期	同时扩张		同时收缩		交叉变动	
	年数	比率	年数	比率	年数	比率
整个时期	13	0. 35	12	0. 33	12	0. 32
旧体制时期	8	0. 32	11	0. 44	6	0. 24
改革时期	5	0. 42	1	0. 08	6	0. 50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1）》，第 56 页。

率来看，旧体制时期比改革时期低一倍还多，这就是为什么旧体制时期的波动系数远远高于改革时期（见表 1—6）的缘故。体制变革中工农业生产的同时收缩下降，同时扩张率及扩张收缩的交叉变动率的提高，不仅反映出新体制背景下经济波动形态的特征：总量经济波动向高速稳定的增长轨道收敛，而且从反面证明传统经济的强波周期在产业层次上存在很强的同步振荡。改革以前出现的历次经济衰退中，除 1955 年以外，其余的 1957、1960、1968、1972、1974 和 1976 年，两大产业都是同时陷入衰退而且大多是绝对衰退（负增长）。

我们在观察结构性波动对总量波动的影响时，不仅要看“增长率”，还要看“份额”。就工、农业总产值构成而言，改革前在 30：70 至 75：25 之间，80 年代以来工业和农业的份额基本上在 75：25 上下浮动，1989 年农业总产值份额只有 25%。由于改革前农业份额比较大，它的波动对总量波动的影响也比较强，可以说那时“国民经济增长稳不稳首先取决于农业稳不稳”。现在农业产值份额比较小而工业产值份额已经相当大，那



么工业波动要比农业波动对总量波动的影响更为突出，工业增长的稳定状况直接决定着总量增长的稳定状况。1985—1989年连续5年农业生产徘徊，而工农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等总量指标仍保持比较高昂的增长势头，相反，1980年粮食和经济作物均达到历史上最好的收成，而总量经济仍是低速运行，正是由于工业增长已成为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者。我们无意轻视农业生产，而只不过是刻画出一个客观的事实。在今后的经济发展中，要避免强波，实现包含常规性周期波动的稳定，首先要保证工业稳定。

2. 非农产业的结构性波动

我们再考虑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和商业这四类非农产业的波动情形。从1949—1989年，我国工业发展经历了7次波动，建筑和运输业有8次波动，商业出现了10次波动。其中，商业波动最频繁，但它的平均波幅只有17.3%，比工业的33.9%、运输业的31.6%和建筑业的58.8%都要小，建筑业的波幅最大。从负增长年份的出现率来看，四类产业的次序是：工业0.11、运输业0.16、商业0.19、建筑业0.30（见表3—2）。这说明商业和建筑业最容易出现绝对衰退，工业和运输业的扩张力要强一些。我们这里注意的是为什么运输业和建筑业的平均波幅比较大而工业和商业的平均波幅比较小。从产业内部的构成来看，建筑和运输业本身通常不发生结构性波动，尤其是建筑业，通



常的情形要么是整个产业全面扩张要么是全面收缩；与此不同，工业内部和商业内部都容易产生结构性波动：一个行业繁荣，另一个行业衰退。建筑业由于缺乏内部的景气循环交叉变动、上升和下降都是同步的，所以它的增长路线要么是突进式扩张，要么是紧急刹车，强波倾向最明显。在1949—1989年这41年间，建筑业的负增长年份最多，证明缺乏结构性波动的产业最容易产生强波。

表 3—2 非农产业的经济波动

周期	工业波动		建筑业波动		运输业波动		商业波动	
	负增长年	波幅 (%)	负增长年	波幅 %	负增长年	波幅 (%)	负增长年	波幅 (%)
I	—	>50.5	1	>60.0	—	>40.0	—	>40.0
II	2	71.4	1	57.6	2	93.8	1	10.0
III	2	40.2	2	134.5	2	41.1	3	26.1
IV	—	33.7	2	75.6	1	20.2	—	6.7
V	—	13.1	/	66.6	1	15.8	2	28.2
VI	—	11.3	1	16.0	—	13.5	—	11.9
VII	—	12.9	1	26.8	—	15.4	—	9.9
VIII			1	32.9	—	12.6	—	7.4
IX							—	10.9
X							—	26.9
均值 比率(%)	0.11	33.9	0.24	58.9	0.16	31.6	0.19	17.3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1)》，第34页。

3. 工业波动：制造业与纺织业

我们可以从两个分析层次来研究工业内部的结构波动趋势：一是轻工业与重工业的变动关系，二是制造业与纺织业的变动关系。



从轻、重工业的波动关系来看,轻工业出现了 9 次波动,平均长度为 4.44 年,重工业经历了 6 次波动,平均长度为 6.67 年,因此重工业的周期持续时期比轻工业长一些;其平均波动幅度,轻工业为 20.7%,重工业为 23.3%,从而重工业增长的波动强度高于轻工业;二者的扩张力重工业比轻工业强,前者的平均增长率比后者要高出 2.1 个百分点。但是,从 1974 年开始,轻、重工业的增长趋势发生了反向变化:重工业增长减慢,轻工业增长加快。从年平均增长率来看,1952—1974 年,轻、重工业分别为 10.8% 和 16%,后者较前者快 5.2 个百分点,1975—1989 年度为 13.4% 和 10.5%,后者比前者慢 2.9 个百分点,其中 1979—1989 年为 14.3% 和 10.7%,轻工业增长加速、重工业增长减速更为明显。由于这种反向变化收敛于以平均数为基础的均衡增长轨道,所以近 10 多年来的整个工业波动变得相对平衡,从而使总量波动程度降低。相反,在 50 年代,由于重工业表现为突进式增长,而一旦遇到来自资源“瓶颈”、人力资本短缺、消费需求不足和通货膨胀(公开的形式是价格上涨隐蔽的形式是短缺加剧)等方面的约束时,重工业生产又不得不“紧急刹车”,结果很容易产生重工业强波。

从 10 年平均增长率的变动来看,我国重制造工业中的钢铁、矿山设备、发电设备、金属切削机床、汽车和拖拉机生产的增长速度,以及纺织业中的化纤、布、纱、毛线、呢绒和丝的增长速度,从 50—80 年代都存在放慢趋势(见表 3—3)。就是说全部工业在 50 年代的扩张力很大,其中以重制造工业的扩张力最强,



例如汽车、发电设备、矿山设备和金属切屑机床在 50 年代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 510.2%、234.7%、107.5% 和 67.5%。这样一种突发性扩张,怎么不会造成强波现象呢?用历史的眼光来看

表 3—3 制造业、纺织业增长速度变动(%)^{*}

行业	项目	50 年代	60 年代	70 年代	80 年代
重 制 造 工 业	钢铁	38.69	2.84	11.63	6.02
	矿山设备	107.47	0.78	18.65	5.57
	发电设备	234.68 ^①	18.27	14.33	15.70
	金属切削机床	67.50	11.20	5.25	2.72
	汽车	510.18 ^②	40.27	15.29	14.06
	拖拉机	—	30.72	38.29	10.07
纺 织 工 业	化纤	—	44.19	17.18	16.88
	布	16.22	4.85	4.37	4.58
	纱	16.43	5.50	4.26	6.17
	毛线	28.75	9.49	9.88	17.33 ^③
	呢绒	21.02	5.15	6.27	11.90
	丝	21.24	6.12	9.36	5.61

* ①为 8 年平均;②为 4 年平均;③为 9 年平均,其余为 10 年平均。严格说来,钢铁不应包括在制造业中,它属于制造业的原材料,但为了研究的方便,我们这里考虑钢铁的生产。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1)》,第 422—427 页。

这种由高速繁荣造成的强波有客观必然性,因为处于初创期的产业和产品生产不经过一个高速扩张阶段,那么发展的进程就会拉得很长。

在重制造业、纺织业增长速度放慢的总趋势中,纺织业生产的减速程度低于制造业,但从不同“年代”的比较看,纺织业出现了再度繁荣而制造业表现为稳中有降。这是因为,新中国建立



初期的工业主要是轻纺业,重制造工业尤其是钢铁和重型机器制造业于 50 年代才开始是全面创业、兴建;而一旦重工业体制初步形成,机器制造还未发生革命性改造,以及居民消费在外部冲击和较高收入的推动下产生突发性需求,同时重工业生产的深层扩展愈益依赖于消费的刺激时,原来的“重工业优先”的工业增长战略就不得不调整,工业生产就必然向轻纺业方面倾斜,从而提高纺织业的景气繁荣程度。在重制造工业减速而纺织业再度繁荣,保持高速发展势头,实际上就产生了如本章第 1 节脚注中所讲的“摇摆式衰退”效应,即重工业向左边摆动(减速)而轻纺业向右摇摆(加速)使得总工业生产的增长保持在一个有左右摆动的均衡位置上,结构性波动减缓了总量波动的幅度。如果仔细观察改革以前重制造工业和纺织业的波动关系,容易发现二者经常产生同向扩张和同向收缩,景气交叉变动率很低,所以工业波动的路线是相当陡峭的。

这里顺便要指出的是,我国在体制改革以前奉行了整整 30 年的“生产资料优先增长”或“重工业发展优先”的政策,这有其历史必然性和某些合理性。因为一个大国面对现代工业水平十分低下,缺乏重工业的基础,而且已有的轻纺业生产有很大一部分是手工式这样一个发展背景,加上战争的气氛很浓以及政治经济上受到一些外围国的挑战,如果不迅速发展制造业,不迅速建立自己的重工业体系,其处境就会很糟,而独立的重工业体系的建立为国强民富打下了良好基础。我们前面关于过度投资和消费不足的论述只不过是描述一个事实,现在要补充说,这个事



实的产生具有某种必然性。另一方面,中国在重工业体系基本建立时逐步推进发展战略的转变。带来上面所讲的结构性变动,虽然在时间选择上也许不够及时,但总的来看是比较成功的,现在不但消费者正在从上一阶段建立起来的重工业中受益,而且工业生产有了比较好的结构基础,从而稳定的程度提高,工业强波正在逐渐减缓。

4. 农业波动:种植业与畜牧业

新中国农业生产经历了 8 次波动:第 I 次波动为 1949—1953 年,第 II 次波动为 1953—1961 年,第 III 次波动为 1961—1968 年,第 IV 次波动为 1968—1972 年,第 V 次波动为 1972—1977 年,第 VI 次波动为 1977—1980 年,第 VII 次波动为 1980—1986 年,第 VIII 次波动为 1986—1989 年。平均 5 年出现一次波动。改革以前的 5 次波动中有 4 次出现负增长,改革以来的 3 次波动的低谷均为正增长,这表明改革给农业带来了繁荣,摆脱了灾难性的绝对衰退,也告诉我们改革以前比改革以来的经济波动幅度强与农业生产的绝对衰退有关。1978 年农业改革开始以前,种植业中的粮食、棉花、油料和畜牧业中的大牲畜、生猪和羊这 6 大行业在农业衰退期中的产量基本上是同时的,而改革以来则出现了景气交叉。从这 6 大行业的景气交叉率来看,第 I 次波动为 33.33%,第 IV、IV、V 次波动均为 50%,而第 VI、VI、VIII 次波动的景气交叉率分别达到 83.33%、50%和 66.67%。正是由



于行业间景气交叉率提高,才使得改革以来农业总产出没有出现绝对衰退,因为种植业衰退伴随着畜牧业繁荣或者畜牧业衰退伴随着种植业繁荣在总量上起到了近似于“零和波动”的效果,某行业的繁荣部分抵销了另一行业的衰退。

我国历史上粮食和生猪产量的波动很频繁,其中又以生猪产量更为不稳定,它的负增长年份出现率为 0.35,但粮食只有 0.2。分阶段看,改革前生猪和粮食的交叉变动系数为 0.45,改革以来达到 0.83,后者比前者提高近一倍,其中特别是 80 年代粮食和生猪同时负增长的情形已经不存在了。这样,改革以来农业中的主导行业之间的结构性波动减缓了农业总产值增长的波动,而改革前农业总量增长起伏振荡则又是与农业内主导行业同向波动紧密相关的。

顺便要指出的是,我国粮食波动除了本文后面论及的“政策”和“体制”因素的影响之外,还存在自然气候的影响,气候的优劣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粮食产量的高低,尤其是决定粮食亩产量的高低。但是由于我国政府通过补贴、计划指标和行政命令等方式对粮食生产起了很大的稳定作用,加上农民也感到“无粮不稳”,感到没有粮食将直接威胁到基本生活,又使得我国粮食生产的波动不像生猪生产波动那么频繁。而生猪的生产波动频繁的原因又在于:(1)生猪生产受市场调节作用较强;(2)粮食收成的变动决定生猪饲养的规模;(3)乡镇企业和其他非农生产的发展状况对畜牧业也有直接影响等。但如果考察粮食产量波动和生猪产量波动的关系,其趋性特征是:二者的交叉变动加强。



§ 3.3 同向波动的结构原因

1. 层次单一的平均化收入结构

我国经济成长中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层次单一的平均化收入结构。所谓“层次单一”，是指作为收入获取者的所有社会成员之中不存在因较大收入悬殊而产生的“等级”，即没有高产阶级、中产阶级和低产阶级之分，大家的收入水平都在同一层次上。多年来实行的“八级工资制”并不足以导致不同收入阶级的产生。这在我国改革前尤为典型：居民不仅没有资本收入（由“国家”和“集体”拥有），而且因为低收入导致低储蓄，其利息收入也低得可以忽略不计，唯一的收入是直接劳动收入；加上实行平均主义的劳动报酬政策，仅有的劳动收入也保持在相当均等的水平上，整个社会成员的收入缺乏层次性。这种层次单一的平均化收入结构，造成的经济波动效应是：政府市场管理政策的松紧信号引导居民同时购买或同时持币待购的行为，引导居民用同样多的收入实现同一类型的购买、追求同一级别的费用，结果造成强烈的市场波动。在收入水平均等化的情况下，要买大家都买，一齐去排队，要不买大家都不买，商店冷冷清清，市场上经常出现抢购和疲软这样两种极端的情形。而市场的强波动必然造成生产上大起大落。



在第一章的论述中，我们作出了两个重要判断：（1）中国经济增长的波动系数高于工业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国家经济增长的波动系数；（2）在我国，旧体制时期的波动系数高于改革时期的波动系数。如果从收入分配结构的角度来看这两个判断，我们发现：基尼系数越小，收入均等化程度越高，市场和经济增长的波动可能越强；反之，基尼系数越高，收入分配的结构层次越多，市场和经济增长的波动则可能越弱。这是一个可以由广泛的经验资料来验证的定律。

我们先来进行国际比较。前面指出，中国的波动系数高于美国、英国、日本和印度等，现在我们看到中国的基尼系数亦低于这些国家。从时点上观察，中国 1982 年的基尼系数为 0.13，而英国 1979 年为 0.33，美国 1978 年为 0.44，印度 1976 年为 0.40，日本 1979 年为 0.88^①。严格说来，这一比较存在一定程度的口径不一致问题，因为所计算的波动系数涉及一个含许多年份的时期，而这里提供的基尼系数落在不同的时点上，但考虑到时点比较接近，而且基尼系数一般在短期内不会发生急速变化，所以上述比较还是很有意义的。按照我们的计算结果，日本和印度的波动系数高于美国和英国，但它们之间的基尼系数的高低区别却反过来。这说明用收入不平等程度来解释波动程度在某些情形下可能遇到一些困难，这意味着经济波动的解释变量不是一个而包含一个系列，不过，在讨论中国的情形时，这一解释

^① 胡鞍钢：《人口与发展》，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21 页。



还是有相当说服力的。

再来对我国两个不同体制时期进行比较。从趋势上看,旧体制时期比改革时期具有更高的平等程度。随着改革的逐渐展开,市场机制的引入,社会成员的收入来源结构发生了变化,居民之间的收入等级层次逐渐拉开,不均等程度提高,基尼系数提高。以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为例,1981年的基尼系数为0.1252,1989年为0.2279,提高82%。因为我们没有找到1980年以前有关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的时间序列数据,所以我们以1981年代表传统时期。

图3—2和3—3分别提供了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分布从1978—1986年的变化和城镇居民家庭人均生活费收入分布从1981—1986年变化的情况。我们从这两个图中得到两个这样的印象:(1)改革以前的分布从最低收入到最高收入的长度较短,跨度小,改革中的分布从最低收入到最高收入的长度较长,跨度大。从1978—1986年,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分布跨度(S_a)扩大了一倍多,即从1978年的 $0 < S_a < 500$ (元)到1986年的 $0 < S_a < 1\ 200$ (元);城镇居民家庭人均生活费收入分布跨度(S_c)扩大了差不多1/3,即从1978年的 $0 < S_c < 1\ 000$ (元)到1986年的 $0 < S_c < 15\ 000$ (元),这说明社会成员间收入分配的结构、层次更广泛。(2)收入分布的最大人口频率下降。1978年,农民家庭人均收入100元左右的人口频率最大,呈尖峰状,这说明绝大多数农民都具有同一个层次的人均收入水平。1986年,最大人口频率下降,呈缓和凸状分布。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收入水平分布的人



口频率的变化和农民的变化差不多,只是城镇取比较规范的正态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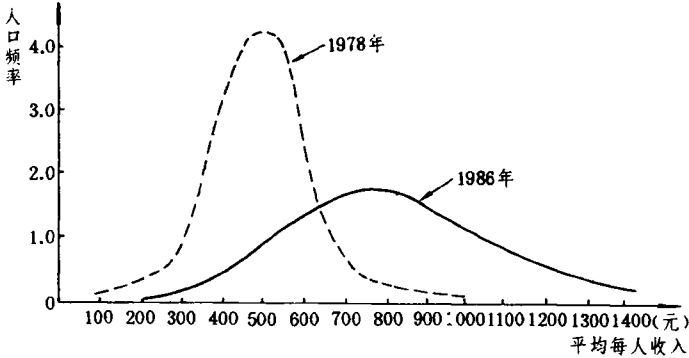


图 3-2 城镇居民家庭人均生活费收入分布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7)》,第 714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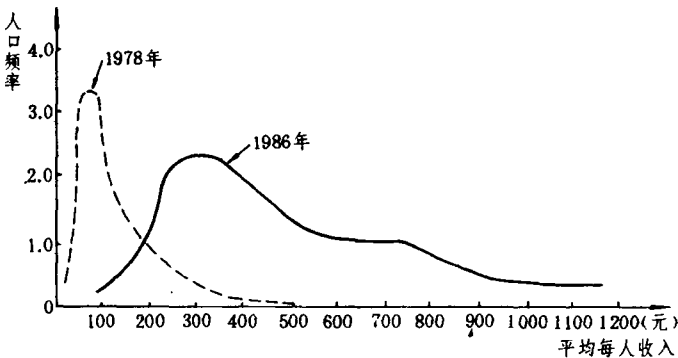


图 3-3 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分布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7)》,第 715 页。



上述收入分布动态的变化，与改革前后经济周期波动形态的变化是一致的，尖状的收入分布和经济增长的强波并存，平缓的收入分布则又伴随着强波的收敛。这是因为，当收入水平都在一个层次上时，必然会产生同样的购买力，引致同步的购买行为，使市场产生同步震荡，从而使生产出现突发性上升或下降。当收入分配的层次多级化时，买者的购买力和购买欲望亦会有差别，一部分人以更多的收入用于购买必需品，而另一部分人以更多的开支支付高档消费品，这样收入层次差别导致购买层次差别，市场和生产的结构亦会从倾向于平面式变成倾向层次性，经济波动会因层次而抵销一部分。

2. 狭窄的消费选择空间

层次单一的平均化收入结构常常与狭窄的消费选择空间相一致。因为当一个人的收入水平很低时，他的消费选择将非常简单，只要维持温饱即可；而全社会绝大多数人都只享有同样的低收入水平时，那么大众的购买和消费选择同样是十分简单的，这样一来，全社会的消费结构也会变得缺少层次，十分简单（见表 3—4）。

从表 3—4 中可以看出，同其他 12 个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家庭消费的配置最为单纯，总消费中有 74% 用于吃和穿，其他国家和地区除印度、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泰国在吃穿上的消费基本上超过 50% 外，其余都在 50% 以下，后面 5 个工业发达国



家的吃穿消费份额还不到 20%，而中国另外 5 项消费的份额大

表 3-4 家庭消费结构的国际比较 (%)^{*}

	吃	穿	住和烧	医疗	教育	行	其他
中国	61	13	8	1	1	1	15
南朝鲜	5	6	11	5	9	9	25
泰国	30	16	7	5	5	13	24
印度	52	11	10	3	4	7	13
印度尼西亚	48	7	13	2	4	4	22
菲律宾	51	4	19	2	4	4	16
新加坡	19	8	11	7	12	13	30
香港	12	9	15	6	5	9	44
日本	16	6	17	10	8	9	34
美国	13	6	18	14	8	14	27
英国	12	6	17	8	6	14	38
法国	16	6	17	13	7	13	29
原西德	12	7	18	13	6	13	31

* 表中“住和烧”包括租金、燃料和电力；“医疗”包括医疗卫生；“行”包括交通运输和通信；“其他”包括耐用消费品和前面各项所未包括的消费开支；画有“○”的数字为最大频率值。

资料来源：《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贫穷》，第196—197页。

大低于其他 12 个国家和地区。如果做一个频率分布图，中国与印度、菲律宾、印尼、南朝鲜和泰国一样，最大频率值都落在吃的消费上，但中国的最大频率值高于这些国家和地区，达到 61%，表中后面 7 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频率值都落在包括耐用消费品在内的“其他”消费上，而且最大频率值几乎只有中国的一半。这说明其他 12 个国家和地区在表中 7 种消费类型上的消费分布结构的耗散程度高，集中程度低，最大频率值和最小频率值之间的差比较小，从而分布比较均匀；相反，中国消费



分布结构的耗散程度低，集中程度高，最大和最小频率差相当大，从而分布十分不均匀。

中国消费分布结构的上述特征必然造成消费者购买的拥挤行为：大家都用同样水平的收入购买同样的商品，货架上数量有限的商品面对着很长的购买队伍。政府试图用定量配给的方法稳定消费者心理，改变消费者的短缺预期^①，但政府这种反短缺预期的配额供应办法并不会减缓市场购买的强波现象，因为无论是以年为时限（粮票等）还是以月为时限（各种副食配额）的定量措施不但不能引导消费者按耗散的方式进行采购，即你今天购买，我明天购买，大家不挤在同一天，而且事实上会引导消费者在差不多同一个时期拥向市场去进行排队抢购，待抢购风波完了之后，接着而来的便是卖者等待买者，市场疲软下来，形成冷热交替的市场波动。据有人分析，月度配额的购买高峰在月底，年度配额的购买高峰在年底，因此在月底和年底之前市场上总是会显得销售不旺。所以，配额的办法不可能从根本上缓解市场上的强波现象。

我们在解释中国消费分布过度集中倾向时，不能单纯从收入水平上看，因为改革以来居民收入水平大大提高后，其购买和消费结构并未发生根本上的转变，吃和穿的消费分布频率仍

^① 短缺预期是指消费者对未来短缺形势的判断，通常地，当某商品当前出现短缺而又没有灵活的价格变化来填补这一短缺时，消费者认为未来短缺将比当前短缺的程度更高，所以常常采取提前购买的行动，以避免未来遭受更强的短缺痛苦，当前排长队购买是为了未来不再排更长的队。



很高，而其他消费分布频率还很低，问题不在于买不起，不在于没有钱，居民储蓄存款加速增长证明居民的可能购买力加速提高，问题在于消费体制，在于政府继续维持免费的高福利体制，在于许多消费资料如住宅、电话、汽车、医疗和教育等仍实行政府包办制度，有钱的人想买不能买，没有一个自由的价格和消费选择制度刺激不同层次的收入获取者购买不同层次的商品，其结果，一方面是储蓄猛增，另一方面是价格相对自由的消费品市场经常出现拥挤，出现一波一波的购买浪潮。

3. 企业的同时扩张与同时收缩

层次单一的消费结构和一波一波的买者购买行为势必造成投资和生产结构也出现简单化趋势。当消费者都花钱买“老三大件”(自行车、缝纫机和手表时)，企业便蜂拥而至投资生产它们，掀起生产“老三大件”的高潮。由于供给形成和对消费市场的反映之间有一个时滞，生产过程有一定的惯性，等到消费企业还在大批生产，卖者还在大量兜售，造成惯性型生产过剩和供大于求，“老三件”不得不大量积压在仓库中。当消费者以跳越方式又产生了对“新三件”(彩电、冰箱和洗衣机)的需要时，企业便又同时扩张家用电器投资，加快步伐生产“新三件”。由于同向扩张导致过大的生产规模，产量增加太快，加上已形成的产品供求主要是数量型而不是质量型的、生产出来的东西并不是买者想要的，结果库存急剧增加，大批企业不得不同时停工、同时收缩生产。



前几年一窝蜂上 147 条彩电线,大家都生产彩电,而近两年大量彩电积压,用削价销售也难以启动彩电需求市场,使企业不得不减少生产,充分表明企业同时扩张和同时收缩的强周期效应,充分表明我国企业生产还未转入结构性景气循环轨道,生产波动还存在相当明显的同步震荡。

进一步看,上述企业生产的同向波动跟随消费者简单化购买和消费行为的变动和转换,表明生产过程对消费过程依赖性加强,消费者偏好的变化正在对生产结构调整产生直接影响,它比改革以前消费者选择由政府 and 计划者事前给定要优越得多。在旧体制下,消费、生产的数量和结构都服从于上级规定的指标,因此供给形成和需求形成以及供求之间的相互调整都缺乏灵活性。尤其是,对于企业来说,由行政决定的投资和生产比由消费者直接调节的投资和生产具有更强的同时扩张和同时收缩的倾向。因为在企业的投资和生 产决策主要以政府规定的指标为依据,它的全部努力只是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的前提下,企业不必观察和利用消费者偏好的即时变化和随机转换行为,不必考虑反映消费者需求趋势的市场动态有什么新的特征,不必考虑代表供求关系变化的价格信号对扩大或缩减投资和生 产有什么重要性,他只需要考虑如何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只需要盘算怎样提高产值(如果上级将减少产值作为约束指标那么企业盘算的是怎样少生产一些),只需要把握好“任务”和“时间”这两个变量。如果时间充裕,任务较松,生产就可以慢一些,反之则需快一些;如果已经临近规定的时间,那么企业就会不惜一切代



价,开足马力加快机器运转,争取完成和超额完成上级规定的任务。由于全社会政府机构直接控制的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占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的主导部分,又由于这些企业从政府部门那里在同一个时期接受同样的指令,所以一个企业的扩张和收缩会同时带动所有企业进入扩张和收缩,从而全社会生产过程产生“共振”。

我们来看看一年之中企业、地方政府同向扩张和同向收缩的时间性特征。从1953—1985年期间,国有企业基本建设投资的季度、月度的观察中,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先松后紧。

从季度看,第1季度投资占全年投资份额最少,为17.9%;第2、3季度略有增加,分别为21.3%和23.9%;第4季度所占份额最多,高达36.9%(见表3—5)。

从月度看,头4个月的投资份额少,各月份额均值在5.8%至5.9%之间;5月和6月的份额增加,分别约为6.9%和8.3%,而且6月份形成一次月度性投资高峰;7月和8月比6月的份额减少约1个左右的百分点;而从9月到12月的投资份额表现为逐月增加,11月和12月达到全年投资高峰。因此,一年中各月投资份额的分布特征是:最低——低——高——最高,即1—4月为投资低潮期,6月形成一次投资高潮,7—8月轻度减速,9—12月从逐月加速进入高潮。这一特征可以从表3—6、图3—4清楚地看出来。

上面所描述的我国全民所有制单位基本建设投资的月度和

表 3-5 全民所有制单位基本建设投资的季度分布(%)^{*}

年份	季度				年份	季度			
	I	II	III	IV		I	II	III	IV
1953	12.5	21.7	26.2	39.6	1972	13.2	22.0	22.8	42.0
1954	11.5	22.3	28.0	38.2	1973	10.7	20.9	22.8	45.6
1955	14.1	23.2	24.0	38.7	1974	11.4	18.7	22.8	47.1
1956	13.1	21.5	25.3	40.1	1975	11.5	22.3	23.6	42.6
1957	12.2	20.9	26.7	40.2	1976	13.1	22.3	21.9	42.7
1958	17.4	18.6	31.2	42.8	1977	9.5	20.6	23.7	46.2
1959	13.1	18.0	19.3	49.6	1978	10.8	22.4	23.4	43.4
1960	18.8	23.6	19.3	38.3	1979	12.9	21.0	23.9	42.2
1961	13.4	20.1	17.6	48.9	1980	9.7	20.3	23.1	46.9
1962	14.2	15.7	16.7	53.4	1981	9.3	20.2	24.3	46.2
1963	11.6	20.4	23.2	44.8	1982	9.3	21.3	24.1	45.3
1964	13.3	23.6	24.6	38.5	1983	10.5	23.0	23.6	42.9
1965	12.7	22.6	24.6	40.1	1984	8.6	20.7	25.5	45.2
1966	13.5	22.9	25.7	37.9	1985	8.6	22.0	24.5	44.9
1970	12.6	24.8	29.5	33.1	平均	11.9	21.3	23.9	42.9
1971	13.8	22.2	25.5	38.5		(17.9)			(36.9)

* 表中, I、II、III、IV 代表季度。括号内的数字是经过调整后计算出来的,因为在统计记录中,没有 1 月份的数字,而 12 月份的数字明显偏大,为了计算平衡,我将 12 月中的数字扣出一部分转至 1 月,所扣除的数字为 2、3 月的均值,可能不精确,但不会影响统计判断。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编:《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资料 1950—1985》,中国统计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53 页。

季度变化,不是一个个别现象,而反映出一种内在趋势,是一个体现在所有年份中的“法则”。所以我们认为,在中国国有经济的年度投资活动中,企业间的交叉波动率很低,普遍存在的是服从于同一个信号的同向波动,在一个时候同时低增长,在另一个时



表 3-6 全民所有制单位基本建设投资的月度分布(%)*

月份 年份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953	6.2	6.3	6.2	7.5	8.0	7.5	9.3	9.4	12.7	13.1	13.8	
1954	6.0	5.5	6.2	8.1	8.0	8.3	7.0	12.7	10.6	13.2	14.4	
1955	6.7	7.4	6.0	8.5	8.7	6.7	8.1	9.2	10.4	11.5	16.8	
1956	6.1	7.0	6.1	7.3	8.1	7.8	8.1	9.4	10.1	12.1	17.9	
1957	6.7	5.5	6.4	6.5	8.0	8.0	8.5	10.2	10.8	11.6	17.8	
1958	3.7	3.7	4.5	5.2	8.9	9.5	9.7	12.0	11.7	11.6	19.5	
1959	7.6	5.5	5.7	5.9	6.4	5.3	5.5	8.5	10.7	13.4	25.5	
1960	11.2	7.6	7.2	7.6	8.8	6.2	6.3	6.8	6.8	7.0	24.5	
1961	7.9	5.5	5.5	6.6	8.0	6.2	5.4	6.0	5.8	7.3	35.8	
1962	8.4	5.8	5.2	5.5	5.0	4.6	5.5	6.6	8.4	10.4	34.6	
1971	6.6	7.2	6.8	7.2	8.2	8.8	7.6	9.1	8.9	9.1	20.5	
1972	6.7	6.5	6.2	6.6	9.2	6.5	7.9	8.4	8.9	8.8	24.3	
1973	5.1	5.6	6.3	6.6	8.0	7.4	7.3	8.1	8.3	10.5	26.8	
1974	5.5	5.9	5.5	5.8	7.4	6.5	7.7	8.6	8.7	10.4	28.0	
1975	6.4	5.1	6.0	7.2	9.1	7.4	7.3	8.9	8.0	9.8	24.8	
1976	7.2	5.9	6.2	0.7	9.4	7.6	6.6	7.7	7.9	9.3	25.5	
1977	4.6	4.9	5.2	7.1	8.3	7.1	7.1	9.5	9.1	9.9	27.2	
1978	5.5	5.3	6.0	7.7	8.7	7.1	7.5	8.8	8.2	9.6	25.6	
1979	6.5	6.4	6.3	7.0	7.7	7.4	7.5	9.0	8.6	9.9	23.7	
1980	5.0	4.7	5.4	6.7	8.2	7.0	7.5	8.6	7.6	9.0	30.3	
1981	4.5	4.8	5.2	6.7	8.3	7.5	8.4	8.4	9.4	10.3	26.5	
1982	4.3	5.0	5.7	7.1	8.5	7.2	7.6	9.3	8.8	10.5	26.0	
1983	5.0	5.5	6.0	7.7	9.3	7.5	7.6	8.5	9.0	10.5	23.4	
1984	4.0	4.6	5.5	6.6	8.6	7.4	8.1	10.0	9.2	10.4	25.6	
1985	/	8.6	5.5	6.9	9.6	8.1	7.6	8.8	8.5	10.0	26.4	
平均值	5.896	5.832	5.872	6.892	8.256	7.224	7.468	8.980	9.120	10.012	17.92)	23.816

* 因缺乏 1 月份的统计记录,所以表中未列 1 月份数字;“平均值”对应的 12 月份括号中的数字表示扣除 1 月份数字后的平均扣除值假定与 2 月份相同。

资料来源:《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资料 1950—1985》,第 56—57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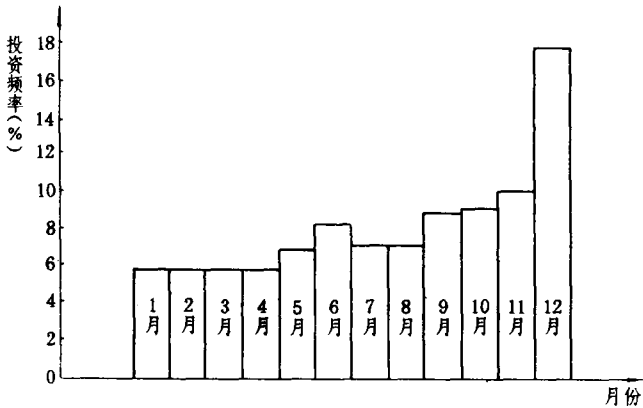


图 3—4 全民所有制单位基本建设投资平均月度分布

候同时加速增长,企业生产的来潮和退潮都是同时、同向、同步的,企业间的结构性波动倾向很弱。在这样的景气变动机制中,表现在国民经济总体上的波动就必然是一个强烈的波动。

4. 区域发展的同向选择与攀比

除了收入者、消费者以及作为投资和生产者的企业的同向选择造成同步振荡从而引起强波外,不同区域(省、县等)在经济发展上的同向扩张和同步收缩也是宏观经济增长出现强波的重要原因。

通常,地方政府比企业有更多的经济决策独立权,它对本区域(本省、本县)的经济增长和发展负有责任,因此它需要



对本区域的社会再生产过程作出统筹安排，一方面用区域性计划指标约束企业和下属单位的投资和生产行为，约束居民的消费行为，约束劳动者的劳动行为，另一方面通过随机调节和干预“纠正”微观经济主体偏离本区域计划的行为，使整个经济运行在既定的区域性计划轨道上。但是，区域计划和区域政策的形成受中央计划和中央政策的约束，地方政府只能是对先行的中央经济发展计划作出分解，接受和完成中央计划会议上规定给它的那一部分任务，无论是采取统收统支还是实行留成或地方包干，其实质都一样：只能在中央年初定的年度计划所规定的“笼子”中行事，虽然最后的生产实绩必然是或者大于或者小于这个“笼子”，但过程中的操作不能不接受这个“笼子”的限制。而且，在过程之中，地方政府还必须接受中央政府的随机指令，进行符合中央政府意志的即时调节。比如，本来年初中央要求各地方政府控制需求，防止生产“过热”，但由于种种原因，中央政府可能会改变主意，要求各地方政府转而采取扩张措施，刺激生产，把速度搞上去。在这种情况下，各地方政府不得不按照中央政府指令同时采取扩张行动，加速地区经济的增长。尤其是在中国，因为税率、利率、价格和工资率，甚至上缴利润率和企业积累率，都是由中央政府统一决定的，地方政府不可以自主地决定本地的税收、利息、价格和工资等，就更有可能引致不同地区采取的经济政策是相同的，你调价我也调价，你搞保值储蓄我也搞保值储蓄，你给职工涨工资我也给职工涨工资，形成鲜明的同向选择，不同区域之间难以形成相



向调节和交叉性景气变动。从以往的历史看，只要中央决定搞工业“大跃进”（1958年），让国民经济各个方面都“大干快上”（1978年），各个地区就会一齐掀起“大跃进”，争相“大干快上”；只要中央决定调整（1963—1965年）、紧缩（1981年）和治理整顿（1989—1990年），各个地区就会同时给银行和企业打电话、下命令要求减少投资、放慢生产进度。结果，全国各地的生产要么是排浪式地上升，要么是排浪式地下落，使国民经济增长要么是出现突发性繁荣，要么是产生急剧衰退。

更为值得强调的是，以往人们比较注意企业的攀比行为，然而事实上，地方政府也存在明显的攀比行为，不但“向上攀比”，而且“向下攀比”。当中央政府偏好于高速增长时，地方政府之间就会出现“向上攀比”的行为，谁都想在速度上比别人高出一一点，这种互相“向上攀比”的直接结果是宏观经济增长速度的实际值高于原来中央政府提出的计划值。当中央政府偏好于平衡发展或低速增长时，各地方政府就会产生“向下攀比”的行为，在充分了解别的地区的生长情况后，宁肯将本地的速度压得低一些，这种“向下攀比”又会导致宏观经济增长的实绩低于中央政府预期压缩的水平。这就是为什么历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实绩总是或高于或低于中央计划水平的原因之一。

因此，同向选择和攀比行为都会造成强波。

如果分阶段来看，地方政府同向选择和攀比的程度，改革时期比传统体制时期有所降低，因为采用“财政包干、分灶吃饭”和“定基数后上缴”的放权办法实际上给了地方政府以较



大的自由活动空间，不同地区之间在利用这块“自由地”时会使它们的政策走向产生一些差异，区域景气调节会出现某些不同和交叉。但是，即使是这样，我国区域经济的同向波动现象仍十分明显。



4章

低效增长的循环

本章的任务是在前面的“总量”和“结构”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和论证“效率周期”假说，试图了解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效率波动与总量波动的关系，观察国民收入增长曲线是怎样沿着效率曲线进展的，并从总体上考察效率波动的内在机制，着重研究周期低谷阶段效率下降的原因以及在低效状态下的经济回升会产生怎样的周期效应。

研究效率变动与总量经济增长周期的关系，不是一个新课题，早在30年代西方经济周期问题的讨论中就有人发现效率的起落变化与经济增长的景气变化的一致性。哈伯勒教授在总结30年代西方周期研究的成果时就发现，这是一个新观点。这一论点的基本思想是：“在高潮时期浪费现象会到处潜滋暗长，因此效率将降低，在低潮时期则由于消灭了浪费，效率会提高。”因此经济的景气波动与效率波动的方向相反。据说这是因为货



币工资在高涨时期一般是上升的,在低落时期一般是下降的,在高涨时期,效能工资上升的速度超过货币工资,而在低落时期效能工资的下降速度超过货币工资。但是哈伯勒指出,能力较差的工人,在高潮时不得不吸收,在低潮时则又把他们解雇,而且陈旧设备在高潮时会拿来使用,在低潮时则又搁置起来。所以效率波动与生产力曲线的波动是一致的。^① 我们不想评价这两个相反的观点,而只想研究中国经济中的现实。

§ 4.1 生产率周期

1. 劳动生产率周期

在长期趋势上,由于技术进步、生产工艺革新、劳动力质量相对提高以及管理方法和政策操作上的改善,都会引起劳动生产率提高,特别是在现代工厂体系代替分散的家庭经营,机器生产代替手工生产的条件下,规模经济效益大大提高,使得劳动生产率增长加速。中国近 40 年的经济发展同样从上述进步和革新中得到了巨大的收益,生产率极大地提高。以 1952 年为 100,中国社会劳动生产率增长指数,1978 年为 136.5,1989 年为 329.0,前 26 年的指数增长每年平均为 1.4 个百分点,后

^① [美] 哈伯勒:《繁荣与萧条》,商务印书馆 1980 年版,第 128—129 页。



11年年均递增 8.4 个百分点。劳动生产率增长,改革时期比改革前明显加速。但是,中国社会劳动生产率增长不是持续不断、逐年上升,而是存在十分显著的波动,仍然存在长波、短波、中波三种形式。表 4-1 描述了 1953—1990 年中国社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波动的三种形式。

表 4-1 社会劳动生产率周期的三种形态*

年份	短周期		中周期		长周期	年份	短周期		中周期		长周期	
	比上年增长	T-T'	比 1952 年增长	T-T'			比上年增长	T-T'	比 1952 年增长	T-T'		
1953	12.3	I	15.8	I	第一次高潮	1973	6.8	VI	100.9	第二次高潮	IV	
1954	3.1		30.5			1974	-0.9		99.1			
1955	4.1	II	20.5			1975	6.1	VII	111.2			V
1956	11.1		33.9			1976	-4.5		101.7			
1957	1.3		35.6			1977	6.1		114.0			
1958	13.3	III	53.7			1978	10.5	VIII	136.5			VI
1959	3.3		58.8			1979	4.8		147.8			
1960	-0.1		58.6			1980	3.6		156.8			
1961	-28.9		12.8			1981	1.6		160.9			
1962	-6.6		5.3			1982	4.6		172.9			
1963	8.5		14.3	1983	6.7	191.2						
1964	12.6	28.7	1984	10.1	220.6							
1965	12.8	IV	45.1	II	IX	251.0	VII					
1966	12.8		63.7			1985		9.5	266.5			
1967	-10.5		46.5			1986		4.4	292.5			
1968	-9.7		32.3			1987		7.1	323.5			
1969	14.9		52.0			1988		7.9	329.9			
1970	18.7		80.5			1989		1.3	340.8			
1971	3.4	V	86.6	III	X	340.8	V					
1972	0.8		88.1					1990	2.6			

* T-T'表示从低谷到低谷。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1)》,第 63 页。

从短周期看,社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变动出现了 10 个周



期；而中周期为 5 个；长期趋势则刚好出现一次波动，1950—1959 年为第一次高潮，之后出现了 20 多年的低潮，1982—1989 年又产生第二次高潮，形成一次完整的长波。

如果我们将表 4-1 与本书第 1 章第 1 节所描述的国民收入增长的三种周期形态作一比较，容易看出，我国社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周期波动与国民收入增长率的周期波动是完全同步的（见表 4-2、4-3、4-4）。

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变动过程中，全民所有制工业劳动生产率的波动更频繁一些，1949—1989 年期间出现了 11 次波动，其低谷年份分别是：1955、1957、1959、1961、1968、1972、1974、1976、1981、1986、1989 年。可见，社会劳动生产率增长的第 III 周期在全民所有制工业劳动生产率这里出现了第 III、IV 两次周期，而其他周期的起终点和长度是同样的。

以上的分析表明，我国总量经济波动与劳动生产率波动的关系是：当总量经济增长处于高潮阶段时，劳动生产率提高，经济增长转入低潮，劳动生产率也下降，或者我们可以反过来说：由于劳动生产率提高，经济增长出现高潮，而劳动生产率下降则导致经济增长率下降。

2. 资本生产率周期

所谓资本生产率就是投资生产率，又叫资本产出率或资本效率，我国学者常用投资效率来称呼它。我们这里使用“资



表 4-2 社会劳动生产率短波与国民收入短波年份比较 (T-T')

	I	II	III	IV	V
社会劳动生产率周期	1949—54	1954—57	1957—62	1962—68	1968—72
国民收入周期	1949—54	1954—57	1957—62	1962—68	1968—72
	VI	VII	VIII	IX	X
社会劳动生产率周期	1972—74	1974—76	1976—81	1981—86	1986—89
国民收入周期	1972—74	1974—76	1976—81	1981—86	1986—89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0）》，第36、65页。

表 4-3 社会劳动生产率中波与国民收入中波年份比较 (T-T')

	I	II	III	IV
社会劳动生产率周期	1949—62	1962—1968	1968—1976	1976—19
国民收入周期	1949—62	1962—1968	1968—1976	1976—19

资料来源：同表 4-2。

表 4-4 社会劳动生产率长波与国民收入长波年份比较

	第一次高潮期	低潮期	第二次高潮期
社会劳动生产率周期	1950—1959	1960—1981	1982—1988
国民收入周期	1950—1959	1960—1981	1982—1988

资料来源：同表 4-2。



本”一词，为的是与前面的“劳动”相对应。第2章研究投资周期时，我们曾用统计刊物中提供的“积累”来代表“总投资”，现在我们分析资本生产率时同样使用“积累”数据。

计算资本生产率可采用以下三个公式：

$$\text{总投资效率} = \frac{\text{总国民收入}}{\text{总投资}} \quad \text{简写为：} T_i = \frac{Y}{I} \quad (1)$$

$$\text{投资乘数} = \frac{\text{国民收入增量}}{\text{投资增量}} \quad \text{简写为：} R = \frac{\Delta Y}{\Delta I} \quad (2)$$

$$\text{加速系数} = \frac{\text{总投资}}{\text{国民收入增量}} \quad \text{简写为：} K = \frac{I}{\Delta Y} \quad (3)$$

在所计算的结果中， T_i 和 R 取值越大，意味着资本生产率越高，反之则越低； K 取值越大，则意味着资本生产率越小，因为国民收入的单位增量需要更多的投资来创造，或者说单位投资量只能带来一个较小的国民收入增量。考虑到前面讲到的社会劳动生产率是用平均每一个社会劳动者创造的国民收入（不变价）来表示的，不是涉及的增量关系，为口径一致，我们用公式(1)来计算资本生产率^①。实际上用另外两个公式计算得到的结果可引出同样的统计判断，为免重复，表4-5不列出 R 和 K 的结果。

由表4-5可知，在1949—1989年，我国全社会资本生产率变化历经了9个完整的周期。1989年比1988年有所回升，所以第Ⅸ周期的低潮在1988年。在9个周期中，第Ⅰ、Ⅱ、Ⅲ和

^① 计算用的数据 Y 和 I 均按当年价，分子和分母都用当年价，计算结果不会受价格干扰。



第Ⅷ周期的持续时间较长,其余周期长度很短,尤其是第Ⅴ、Ⅵ、Ⅶ周期从高潮到低谷没有平缓转折。

表 4-5 全社会资本生产率周期

年份	T_i	周期	年份	T_i	周期
1952	4.5308	I	1971	3.0366	V
1953	4.2202		1972	3.2963	
1954	3.8575		1973	3.1282	
1955	4.2595	II	1974	3.1687	VI
1956	4.0645		1975	3.0157	
1957	3.8970		1976	3.2447	VII
1958	2.9499		1977	3.1779	
1959	2.1900		1978	2.7691	
1960	2.4351	III	1979	2.8854	VIII
1961	5.1077		1980	3.1657	
1962	9.1929		1981	3.5633	
1963	5.4645		1982	3.4450	
1964	4.4335		1983	3.3329	
1965	3.8000		1984	3.1470	
1966	3.3745		1985	2.6712	
1967	4.8915	IV	1986	2.6695	IX
1968	4.7483		1987	2.8238	
1969	4.5294		1988	2.7743	
1970	3.1165		1989	2.8081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1)》,第40页。

我们将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周期和资本生产率周期进行比较,得到一个重要结论是:二者按相反方向变化,当劳动生产率周期进入高峰时,资本生产率周期则进入低潮;当劳动生产率进入低潮时,资本生产率周期却进入高峰时期(见表4-6)。



表 4-6 劳动生产率周期、资本生产率周期的
高峰年和低谷年的比较

劳动生产率周期	高峰年	1953	1956	1958	1965	1970	1973	1975	1978	1984	1988
	低谷年	1954	1957	1962	1968	1972	1974	1976	1981	1986	1989
资本生产率周期	高峰年	1952	1955	1962	1967	1972	1974	1976	1981	1987	
	低谷年	1954	1959	1966	1971	1973	1975	1978	1986	1988	

资料来源：同表 4-1、4-5。

前面指出过，国民收入周期与劳动生产率周期的变动是同步的。现在可以进一步补充说：资本生产率周期与国民收入周期的变动是反向的。对这种情形，可以从两方面来解释：一是就业方面，二是资本使用方面。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就业刚性。无论生产和投资是扩张还是收缩，已在就业岗位上的职工总是在那个岗位上，货币工资不会因为生产不景气而减少，企业职员不会因为投资削减、任务不足而被解雇。由于企业的产量依赖于资金投入和生产任务，只要资金投入和生产任务减少，机器闲置量增大，结果产出减少，但企业职工还有那么多，结果人均产量下降，从而劳动生产率下降。另一方面，在紧缩时期，投资减速幅度大于产出减速幅度（这一点已在讨论投资周期的那一章指出过），加上投资减速和产出减速有一个时差，而且紧缩时期削减最多的是粗放型的基本建设投资而更新改造投资下降幅度小一些，都会导致紧缩期单位投资的产出相对提高。当然对于 Y/I 式来说，问题不在于分子 Y 增大，而在于分母 I 缩小，甚至宁可说分子的减速度小于分母的减速度。顺便要指出的是，



有的人根据调整时期相对的资本产出率高于扩张时期而过分批评周期的扩张阶段推崇周期的收缩阶段，这是不妥当的，因为靠 I 的减速度快于 Y 的减速度而换来的“资本生产率”究竟对经济增长和国强民富有多大意义是值得怀疑的，特别是用牺牲总量增长换来的“资本生产率”实际上伴随着巨大的劳动力浪费。我国经济统计中的“基本建设投资”实际上相当于马克思所讲的那个“不变资本”，紧缩时期主要以削减这一部分资本为目标，而企业职工的工资照发，即“可变资本”保持不变，这本身就是一种“结构失衡”，^① 其直接结果是劳动效率下降。因此，紧缩时期“资本生产率”上升而劳动生产率下降是与刚性就业和刚性工资体制紧密联系的。

按通常理，在高潮时期，资本和劳动的效率都应当比低潮时期高一些，因为投资和生产规模的扩大，既会创造出大量的就业机会，每个人都有事干，而且“陈旧设备在高涨时会拿来使用”，劳动力和机器设备可以实现“充分使用”（Full employment）。问题是，在周期高涨阶段，投资增长的加速快于产出增长的加速，即公式 Y/I 中的分子分母虽然都增大，但 Y 不及 I 增加那么多、那么快，分母大于分子，结果投资效率 T_i 不是相对提高而是相对下降。资本投入（或资金投入）的加速增长快于

^① 一般来说，紧缩的主因是调整扩张时期“长线”和“短线”之间的不平衡，以达到结构平衡的目的，但实际的调整本身就是不平衡的，因为在劳动就业和工资保持刚性状态的情况下仅仅削减资本投资，必然使劳动力闲置。因此，实行刚性工资和刚性就业下的调整可以给一个名称，叫做“用失衡调整失衡”。



产出的加速增长，是理解经济周期高涨期伴随资本生产率下降的奥秘所在。

这样，我们便得到一个总体认识：在中国经济周期的扩张和收缩阶段，我们都可以看到效率下降的情形，在高速扩张时资本效率下降，在急剧衰退时劳动效率下降，低效增长不断地自我循环。我们要进一步了解的是，低效增长对强波及其再生有什么影响，资本投入增长快于有效产出的增长是怎样创造过度繁荣而过度繁荣为什么又难以长久维持，解释对象的可能选择点是：中国经济到底是怎样从低谷转向回升的？

§ 4.2 低效增长的回升和衰退

现在，我们从效率周期的角度来研究强波周期阶段的形成，主要考察回升和衰退两个阶段，首先看中国经济增长过程是怎样从低谷转向回升的，因为研究经济回升过程，可以帮助我们找到解释效率周期与经济周期关系的突破口。

1. 一个回升的案例：1990年3—11月

1989—1990年期间，中国经济学界就如何解决市场疲软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政府从1989年10月开始针对该年8、9月以来国民经济特别是工业生产的大滑坡现象，就如何迅速启动



市场采取了种种措施，这为我们研究中国经济周期的回升运动提供了直接的案例材料，尽管集中计划体制时期的周期回升过程与改革时期的周期回升过程不完全相同，但还是存在许多相似之处，因为改革以来在工业生产领域中还未引致主体机制发生实质性变化。

这一次政府推动经济回升，使国民经济迅速从周期的低谷阶段走出来，走了三步：第一步是从1989年10月份开始放松银根，向工业生产注入资金，尤其是大幅度增加工业流动资金贷款。这一步骤并未收到刺激工业生产的预期效果，由于生产下滑的惯性，第四季度工业生产继续衰退，直至1990年1—2月份的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同期下降0.9%。为了急于推动生产回升，政府于1990年3月份开始采取第二个步骤，继续放松银根，降低存、贷款利率，给工业企业注入更多的资金，但改变了资金投放方向，即不是作为流动资产投资，而是作为固定资产投资，尤其是扩大工业基本建设投资。这一步很快见效，结果工业总产值由1—2月的负增长转变为3—5月正增长3.3%的速度，6月份上升5.9%。这一步骤的直接效果是刺激了工业生产回升，但是由于以消费需求为主体的最终需求或即期需求不足，生产回升带来的只是库存水平加速提高，不仅工厂库房积压大量增加，而且商业库房愈益暴满，销售严重困难，生产出来的产品价值得不到实现。针对这种情况，国务院又于7月份开始第三步，将扩大的资金主要不是用于刺激企业生产，而是刺激市场销售和刺激买者购买从而提高消费需求。办法是一方面陆



续大幅度上调部分商品价格和邮政资费，允许各地出台一些调价项目，让价格预期看涨，调动消费者购买欲望；另一方面用一部分资金开展市场组织和促销；同时再次下调存、贷款利率和汇率，追加年度信贷规模，既促使作为生产资料消费者的企业增加购买，又迫使居民减少储蓄增加即期开支和消费。同时帮助农民增收增支，刺激农村市场。这一步的效果是，城乡市场转旺，工业生产回升加速。从 10 月份开始，农村当月市场零售额突破了前几月的低增长、停滞和负增长格局，10 月和 11 月的消费品零售额分别比去年同月增长 4.2% 和 5.4%，农业生产资料零售额分别增长 4.6% 和 9.3%。城市居民消费品零售额 10 月、11 月分别比去年同月增长 10.9% 和 15%。可见市场销售增长出现月度加速。市场销售加速后，工业总产值增长亦加速，8、9、10、11 月其增长率(比去年同月)分别为 4.6%、9%、12.7% 和 15%，逐月的加速度相当明显。

1990 年 12 月下旬，国家统计局综合司对 1989 年 8 月至 1990 年 11 月期间我国国民经济的综合景气变动进行了观察和分析(图 4-1)。

从下面的图可以看出，我国最近这次经济周期的初步回升是在 1990 年 3 月至 8 月期间，加速回升是在 9 月份开始的，图中 3 个纵向区间反映政府启动市场、刺激生产的“三步曲”的实际效应：第一步注入流动资金没有改变综合景气衰退的局面，第二步注入固定资金带来了经济的轻微回升，第三步刺激最终需求导致了经济加速回升。当然，一般来说，政策转变成现实有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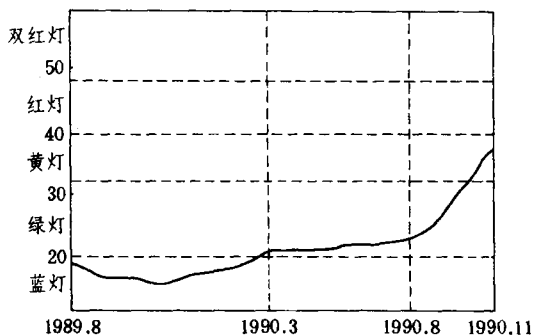


图 4-1 1989 年 8 月—1990 年 11 月综合景气变动*

* “综合景气变动”的测度,是根据对 12 个监测指标增长率的数量区间进行评分,同样按“五灯”区间来打分,然后将分项得分计算出对应“五灯”区间各自的总分。从蓝灯到双红灯这“五灯”间各自的临界增长率(我按简单算术平均计算)分别为:蓝灯到绿灯为 4.09%,绿灯至黄灯为 10.45%,黄灯至红灯为 12.95%,红灯至双红灯为 15.38%。而五灯各自的区间分值为:12 分、24 分、36 分、48 分和 60 分。

个时滞,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中这个时滞有时为一个季度,有时为半年。这个时滞长度并不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形,因为在我们这个国有制为主导的经济中的政府干预是直接的、快速的,有时候打一个电话就行;虽然在区域上西部地区反映慢一些,但是,全国加总后得到反映时滞一般不会超过 3 个月(在传统体制下,这个反映时滞更短)。根据第三步刺激在政策和实际之间的反映时间,这个时滞为两个月。另外,图 4-1 描述的景气趋势线实际上未充分反映某些主要指标的景气趋势。比如工业贷款从 1990 年 1 月起就进入了红灯区,一直持续到作



为记录终点的 11 月份；狭义货币流通量于 10、11 月已处于红灯区，而工业总产值增长率于 11 月（15%）进入红灯区。在观察景气变动时，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基数”。考虑到 1989 年下半年工业生产出现衰退，工业总产值增长率很低，所以我们对 1990 年 9 月至 11 月工业产值加速增长不必过份恐惧。但必须看到，工业生产的实际加速回升是一个事实，特别要注意的是，这个加速回升完全是靠注入资金、简单地扩大投资、大量增投资货币来实现的，而不是在结构改造的基础上通过加速技术进步、组织创新、要素组合的优化升级和提高劳动效率来实现的。据统计，1990 年 1 至 11 月，预算内国营工业企业亏损额比上年同期增长一倍多，实现利税下降 18.8%。这说明，中国经济的回升不是靠效率提高来推动，而靠的是政府增加信贷、加速资金投入来拉动；不是依赖企业创新，而依赖的是政府诱导。如果观察的时间不是市场调节份额和非国有经济份额基本上分别已占 50% 左右的体制变革时期，而是经济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时期，这一判断和结论更为恰当。

2. 回升的两个途径：创新为主 与注入资金为主

在市场经济中，生产的回升则是另外一种景象，它取决于如熊彼特所发现的“创新”活动，取决于“建立一种新的生产



函数”，即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①在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下，为了在总体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免除破产甚至获取超额利润，企业家不得不努力创新；引进新产品，引用新技术和新的生产方法，开辟新的市场，控制原材料的新供应来源，实现企业的新组织。如果所有企业都这么做，那么整个经济就会获得一种新的增长动力，它会在新的结构状态下扩大增长的源泉，投资机会增加，生产规模扩大，就业量亦随之增加，结果经济走出低谷，转入回升和复苏。尤其是，在衰退期间，大量企业破产引起大批工人失业，这不但意味着改变旧的要素结构，使由低效而决定的低竞争能力的企业破产，让其资本和劳动力寻找新的要素组合结构，而且意味着劳动力质量将被迫提高，因为在劳动力竞争中，你没有高质量的劳动技能就找不到新的职业。这样一来，资本要素和劳动力要素都会获得改进，提高其产出水平。所以，市场经济周期走出衰退期进入回升期是以要素效率提高为前提的。在公式 Y/I （资本生产率）和 Y/L （劳动生产率）中，虽然和前面提到的中国经济的情形一样，也是分子分母同时加速增长，但不同之处在于不是分母 I 和 L 的增长快于分子 NI 的增长，而是相反： Y 的加速增长快于 I 和 L 的加速增长。

因此，经济回升的动力和途径有两个：一个主要是投入

^① 宋承先等主编：《当代西方经济思潮》，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200—201 页。



(资本和劳动)的外延扩张,简单地扩大资金投放规模,注入货币;一个主要是以结构革新和效率提高为基础的内含扩张,以创新为主。走后一条途径投资不必采取过度加速的形式就可以带来生产的回升。走前一条途径,投资过度加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没有快速的投资增长,产出就难以达到计划水平。而靠简单地投放货币、注入资金无疑会带来产值的加速增长,这是由于生产结果的评价不是经由企业家在扣除包括工资在内的“利润计算”而是经由一切投入混然一体的“产值计算”,其结果必然是有多大的投入就有多大的产出或产值,即使利润为零甚至为负数,只要工资和产值增加很快,企业也会竭力要求增加投资贷款,投资使用效率越是低,追求资金投入的渴望就越强。这样便产生一个非良性循环:简单的注入资金推动低效益的产值增长,低效益的产值增长又要求更多的资金注入,最终是推动经济走上“过热”轨道,产生突发式的“虚假繁荣”。

这并不是说效率永久停滞、下降,也不是每一个企业都处于同样的效率状况,在不同时期,在不同的企业,效率水平是不同的,而且呈上涨趋势。在技术进步的整体推动下,来自效率贡献的增长总是会存在的。我们在上面试图强调的是:使中国经济增长从低谷转向回升的突出表现不是企业的自主创新而是政府的货币投放,效率或生产率增长曲线表现为在产值增长曲线之下延伸,劳动生产率的回升慢于产值增长率的回升。



3. 简单的数量型收缩

低效增长循环的另一面是简单的数量型收缩。它包括两个基本内容，一是通过减少财政拨款或由银行减少、停止贷款的方式削减投资，最主要的是砍固定资产投资，其中尤其是压缩基本建设投资，有的项目对投资的数量需求具有整体性，一部分投资的突然中止会使已完成的投资部分不能形成生产能力而报废，但即使如此也得停止作为追加投资的拨款或贷款，使整个投资工程半途而废。二是直接裁减员工，不过这个裁减不是经由以利润预期和价格信号为调节器的市场评价，并非根据企业和工程项目的运营效率来判别哪个地方的员工需裁减，哪个地方的员工不需裁减，而是服从行政评价和计划指令。由于城镇职工的就业具有刚性，一旦进入工厂就再也不能被解雇，只能“进”不能“退”；还由于城镇职工的工薪具有刚性，只能向上调整，加薪提级，不能随生产景气状况而使工资上下飘浮，即使是衰退时期工资也不能下降，结果所谓裁减员工就只是在那样一些领域，在这些领域中，全部或大多数员工不是来自城镇或由政府统分统配（如从大学分配来的毕业生）的固定工，不是“吃商品粮”的“国家职工”，而是来自乡村的合同工或临时工。一般来说，这些员工大部分被安排在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商业服务行业和其它技术和生产工艺比较简单的行业或部门，他们一般承担新工业项目的基础建设工作，每当政府决定压缩



基本建设投资项目时，这些员工自然就被归入被裁减之列，劝退其回乡，重新回到土地上从事并不真正急需的农业劳动。这两种以压缩新建项目投资和裁减农民工为基本内容的数量型紧缩，事实上可以叫做“不平衡紧缩”，或“短边紧缩”，因为它不是针对所有企业，不是针对全体就业人员，不是针对各种性质的投资和生项目，而仅仅是其中政府认为必需紧缩的部分。一般地说，每一次总量紧缩总是伴随对两类基本产业——农业和非农业——进行“结构调整”，其目的旨在用减慢工业增长的办法来加强农业，让经济高涨时期从农业分离出来进入非农产业的一部分劳动投入重新回流至农业经济部门。这种“结构调整”成为上述“不平衡紧缩”的直接动因。

“不平衡紧缩”可以实现政府和计划者所期望的在农业和非农产业中调整投入（资金和劳动）配置的目的，投入增长向农业倾斜。但它的致命缺点是未能在非农产业内部建立符合新结构要求的“新的生产函数”，未能利用总量降温的有利条件对存量结构进行调整，未能在资本要素和劳动要素之间建立“熊彼特式的新组合”，那些经营管理不善的企业并未因总量紧缩造成的投资紧张、销售困难和全面亏损而破产、关门。企业要么是照常生产，增加库存积压，要么是让机器停止运转但职工照常上班拿工资，其工资基金和经营亏损或者由财政予以补贴，或者向银行申请“亏损借贷”，进行债务型经营，而企业结构还是原来的，企业内的资产和劳动组合还是旧式的，生产方式和工艺还是老样子。因此政府推行的“不平衡紧缩”不会使所有企



业面临同样的伤筋动骨的风险。那些紧缩时期带病运转的企业普遍的行动和策略是：等待。他们知道政府的总量紧缩维持不了多久，而且以强化农业生产为目的“不平衡紧缩”也容易达到目的，所以只要能坚持，只要能给职工发出工资以度过暂时的难关，等到政府决定再度放松，一切可以照常进行。在传统计划经济时期，政府在实行总量紧缩时也进行过企业“关停并转”，但存在两个问题：(1)“关停并转”的规模是极为有限的，政府对那些亏损并不是很严重但还款能力实际上已经下降到本应破产的企业实行保护、维持；(2)“关停并转”的对象选择不是经由以利润预期和价格信号调节为基础的市场评价，而是经由行政官员评价，而行政官员评价不可避免地受到信息、利益和其他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因此这种“关停并转”的对象选择可能发生错误。在改革时期的1989—1990年这次紧缩中，几乎没有“关停并转”，带病运转的企业还是维持独立的生产组织和财务核算。结果，企业还是原来的企业，没有产生新的改组，资产和劳动的结合方式还是过去的模式。这样一来，缺乏存量结构调整的总量紧缩其效应仅仅是在农业投入和增长略有加速的基础上带来了非农产业增长速度大幅度下降，这种调整和紧缩并未为新周期的扩张繁荣准备好一套“新的生产函数”，并未实现向新增长格局转换的产业、产品和企业结构改革。

可见，中国经济从繁荣期向低潮期的调整，只是从数量上压低了增长速度，从外延上缩小或抑制了资本形成规模，减缓了以农业份额（就业和产出份额）下降为中心内容的工业化加



速进程，并没有实现结构革新和效率改善。由于中国经济是一个靠加速投入增长来实现加速产量增长的经济，经济运行中缺乏以争取技术和管理革新领先的效率竞争，企业之间的竞赛不是由技术和管理革新领先而带来的“效率的竞赛”，而是“产值的竞赛”，所以所谓“经济效率”实际上是和投入的加速增长相结合的。在劳动投入为给定的情况下，如果某企业的资本投入增长速度快于另一个企业，那么前者的产值增长亦快于后者，虽然按公式 Y/I 计算的资本生产率相对低一些，但按公式 Y/L 计算的劳动生产率则相对较高。或者，在资本投入为给定的情况下，如果某企业的劳动投入增长速度快于另一个企业，相对来说前者的产值增长也会快于后者，尽管 Y/L 计算的劳动生产率相对低一些，但按公式 Y/I 计算的资本生产率亦会相对较高。而企业为了得到上级（包括银行）的好的评价从而诱使上级领导（包括银行负责人）为下一步提供一个企业所希望的投资承诺，他们会各自选取有利于自己一方的效率评价尺度，以致上司难以判别谁的效率究竟是否低于另一些“投资候选者”，这就给判别谁应该在紧缩中“下马”和“关停并转”带来了评价上的困难。尤其是在“产值竞赛”机制中，单纯从数量上压低速度，不但调不动结构，难以建立“新的生产函数”，而且当前的要素生产率会下降。

“不平衡紧缩”，或“短边紧缩”，既会导致总量性效率下降，又会造成结构性效率下降，因为作为生产要素的资本和劳动只有在结合状态下才会带来产出的增长，其中一方短少则另一方



势必形成事实上的闲置和浪费，即资金投入数量的减少既会使资金的产值贡献减少，又会使劳动的产值贡献减少，所以以资本数量型紧缩为特征的“短边紧缩”，会造成总量和结构的双重效率下降。

最近几年来，有的经济学家以为“压速度”可以达到在总量平衡的基础上实现结构调整和效率提高的目的，但实际结果是（1989—1990 年为例），速度压下来了，结构调整只能在工农业和工业内部基础和加工行业的数量比例调整上有所作为，生产要素结构调整不能实现，而效率反而呈下降趋势，其原因在于单纯的数量调整和短边紧缩不能解决深层问题。

4. “短边紧缩”后的全面扩张

中国经济周期运动的基本特征是短边紧缩和全面扩张的交替变化。当经济达到高潮并且政府感到再加速增长会使短线制约和总需求过剩超越经济系统的“极限”时，政府便会立即让一些原计划上马的项目停止上马，已上马的项目部分下马，对已投产营运的企业的新增投资许诺也实行紧缩，但不允许企业破产，不允许拥有城市户口的工人失业。所以，从生产要素的角度看，紧缩是短边的，只有投资需求下降，没有工资成本下降和失业率提高，这又可以叫做“无失业紧缩”或“工资刚性紧缩”。如前所述，这种短边紧缩既会造成当前的劳动效率下降，助长劳动者的惰性，又会降低未来劳动投入的质量，因为工人



在紧缩期没有失业危机感也就不会为了有限的就业机会而去努力提高劳动技能和劳动素质以提高个人的就业竞争能力。除此之外，短边紧缩实际上为下一轮数量型扩张打下了基础。

一般说来，在没有失业和不出现工资率下降的“短边紧缩”的情况下，由于企业产出和上缴利税下降致使企业因相对工资成本提高^①而政府财政的相对开支增大，^②政府的财政亏损补贴会越背越大，持续时间越长，不堪忍受的补贴压力将愈益加大，而靠发货币的办法来在名义上弥补财政亏空，将财政赤字转化为通货膨胀又会遭到老百姓的反对。为了不至引发灾难性的财政危机，政府会主动地缩短“短边紧缩”时间，尽早放松信贷控制，将短边延长，在资本和劳动这两个基本生产要素之间建立新的均衡。在“短边紧缩”下，如果假定两要素的投入组合系数和产出弹性系数都是0.5(对于 α 和 β 都一样)并保持不变，那么有简单的要素非均衡模型：

$$L(t) > I(t)$$

$$L_p, A_i > I^p, A_i$$

式中， $L(t)$ = 总就业； $I(t)$ = 总投资； L_p = 初始年份

① 我们将前面提到过的收益或生产率公式 Y/L 和 Y/I 倒过来，得到成本的简单公式 L/Y (工资成本)和 I/Y (资金成本)，总成本率为 L/Y 与 I/Y 之和。在短边紧缩下，资金成本率 I/Y 下降或不变，因为或者是投资减速快于产出减速，或者是二者减速程度一样，但工资成本率则无论怎样会提高，因为在 L 不变的情况下，无论 Y 减幅多大， L/Y 总是会增大。

② 在其他条件为一定的情况下，财政收入减少，即使财政开支绝对量不变，财政的相对开支也会增大，出现赤字。



的就业量； Δ_i = 就业增长因子； I^p = 初始年份的投资规模； Δ_i = 投资增长因子。

为了消除短边约束，须采取两个办法。其一是让多余员工失业，失业率大小取决于短边程度，或者是让就业增长因子 $\Delta_i = 0$ ，即新增劳动力供给完全不形成为就业，或者是在 $\Delta_i = 0$ 的同时还迫使初始年份的就业量 L^p 规模缩减。其二是保持 L^p ， Δ_i 不变，靠加速投资增长因子 Δ_i 来实现。这两个办法都会导致：

$$L(t) = I(t)$$

$$L^p, \Delta_i = I^p, \Delta_i$$

在刚性就业和刚性工资体制下，采取的是第二种办法，用扩大投资来使要素非均衡转化为要素均衡。当然实际操作上不会恰好均衡，投资扩张可能过度，但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过度增长或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经济中， Δ_i 具有相当大的扩张可能性，不仅城镇经济中有一大批“在职失业后备军”，而且近 1.5 亿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足以为 Δ_i 所要求的就业增量提供供给。

问题不在于全面的数量型扩张会碰到要素数量型供给的限制，而在于要素质量的约束。如果加速扩张的投资只能继续与素质低下的劳动力相结合，不但单位投资的收益不可能提高，而且会相互强化对方的粗放型投入，生产和投资难以从外延型发展阶段向内含型发展阶段，经济的扩张单纯成为数量型扩张，周期过程就会表现为低效的单纯数量运动，而这种单纯的数量运动往往表现出更大的不稳定性。最终是，数量运动、低效和不稳定性三者相互强化，不断再生和加剧。



§ 4. 3 “体制效率周期”假说

在考察效率与周期波动的关系时，我们引入“体制效率周期”概念。这一概念的基本涵意是指，随着“体制”的革新和变迁，经济的效率亦会随之发生变化，先是效率递增，后是效率递减，形成类似的扩张、收缩周期。在一种新的体制产生的初期，总是会或多或少地给追求和建造这个体制的人们以激励，给他们以精神鼓舞，促使他们革新自己的行为，改善工作态度，提高劳动效率。当这一行动迅速给人们带来利益和实惠时，劳动的热情和干劲会加倍提高，生产的效率进一步提高，直至达到高峰。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经济过程的复杂多样化，旧的体制框架逐渐显现出局限性，人们对原来那种体制的热情和冲动下降，工作效率逐渐下降，以至进入低潮，与此同时人们又要求一种新的体制来对旧的体制进行改革，注入新的因素。这样一来，体制变化完成一次“周期”，而产生于体制刺激的劳动效率变化也完成一次“周期”。体制周期除了导致劳动效率周期外，还会导致管理效率周期，因为体制产生初期通常伴随新的管理和组织形成出现，而新的管理和组织形式又会改变旧的管理、组织方式对生产力发展的阻碍，为改善生产力组织提供新的舞台，以致生产力的生产率提高。同样，由于技术进步和新的市场战略的要求和变化，旧的管理方式和组织方式便逐渐变



得不适应起来，结果管理和组织效率随之逐渐下降，直至达到低潮，然后进一步寻找新的管理和组织方式。这样，管理效率“周期”形成。由于劳动效率和管理效率的变动与体制变动紧密相关，所以我们将其统称为“体制效率周期”。这里讲的“体制”不只是通常所讲的产权制度，它还包括管理和经营机制，劳动与生产资料的组合结构，以及经济资源的配置机制等。

与产品生命周期、^① 创新和技术变革周期^② 等都是经济长期发展过程中的普遍现象一样，“体制效率周期”也具有某种普遍性。在迄今为止的历史长河中，我们找不到永恒不变的一劳永逸的经济体制，它总是会在长短距离不等的不同时间上进行调整、改革和改造，而在从一次调整到另一次调整的期间，它所带来的经济效率会出现由升到降的起伏变化，从而成为经济增长扩张和收缩循环交替的解释变量之一。

但是，“体制效率周期”对解释经济增长的短期波动不具有令人满意的解释力，因为一种体制在一旦建立以后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它从成长、成熟到衰退的变化要经历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即使是用行政命令促使其加速形成也要耗费较长的时间，不可能像经济增长率某些短期波动一样用两三年就可以完成一次

① 英国经济学家里克·布朗在《小企业的市场战略》一书中，对产品的生命周期过程作了清晰的研究。他指出：“产品的生命都是有限的，要经过成长、成熟、衰退三个阶段，这就是产品的生命周期。”（见布朗书，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第57页）。

② [美]熊彼特：《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1934年版。



周期。但是，“体制效率周期”对解释经济增长的中波和长波比较有说服力。

我国近 40 年来国民经济的成长几次大上天下，整个周期的波动系数高于其他国家和地区，除了前几章所讨论的经济增长过程的内在因素外，还有来自体制循环往复变动的因素，还有由此引起的“体制效率周期”的影响。急剧的体制变革，或者是成为推动经济走向繁荣的动力，或者是使经济陷入混乱的推力，无论如何，急剧的体制变革总是会造成经济体系激烈震动，促使经济增长率加速或减速。

新中国成立，农民从无地到有地，从建立互助组到建立初级社和高级社，崭新的制度激励了农民的劳动热情和创新精神，解放了农业劳动生产力，同时农业耕作效率极大提高，农业生产除个别年份受天灾影响而减产外连续七八年保持繁荣发展势头。与此同时，城市职工在新的城市经济制度的鼓舞下也以过去从未有过的饱满的工作热情为新中国工业经济的兴建和发展努力作出贡献，带来了连续八九年的工业高速繁荣。我们且不论当时的“大跃进”发展政策超过国力给经济正常增长造成了负效应，仅就当时工人、农民和所有社会劳动成员的劳动干劲而言的确是前所未有的，对此，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几乎都深切地感觉到。这说明新制度的出现为经济增长的繁荣高涨作出了贡献。但是，50 年代末搞制度升级变革，农村实行人民公社化，城市小集体升级为大集体，大集体转变成国营，挫伤了城乡劳动者的积极性，生产效率下降。尽管我们可以找出许多理由比如盲目冒进的



工业发展政策等来解释 60 年代初我国国民经济的大衰退,但是不能不看到不切实的制度变革降低了制度效率,也是促成经济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这就是说,新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一次中周期(1950—1962 年,是一次典型的古典周期和强波周期)与由体制变革引起的“体制效率周期”紧密相关。

从 1961 年开始,政府将过度升级的制度实行向下变革,降低公有化程度和国有化的覆盖面,比如在农村将“队为基础、三级所有(生产队、大队和公社)”规定为农村经济运行和管理的根本制度,^①并且取消配给制规定,在城乡将不利于生产和生活的在前几年转为国营或公社工业的手工业改为工业合作社或合作小组,等等,再一次从制度调整上提高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和劳动效率,应当看到,这对促进 1963—1966 年的经济繁荣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它为第二个中周期扩张繁荣阶段的形成作出了贡献。可惜的是随后 10 多年全国陷入群众性政治斗争的漩涡,体制效率处于停滞和衰减之中。

当 70 年代末体制效率出现严重危机之时,政府又发动新一轮体制的调整和改革,在农村将原来的“队为基础、三级所有”的统一占有、统一生产经营和统一分配的体制改成以农户家庭独立生产经营、自主分配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城市国有企业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在公有制经济之旁扶植和发展个体经济,引入市场机制,等等,又导致体制效率明显提高,

^① 先是规定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后来变为以生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



带来了经济的普遍繁荣,推动了经济再一次转入扩张繁荣阶段。虽然 1989—1990 年的低增长不能完全用“体制效率周期”假说来解释,因为我们并不能就目前存在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个体经济的增长轨迹上画出一条规则的劳动和管理效率从上升到衰减的曲线,但是迄今为止的国有企业实行的承包经营责任制却似乎表现为“体制效率周期”曲线。在 80 年代中期,承包者热情极高,经营效率也相当不错,从而为当时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作出了贡献。承包初期的经营效率曲线是向上移动的,但随着承包者生产积极性的下降,尤其是在第一轮承包和第二轮承包的交替中,承包者的边际经营效率值几乎接近于零,而一些被迫续包(由上级指令你不包也得包)的承包人更是缺乏投资和生产兴趣。这样一来,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制度效率周期”正处于衰退阶段,需要有新的体制变革措施来改变“体制效率周期”的曲线。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是不是“体制效率周期”会一个接一个替代下去从而制度调整和变革没有终结呢?看来,制度调整和变革不会是从有到无,不会消除,但程度可以变化,它给增长过程带来的强波效应可以消除。这就要求建立一个可以不断自动调整不断用小的起伏来建立新的秩序并且使效率不断提高的比较稳定的制度。我们在前面讨论的主要是引发强烈震荡的“体制效率周期”。顺便要指出的是,目前改革的任务是双重的:提高效率,避免强波。这就必须建立一个使效率和波动同时转入正常的轨道的制度。



5

章

波动累积过程

经济波动是一个复杂的现象，它是由许多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因素共同造成的，单一成因论的解释力总是显得相当软弱。当然，如果解释的对象不是总量波动而是产业、部门、行业或某类产品的波动，其成因解释则可能简单一些，例如有的人用农业的景气变化来解释工业波动，用消费周期来解释某些产品和产业的生命周期，不是没有道理的。所谓总量波动实际上是总产出波动，它是各类产业的产出加总后的总体变化，也是总投入波动在一定时滞后的反映。例如资本和劳动力的变动在给定的结构和效益条件下总是会引起总产出的波动。然而事实上，跟资本和劳动一样，结构和效益也可以作为解释总量波动的独立变量来理解，因为结构的变换及效率的升降同样会引致总量经济发生向上或向下的变化。这样看来，建立投资波动和总量波动的因果关系模型不能说没有道理，但至少可以说是不全面的，



严谨的波动解释模型就应当是：

$$Q_c = f(K_D, L_D, S_D, E_D)$$

尽管这一解释模型会遇到资料困难，其中结构变化 S 和效率变化 E 没有现成的与资本 K 和劳动就业 L 口径一致的统计记录，但是它本身对用 K 的变动来解释总体经济变动的单一因素论提出了怀疑。理论上可以提出这样的假设，即使资本投资和劳动就业量保持不变，如果结构和效率发生变化，总产量也可能提高或下降，因为周期分析中的“总产量”概念不只是投入要素的简单相加。它还包括“效率贡献”，体现全部经济活动的价值实现。

解释波动的另一个要考虑的是经济背景或环境问题。假如我们的研究对象不是“波动一般”，而是在中国发生的特殊波动现象，那么至少应当注意到制度组织、发展水平、政策方式的特征性。因为以纵向计划分配为特征的经济机制、处于加速工业化阶段的发展中经济、以及受集中意识支配的政策体系，其波动行为必然和工业发达的市场经济的波动行为不相同。

本章研究以纵向计划分配为特征的经济机制在周期形式上的特殊性，讨论这一机制内生的波动累积倾向对周期运动的影响。



§ 5.1 经济形态与周期性质

1. 从两种经济形态谈起

按照经济运行和协调机制的不同特征，我们将经济体制分成两类：一类是受价值规律调节的经济，在这种经济中存在着普遍的商品货币关系，不仅微观经济领域中的企业和家户、买者和卖者的行为要接受价值规律的调节，经受市场的检验，而且宏观经济领域中的各级政府调节机构的行为也要接受价值规律的检验，就是说政府的宏观协调行为不是从单纯的主观意愿出发，而是从价值规律的客观要求出发。因此经济中的平衡和不平衡的转换、调节者和被调节者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的关系，而不是单纯的纵向依附关系。从动态上来把握的经济非均衡可以理解为“客观非均衡”。这种经济形态同样可以与计划相结合，通过宏观计划行动来弥补单一价值规律调节不可避免地出现某些“空档”，但是计划不是逆价值规律而行动，不是用服从个别领导人的主观意志而破坏价值规律的客观发展过程，不是用官僚主义来支配经济计划的具体形成和实施，而是从价值规律出发、接受价值规律的客观约束。因此我们定义的“客观非均衡”实际上又是“价值非均衡”。另一类是受过度的纵向行政干预调节的经济。在这种经济形态中，对微观经



济活动的调节以及宏观经济活动本身的协调，起主导作用的不是商品货币关系，不是价值规律的横向作用，而主要是受凌驾于价值规律舞台之上以及凌驾于科学和民主的计划之上的长官意志，有时甚至是某一个领导人的主观意志，同时，由于纵向的行政干预机制的构成是多级的，每一级都有一个长官，都有一个行政干预群体，所以每一级的计划调节和价值规律调节都有可能受到来自上面的政治干预和个别领导人意愿的约束。这种纵向行政干预既渗透到宏观经济活动的协调上又直接渗透到微观经济的运行中。因此经济增长的非均衡过程不是产生于价值规律的“客观非均衡”，而是一种“主观非均衡”，也可以叫做“非价值的非均衡”。

顺便要指出的是，在我国长期以来的“计划和市场”问题的讨论中，人们大都是从二者各自的优缺点去寻找如何结合的关系。但是我认为，二者可以结合，但前提条件是计划必须是科学和民主的计划，而不是领导人拍板的计划，不是受过度行政干预的计划。由官僚主义决定的计划是很难和市场结合得好的。我不大赞成一般地批评计划，不大赞成用计划的弱点来论证市场的必要性、优越性。单纯从协调功能看，计划的优点是掌握宏观经济动态和长期趋势，并可以据此采取市场所不能及的行动；当然在微观协调上市场调节有更大的优越性。我们几十年的实践中，问题不是出在计划本身，而是出在计划的科学性、民主性受到了官僚主义的干扰和破坏，受到了过度的纵向行政干预。实际上，现代西方市场经济国家计划的作用在加强，



例如日本、法国和美国就是这样，但他们的计划不是由行政命令决定，而是由价值规律决定。所以，我们体制中的问题不在于“计划”，而在于计划中过度的纵向行政干预。因此，计划机制改革要做的是排除计划过程中的官僚主义干预，变纵向的过度行政干预性计划为民主的受价值规律决定的计划，从根本上改造过度的纵向行政干预经济。

过度的纵向行政干预经济不仅不能避免常规波动，而且有可能造成强波，这就是说一个集中计划经济的增长过程，不仅不能避免发达市场经济所存在的那样的常规波动，而且有可能产生强波现象。这一假说的现实依据在于过度的纵向行政干预机制存在一个内在的波动累积过程，它使小波动累积为大波动，一个较长时期的“不变或稳定状态”导致某一时点上大调整和急升急降。在规范的受价值规律调节的经济条件中，经济波动几乎分布在过程的每一个时点上，理论上的强波在实际过程中被稀释和相互抵销一部分，集结在总量上的波动通常不是奇峰突起而是相对平缓地升降，比如股市的不断波动、价格的经常变化、工资的随时变动，汇率和利率的经常调整以及生产要素组合的不断改变等等，都表现为即时调整和随机波动，不存在受纵向行政管制约束的波动累积。由于微观经济波动是经常发生的，所以宏观经济的景气变化会以规则的形式出现，扩张道路和收缩道路亦会以平滑的形式出现。



2. “自然周期”及其特征

出于研究的需要，我们在这里提出一个新概念：自然周期。

存在于自然界和人体内（心跳等）的周期性波动现象总是有其规则的自然节律，从而波动总是在某一正常轨道上起伏、延伸；一旦节律因其外部干扰或内在机体发生毛病后必然引致波动形态发生变化，但正常的自然轨道依旧存在。经济过程中的周期性波动与自然界及人体内的周期性波动并不完全相同，但它同样有一个自然的正常轨道。制度和政策可能改变实际周期的形态，但不能消除在正常轨道上运行的“自然周期”；同理，体制改革和反周期政策不可能消灭正常的“自然周期”，而只能使实际周期在一定程度上收敛于“自然周期”。

这里的定语“自然的”有两个基本涵意：（1）在词义上，它与“人工的、人为的”相对应，代表一种自发趋势，是在一组给定的主、客观条件的基础上通过结构效应和自动调整而产生的内在倾向，其要义在于这里不存在集中人格化的官僚主义意志对经济过程的垄断和支配；（2）它和西方经济学中常常使用的“自然价格”、“自然利率”、“自然失业率”、“自然通货膨胀率”和“自然汇率”等用语相类似，系指经过理论抽象后所把握的某一经济周期的理想水平或正常轨道，观察中的实际周期经常围绕着它上下波动。

第一涵意需要满足三个基本条件：



(1) 完全的赢利行为。厂商的行为动机完全取决于赢利性：是否采用新的发明成果，是否用新技术取代旧技术，创新程度的选择，产品生命周期是缩短还是延长，固定资产的更新替换在何时进行，投资和劳动力数量的确定，以及投入组合的长、短期抉择等，都受利润最大化原理支配。无利可图的事在各种外部干预下也不会去干。

(2) 充分的价格调节。所有微观经济活动都接受价格（广义的）调节：狭义价格调节物品和服务的分配和流转、利率调节投资、消费和储蓄的比例选择，工资调节劳动者行为、利润调节经理行为等。价格信息是微观经济运行的基本信息，政府依据宏观平衡的要求而实行的数量配额不仅比重小而且不脱离价格功能的影响。价格决定一切，这是第一种涵意的自然周期形成的重要特征之一。

(3) 自由选择和消费者主权至上。在经济活动中，当事人不是按照凌驾于经济当事人意愿之上的某种行政指令在给定的位置上一劳永逸地行事，而是根据其自主意愿并参照科学计划所规定的宏观参数去自由选择：投资者可以自由创业，劳动者可以自由谋职，消费者可以自由选购，股东可以自由购股。这里，只有消费者（买者）才享有最终主权决定。外部干预不是破坏和限制自由体系的运作，而是补充和完善它。在这种自由体系中，经济增长的周期性波动能从微观活动中找到解释基础，因为它不是由凌驾于微观当事人之上的某种长官意识造成的。

第二涵意的“自然”周期。在其形成意义上，并不必须要



求满足上述三个基本条件。换言之，它假定存在一个可容忍的正常周期轨道。只不过这个轨道是一个事后的经过理论抽象的平均化趋势值，现实中的实际周期经常偏离自然周期轨道，而在存在完全赢利行为及充分价格调节的自由选择经济中，实际周期明显收敛于自然周期，或者二者基本吻合，或者二者间的偏离很小。在这个意义上，自然周期中的“自然”又含有“客观”的意思，作为“看不见的手”的市场“事后”调节以及作为“看得见的手”的科学计划的“事前”调节的结合本身是一个客观过程，而不是受个别领导人意志调节的、极端化主观过程。所以，“自然周期”又是一种在某种意义上没有强政治干预（官僚主义的干预）的在价值规律调节下的客观周期，它表现为客观非均衡，而不是主观非均衡。

经济运行中的“自然周期”实际上就是市场经济周期，它将由政府干预造成的波动抽象掉，纯粹由市场上的价值规律决定。相反，“人为周期”或“反自然周期”，由行政干预特别是政府干预所决定，它反映临驾于当事人（企业和住户）之上的集中化意志。这种集中化意志不但可以在周期的复苏阶段和繁荣阶段创造“人为的繁荣”（Artificial prosperity），^①提高繁荣的程度和延长繁荣的时间，而且可以在衰退和萧条阶段用创造“额外的购买力”、“额外的投资”和“额外的就业机会”的办法，

^① 关于政府推动“人为繁荣”的观点，请参见 M. Kalecki: 《Outline of A Theory of the Business Cycle》，Basil Blackwell 1969, P. 31—32.



限制经济收缩和缩短衰退及萧条的持续时间，使经济提前进入复苏转入繁荣。当然，这并不排除相反倾向的出现。如果作为宏观力量代表者的政府甚至拥有极大权力的个别政府决策人对形势判断过于悲观，或者由于从下至上收集到的信息本身就存在虚假性，或者因信息传递过程太长使信息陈旧过时，从而造成上下左右都处于“短缺困境”之中的幻觉，似乎内部紧张和外部紧张已经达到甚至超过容忍限度，加上决策人本身一直对因紧张和膨胀可能造成社会不稳定抱有恐慌心理，在种种类似的因素的影响和诱惑下，这种受极端化主观意识支配的宏观力量最终便会用下猛药的方法给经济降温，大刀阔斧地紧缩，结果不但导致急剧衰退，而且谷底会掉得很深。因此由“人为的繁荣”和“人为的衰退”构成的“反自然周期”要比前述“自然周期”升降的幅度更大。又由于极端化主观意志在调整经济的过程中存在诸如间隔长、时滞和信息效率低下等问题，所以“反自然周期”的形成具有更强的累积倾向，从而更容易产生强波。

当然，受极端化主观意识支配的“反自然周期”的形成，需要经由相应的经济分配流程和调节机制来反映，极端化主观意识要转化成实际行动并导致周期运动需要有一定的机制作为“谋体”。因此，要了解极端化主观意识对周期运动的作用和影响，就应当对其体制基础作一剖析。



§ 5.2 纵向的要素分配流程

1. 分配流程的纵向性

受过度的纵向行政干预的经济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实行纵向的要素分配：即人、财、物不是通过自由选择的市场舞台相互给予实现自动的供求均衡，而是按等级层次实行从上到下的纵向分配。这里主要指城市，不包括农村，在城市，又主要指国有企业。我国农村的生产要素分配，就其主体方面来说，不论是改革中还是改革前，其流程是横向的，直接约束不是来自上面的集中意志，而是来自“集体化”而带来的社区界限，而且农村社区内的生产要素流转几乎是一种封闭式的，外部交易主要是和政府打交道，小部分交易通过农贸市场，农村社区间的横向要素流转水平很低，这主要是因各社区的产业雷同，缺乏分工。我们不准备对农村生产要素的横向流转作深入探讨，这里只探讨城市经济中的要素分配流程。

(1)物资。改革以前我国物资的纵向行政分配极为典型，尤其是主要生产资料的分配和循环流转采取典型的从上到下的纵向渠道。其程序是，先确定一个在一定时期要达到的产值指标，就全国物资的总供给和总需求制定一个“平衡表”，并就物资的分配使用按部门、分产业、行业和地区作出一个总的安排，然后



各部委根据这一总体安排决定具体的物资分配,下面的省、地、市、县再就各部委或直接是政府主管部门下达的物资分配指标进行逐层分解配置,企业和基层物资部门虽然可以就物资的给予和获取数量展开有限的讨价还价,但物资来源只能是自上而下的行政分配渠道。在经过 10 年的生产资料分配制度的改革后,物资分配走计划和市场两个渠道,其份额大约各占 50%,但实际上仍然是纵向的行政分配起主导作用。

(2)资金。在 1980 年开始实行“拨改贷”以前,我国投资资金的分配也主要是纵向的。企业将上期生产的价值除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留在企业用作更新改造和给职工发工资外,利润部分几乎全部上缴,形成国家财政收入。然后财政部用这笔财政收入的大部分给企业作本期投资,采取的方式是直接拨款,拨款数额也是经过层层分解后再下达给企业。“拨改贷”后,银行起着重要作用,但仍未从根本上改变资金的纵向分配格局,因为银行的给贷行为不是完全取决于自主抉择,财政部门和地方上级领导可以直接干预银行的金融活动,银行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财政部的代理机构以及成为地方领导的“钱库”,资金的循环流转虽有一些横向联系。但纵向的资金分配流程依然存在。

(3)劳动力。改革前,我国劳动者就业由政府统包统配,一方面让已就业者只进不出,另一方面新增劳动人口的就业劳动人事部门统筹安排,分配程序也是从作为最高层的政府主管部门特别是劳动人事部开始,然后自上而下地层层安排,企业只是被动地接纳由上面分配来的职工,而不是从劳动力市场上去寻找;



劳动者同样只是服从分配,而不是经由劳动力市场自主地寻找和选择企业。

我们可以将上述人、财、物的分配和流转,刻画在以下三个图式(图5—1)中。容易看出,在纵向的行政决定经济中,要素分配流程的基本特征有二:一是垂直性,二是等级性。在这里,企业对生产要素或投入的获取,不是通过自主的采购和选择,而只是被动地服从和接受来自各级行政性分配机构的指令,企业不具有“独立商品生产者”的身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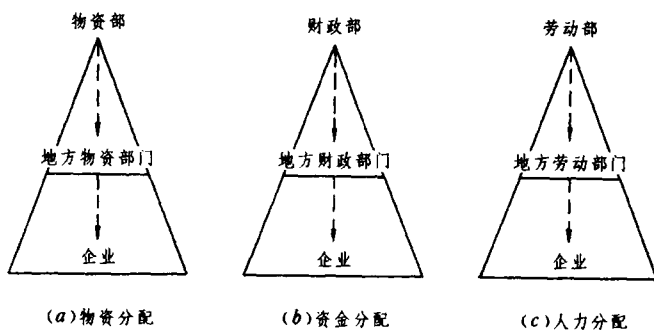


图5—1 纵向行政决定经济的要素分配流程

与上述纵向的行政决定的经济模式不同,在横向决定的市场调节经济中,人、财、物的分配不是由凌驾于企业之上的行政机构决定,资源配置流程不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垂直过程,而是一个左右逢源的水平过程,其协调方式不是行政协调,而是水平协调(见图5—2)。就物资分配而言,由企业彼此作为买者和卖者并在商品市场上来实现。就资金分配而言,由资金供求者通过金



融市场来完成。至于劳动力分配,也是经由劳动力市场来完成的。在这里,人、财、物的供求双方,直接见面,彼此平等,信息反馈及时,行为调整过程短。这不但较纵向行政决定经济有更高的资源配效率,而且可以保证经济运行更为稳定,波动较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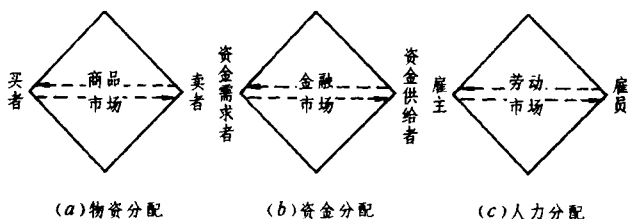


图 5—2 横向市场调节经济的要素分配流程

2. 时滞延长

纵向的行政分配流程的优越性是可以集中稀缺资源兴办符合政府偏好的工程,并且用配额的方式实现普遍给予。但是由于是“人头一份”,政府在实行扩张或收缩政策时容易产生同时震荡,或者一齐上,或者一齐下。例如,只要政府奉行松的信贷政策,人、财、物控制稍有松弛,所有企业就会同时扩张生产和投资规模,从而引起总量经济急速进入高潮期;一旦政府实行紧缩政策,企业不能得到生产所需要的计划物资和计划贷款,所有的企业就不得不同时降低开工率,同时出现新项目下马,致使总量经济立即进入低谷,甚至出现负增长。人们煞费



苦心想解释为何改革前紧缩容易到位而改革时期紧缩显得比较困难，其实一个重要原因是要素分配流程发生了变化：要素分配流程越是集中，纵向程度越高，政府的扩张和紧缩的意愿越是易于实现，强波倾向亦越为明显；要素分配流中走向分散化、水平化，集中化扩张和收缩意愿则可能受到部分的阻滞，强波亦会有所收敛。

纵向的行政分配流程的突出问题是，上下反馈存在一个比受价值规律调节的经济的水平分配流程更长的时滞（*Time lag*），不能及时而有效地解决“微观不平衡”^①。所谓微观不平衡的涵意指微观经济领域经常不断地产生供求关系、生产结构和消费结构方面的变化，造成微观的供求不平衡。比如在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生产部门的内部，有些产品生产过剩，供大于求，而有些产品与需求相比则表现为生产不足，这两方面的情形在市场上表现为供求缺口，表明生产与消费、供给与需求之间存在不平衡。除了商品供求上的微观不平衡外，资金供求和劳动力供求也会经常出现微观不平衡，总是会存在一个开口朝上或朝下的供求差，形成过剩或短缺。在规范的受价值规律调节的经济中，市面上的短缺可以首先动用企业已形成的存货来填补，如果库存不足以满足快速增长的需求，市场上的相对价格就会马上上扬，以致供求数量和需求数量相等从而形成均衡价格为止；

^① 捷克经济学家奥塔·锡克曾经讨论过“微观不平衡”和“宏观不平衡”问题。他的详细观点请参见《东欧经济学概论》，第84—88页。



一旦均衡再次打破，出现过剩，相对价格便会下降，再次形成一个均衡价格。这种从不平衡到平衡、又从平衡到不平衡的变化过程，就是相对价格结构不断调整和变化的过程。在这里，要有一个能及时对库存信号、产量信号、需求信号和供给信号作出及时反应的价格形成机制和利润调整机制。实践一再证明，这个机制只能是受科学计划指导的市场。因为存在水平分配流程的市场总会使买者和卖者直接面对面，如果作为卖者的生产者在交易或寻找顾客的过程遇到困难，买者购买欲望下降，价格预期也下降，那么生产者会及时调整产品，直至出现供求均衡。在以市场协调为基础分配流程中，实现微观不平衡到平衡的过渡，不会产生信息效率问题，而且时滞不长。

在以行政协调为基础的纵向要素分配流程中，要实现微观不平衡的转化，则会产生明显的信息效率问题和时滞过长的问題。因为，在纵向分配流程中，当企业生产结构与消费者需求结构之间出现不平衡时，信息从企业传递到行政干预机构要经历一个较长的距离，花较长的时间；当行政机构得到信息后作出调整抉择并将信息传递给企业所经历的时距同样较长。所以，与买者和卖者、生产者和消费者、企业和家戶的直接交易而形成的信息反馈机制相比，纵向行政协调所需要的信息反馈时滞被人为地拉长了。当最后的调整决策由企业来实行时，以前的不平衡可能由于新出现的变化而被累积起来，结果会产生调整不足的情形。在理论上容易把握的是，即时的变化和不平衡要求即时调整，但纵向行政分配流程只能允许包含一个较长时滞



的非即时调整。

3. 放大效应

由于信息传输的渠道长，加上各级单位（尤其是地方政府各部门）的本位利益的影响，从信息发出地到接受地其信息可能会增加，形成放大效应。就产量指标而言，如果中央行政机构偏好于高速度，评价下层行政机构的政绩主要看产值速度是不是高，那么在自下而上汇报生产进度和增长速度时就有可能层层加码，大家都偏向于高值和多报自己的成绩；如果上层决策者注重从效率和是否稳定来评价下层行政机构的政绩，那么各级地方行政机构在汇报自己的成绩时总是会留有余地，有意低估，结果中央计划者获得的产量信息与企业的实际的真实产量之间就会出现一个差别。同理，下级行政机构在执行上级行政机构的指令时，总是会作出有利于自己的选择，实际执行的结果不是高于就是低于上级领导提出的期望值。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势必造成实际值偏离计划值。总之，无论是自下而上或者自上而下的信息反馈以及对上级指令的执行都会经常出现“层层加码”的情形。由于各行政机构之间为了争取上级的偏爱又会互相攀比，你加一点我也加一点，而且我要比你加得更多，这样一来，“层层加码”的情形就会更为突出，放大效应更为明显。根据放大的了的信号而作出的决策尤其是生产速度的决策会使实际增长率出现“过度”：或者是过度繁荣，或者



是过度衰退，从而使周期轨迹上下落差人为地扩大。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在西方的比较经济学中还是在我国近年来的比较经济体制的研究中，占支配地位的观点是把信息结构和信息效率问题完全归结为计划本身的缺陷，其思维方式是用计划和市场相排斥的观点来评价计划的功能，以为市场能实现信息的及时反馈和调整而计划做不到，计划必然导致信息结构不合理和信息效率低效问题，因此计划内含一种较市场更强的非均衡趋势。以前我也持这一看法。但是进一步的研究使我意识到，由信息结构和信息效率的问题而引起的非均衡趋势，主要不是由于计划，而是由于行政干预。如果我们把信息分成两个层面：一个是微观信息，另一个是宏观信息，就会看到，计划对于宏观信息的形成和反馈比市场有较明显的优越性，而市场对于微观信息的形成和反馈有明显优越性。如果讨论的是微观信息的结构和效率问题，那么毫无疑问计划不如市场优越；如果讨论的是宏观信息的结构和效率问题，情形便是计划优越于市场。但是，纵向的行政干预因其会同时破坏市场和计划的信息的正常流动和调整秩序，它必然使宏、微观的信息效率同时下降，因为行政协调所需要的信息结构不是以价值规律调节和长期均衡增长为基础，它服从于极端化主观意识。



§ 5.3 长期稳定后的大调整

1. 缺乏随机价格调整

标准的市场经济宏观景气变化的重要指标是通货膨胀率或物价上涨率的变动，因为在受价值规律调节的经济条件下，一切变量和行业都通过价格信号来反映并接受价格信号的调节，过程的趋势变动、随机变动、季节变动及循环波动都由价格予以表示，价格变化是一个即时性综合测量器。与此不同，行政机构决定的价格有以下基本特征：首先，它是在由买者和卖者组成的交易过程之外被确定的，决定价格的供求信息流动不是即时的，反馈不是随时的，买者和卖者按照先于交易过程而给予的价格行事，价格主管部门决定的那个价格实际上是以上一次交易过程给出的信息为基础，因此当前的交易过程的信息变动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距才能反映到中央价格决策机构那里。由于买者偏好会经常发生变化，在交易过程中可能随时改变偏好，买者的叫价和卖者的要价需要即期调整，但是在交易过程和定价过程分离的情况下，这些信号不能及时得到反馈，从而价格决定过程本身存在波动累积倾向。另外，通常行政价格成为一种受行政管约束的刚性价格，让价格水平长期保持在不变状态，力图达到“价格稳定”，而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后，“价



格稳定”难以为继，因而“价格稳定”总是会在或强或弱的程度上加剧供给短缺。这时行政价又不得不进行一次有计划的大调整。一般来说，这种大调价实际上是对调整前经常发生的随机调整的累积性反应。假定一个10年的区间，并且假定各年的价格本应上涨2%，但由于实行刚性计划价，前9年价格水平一直不变，等到第十年作大调整时，不得不上调20%，这里，价格的小波动（2%）被累积为大波动（20%）。如果时间单位不是年，是季、月、日或时点，结论也一样。价格缺乏随机调整，在一定的时期后，必然形成价格强波。导致某一个价格调整时期的高通货膨胀倾向。

在1950—1990年期间，我国价格波动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50—1962年，市场价格制度向计划价格制度过渡；第二阶段为1962—1978年，实行典型的刚性行政价格制度；第三阶段为1978—1990年，由单一行政价格制度向双轨价格制度演变。第一阶段物价略有上升；第二阶段物价稳定不变，这一阶段的物价上涨趋势被累积起来了；第三阶段物价逐年加速上涨，这一阶段除本时期的价格上涨趋势外，还有前一阶段累积下来的价格上涨因素（见图5—3）。

以1950年价格为100，到1978年，全国零售物价总指数只上涨了35.9个百分点，年平均只上涨1.28个百分点。以1978年为100，到1988年，该指数上涨了72.7个百分点，年平均上涨7.27个百分点。1989年又比1988年上涨了17.8%。1990年下降到2.1%。据估算，这10年改革对前二十几年累积下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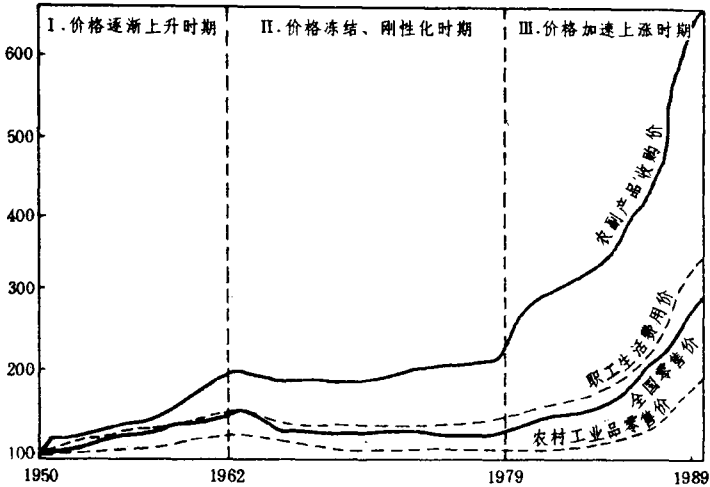


图 5—3 1950—1990 年价格波动(1950=100)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1)》,第 229 页。

物价上涨压力大约只释放了 30%，就是说还有 70% 的累积性物价上涨需要分布在今后的价格改革过程中。无论如何，我国物价上涨的累积过程是十分明显的。除了不同时期的纵向累积过程外，我国物价波动事实上还存在同一时期不同空间的横向累积过程，全国不同省区同类产品基本上实行同一计划价，也会产生价格波动的累积问题。

我们已经指出过，在受过度纵向行政干预的经济中，由于企业的投资和生产行为主要不是接受来自市场这个横向水平的价格调节，而是受来自上级主观决定的产量指标的调节，因此微观



领域中价格和产量之间不存在一个高度相关的规则的函数关系。现在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在亚微观和宏观层次上,纵向行政经济也具有经由兰格式的“试错”^①过程来在价格和产量之间建立函数关系的可能。在市场上出现短缺并且行政决策者已经感受到这个短缺的存在时,他们会作出调价的决策,提高商品价格,并同时作出增加短线产品产量的决策;如果市场上出现过剩,调节目标相反:降价,减少产量。^②在这里,真正的问题不仅在于价格向上或向下及产量的向下或向上的调整均由行政机构来完成,而且在于这个“试错”过程的时间成本昂贵,在于它消除了对供求缺口的即时调整,让过程所需要的经常性价格变化在“稳定时期”中累积起来然后作一次全面性的调整,让小风寒转变成重流感然后进医院,让小小浪花积结为汹涌的波涛。因此“试错”过程中的调价必然伴随大幅度价格结构震荡,引起物价高涨。由于政府行政调价过程实际上是一种提价过程,所以每一次政府的调价行为总是会伴随或者往往是先起一步的居民的通货膨胀预期行为,结果,抢购和涨价同时兴起,从而

① 波兰学者兰格,让中央计划者模拟市场的机能,用“试错法”求解经济均衡方程并确定和调整物价。兰格这一理论受到许多人批评。但是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从集中计划经济向计划市场经济过渡的途中,又不得不走兰格道路,因为“放价”之前的“调价”就是一种计划者模拟市场的行为。参见《东欧经济学概论》,第74—77、164页。

② 在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总体状态的趋势性特征是供给相对不足,从而价格变动呈现为经常性上扬的趋势,所以政府计划调价通常是提价,所以价格结构的改革实际上是提价式改革。因此政府的调价行为与老百姓的价格预期行为是一致的。



使标准微观经济学中建立的价格与购买数量的相关关系发生变异，即需求曲线的斜率不是负而是正，发生与供给曲线相重合的现象。抢购和涨价同时发生，势必诱发更强的市场波动，提高市场不稳定程度。

2. 工资：长期固定后的普调

我国从 1956 年开始实行统一的职务等级工资制，其中事业单位实行职称等级工资制，企业按不同行业实行五级或八级等级工资制，职工的定级、升级均按全国统一规定，地方和企业无权机动安排，更不是受劳动力市场上供求关系的决定。近 10 多年来，工资形成和调整体制增加了某些灵活性，比如允许企业尤其是承包企业可以根据企业经营状况和上缴利税情况，在完成利税上缴及企业的发展 and 积累基金确定以后，企业可以自行决定给职工浮动工资、升级以及增发奖金和劳保福利。但一直到目前，仍实行统一的标准工资制度，不同行业、不同企业的工资结构相当简单，不反映劳动力供求关系的景气变化。在总量经济增长处于高潮时，政府允许企业可以多增加一些工资，多发一些奖金；在经济周期低潮阶段，企业即使开工不足，亏损增大，属于本应淘汰破产的对象，但政府又不允许企业减发工人的工资，职工薪水没有下降的灵活性。至于非赢利机构，不仅实行统一的标准工资制度。而且工资的调整（一般只有向上调整，没有向下调整）全国也是统一的、同时的，甚至调整的



幅度也一样。这种工资普调的方式使各地区收入水平同时大幅度上涨。除了基本工资实行普调之外，还有物价补贴、奖金津贴、职务和职称津贴以及退休津贴等等都是由政府集中统一决定，调整的时间和幅度都是一样的。此外还有工龄工资全国也是统一一个水平、一样的档次结构。历次工资改革的真实涵意实际上是全国统一按照一个口径给职工提工资。所以，普调是我国职工工资增长的一种特征形式，而它又是由政府行政机构来发动和完成的。

由于工资普调是按政府意愿统一行事的，从中央机关到基层单位和企业按照一个单一标准和速率，所以它就不可能是经常性的，不但总工资水平和总工资率不出现景气变动，只有增长，没有下浮，而且从这一次普调到下一次普调之间存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间隔，表现为稳定不变，因此缺乏随机调整和灵活性。这是中国职工工资变动的第二个重要的特征。

在受价值规律调节的经济中，不同地区、不同产业、不同企业和不同学校均有不同的工资结构，并且职员的薪金可以随机确定和灵活自由地调整，但在实行统一调节的行政经济中，工资实行统一的结构和标准，只有普调而没有随机调整。这势必会在宏观层次上诱发收入同时上涨的强波效应。流行的“工资增长过快”或“消费基金膨胀”的观点，只不过是对于工资普调时期的反应，它没有看到普调前职工工资实际上很长时期是固定不变的，处于冻结状态。问题不在于工资在某一时点上出现膨胀，而在于工资普调是累积后的大调整，在于工资波动不是



渐进式的而是突发式的。这种“累积”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纵向累积，将假定时间过程中应发生在不同时间点上的上下浮动取消了，多次性小调整累积为一次性大调整；二是横向累积，将不同单位的参差不齐的多元调整冻结为由政府统一实行的单元调整。这种“双重累积”必然造成工资波动（向上波动）放大，从而使个人收入增长的波动放大，这都会使储蓄、市场购买力和消费出现突发式增长。^①

3. 就业：向上累积与结构性大迁移

在市场经济的周期过程中，就业波动和经济增长波动往往是同向发生：繁荣时期，总就业水平提高，失业率下降，经济增长率提高，衰退时期，企业倒闭，投资和生产收缩，就业水平下降，失业率增加，经济增长率下降。在总量上，我国就业水平和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同向波动不显著，就是说，无论投资和生产是扩张还是收缩，经济增长是加速还是减速，企业不会倒闭，就业水平不会下降，人口和劳动力增长多快就会导致就

^① 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B·弗里曼在《劳动经济学》一书中谈到市场经济“工资的伸缩性”时写道：“那些采用比较固定工资的行业，往往比那些工资在周期中发生变化的行业，在就业方面经受更大的波动。这是因为工资的下降为应付就业需求上变动的影 响提供了一种缓冲器。”（商务印书馆 1987 年版，第 87 页。）在中国的就业和工资体系中，缺少这样的缓冲器。



业量增加多快,从而总就业水平是刚性的。^①这种刚性过度就业制度迫使经济内含着一种高速扩张的压力,使生产和资本规模要求超常规的数量扩充。

就城市总就业量而言,我国不存在向下调整的灵活性,除了自然减员(退休)外,就业规模几乎是直线式扩大。尤其是公有企业和政府非赢利机构,职工只能进不能出,企事业单位之间的就业结构呈现为超稳状态,没有横向的劳动力流动,改革中允许职工寻找“第二职业”,但并未因此而使整个就业结构具有充分的弹性和可变性,因为找到了“第二职业”的人并不会轻易放弃他们在原来单位的“铁饭碗”。而在那些合同工中,只要不是来自农村,他事实上取得了固定工身份,因为已签定的合同书只是一个名义的没有法律约束的纸面上的东西,合同可以无限期地续签。

这种缺乏向下调整灵活性的超稳态城市就业结构,虽然不会导致就业曲线急剧向下移动,因为投资的加速扩张提供了巨大压力,但是就业量直线型累积上升意味着企业内存在巨大的劳动力滞存,在职失业规模递增,这就要求加速资本形成以创造出能满足这些“劳动剩余”所需要的就业机会。如果我们把这种“劳动剩余”称作“过度就业”,那么毫无疑问,“过度就业”要求“过度投资”,而“过度投资”正是推动投资强波形成

^① 无疑地,存在一个劳动生产率波动:繁荣期,劳动生产率提高;收缩期,劳动生产率下降。劳动效率的波动是以就业水平按劳动增长速度的变化而不是以投资和生产规模的变化为前提的。



的主要原因。

容易理解，刚性就业体制产生的不是那种被定义为扩张和收缩循环交替的周期性波动的累积。而是方向单一的向上累积。顺便要提到的是，多年来我国经济学家一直建议政府要放弃高积累政策，变外延的数量型增长为内含的质量型增长，从高投入转向高效益。然而这个观点宣传了 10 多年，而实际上并未转化为政策行动。以改革中的 1979—1990 年为例，除 1981—1983 年的积累率基本上在经济学家设定的“积累率警戒线”（29%左右）内之外，此后的积累率呈稳中有升趋势，其中，1984 年为 31.5%，1985 年为 35%，1986—1990 年都在 34% 左右。这并不是政府未认识到上述转变的重要性，不是政策操作上出了什么问题，而是因为向上累积的就业压力迫使政府不得不实行“过度投资”政策，不得不用高积累率来适应向上累积的就业规模，不得不用高资本投入来支持高劳动投入。所以，如果不改变向上累积的刚性就业体制，过度投资就不可避免，高积累率也是不可避免的。

从城乡和工农业综合的角度看，中国的就业波动还是存在的，其主要表现是：当工业繁荣时，农业剩余劳动力大量地向工业迁移；工业收缩时，农业剩余劳动力又大批向农业回流。这种大迁移不单纯是一个制度现象，它在一定程度上与工业化和发展背景有关，但是，有计划的招工和行政式劝退以及计划控制下户籍制度的时松时紧起着重要的作用。除了城乡、工农业之间劳动力的大迁移现象之外，大学生的统一分配，公有企业



和事业单位在同一个时期的统一招工，老龄职工的统一退休等等，都会引起经济生产过程中的急剧震荡，推动宏观经济增长出现大上天下。

4. 资本运动的特征

首先要指出的是，与价格、工资和就业不同，中国经济中的资本运动基本上不是采取先长期稳定然后在某一时点上作全国统一的大调整的形式，它既有长期调整，又有企业内的短期和瞬时调整，因此资本特别是作为新资本的投资存在随机波动，而且遵循扩张和收缩循环交替的路线。但是，中国的资本运动存在以下几个重要特点：

存量调整的封闭性和不及时

我国企业固定资产存量的折旧、更新和重置，在由政府行政机构规定一个基本参照体系后，企业按照这个给予的参照行事，没有多大自主权，固定资产增量或扩大再生产决策，改革前由政府决定，改革以来主要由企业决定，因此，存量调整受政府统一意志的约束比较小一些，波动和调整的累积倾向也相对弱一些。但是由于缺乏一个超越企业自身的通过不断破产和兼并来实现的资本重置机制，就使得存量调整带有封闭性，往往是自我循环，当固定资产价值的折旧和补偿已经完了时，而它的实物形态的替换和重置还没有发生，经常是守着本应淘汰



的陈旧设备。等到政府发动紧缩由政府统一规定实行关、停、并、转时，类似的滞后重置设备全社会已经积累了很多，造成重置浪潮，同时可能造成固定资产更新周期延长。

价值形态的资本流动性低

在封闭性存量调整的机制下，通常是按照一个固定的折旧率来对固定资产的价值形态进行折旧，时间长度是既定的。而这必须假定经济过程中变量的变化率在各时点上是一致的。技术进步不会加速，替代和创新的出现按数学规律行事。这些假定在实际上很成问题，因为现实的经济过程的最大特点是不确定性和随机性。对付这种不确定性和随机变动的解决办法是创造一个股票市场，在这里，价值资产脱离实物形态每日每时不断地变化，使资产存量价值保持充分的流动性。但在我国，没有这一套机制，企业资产存量的价值不能获得经常性的市场评价和经常流动性，这势必产生存量调整不及时的情形。

过度的增量紧缩对存量的可能破坏

由于每一次紧缩的主要力度用在增量上，就可能造成一种情形：存量因追加投资不足而部分闲置，造成净资本损失。一般地，在存在充分的资本流动性的市场经济中，总量经济不景气时，某些企业因经营不善不得不停止增量投入（包括资金和劳动力），但并不意味着存量资本的净损失，因为股东会退股，经理会宣布企业关门破产并将企业拍卖出去，由具有更强竞争



能力的人来经营这个企业，这样，资本发生转移，寻找新的组合结构，从而出现所谓“创造性的破坏”。但在资本流动性不充分、存量调整具有封闭性特征的中国经济中，增量减少会引致存量的“非创造性破坏”，因为企业不能拍卖，只好闲置不用。这可能引致两种情形：（1）就全社会而言，紧缩使存量资本净流出，而维持过度就业，下轮扩张要有一笔额外投资来弥补这个流失的缺口，其结果是要求过度投资规模更大；（2）下一次扩张投资继续在已闲置的存量资产上用力，但存量资产的经营者的没有变，要素结构没有变。在这个基础上增加投入，可能导致效率下降，特别是资金使用率降低，这两种情形都会成为强波形成的诱因。

§ 5.4 结构失衡的积聚与同时性结构调整

1. 抽象的理论模型

我们运用马克思的两部类平衡原理，来研究结构的平衡与不平衡问题。假定社会再生产只分作生产生产资料和生产消费资料两个部类，社会总产值为：

$$\sum Y = \text{I} (c+v+m) + \text{II} (c+v+m)$$

我们将两部类各自用作自身的消费 I_c 和 II_c 舍象掉，仅从两部类之间的交换来考察其结构关系，所以有：



$$\begin{array}{l} \text{I} (c + \boxed{v+m}) \\ \text{II} (\boxed{c} + v + m) \end{array}$$

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 2 卷第三篇第 21 章中 II · 3 节的分析目的不一样,我们不从动态过程来讨论“扩大再生产”或“增长”如何进行,而只是从静态意义上考察“结构”,因此我们给定积累率为 $1/3 m$ ^① 并保持不变。这样,在 $\text{I} (v + 1/3 m)$ 和 II 之间,主要有三种可能的结构形式:

$$\text{I} (v + 1/3 m) = \text{II} \quad (1)$$

$$\text{I} (v + 1/3 m) > \text{II} \quad (2)$$

$$\text{I} (v + 1/3 m) < \text{II} \quad (3)$$

第(1)式表示结构平衡,第(2)和(3)式表示结构不平衡或结构失衡,其中,第(2)式表示第 I 部类生产过剩、第 II 部类生产不足,第(3)式表示第 II 部类生产过剩、第 I 部类生产不足。对于这种生产过剩,马克思指出“只有通过一次大崩溃才能恢复平衡”^②,其结果要么是资本由第 I 部类转移到第 II 部类,要么是资本由第 II 部类转移到第 I 部类。因为这里假定只有两个部类,所以弥补过剩的过程可能比较长,从而可能导致“大崩溃”。但是,如果所讨论的结构关系不只是两大部类,而是多部类,那么部类之间可以在同一个时期互相填补“过剩”和“不足”。所以马克思说:“生产资料的生产总额在一个场合必须增加,在另一个场合必须

^① 马克思设想为 $1/3 m$,我们根据中国实际积累率将其定为 $1/3 m$ 。请见马克思:《资本论》第 2 卷,第 588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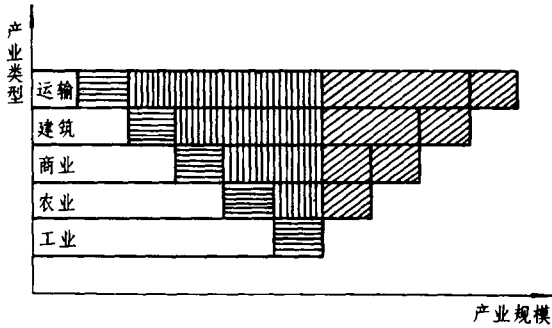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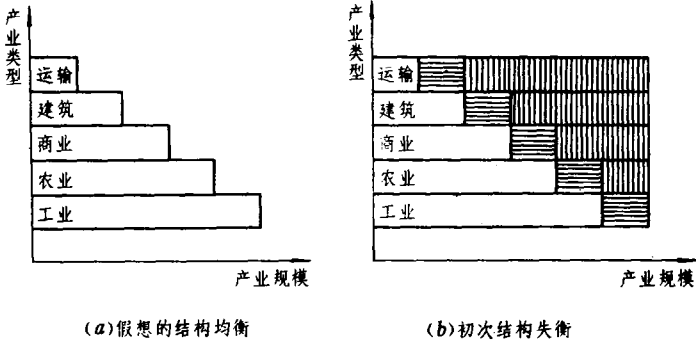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 2 卷,第 589 页。



减少。这种情况,只有用不断的相对的生产过剩来补救;一方面要生产出超过直接需要的一定量的固定资本;另一方面,特别是原料等的储备也要超过每年的直接需要(这一点特别适用于生活资料)。这种生产过剩等于社会对它本身的再生产所必需的各种物质资料的控制。”^①这就是说,生产过剩对于错综复杂的再生产能起一个调整作用,不至因为某一环节需要增加供给投入时而没有储备。当然,正如马克思所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这种生产过剩是“无政府状态”(应为“无秩序”)的一个要素。问题是,这种“无秩序”有助于按耗散结构原理进行即时调整,即使不平衡存在积聚或累积倾向,但比以纵向流程为特征的“有秩序”调节所引致的积聚倾向要弱一些。在讨论这个区别之前,我们先来看以“过剩”和“不足”为内容的“结构失衡”积聚的抽象模型。

根据我国统计局按MPS核算体系对产业产值的统计,我们假设有农业、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和商业这五种类型的产业,从动态过程来看它们之间的结构平衡与不平衡的变动情况,图5—4描述了三种极为抽象的结构模型。模型(a)为假想的结构均衡。在这个模型中,产业结构均衡是以不等的绝对规模为基础的,工业规模最大,运输业规模最小,农业次大,建筑业次小,商业居中,所以产业均衡决不意味着产业规模相等。随着工业化发展,农业份额会相对缩小,其他非农产业份额则相对扩大。我们在这里不考虑工业化对产业规模的影响。在模型(b)中,总产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第527页。






-  表示初次均衡的增量规模
-  表示初次失衡的规模
-  表示第二次失衡的规模

图 5—4 产业结构非均衡化模型*

* 本模型只是用来说明结构从“均衡”到“失衡”的理论,而不是对现实的概括。



业规模增大一倍,其中工业规模增加最少,它仅仅只得到一个均衡的增量规模,而其他4类产业按由下至上的次序存在一个比一个大的过度增长规模。总的产业过度扩张规模为全部“四”部分。我们将它称之为“过剩规模”由于“过剩规模”存在而使得产业结构出现失衡。但这只是初次失衡,不存在结构失衡的积聚。模型(c)的总产业规模再次扩大,但不同产业扩张的速度不同,我们假定仍按模型(b)中产业规模扩张的速率,并假定工业仍旧只得到第二次均衡增量规模,而其它产业的“过剩规模”进一步扩大,在第一次失衡规模的基础上又增加了第二次失衡的规模,结果出现了过剩规模的积聚从而产生了结构失衡的积聚。

结构失衡的积聚不仅意味着产业的非均衡增长,而且意味着非均衡在累积后更为严重,不同产业间的扩张加速度表现为:快者更快,慢者更慢。我们模型中的初始产业规模的设定可能与人们的实感有差别,扩张加速度也与现实有差异,但这对于问题的理解更简明一些。

2. 结构失衡的积聚过程

在某种意义上,经济波动过程实际上是一个结构的调整和转换过程,结构的变化总是会以或强或弱的形式引起总量经济的波动。半个多世纪前,有的西方学者在试图证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不可避免地产生周期性波动这一论点时,就是以结构变



化是经济运行的普遍现象为立论依据的。^① 因为结构变化是一个超越体制的现象，所以，由结构变化而导致的经济波动就同样是超越体制差异的。这种看法不是没有道理的。不过，我们感兴趣的，不是一般地说明结构变化会产生总量波动，而是力图从比较研究中了解两种不同经济机制中的结构变化对总量波动产生影响的差异，进而弄清楚行政决定经济中结构失衡是如何积聚起来并推动总量经济强波的形成的。

在受价值规律调节的经济中，结构的调整和转换被当作一个由市场自动调节和企业自动追求创新的自然过程。因为微观领域中的经济参数如价格、利率、工资等经常不断地随供求关系变动而随机波动，并直接影响经济当事人的行为，投资组合是灵活的，要素的流动性很高，反映也是及时的，所以微观的结构变化和不平衡会及时转化为微观经济波动，而不会累积为严重的宏观经济结构的失衡，或者说这种累积的程度可能不会很高，因为它会在微观层次稀释、消化一部分。加之，市场经济活动中广泛存在消费者主权，投资和生产者的“周期”行为受消费者偏好的影响。生产结构的变化及时反映消费结构的变化，以致于 $I(V+m)$ 和 II_c 之间的不平衡可以比较快的予以纠正，当 $I(V+m)$ 大于 II_c 时，第 I 部类的产品价值得不到实现。从事第 I 部类产品生产的厂商不得不立即削减生产，减少向银

^① 英国经济学家庇古，在本世纪 30 年就从业结构、产业结构等结构的变化来论证社会主义经济周期波动的必然性。



行的借贷量，解雇一部分员工；当 $I(V+m)$ 小于 I 时，价格会上升，随之厂商将扩大投资和雇用员工，这对结构由不平衡向平衡过渡都会产生直接作用。不会发生累积，时滞也不会因信息反馈过慢而拉长，唯一存在的时滞只是发生在因为供给形成需要一个过程之上。

在纵向行政干预经济中，消费者主权被削弱了，生产者主权和计划者主权也受到很强的侵扰，企业生产结构的调整不是及时地跟随消费结构的变化，而是服从于上级领导机构先行给定的指标，企业之间的产品结构、就业结构、要素组合结构等等，都由上级主管部门来安排调整。因此行政决定经济中的结构调整主要不是一个微观过程，宁可说是一个由政府行政机构直接操纵的宏观过程。而微观经济结构调整的宏观化，会碰到前面所提到过的信息反馈缓慢，时滞延长等问题，以至于每一次调整都难以做到及时、迅速。此外，宏观决策人在作结构调整决策时，往往要等到结构失衡很严重，其负效应愈益加剧时才会下决心，因为宏观化结构调整总是要付出比较昂贵的代价，比如要压速度、砍投资、人为地扩大在职失业规模等。等到调整决策作出并按等级程序将决策层层下达贯彻时，结构失衡积聚的程度比作决策时所感受到的更高了，这是因为宏观决策的形成和下达需要一个时间过程，但经济变化不会“暂停”等待你的部署。我国每一次真正实行结构调整时，结构失衡已经积聚到相当严重的程度甚至出现了结构危机，这势必增加结构调整和转换的难度。



3. 同时性结构调整

纵向行政决定经济由于不存在开放的自动的存量（已参与生产过程的资本设备和劳动力）调整机制，存量结构的调整靠有政府统一安排“关停并转”来实现，所以资本存量和已就业的劳动力的转移活动不是按市场耗散结构的方向参差不齐地分布在不同时点上，而通常是在中央决策机构安排下同时发生；加上结构失衡已经积聚到严重程度，以致于调整不得不采取伤筋动骨的方式，涉及的面很广，持续的时间很长。结果，每一次统一的涉及面很宽的结构调整总是伴随着国民经济的全面动荡。

本来，结构调整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调节者必须对企业的投资、生产及经营和亏损情况十分了解，必须对微观经济结构有一个深刻的把握，只有这样才能对症下药。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中，充当这样一个调节者角色的通常是银行，因为银行自始至终掌握着企业的投资动态，对企业的盈亏状况和盈利趋势了如指掌。当企业经营亏损，财务偿还能力下降，难以继续运营下去时，银行可以通过立即停止贷款、收购和要求偿还等方式迫使企业关门实行资产转让和拍卖等，从而完成结构调整。在我国，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没有独立化、专业化、不但利率的变动要由上级统一决定，而且地方政府的主要行政官员可以直接干预银行的贷款决策活动，使银行不能独立承担起调整结



构的任务。

· 凭借行政力量来进行同时性结构调整，一个突出的问题是调整成本增大。在这种调整机制中，存在两个调节机构：一是金融机构，二是行政机构，它们的调节目标虽然一致，但调节方式和手段却是相互矛盾的。比如，面对一个亏损日益增加的带病运转的企业，银行考虑到它的还贷能力，希望完全停止给这个企业贷款，让其被其他高效企业淘汰掉，完成资本和劳动要素的转移和新组合；而政府领导人考虑的是企业破产造成失业后会造成“不安定”因素，希望保住这个企业，用最低限度贷款维持最低限度的经营活动，只要能发工资就行。由于政府领导人具有比银行行长更大的控制权限，银行只好按领导人的旨意保护这个病态企业。这不但降低了银行调节工作的效率，而且因行政机构参与经济调节活动意味着整个国民经济活动需支付一笔额外的调节成本，致使全社会总调节成本增加。我国经济周期运动中表现出“帕金森定律”，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帕金森定律”告诉我们：当生产的增长完全减慢时，行政倾向却有可能加强，行政机构费用的增长保持上升趋势，并且这种趋势略有加速倾向。在 50 和 60 年代，我国国民收入增长出现绝对衰退时，行政管理费也出现绝对衰退；从 70 年代以来，情形发生了变化：当国民收入出现绝对衰退或低增长时，行政管理费却保持强劲的上升势头。以作为周期低谷年份的 1972、1974、1976、1981、1986 和 1989 年为例，国民收入增长率分别为 2.9%、1.1%、-2.7%、4.9%、7.7% 和 3.3%，而行政管理费却



分别增长 12.1%、3.8%、5.6%、6.1%、27.1% 和 21.1%。因此，即使是在生产不景气年份，行政管理经费的增长仍保持相当高的速度，1986 年和 1989 年明显加速。这说明，“双重调节机构”增大了调节成本。但是，由于整个调节过程不是建立在以银行为中心的横向协调基础上，而是服从于自上而下的纵向协调，调节者的同向调整和被调节者的同时行动没有变化，结果经济生活中的“同构现象”依然存在，而“同构”正是强波形成的基本诱因之一。



6

章

政策波动与政府的周期行为

前几章的周期分析主要着眼于“增长机制”、“分配流程”和“要素流动”等方面，本章转入“周期行为”分析。

以往的周期行为理论立足于企业行为分析，或者是用企业创新或者是用建立于企业“预算约束软化”假定基础上的“投资饥渴”和“扩张冲动”来论证企业行为与宏观经济景气循环的关系。这一解释内含三个重要假定：（1）企业对景气信号的反映是灵敏的；（2）无论是向上扩张，还是向下收缩都是自愿的、主动的；（3）企业可以自主而又灵活地改变投资和生产规模。我们的研究表明，这三个假定对迄今为止的中国经济尤其是国有制经济并不合适。在我国，企业的行为受某种凌驾于企业之上的力量强大的“外力”的作用和影响。即使确认企业预算约束可以诉诸种种行动而变软，据此而产生“投资饥渴”和“扩张冲动”，但是人们对如下问题有所忽视。



——企业预算约束软化并不是由“单边”（企业一方）决定的，而是由“双边”（企业和政府两方）决定的，而且政府一方起着主要作用；

——“投资饥渴”和“扩张冲动”并非企业独有，实际上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都有，而且政府的“冲动”倾向更强更具有影响力；

——企业在周期扩张阶段采取自愿的积极行动，但在紧缩阶段其行动往往是被迫的，而且事实上，在紧缩时期，企业要求扩张、要求信贷放松、要求更多投入的欲望要比扩张时更强，因此单一的企业扩张行为解释不了周期收缩阶段的形成；

——无论是在周期的扩张阶段还是在周期的收缩阶段，企业在投资和生产行为上都受由上级主管部门安排的“既定规模”约束，它只能在预先给定的范围内活动；

——景气信号的给予并不是企业自发地相互作用的结果并经市场有规则地反映出来，而是来自企业之上，对企业来说，景气信号的给予产生于某种“外力”。

由于存在上述这些问题，所以单纯用企业行为学说很难对中国经济周期的形成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本章试图建立一种新的周期行为理论。其侧重点立足于“宏观”方面，着力研究政府的周期行为，力图在宏观、微观关联环节中发现政策导向和多级政府随机干预的支配作用。当然，这一理论的完整建立，需要一系列的精细论证，限于篇幅，本章只能提供一个粗略的分析框架。



§ 6.1 政策波动

我们所讲的“政策波动”，不同于近几年经济学文献中所说的“政策失误”，它不含价值判断，不涉及是扩张政策好还是紧缩政策好的问题，更不是简单地将周期的扩张阶段与“政策失误”联系起来，而只打算揭示政策波动与经济周期的关系，证明我国政府政策调整的方向决定经济周期变动的方向。

首先要指出的是，我国的政策波动与西方经济中的“政策周期^①”现象是不同的，西方的“政策周期”理论是以选举的规则性周期变化为依据的，它力图证明4年一度的总统大选及不同任期之间的政策变化是和经济周期相一致的。我国则不然，高级领导人的变动没有一个法定的时间限制，因此很难说我国存在时间上规则的“选举周期”。然而我国经济波动的明显特征之一是不规则性，它受某种覆盖面很宽、影响力很大的可以造成强烈随机震荡因素的影响。现在进一步指出，这个因素就是不规则的政治决策的干预和不规则的政策变动的的影响。不规则政策变动导致不规则经济周期。

表6—1 揭示了我国1949—1991年政策变动与结构变动和

^① 西方“政策周期”理论开始产生于本世纪40年代，70年代进入讨论热潮，最近10多年来这方面的研究仍在继续。



总量波动的关系。我们看到，每一次大的政策变化总是伴随着结构变化和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其特征是：

(1) 当政府采取扩张政策时，产业结构上表现为工业增长快于农业增长，工业份额增加，农业份额下降；由于工业成为总量经济增长的主力，所以工业增长加速同时带来总量经济增长加速，形成周期的上升阶段和高潮。

(2) 当政府采取紧缩或调整的政策时，产业结构上表现为工业生产放慢或滑坡，农业增长相对加快，农业份额有轻微增加，工业份额不变或下降；由于工业增长速度放慢，总量经济增长亦随之放慢。出现周期的下降阶段和低潮。

(3) 只有在非常严重的政治运动干预下，工业和农业生产才会全面衰退，致使总量经济出现全面危机。

表 6-1 政策变动、结构变动和总量波动的关系

政策变动	结构变动	总量波动
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定将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作为一切工作中心，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1953年年初开始执行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各业发展基本协调，但工业增长更快，1952年比1949年，农业年递增15.3%，工业为48.9%；1953年，农业增长3.1%，工业为18.7%	第一周期上升阶段，持续4年繁荣（1950—1953年）
1954年决定压缩基建投资	1954和1955年，农业逐年上升，非农产业增长减速，其中建筑业1954年负增长	第一周期下降阶段，连续2年减速（1954—1955年）



续前表

政策变动	结构变动	总量波动
1956年9月中央“八大”提出适度扩张政策，6月提出既反保守又反冒进方针	1956年，农业增长减速，非农产业增长加速；1957年农业下降，建筑业、商业负增长	第二周期上升阶段，高涨1年（1956年），下降阶段为1年（1957年）
1958年3月八大二次会议通过“总路线”实行“赶超”政策；1960年1月继续跃进方针	农业衰退，非农产业高速增长	第三周期2年繁荣（1958—1959年）
1960年6月、7月和1961年1月中央多次会议决定纠正“大跃进”的失误，开始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	1960年五大产业全面减速，但只有农业负增长，1961年全面负增长；1962年非农产业负增长，农业回升	第三周期下降阶段，1960年低增长，1961—1962年负增长
1963—1965年继续实行八字方针，但不是紧缩，而是实行均衡扩张政策，提出和实行“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方针	各业同时高速增长后，同时转入衰退	第四周期上升阶段4年（1963—1966年）下降衰退2年（1967—1968年），主要是由于“文革”影响
1969年4月中央九大决定恢复由“文革”初期中断的经济发展政策，恢复计划	各业增长加速后轻度减速	第五周期上升阶段3年（1969—1971年）
1972年国务院决定压缩基建投资8.7亿元，减少重工业投资21.4亿元，压在建大中型项目150个，劝退农民工370万人	工业增长减速，农业衰退	第五周期下降阶段（1972年）



续前表

政策变动	结构变动	总量波动
1973年1月全国计划会议决定调整原计划, 加强企业管理, 在农村重申“六十条”	工农业都回升, 农业回升更快, 农业份额增加	第六周期上升阶段 (1973年)
1974年“批林批孔”强政治干扰	工农业全面衰退, 工业下降更快, 工业份额下降	第六周期下降阶段 (1974年)
1975年实行邓小平同志的经济发展政策, 1976年政治干扰经济	1975年农业和商业虽然低增长, 但其它非农产业高速发展; 1976年全面衰退	第七周期上升阶段只繁荣一年 (1975年), 之后紧接1976年的下降阶段
1977—1978年实行以“洋跃进”为特征的增长政策	1977年农业负增长, 其它产业正增长, 1978年增长全面加速	第八周期上升阶段高速增长2年 (1977—1978年)
1979—1981年实行调整政策	各业增长速度升降不一	第八周期下降阶段, 由中速变为低速
1982—1986年, 在改革的同时实行高速增长政策	农业先是3年高速然后2年低速, 非农产业一直增长强劲	第九周期上升阶段, 持续繁荣
1986年实行“双紧”政策	工业大幅度减速, 农业略有回升, 但工业份额还是上升, 其它产业正增长	第九周期下降阶段 (1986年)
1987—1988年, 再度实行高速增长政策, 甚至不惜用膨胀刺激速度	工业连续两年加速增长, 农业1987年回升后, 1988年轻微减速, 但工业份额连续两年上升	第十周期上升阶段 (1987—1988年)



续前表

政策变动	结构变动	总量波动
1988年9月至1991年9月治理整顿	工业1989年至1990年上半年下降,1990年下半年回升,农业连续两年回升,但农业份额还是下降,建筑业1989年负增长1990年回升,商业1989—1990年两年负增长	第十周期下降阶段(1989—1990年初)

表6—1简单描述了我国经济政策变动与结构变动和总量波动的关系。从政策变动与总量波动的关系来看,紧缩政策引致波动的低潮,扩张政策引致波动的高潮。从政策变动与结构变动的关系来看,在假定不受强政治运动干扰并且政策的目标不是为了对付通货膨胀的条件下,紧缩政策往往伴随农业上升而工业和其它非农产业下降,扩张政策则总是造成非农业加速增长;如果扩张政策不是着眼于结构性扩张而是总量性扩张,那么农业亦会随之扩张。

问题在于我国政策波动具有扩张和收缩循环交替的特征,在扩张达到一定的限界时必然跟随着紧缩,这样,我国的政策波动采取“周期”形式。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的经济政策和政治领导是结合在一起的,很大程度上政策形成依赖于政治路线的指挥,经济受政治支配,加上政治领导的形成不存在规则的时间变动,随机变动的情形常常发生,而每一次不规则的政治变动又总是破坏了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就使得经济波动的周期规则发生变异。显然,1967—1968年、1974年、1976年成为增长过程的



低谷年份包含不规则政治变动的影晌,如果政治变动从而政策变动规则化,增长过程的低潮的发生时间可能会或迟或早。

中国的政策变动的不规则性产生于政策目标选择的不确定性,不存在象西方“政策周期”理论所描述的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交替换位”那样明确的目标选择。在中国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既没有通过市场表现出来的公开失业率,又不能确认政府在某一个时期明确宣布要实行通货膨胀政策,因此我们不能通过建立“交替换位”的分析模型来揭示中国“政策周期”的运动特征。此外,政府在总量调整和结构调整的政策选择上,也具有很大的随机性,没有一个规则的交换途径。

正是由于政府政策目标交换是不规则的、随机的,才使得从“事后”来观察的政策波动路线的起伏变化也表现出不规则性和随机性,而这又进一步证明了我国经济的周期波动的不规则特征。

§ 6.2 计划与周期

1. 计划形成的波动趋势

现在我们将“计划”和“政策”分离开来,单独考察计划行为,在抽象掉政府随机干预下研究计划变动的趋势,了解“计划”与“周期”的关系。



从“目的论”的角度看,我们没有理由对计划者实现总量经济稳定和结构均衡发展责任感和良好意愿表示怀疑,事实上,在撇开政府领导人的行政干预的前提下,历史上每一个计划(年度计划和五年计划)本身都表明强烈的反周期倾向和对“平衡性”和“比例性”的追求。但从“发生论”角度看,却又是另一回事。特别是,如果将已有的各个计划联系起来看,增长的“计划轨道”同样不是直线上升,而是波浪式伸延,这是因为计划者不能脱离实际经济运行轨道而行事而只能是跟随它,从它出发、实行相互修正。计划者行为往往是:下一阶段的计划根据上一阶段计划完成的情况来制定;上一阶段计划完成不好或者没有完成计划,就要削减计划指标,将下一阶段的计划指标定得低些,上一阶段计划完成很顺利很容易或者超额完成任务,就要扩大下一阶段计划的任务,把指标定得高一些、紧一些。^① 这样便得到计划者“周期”行为的一般图式,见图 6—1。

可见,计划的“周期”行为是:当时点 1 上 P_1 大于 R_1 时,在时点 2 上会降低计划指标,有 P_2 ,但实绩可能反而会提高到 R_2 ,在时点 3 上,计划指标可能提到 P_3 ,因为计划者认为时点 2 上计划太保守,而这时实绩可能下降为 R_3 ;考虑到前几次计划调整过度,在时点 4 上计划者对计划指标可能实行微调,调到与假想的均衡轨道重合的位置 P_4 ,同时 R_4 也落在这一点上;但是计划和实绩相偏离是常见现象,重合只是特例,而且二者均会

^① 《东欧经济学概论》,第 313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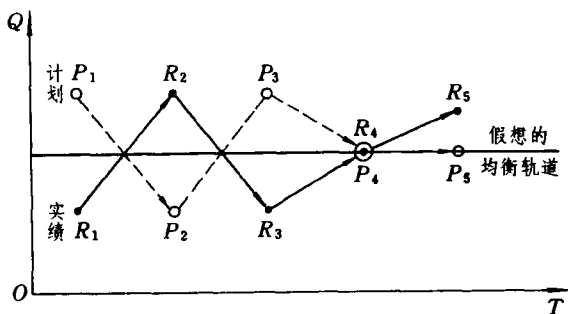


图 6—1 计划形成的波动趋势

经常不断地偏离假想的均衡轨道。这样，不但存在 $R_1—R_2—R_3—R_4$ 的实际周期，而且同样存在 $P_1—P_2—P_3—P_4$ 的计划“周期”，计划轨道并不是一条水平的均衡轨道。

因此，即使是在抽象掉政府行政干预和长官意志决定的前提下，单从计划本身的运行来看，也不等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没有波浪式运动，也不等于周期现象的消失。从连续的时间过程看，计划发展同样是按波浪起伏的形式向前推进的。

2. 计划与实绩

严格说来，图 6—1 只是证明了“计划周期”的形成，没有明确实绩与计划的关系，因为在那里，“实绩”是既定的，作为计划制定的依据。同时假定上期计划和实绩之间的差额的性质决定本期计划轨迹的方法，当上期 $P > R$ 时本期计划向下调整，当上期 $P < R$ 时本期计划向上调整。然而，如果不是考察计划的



形成，不注意上期实绩与本期计划的关系，而是本期的计划和实绩的关系，我们得到的经验认识是：

(1) 如果计划的扩张倾向不变， P_1 按水平方向伸延，假定实绩跟随计划，那么 P_2 和 R_2 会在假想的均衡轨道之上重合，圆满完成计划，但这里的计划是一个高速计划；

(2) 如果计划的扩张倾向改变，计划指标下调，也假定实绩跟随计划，那么 P_2 和 R_2 将在假想的均衡轨道以下重合，这里的计划是完成了，但它是一个紧缩计划；

(3) 如果计划的扩张倾向改变，计划指标下调但采取小力度，而实绩也跟随计划，那么 P_2 和 R_2 重合于假想的均衡轨道某一点，其情形如 6—1 中的 P_4 和 R_4 的重合一样，实现均衡计划和均衡增长。

这三种调整在我国近 28 年的计划增长实践中都出现过，但有两种情形：

(1) 从周期的阶段来看，在扩张阶段，增长的实绩高于计划；在收缩阶段，增长的实绩低于计划。从 1953—1990 年工业实绩增长率与计划增长率变动的经验数据来看，这一结论得以证实。在国民收入增长率 10 次波动的低潮年份中，工业的实绩增长率和计划增长率相比，有一次相等（1990 年）；3 次实绩水平高于计划水平（1957、1981 和 1986 年）；有 6 次实际水平低于计划水平，就是说在周期低潮期，工业实绩增长率下降幅度大于计划下降幅度的频率为 0.6。在国民收入增长的向上扩张时期，工业实绩增长率大于计划增长率的频数值为 0.9259，即



在所观察的 27 个向上扩张的年份中只有一年(1955 年,这一年为工业周期的低潮但是是国民收入周期向上转折的年份)计划和实绩相等,另一年(1960 年)实绩低于计划,其余 25 年都是实绩大于计划。从工业增长率实绩和计划的波动关系资料,我们得到图 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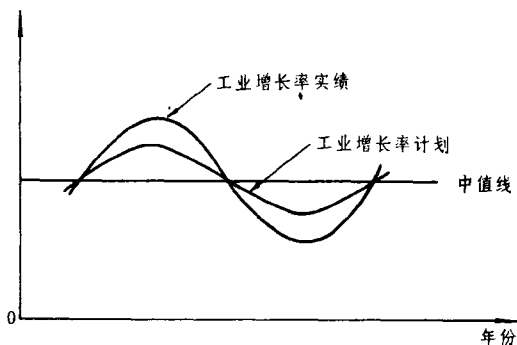


图 6—2 工业增长计划与实绩波动的关系

(2)从五年计划的整体来看,我国国民经济增长的实绩一般要高于计划规定的指标,只有在不多的调整年份中实绩才低于计划。以经济增长过程中政治运动干扰最少的第一、二个五年计划和第六个五年计划而论,都是“完成或超额完成计划”。例如,“一五”期间(1953—1957 年)所规定的基本建设总规模本来就是很大的,但完成的实绩超过原定计划的 15.3%;其它主要指标在 1956 年底就提前完成,从而 1957 年成为超额完成计划任务的年份;工业总产值计划由 1952 年的 275.1 亿元增加到



1957年的535.6亿元,而1957年实绩却是784亿元,大大超过计划。^①在“二五”期间(1958—1962年),粮食、原煤、原木、原盐的产量等在1958年就完成了原定在1962年完成的指标;钢、冶金设备、发电设备、金属切割机床、棉纱、机制纸、棉花等产品的产量,在1959年就“完成、超额完成或者接近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原定在1962年完成的指标”,基本上提前三年。^②在“六五”期间(1981—1985年),社会总产值、工农业总产值、国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长分别为11%、11%和9.7%,都大大超过了计划增长4%的速度。到1985年,农业总产值超计划指标45.6%,工业总产值超计划指标37%,部属铁路、水运货物周转量分别超计划的20—34%,民航运输总周转量和邮电业务量分别超计划的59%和24%,社会商品零售额超过计划38.4%,财政收入提前一年完成计划;“六五”期间全民单位基本建设和更新改造投资分别累计超过计划的48.3%和15%,其它指标也都超过计划指标^③。“七五”期间即使1989—1990年实行治理整顿,但计划指标还是超额完成。

美国学者弗雷德里克·L·普瑞尔根据对原苏联经验资料的观察得出结论说:“在集中化管理的社会主义国家,选举并不重要,而与此极为相似的是一种‘政治经济周期’,即投资高潮集

^① 马洪、刘国光、杨坚白主编:《当代中国经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10、31、312、316页。

^② 《伟大的十年》,第4页。

^③ 国家统计局编:《“六五”期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概论》,中国统计出版社1986年版,第1—6页。



中在五年计划最初几年内”。^①在我国,普瑞尔的判断并未得到证实。实际的情形是,各个五年计划时期在最初几年有时达到投资高潮,有时进入投资低潮,其选择参照取决于上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最后几年的投资是高潮还是低潮。如果上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末期投资高涨,那么当前这个五年计划时期的开始年份可能紧缩投资,反之亦然,形成首末交替变换。在总共7个五年计划时期之间,这种首末交替换位有5次,只有一次同处于投资低潮中。这又一次证明我国计划投资的方向调整是不规则的,它不遵循五年计划内“先高潮后低落”的固定变动法则,而是以反方向前期决定后期。由此可见,中国的计划有两方面的特征:一方面计划运行表现出波动趋势,另一方面计划的波动没有一个固定的时间规则。

3. 实绩偏离计划:时滞与信息不完全

从计划与周期的关系来看,我们强调三个基本论点:(1)计划运行本身具有波动趋势,计划轨迹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一条起伏波动的曲线;(2)计划波动是无规则的,没有一个固定的时间长度,把“五年计划”和周期持续时间的平均长度等同起来并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3)计划波动与增长实绩的波动经常是分

^① [美]普瑞尔:《东西方经济体制比较——研究指南》,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112页。



离的,重合只是特例,实绩周期偏离计划轨道的趋势性特征是:经济扩张时,实绩水平高于计划水平,经济收缩时,实绩水平低于计划水平。前面讨论了前两个论点,现在来讨论第三个论点。

观察 1953—1990 年工业增长率的计划和实绩的变动我们发现:在 38 年中有 22 年处于经济的扩张期,16 年处于经济的收缩期,而 22 个扩张年份的工业增长率的实绩都高于计划,其年均幅差为大约 8.1 个百分点,^① 1958、1965 和 1970 年的幅差分别达到 40.9、14.6 和 13.7 个百分点;16 个收缩年份中有 1 年的计划和实绩相等,^② 有 6 年的计划低于实绩,^③ 其余 10 年都是实绩低于计划,除 1968 年外的 8 个年份中,实绩低于计划的年均幅差为 15.2 个百分点,其中,1961 和 1967 年实绩小于计划分别高达 50.4 和 29.8 个百分点。改革时期的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最明显的变化是经济收缩期工业增长率的实绩不是低于而是高于计划,但扩张期仍然是实绩高于计划,这说明两个问题:(1)计划比以前更接近于实际,从而计划按价值规律办事的程度提高,孙治方早年提出的“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基础上”的政策主张在改革时期中得到了反映;(2)在经济紧缩时

① 我国计划工作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干扰曾一度中止,1968—1969 年缺乏工业增长计划的资料,因此无法比较这两年的工业增长率的计划和实绩之差,根据趋势,我们假定 1968 年的实绩小于计划,假定 1969 年的实绩大于计划,我们计算平均幅差使用“大约”一词比较稳妥一些。计划中断年份是 1967—1968 年,1969 年的《计划纲要(草稿)》涉及的时间是未来年份。

② 1955 年计划和实际工业增长率都是 5.6%。

③ 1957、1979、1980、1981、1986 和 1990 年计划分别为 4.8%、8%、6%、3%、8.8%,和 6%而实绩分别为 11.5%、8.5%、8.7%、4.1%、11.1%和 7.6%。



期,可能产生了一些逆政府政策周期的因素,就是说,中央政府要紧缩,但实际过程有一股反紧缩的力量在发生作用,^①从而增长的实绩高于计划。然而,即使发生上述变化,我们仍然认为工业生产实绩比计划具有更强的波动倾向。

经济增长的实绩之所以偏离计划有三个重要原因:一是计划的“抽象性”和计划信息的不完全性;二是计划过程的时滞,三是纵向行政干预和地方行政机构层层加码。我们先研究前两个原因。

(1) 所谓计划的“抽象性”是指计划不可能囊括经济过程的全部具体细节,不可能包容成千上万种产品的投入产出组合,不可能覆盖所有企业的实际营运,同时也不可能完整地反映消费者需求结构的经常变化以及由此引起的产品供给结构的经常变化,计划只能描述社会再生产和增长过程的主流方面,只能涉及主要经济变量,所以计划只不过是未来经济过程的抽象概括;与此不同,实际经济增长是社会再生产过程所有领域和所有环节在结果形态上的反映,它不仅反映经济发展的主流和趋势变动而且反映过程的具体细节和支流。所以,实绩偏离计划首先是由计划和实绩涵盖面的差异决定的。从信息的角度看,计划所涉及的总信息量总是小于实际过程拥有的总信息量;相对于实际过程而言,计划的信息总是不完全的。

^① 这些因素和力量来自三个方面:一是非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城市个体经济和乡镇企业经济的发展;二是国有企业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企业的自主权扩大;三是地方财政包干强化了地方政府对地方利益产生更强的保护主义倾向。



(2) 计划与实际过程之间存在时滞，这时时滞包括三个主要方面：

1) 计划反应的时滞。在集中计划经济下，信息流动主要是纵向的，而且渠道较长，从直接生产单位发出原始信息后，要经过许多层中介加工、传递，才能到达需要这种信息的中央计划机构，从信息向上传送的起点到达终点，存在一个较长的时滞，计划单位对直接生产单位的信息的反应不是即时的。

2) 计划形成的时滞。集中管理经济的计划形成过程相当复杂，它不象企业和公司计划一样计划制定者和生产指挥者是同一个管理班子，相反，计划机构和直接管理机构是分家的。在这种情况下，要制定一个各专业管理机构如各部委、大公司以及各省市都能接受的计划，对于计划制定机构来说，不仅要有准确而及时的信息量，而且要取得直接管理机构的意见、愿望和各种有关的可行性分析，这就不得不召开规模较大的计划讨论会。由于各直接管理机构都不可避免地存有“本位论”意识，为本单位说话，使得计划会议很容易成为各单位之间讨价还价的场所，最后形成一个一致的总体计划蓝图并写成可以用“文件”方式反映的纸面计划，需要耗费很长时日。从经验观察看，制定一个五年计划要6—12个月，制定一个年度计划要2—3个月，计划制定的时间起点往往是在前期计划执行的末尾时期，而终点到来时本计划期却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因此计划形成的时滞很长。

3) 计划执行的时滞。中央计划制定完成以后，以政策文件



下达给各有关单位，而各有关单位又需要对中央计划给出的计划任务作进一步分解，形成地方或部门计划，其程序和上面一样。在地方或部门计划用一个较长时间制定出来之后，直接生产单位具体实施之前又有一个进行可行性讨论的时间，如果计划的松紧度对企业有利或压力不大，那么计划任务可以随之执行，如果企业感觉到计划任务压力太大，则会向上级提出要求修改计划，在上下级之间进行讨价还价，直至直接生产单位的要求实现时为止。

这样一来，计划的执行也存在一个较长的时滞。

在计划机构收集加工信息、召开计划讨论会议、起草计划文件、分解和执行计划的同时，社会再生产过程一直在连续运行，而计划的依据来自于整个计划过程始点上的信息。当然计划者可以根据预测对“未完成计划阶段”的可能实绩作一个估算，譬如根据前期计划完成的“平均数”加一定大小的“趋势误差”来推算一个可能值。问题是，计划经济增长过程具有极强的不确定性，随机变化使得经济不会遵循指数型增长轨道，加上集中计划下的企业行为是同向、同步的，一个企业离计划者预期只有很微小的差额但所有企业加总的差额将会是很大的。尤其是，上述时滞过程给各种形式的行政干预准备了条件，因为无论是在计划信息的收集和计划的形成过程中，还是在计划的执行过程中，主要操纵的力量都是行政机构，而不是计划者与生产者 and 消费者直接发生关系。在这种情形下，各级行政机构都会按照本地区本单位的利益需要来行事。所以，由于利益



的原因，最终制定出来的计划并付诸实施从一开始就隐含着实绩偏离计划轨道的可能。

我们虽然确认增长的计划轨道是非均衡的，表现为扩张和收缩的循环交替，但是我们发现，增长的实绩轨道具有更强的非均衡倾向，其特征是实绩的扩张水平在计划扩张水平之上，实绩的收缩水平也时常是在计划收缩的水平之下。这一论点暗含着一个前提假定：计划者们引导着经济增长的起伏波动，但计划并不是强波生成的主因，实际过程中存在一个既非市场又非计划的干预力量，这就是我们一再论及的过度的纵向行政干预。

§ 6.3 纵向行政干预

1. 纵向行政干预：两个特征

现在我们来探究造成实绩偏离计划的“体制因素”，我们的分析集中于经济协调机制。

从协调机制上看，在纯理论意义上一般有两种协调机制：（1）横向协调。它以市场组织为基础，买卖双方同样受获取利益的刺激，地位和参与是平等的，交易采取货币化形式，横向联系是全部协调活动的起点和终点，这种协调又叫“市场协调”；（2）纵向协调。它以行政网络为基础，协调者和被协调者之间受制度化的指令和禁令约束，交易不必是货币化的而通常



采取实物化形式，地位和参予都是不平等的，下级依赖和服从上级，上级和下级相比在人财物上拥有较大的权力所以可以按行政而不是市场的要求支配下级的行为。这种协调又叫做“行政协调”。^①改革以前，我国经济中行政性纵向协调占绝对支配地位，改革10年后，横向性市场协调逐渐扩大，但1989—1990年治理整顿期间又出现了纵向性行政协调慢慢反回的趋势，而且即使是市场发育很快的1979—1988年也没有从根本上突破纵向性行政协调占支配地位的格局。对于微观经济过程而言，纵向性行政协调意味着一种没有“可谈判余地”的外部强制力量的输入，微观经济当事人只能服从，不可讨价还价，因此这种“协调”实际上转换成了“干预”，纵向性行政协调实际上就是行政干预。

在我国，行政干预常常和计划指导混然一体，微观单位接收一个来自“上边”的指令，分不清是出自于计划管理机构还是出自于行政长官的旨意，因为指令从上向下传递是经由行政网络来实现的。事后可能知道，这道指令代表的是行政长官的偏好，而不是计划者的意愿，但在当时是作为“计划指令”来执行的。行政干预与计划指导混然一体，隐没了行政干预对计划的指导的背离。

一般来说，计划指导在时间趋势上是比较稳定的，比如一

^① [匈] 科尔内：《增长、短缺与效率》，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71—172页。



个五年计划或一个年度计划一旦开始实施就要求按所规定的指标进行操作，中间要作修正和调整也需要制度化、程序化。行政干预却不然，其行为常常是随机的，撞击反射，就事论事，哪里有“火”就去那里“灭火”，我们的部长、省长、市长、局长和其他行政长官就是这样整日奔波。这种随机的行政干预带来的是微观经济活动随机震荡。为了保住一个行将破产的企业，市长比厂长更容易从银行获得贷款，更容易从物资部门搞到一批平价物资，所以市长的行为更容易造成企业产量的波动。

除了随机性以外，中国经济生活中行政干预的另一个突出特征是：多级性。不但中央政府对全国国民经济进行总体调节外还可以直接干预其直属大中型国有企业的微观经济活动，而且地方政府在对地方国民经济进行间接调节外还可以直接干预地方国营企业的投资、生产、交换和分配活动，在地方政府中又有市、县政府各自相应可直接干预的范围；此外，也有来自按行业、部门分级的干预；还有来自“公司”、“集团”管理机构的直接干预。当中央政府发出一个指令后，各级行政机构逐级加压，逐级放大干预力量，这些被叠加和放大的干预和指令最终落在企业等微观生产单位身上。一般来说，非地方企业，如部属企业，不直接接受地方政府的控制，中央政府在管理这些企业时，其指令常常直接下达给企业。但是，由于中央企业在许多方面如城市管理、交通和其他公共设施、文卫教育以及公安和环境方面不得不接受地方政府的领导和控制，而这些“非生产控制”有时又和“直接生产控制”混在一起，至使“中



央企业”也要或多或少地接受地方的纵向行政干预。因此，企业面对的是多级行政干预。这种多级行政干预造成的后果是，在多级干预后，企业等微观生产单位创造出来的经济实绩总是偏离集中计划的意愿值很远。当集中计划的意愿倾向于扩张和加速增长时，多级干预后带来的增长加速会更快，扩张水平会更高；当集中计划的意愿倾向于收缩和低速增长时，多级干预后带来的增长速度会更低。如果考虑到各级行政机构在执行上级指令时会按照上级的“手势”所指方向进行攀比的情形，这个结论便可以得到进一步的验证。

所以，从行为分析的角度看，多级行政干预是经济周期中出现过度扩张和过度收缩的重要推动力量之一，由于多级行政干预表现为随机性，就使得由过度扩张和过度收缩循环交替而形成的强波运动也表现为随机性。

2. 纵向行政干预：目标一致

行政干预的多级性并不意味着干预目标选择的多样性。实际上，只要中央政府一声令下，各级政府便会一齐行动，这是由于前面描述的纵向协调机制的特殊性质——下级服从上级——所决定的。我们以紧缩为例。改革以前，中央紧缩政策主要有两个目标：一是通过削减非农产业投资，压低增长速度；二是调整产业结构，一方面降低工业投资速度，增加农业投资，另一方面增加农业劳动的粗放投入。这实际上也是各级地方政府



在紧缩时期的主要任务。改革以来当物价上涨加速时，中央政府又把稳定物价当作政策的重点。比如1988年年初，中央规定物价上涨率不超过14%，1988年年底统计达到了18.5%，于是中央又提出1989年物价上涨率必须明显低于1988年，结果实际是17.8%，1990年初又提出计划物价上涨率14—16%，实绩是2.1%。不管实际操作上发生什么偏差，地方政府始终是按照中央确定的目标行事，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遵循一个目标：全面稳定物价。而最近两年，各级政府又始终是集中精力解决市场疲软问题。因此，在增长管理、结构管理、市场管理和物价管理等问题上，各级政府的行为是一致的、同步的，服从于最高决策层，下级行政机构几乎完全是“按章办事”，自主选择的空间很小。

我们无疑可以找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例子，如果假定中央“政府可能在某种程度上采取增加宏观经济波动的行动”，那么地方政府的“下有对策”似乎可以起到阻抑中央政府的周期行为的作用。但是，地方政府并不会在周期的扩张和收缩阶段，采取同样的行动。为了在经济实力和生产发展速度上与其他地区竞争，每一个地方政府都希望在扩张时期从中央那里获得尽可能大的投资计划规模和各种有利于本地扩张的承诺，用尽可能大的生产规模来缓解本区域的剩余劳动力压力，所以在周期的扩张阶段，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行为是完全一致的，甚至地方政府的扩张倾向更强。在紧缩时期，的确可能产生“下有对策”的行为，即中央政府要求按照一定的指标来采



取收缩措施时，地方政府可能先是等待观望一阵子，随后的紧缩也可能是走过场，或者是蜻蜓点水，只要中央一放松便马上转向扩张。问题还有另一面，那就是，这样的“下有对策”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它对地方政府主要决策者来说“政治机会成本太高”，在实行单纯上级任命的干部形成制度下，与上级的行为不一致则意味着下级个人利益可能损失，而这是下级行政长官所不愿意接受的。为了将两方面的利益（本地区利益与个人利益）都考虑到，可能的选择是，在紧缩时期将地方统计数字报得保守一些，偏低一些，这既符合上级意愿，又事实上形成了大于统计报告数字所显示的生产能力从而为下一个周期扩张留下了后劲。因为我们所观察和分析的周期只不过是统计数字所显示的周期，所以地方各级政府在此阶段采取“下有对策”的办法并不影响我们的论点的真实性。我们根据对 29 个省市自治区（不包括海南省）1985—1989 年各地区工业基本建设投资增长升降趋势的观察发现，反向变动率不到 10%，就是说各省市自治区的投资行为路线大体上是一致的，他们服从于同一个信号指引，按照一致的方向来干预微观经济过程。

纵向行政干预在目标上的一致性，行动上的同步性，必然迫使全国所有企业基本上在同一个时候、按照同一个目标、用同样的速率来增加和减少生产，最终使国民经济的综合增长率或者是急速上升或者是急速下落。因此，地方各级政府的强周期行为是理解中国社会主义强波增长过程的一个基本方面。



§ 6.4 政府与企业：周期行为比较

1. 企业：主动扩张与被迫收缩

现在我们来考察政府和企业周期运动过程中的基本特征，考察二者对周期形成的不同作用。这里的企业以全民所有制企业为代表，政府系指所有凌驾于企业之上的行政机构，假定中央最高决策机构（包括中央计划部门和各专业部委）和各级地方政府在周期行为上是一致的，他们不仅承担宏观调节的任务，而且共同地以直接和间接的方式参与对微观经济过程的协调和控制，共同向企业发布指令和禁令。

全民企业有几个重要特征：（1）产权为国有实际上是政府所有；（2）人、财、物等资源来源于政府的统一分配和给予，1984年开始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企业在财源和物源的获取上有了一些自由度但仍由政府控制为主，而对就业资源的获取和使用几乎完全没有自主权；（3）企业产出的分配和利润形成过程不是独立地由企业自行决定而是和政府共同决定；（4）没有自由的定价权，销售活动受交易之前就已经确定了的“计划价”支配，协议价只起补充调节作用，科尔内所说的“大多数企业不是价格的接受者而是制定者”并不符合中国的情况至少不符合改革以前的现实；（5）虽然企业在上缴利税、从政府财政部门直接



要求拨款或从银行直接要求贷款时可以通过讨价还价使其预算约束比私人企业家的预算约束要软一些,但由于所有企业都这么做,迫使政府不得不作出“平衡”,给企业一个“规模限界”,企业不能越出这一限界;(6)至于“所有者们用自己的资金向企业投资——不是为了使之发展和扩大,而是为帮助它摆脱财务的困境”^①这一判断假如是正确的话,那么这并不是企业行为的特性而恰恰反映出政府行为的特性。在现实中,国有企业始终是政府意愿的执行人,在投资、生产和销售等方面都依赖于政府,用通俗的话说就是依赖“市长”而不是依赖“市场”。

企业的经济特征决定着企业的周期行为。

与私人企业家相比,国有企业具有更强的扩张性,因为它缺乏充分的成本约束,投资和生产决策不是唯一地实现利润最大化目标,而是产值最大化,投入越多意味着产值越多。当企业投资完全来源于政府财政拨款从而政府要求生产出来的利润全部上缴而政府对企业的财务考核主要看产值计划任务完成情况时,企业对利润的多少几乎根本没有兴趣,而在对产值 w 在 c 、 v 、 m 中进行分配时,企业宁愿让 c 和 v 的份额大一些,因为这不但为下期产值任务准备了生产能力基础,而且可以赢得职工的支持,在实行“拨改贷”和利税分流的改革措施后,企业的资金约束和对利润的兴趣有所提高,但由于利润分配仍采取

^① [匈]科尔内:《短缺经济学》下卷,经济科学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0—11 页。



“分成”形式，而且政府考核企业仍离不开产值增长速度，企业的行为目标和动机仍不可能以追求产值最大化转向追求利润最大化，成本约束机制仍不可能建立，所谓“承包”也只能是“包盈不包亏”。这都会刺激企业产生永不满足的投资需求，向政府要求更多的资金。当计划者和行政部门向企业分解和下达投资规模计划时，不会有一个企业要求上级减少给他们投资承诺，相反，总是会有一些企业用种种理由证明他应该得到一个比原有投资承诺更大的投资规模；另外，在实际投资过程中，企业又会巧立名目创造一些需要“超额投资”（超过协议投资计划的部分）来弥补的口子，迫使政府来填满这个口子。结果使实际投资水平大大超过初始计划投资水平。这样一来，计划投资规模被突破出现两次：第一次是由于多级行政干预下在计划分解上层层加码；第二次是企业要求修改投资计划和实际的投资扩张。如果说，初始投资计划就已经包含过度投资的倾向，那么现在这个倾向产生了累积，国有企业成为过度投资倾向累积的最基层的从而也是涉及面最广泛的推动力。

进一步的研究表明，企业要完成双重任务：一是使产值最大化，二是实现企业内的“充分就业”。在总量经济增长的上升阶段，完成这两个任务不会遇到什么困难，因为上升时期从上到下一片扩张繁荣气氛，企业可以很容易地得到资金（财政拨款或银行贷款）。在总量经济增长的下降阶段，情形则不同。由于政府推行紧缩政策，货币发行受到节制，加速投资所需要的财政资金和银行信贷都受到限制，使得企业难以得到投资资金。



即使政府降低企业的产值任务指标，但在企业不能解雇员工的情况下，企业仍要完成第二个任务，保证职工在企业内的“充分就业”，企业也会采取反紧缩的行为：一方面要求上级主管部门保证他的“最低限度投资”——保证企业职工工资开支规模不下降甚至略有扩大，迫使政府提供相应的物资和资金供给，将本来应破产的企业维持一定百分比例如50—60%的开工率；另一方面要求政府给予亏损补贴，工厂即使停工，机器即使停止运转，也要给职工开工资。企业并不希望用政府的财政补贴来维持现状，所以在紧缩中为了改变困难处境的企业总是一再呼吁政府放松紧缩，转向回升，其具体策略也是等待放松，只要政府放松信号一发出，所有企业都会同时加快机器运转，不管市场销售前景怎样，生产出了产品再说，虽然产品库存积压增加，但产值上去了；或者即使考核的对象是利税而不是产值，当前的生产上去了也有两个好处：一是实现了厂内“充分就业”，二是可以为未来利税增长加快打下基础。因为在存在趋势性短缺的经济中，市场上的有效需求不足不会永久持续下去。

以上的分析表明，在经济的周期运动过程中，企业行为特征表现为：扩张是主动的、意愿的，收缩是被动的、非意愿的。扩张期，企业行为和政府行为是一致的；收缩期，企业行为和政府行为是相反的。被迫收缩和反紧缩行动给“企业创造周期”的论点带来了逻辑解释上的困难，因为“周期”是扩张和收缩的循环交替，并非单纯由扩张阶段构成，离开了对收缩起源的理解，周期分析就会是不完整的。众所周知，在西方资本主



义市场经济周期学说体系中，对周期低潮或危机形成的解释占有尤其重要的地位，有人实际上把周期学说和危机学说看成是同义的，因为二者的研究任务都是要说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为什么产生周而复始的危机现象。我们注意到，解释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扩张倾向对于理解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周期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但是，对周期低潮和衰退形成的研究同样是不可以忽视的。

2. 政府：主动扩张与主动收缩

迄今为止，中国经济的周期波动主要是由政府来推动，它不仅主动地促使经济从低潮转向回升复苏再从回升复苏转向高潮，即主动扩张；而且在经济系统中出现严重不平衡、短缺加剧、膨胀推动超高速增长时，政府又会主动刹车，放慢增长，使经济从高潮转向低潮，即主动收缩。从低潮到高潮、再从高潮到低潮……，如此循环往复，以致无穷，都包含着政府的作用。前面已经指出，中国经济的周期波动主要不是市场推动，而是计划和行政推动；现在进一步指出，中国经济的周期波动主要不是企业推动，而是政府发动。

政府之所以能够主动地推动经济走向扩张和收缩，首先是因为政府直接掌握着劳动、物资和资金的组织和分配权，它可以很方便地决定资源流动方向和路线。就劳动而言，如果政府出于对高速增长的偏好，希望加速工业化的步伐，它便可以实



行一整套宽松的工业就业政策，通过加速工业投资来扩大工业就业机会，吸纳大量从农业中分离出来的剩余劳动力；当快速扩张工业就业遇到了投资品和消费品供给的困难，工资规模扩展太急以致所形成的购买力给城市消费品市场和价格造成短期难以忍受的冲击时，政府不得不主动收缩工业就业规模，动员农民工回到农村去，结果造成了城乡、工农产业结构性的就业波动。物资的流转也有类似的情形。在资金方面，政府可以通过“强制积累”来为实现过度投资计划筹集资金。包含三个办法：一是人为地压低消费水平。在城镇这一块实行低工资政策，抑制工资的形成和增长，通过高税率或强制性利润上缴将一部分劳动收入转化成利润收入并集中在中央财政的总笼子中；在农村这一块则通过低农价政策从农民那里搜取一部分“剩余积累”。二是借债。如果靠压低消费还不能为过度投资计划筹集起足够的资金，政府可以诉诸于公债和向国外贷款。但是，直到1979年，我国走的基本上是“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道路。1979年开始明确实行开放政策以来，公债和外债成为加速投资的资金来源之一，但这个规模仍很小，1979—1989年我国利用外资（对外借款、外商直接投资和外商其他投资）的累计数为900亿美元，年均不到82亿美元。三是实行公开的或隐蔽的赤字财政政策。如果集中起来的收入、储蓄和债务不能满足政府的开支和发展生产的资金，政府便会将支大于收的财政赤字通过向银行透支然后由中国人民银行发行新纸币的办法来弥补。这三种办法，尤其是第一、三种办法，为实现过度投资计划作了重要



贡献，同时也是导致周期性高速扩张的主因。

为了实现高速扩张的意愿，促使国民经济走上全面繁荣的轨道，政府不仅会创造一个有利于扩张的机制，直接提供充足的要素资源，而且会通过一系列会议、发指示、批条子进行自上而下的生产动员，在动员中常常会提出一些有利于高速增长口号以激励各级政府和企业的扩张热情。我们根据对报纸和有关经济政策文件资料的研究发现，几乎每一次周期的扩张高潮期都有各具特色的动员口号。

另外，在消费需求不足的情况下过度扩张投资，有可能碰到投资系统吸收能力的限制。一方面，长期的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特别是重工业优先增长持续时间太长，势必破坏生产和消费的平衡，使生产结构或产业结构与消费结构不适应；另一方面工业的快速发展要求农业同样以较快的速度提供足够的生活必需品尤其是食品以满足新增工业劳动力的再生产，如果农业因存在“李嘉图增长陷阱”而长期发展滞后，不仅会造成工业和农业之间的结构失衡，而且有可能爆发食品危机。要使农业实现稳定增长，变过份滞后为协调，只有政府的干预和调整才能做到。从我国历次紧缩的形成来看，几乎每一次都是从加强农业生产、扩大农业投入的目的出发的，通过较大幅度地降低非农产业的增长速度来换取农业增长的轻度回升，达到两大基本产业成长的相对均衡。显然，这一紧缩效应是政府政策调整的结果，它是不能用“企业创造周期”的理论来解释的。

政府直接发动扩张和紧缩的可能因素是，它不仅直接掌握



和控制着经济调节参数，如价格、利率、工资率和税率等，而且掌握着规模较大的直接拨款投资。在我国，由国家财政支持的基本建设拨款占全民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及基本建设投资的份额。1953年分别为76.8%和77.8%，1978年分别为67.6%和90.2%，1989年分别为24.2%和39.5%。在这样一种资金配置格局下，如果政府要对产业结构——包括工农业之间的结构及工业内部基础工业和加工工业之间的结构——进行调整，或对总投资规模进行向上或向下的调整，是不难达到目的的。这一点在改革之前尤为明显。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事实是，我国每一次投资周期的高潮总是伴随着由国家财政拨款直接投资的大中型项目的大批上马，重点项目上升也多；而在投资周期的低潮则表现为相反情形，因为投资紧缩首先是预算内项目紧缩，而在预算内项目中又首先是先砍由国家财政拨款的项目，这不仅可以相对减轻因支出过大而造成的财政困难，而且较容易实现政府确定的经济紧缩的目标。

3. “层层加码”效应

前面讨论中提到的“政府”是一个总体概念，仅仅用来与“企业”相对应，正如用“行政”与“市场”相对应一样，其着眼点也主要是为了一般地论述“政府”与“企业”在我国经济运行中的不同的周期行为。现在我们进一步对“政府”作一分解，了解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周期行为上的差异，特别强调



地方政府“层层加码”行为的强波效应。

如果我们确认经济的扩张和收缩首先是由中央政府发动的，那么地方政府的进一步行动一般不是“逆周期”而是“顺周期”的，尤其在扩张阶段是这样。因为无论是从政绩评价还是从地方利益的角度看，“顺周期”行动都是有益的。这种“顺周期”行动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在中央规定的指标基础上“加码”，中央给地方放权越多，“加码”程度就越高。^①在各级地方政府内部，每一个下级政府都会模仿其上级政府的“加码”行为，因而每一个上级政府对其下级政府都会产生“加码示范效应”。结果是，层层加码，逐层叠加，由各级政府加总所得到的实际值必然超过中央政府的期望值。一般规律是：如果中央政府希望工业高速增长，那么地方政府会在层层加码后使工业增长得更快。

在收缩阶段，地方各级政府的“顺周期”倾向相对弱一些，甚至可能采取“反紧缩”对策，因为投资和生产紧缩毕竟会导致地方收入下降，损失一些发展潜力。但是由于紧缩通常比扩张有更强的行政约束力，中央政府为了在短期内取得较为显著的紧缩效果，会用行政和经济的办法促使地方政府按要求采取紧缩措施，尤其是，虽然每一个地方政府的紧缩行动基本上属于非意愿行动。这和企业一样，但它又会在观望和对比中尽可

^① 1958年和1970年分别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地方分权”，而这两年恰恰是工业增长率的实际值超过其计划值最多的年份，幅差分别为40.9和13.7个百分点。



能使自己的紧缩行动不落后于他人,所有的地方政府都这么做,结果又会在水平级上产生“加码示范效应”,使紧缩的实际值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大于其计划值。只是由于出于地方主义利益考虑的“反紧缩”和出于政绩评价考虑的“加码示范效应”是一对矛盾,所以紧缩期的实际值与计划值的幅差及其出现频数要小于扩张期实际值与计划值的幅差及其出现频数。这样一来,我们就从地方政府的“加码”行为的角度进一步解释了中国经济增长在总体上的高速扩张倾向,也就一步证明“大起大落”中“大起”更容易产生,过度繁荣比过度衰退更容易出现。



7章

工业化与产业周期

我们在第1章指出：在其他条件为一定的情况下，平均经济增长率越高的国家，其波动强度会越高；平均经济增长率越低，其波动系数越低。在我们所比较的11个市场经济国家中，英国、美国、法国和原西德在近二三十年中的平均增长率较低，波动系数也较低，在0.0204和0.0360之间，经济系统的稳定程度较高；而其他平均增长速度较高的国家和地区，波动系数也较高，例如南朝鲜和新加坡平均增长率高达8.7%和8.77%，其波动系数也是最高的，分别为0.0453和0.0508。中国自改革以来，体制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旧的集中计划经济已经变成含有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的混合经济，经济波动强度也已大大减缓，但由于平均增长速度较高，改革时期的波动系数仍高于上述几个发达国家。拿日本来看，1945—1973年是它的高速增长时期，1974年以来进入低速增长时期，而前一时期的波动系数也



高于后一个时期。

国际经济发展史表明,一国的工业化加速推进的时期正是该国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时期。所以,与其说高速增长经济存在强波倾向,勿宁说加速推进的工业化经济存在强波倾向。新中国从成立到今天,其经济发展一直是在加速工业化的过程中进行的,要解释它的周期性波动的成因,还必须深刻地把握其工业化发展这样一个现实背景。

承认以产业结构升级为主题的工业化进程的波动和总量经济波动的相互关系,不仅可以解释为什么改革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波动仍比欧美工业发达国家的周期性波动要显著一些而和一些工业化过程仍在继续的高速增长国家比较接近,而且向我们揭示:中国经济在体制改革完结之后但如果还未完成伴随高速增长工业化进程,其波动过程就有可能继续存在甚至难以实现像工业发达国家那样的稳定。

§ 7.1 工业化的“周期”现象

1. “工业化周期”假说

工业化过程首先是一个资本规模迅速形成和扩展的过程,资本规模的扩展必然要吸纳大量先前闲置的劳动力,从而整个



社会的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得以迅速扩大，社会再生产规模随之扩展，产量增加。尽管工业化初期更多的是数量型的简单扩张，但由于资本、劳动是同机器生产体系相结合，增长的效率亦会显著提高，从而工业产出的增长会快于投入的增长。尤其是，工业化过程特别是它的初期阶段会出现以下情形：（1）农业剩余劳动力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投入工业生产，农业总产量基本上不会减少，但同样数量的社会劳动者可以创造出更多的社会总产品；（2）工业的扩展必然要求建筑业、运输业和其他联带产业的兴建和扩展，而这些产业又必然创造出相应的价值财富，使全社会的价值增长规模扩大；（3）工业经济比传统的农业经济要求更为发达的交换和服务，这便会推动商业和服务业的快速发展；（4）由于消费者对农产品的消费偏好比较稳定而对工业品的消费偏好容易变化，加上工业产品存在着一定的生命周期，这就会使工业生产经常不断地追求产品创新和产业兴建。所有这些，都将推动总量经济的迅速扩张。

扩张和繁荣不是永恒的，对于发展中国家也是这样。这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常常会遇到“瓶颈”，其中最重要的是资源瓶颈，包括资本供给品和熟练劳动者等方面的短缺。当制造工业迅速发展时，它要求能源，原材料和其他资源产业先行发展；当产业结构高度化并开始工业技术升级时，它要求有足够的技术和熟练劳动者准备，而资源产业的扩展和技术的准备难以长期维持在一个理想的水平上，过度的外援又会给长期发展制造困难和矛盾。其结果是，让工业化暂时放慢，降低工



业增长速度，总量经济下降，波动的扩张和高潮的持续时间越长，峰值越大，收缩和低潮持续时间也会越长，谷值亦越大。这样一来，工业化过程中总是存在一个不可避免的矛盾现象：既潜在着高速增长势头、又隐藏着急速衰退的短缺压力。正是这一矛盾现象导致工业化过程总是表现为一个工业急速扩张和暂时收缩的周期性波动过程。从长期趋势看，工业成长是上升的，但这种上升不是线性的，而是上下起伏的，我们把这种非线性的工业成长轨道看成是工业化周期波动轨道。理想的制度和合理的政策可能使工业化周期的波动轨迹变得缓和一些，但终究不能消除工业化周期波动。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产生于发展中经济的强波现象，是一个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它存在于工业化过程本身之中。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增长并没有超越这一规律，因为它的发展任务首先是加速工业化。

2. 加速趋势

在我国，以机器大工业成长为主题的工业化过程发端于 19 世纪中期，但是，经过大约一个世纪，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现代工业的成长并没有多大进展。经常不断的战患，以及传统的家庭小工业的高度分散化，加上外国工业资本的掠夺性和不稳定性，至使近 100 多年的工业发展老是在低水平上循环，没有导致产业突变和工业生产革命。1949 年，在工农业总产值构成中，工业份额只有 30%，大体相当于美国 100 年前的水平，在 1839 年的



时候,美国工农业份额分别为 26%和 74%。^①在就业方面,我国 1949 年城乡就业总量为 18 082 万人,城市只有 1 533 人,占总就业的 8.48%,农村拥有 16 549 万人,份额高达 91.52%。当时农村内部的工商业还相当落后,其就业人数不会超过城市。扣除农村中的非农业就业份额外,1949 年农业就业份额不会低于 90%。所以,无论是从产值结构还是从就业比重来看,新中国成立前夕的经济仍是以传统农业为中心的第一次产业经济。

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就提出了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任务,这就要求加速实现工业化的进程,逐步缩小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份额,使工业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主要推动力和动力。从 40 年的经济发展来看,我们朝这个方向走出了重要的第一步。虽然和发达的工业国家以及新兴工业国家相比,我们现在基本上还只能算是一个农业—工业国家,还未达到真正工业化的目标,但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工业和农业产值份额交叉的变动速度快于美国,美国用了 43 年时间,于 1882 年出现交叉;中国只用了 6 年时间,于 1955 年出现交叉。1989 年,中国的工业产值份额为 77%,出现 X 型交叉后只用 34 年就达到这一水平;美国同一水平出现于 1930 年,花了 48 年时间,而且一直到 1948 年都是在 1930 年的 76.2%上下波动。这说明中国工业生

^① 1844 年为 31.7%和 68.3%。我们没有找到 1839—1844 年间连续各年的资料,所以取 1839 年的数字进行比较。由于这里的“工业”不包括电力在内,同我国统计中“工业”包括电力工业相比偏低;如果加进电力工业,美国 1839 年的工农业份额和我国 1949 年的工业份额差不多(《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统计集(1848—1960)》,世界知识出版社 1962 年版,第 14 页)。



产的成长速度快于美国,只是起跑晚了整整 100 年。

另外,中国就业结构转换的速度在总体上也是加速进行的。1949—1989 年,它们第一次产业的就业份额共下降 29.8 个百分点,年均下降 0.745 个百分点。如果按照改革时期(1979—1989 年)的变动速度,即第一次产业的就业份额平均每年下降 1 个百分点,第二次产业平均每年上升 0.4 个百分点,而第三次产业平均每年上升 0.57 个百分点,那么大约在 2016 年前后将出现三次产业就业份额的交叉,从而发生重大的结构转换。假如这一估测成为现实,那么容易得到中国就业的产业结构转换的时点(见表 7—1)。

表 7—1 就业结构转换时点的国际比较 单位:年

国家	第一、二次产	第一、三次产	A、B 间 时 差	中国落后时间	
	业交叉时点	业交叉时点		比 A	比 B
	A	B			
英 国	1870 前	1870 前	0	大约 146	大约 140
法 国	1873	1903	30	143	113
原西德	1891	1910	19	125	106
美 国	1910	1930	20	106	86
意大利	1958	1957	1	58	59
日 本	1961	1960	1	56	56
中 国	2016	2016	0	—	—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0)》,第 13 页;[日]佐贯利雄:《日本经济结构分析》,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1—15 页(“AB 间时差”数字作了调整)。

从表 7—1 可以看出,中国的转换时点要比先行的市场经济工业国晚 50—150 年。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但是必须同时看



到,从同一个起点出发到出现 X 交叉时点,中国所用的时间最短。在所有工业发达国家中,工业化进程所用时间最短的是相对后起的日本。但是,完成同一量级的产业结构升化所花的时间,新中国又比日本缩短了大约 15 年。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 1868 年,一、二、三次产业的就业份额分别为 83.6、4.9 和 11.5,与中国 1952 年分别为 83.5、7.4、9.1 的结构水平差不多;但是到达 X 交叉的时间日本在 1958 年前后,用了 90 年,而中国可能在 2016 年,只需 75 年。

3. 周期过程

我国国民经济的上升和繁荣期通常伴随着工业生产的扩张,而下降和衰退期又总是伴随着相对的工业生产收缩。比如,1956 年的工业“冒进”,1958—1960 年的工业“大跃进”,1969—1972 年以军事工业扩张为重心的工业增长加速,1977—1978 年的工业“洋冒进”,以及 80 年代中期以来的所谓工业生产“过热”,总是带动着总量经济的快速增长;而 1955、1961—1962、1967—1968、1973—1974、1976、1981—1982 年以工业生产收缩为特征的所谓经济调整则又迫使总量经济增长急剧减速;相反,处于总量波动低谷的调整时期常常伴随着农业份额的暂时回升,大批已经进城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又再度回流到耕地上。因此,我国经济的总量波动是和工业化进程的变动一脉相承的,工业化生产的不稳定趋势成为总量波动趋势的基本依据之一。



我们用国民收入中农业份额的增减来反映工业化变动的周期过程，农业份额减少表示工业化持续扩张，农业份额增加则表示工业化中断或退步。表 7—2 显示出，从 1949—1990 年，我国工业化发展（用农业份额下降来表示）出现了 8 次周期波动，1984—1990 年一直处于工业化发展的上升阶段，1990 年再度下降。在 1950—1990 年期间，农业份额下降 27 年，上升 14 年，而且下降的幅度大于上升的幅度。可见，工业化或非农化过程

表 7—2 农业国民收入份额变动的周期

起终点年份		起终点份额		变动趋势		升降 年数	周期 次数
起点	终点	起点	终点	特征	程度		
1949	1954	68.4	51.9	↓	16.5	降 1	I
1954	1955	51.9	52.9	↑	1.0	升 5	
1955	1960	52.9	27.2	↓	25.7	降 3	II
1960	1963	27.2	48.8	↑	21.6	升 5	
1963	1966	48.8	43.6	↓	5.2	降 2	III
1966	1968	43.6	50.5	↑	6.9	升 3	
1968	1972	50.5	37.8	↓	12.7	降 2	IV
1972	1974	37.8	39.3	↑	1.5	升 4	
1974	1975	39.3	37.8	↓	1.5	降 1	V
1975	1976	37.8	38.8	↑	1.0	升 1	
1976	1978	38.8	32.8	↓	6.0	降 1	VI
1978	1979	32.8	36.6	↑	3.8	升 2	
1979	1980	36.6	36.0	↓	0.6	降 3	VII
1980	1983	36.0	40.6	↑	4.6	升 1	
1983	1989	40.6	32.0	↓	8.5	降 6	VIII
1989	1990	32.0	34.7	↑	2.7	升 1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平衡统计司编：《国民收入统计资料汇编

（1949—1985），中国统计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1 页；《中国统计年鉴 1991》，第 35 页。



是趋势性扩张型的,在这个扩张过程中平均每两年出现一次中断(27/14)。

根据表 7—2 描述的变动趋势,我们就中国工业化的周期波动过程概括成一个如图 7—1 所示的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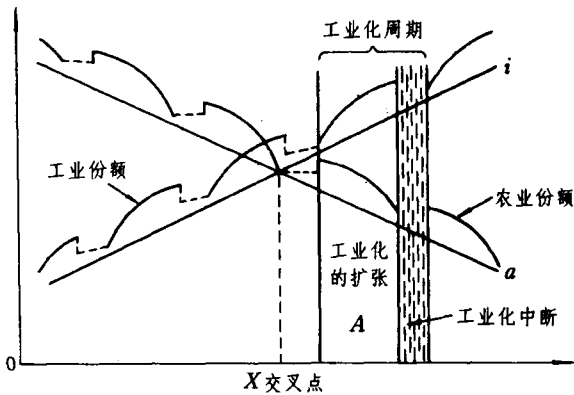


图 7—1 工业化的周期趋势

在这个模拟模型中,工业化发展在趋势上是上升的,工业份额趋势线*i*上升的同时,农业份额趋势线*a*下降,但是工业化轨道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一条波浪线,表现为加速和中断的交替。模型中,区间 A 表示工业化的扩张,区间 B 表示工业化的中断,A+B 构成一次工业化周期。X 交叉时点表示工业份额趋势线和农业份额趋势线的交叉,如果工业化过程加速,X 交叉时点将向左移,反之则向右移。对于后行工业化经济来说,这个时点通常是向左移动的,直线*i*的斜率更大。将这一分析模型的



前几条所界定的总量周期作一比较，很显然，二者的波动轨迹基本上是一致的。

§ 7.2 产业结构的非均衡运动

1. “产业集群”中的结构非均衡运动

工业化周期实际上是一个产业结构变换过程的反应，由于工业化周期与总量经济的运动路线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可以从对产业结构变换的分析中进一步说明总量周期的成因。

在前面刻画工业化周期运动的模拟模型中，我们证明了这一周期运动发生在工业和农业这两大基本产业份额中的 X 交叉过程，并指出短期随机性波动是在工业化趋势性扩张线上展开的，而在随机波动中扩张是常规的而“突然跌落”则是“反常行为”。为了从结构上来解释这一现象，我们在这里提出一个替代性假设，这就是产业结构的非均衡运动中“产业集群”的连续和中断。

所谓产业集群是指一种产业构成状态，在这一状态中，不同的产业不是彼此孤立地在封闭的系统内自我循环，不同产业的份额不是均匀地分布在各自所拥有的时空中，而是趋于集中在某些产业和它们的周围，系统内形成一个中心产业和众多的外围产业。这个产业集群可以用图 7—2 来表示。这个简图告诉



我们，现代产业结构系统内各产业不仅相互关联，而且集结在一个中心产业的周围。例如，加工制造业作为核心产业，其他8个外围产业按照不同关联程度集中在它的周围。由于制造业和其他外围产业形成一个“群集”，我们可以容易获得如下认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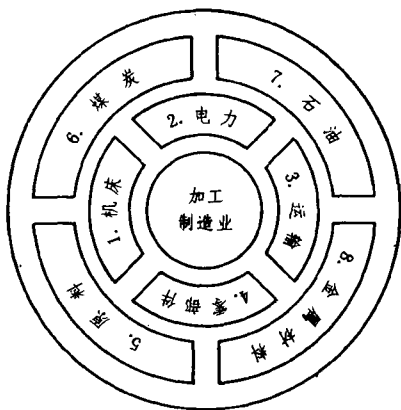


图 7-2 核心产业与外围产业的群集

首先，制造业的扩张和收缩决定着外围产业的扩张和收缩，在经济投入的意义上，制造业为其他外围产业创造出需求。如果制造业高速增长，意味着外围产业的需求高速扩张，为了实现产业结构的均衡，外围产业就必须加速投资和生产；如果核心产业出现衰退，则意味着外围产业的需求下降，这时外围产业只有减少供给才能维持均衡。

其次，从供给的角度看，如果外围产业出现衰退，表明对



核心产业的供给减少，为了不致于使生产者受损失，核心产业就不得不减少投资，缩小生产规模；如果情形反过来，外围产业的生产开始扩张繁荣，则核心产业的投入品增产，为了不浪费投入品，避免因生产过剩造成的资源损失，核心产业就必须扩大投资和生产，加快吸收投入资源的速度。

第三，在这个产业集群中，假定各产业的初始比率都是合理的，但在本期的生产过程中某一个外围产业因种种原因出现生产不足，比如由于价格利差的刺激，一些生产相对价格偏低的原料、煤炭和电力的企业改变投资和生产方向，从原来的产业转向价格利益较大的加工制造业等，这就会产生两个问题：一是加工制造业投入品的需求更大；二是外围产业中的煤炭、原料和电力创造出来的投入品可供量更小，这一大一小必然使供求缺口猛然增大。假定在转移过程的初期制造业因为可动用投入品存货支持制造业扩大部分的生产，以致带来制造业的加速增长。但一旦存货用完，制造业生产就会猛然出现滑坡，由于其他外围产业在生产上与核心产业紧密关联，结果它们也会随之下降。在核心产业和部分外围产业的生产都下降的情况下，“总量”增长必然下降，而这时如果农业生产保持不变的增长速度，那么所有工业在“总量”中的份额就会下降。这样一来，总量衰退和工业化中断都发生了。扩张过程可以按相反的情形进行推论。

由此可见，产业结构的非均衡运动必然导致工业化和总量增长的波动。



在这个产业集群系统中，有两个重要的周期效应：一是核心产业生产的景气状况对外围产业的发散效应；二是外围产业生产的波动对核心产业的回波效应。由于发散和回波过程存在时滞，因此过程具有累积特征。从核心产业到终点外围产业的层次越多，路线越长，过程的累积倾向亦会越强。

2. 外围产业发展滞后与结构性危机

通常，产业集群的形成既可以发生在市场经济中又可能发生在计划经济中，它是现代工业经济成长中的一个普遍现象。从世界银行提供的各国数据看，工业产业集群的核心是制造业，但不同国家核心产业的比重是不同的。在所观察的 93 个国家中，1988 年核心产业份额最大的是西德，达到 44%；中国为第二，达到 33%；但是西德该年的农业份额只有 2%；中国却有 32%。所以，中国的工业产业集群具有较强的向制造业集中的倾向，这意味着中国的外围产业份额较低，其发展比较滞后，而核心产业份额较高，发展则比较超前。

在 1953—1990 年期间，我国工业总产值年均 11.6%；其中轻工业增长率为 10.7%，重工业为 12.7%，重工业增长快于轻工业增长。在重工业中，制造业增长又快于采掘和原材料工业的增长，1958—1990 年期间年均增长 15%，如果考虑到 1950—1957 年制造业扩张兴建的情形，新中国制造业增长可能在 15% 以上。从份额上看，制造业占重工业的份额，1952 年为 41.9%，



1989年为48.6%。所以无论是从增长速度上看,还是从规模上看,新中国制造业的核心产业地位是明显的。尽管从80年代中期开始,制造业份额呈现下降趋势,但并未而且在相当长时期也不可能改变其核心产业地位。不过,制造业的超前增长势头可能会较快减弱。这有两个原因:一是我国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已高于发达国家同一份额的平均水平,为了扩展服务业和工业内的非制造业的生产,制造业份额将略有下降;二是我国目前的出口商品结构同国际平均水平相比,其不合理性主要是制造品内部机械和运输设备的出口份额偏低,而其他制造品出口份额偏高;至于初级产品的出口份额1988年为17%,低于中等和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比高、上中等收入国家分别高5个和4个百分点。但和美国一样。今后我国制造业份额将出现下降趋势,并不意味着制造业作为核心产业的地位会消失。从国际经验数据看,即使是在高度发达的“后工业社会”中,制造业仍是产业集群中的核心产业,中国同样将遵循该法则。

因为我们的研究重点不是作预测,而是研究“过去”,所以对核心产业加速扩张而外围产业发展滞后的原因和后果尤感兴趣。

我国核心产业的迅速扩大主要是在政府采取集中动员资源的政策推动下实现的,这一政策的核心是“优先发展重工业”。在这一政策的指导下,一些本应在轻工业和消费资料部门进行分配的资源被集中在重工业尤其是制造工业中使用。这一政策的积极作用是在短时期建立起可以直接为现代化作出贡献的重



工业体系，从而也为经济高速增长打下了良好基础，加快了工业化的发展步伐。对重工业的优先发展，过去经济学家的批评意见较多。现在看来，这一发展政策，既带来了负效应，也带来了正效应。^①其正效应是对工业化和未来经济增长的贡献，因为重工业尤其是制造业既可以创造较其它产业更大的附加价值，又为技术物化准备了一个最合适的载体。其负效应是它人为地限制了消费的增长，让外围产业的增长不能足以满足核心产业增长的需要，结果造成产业不平衡发展。

对于经济周期的运动而言，外围产业发展滞后，必然在一个或长或短的时距内引致经济系统产生结构危机，一边是投资需求过大，一边是投资品供应不足，由于外围产业提供的物资不够用，致使核心产业产生资本闲置，能力浪费。如果我们透过各个总量周期的表面去仔细考察周期性衰退的内在过程，不难发现，1984年以前的历次衰退几乎都是以爆发结构性危机为基础的。在总量上虽然也有根源于过度投资（消费需求不足）的需求过剩，但这种过剩投资需求又主要是由重工业投资特别是制造工业投资所创造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总量非均衡产生于结构非均衡，总量衰退是结构矛盾加剧的总爆发。正因为如此，我国每一次总量衰退时，政府通常是用调整产业结构的

^① 美国经济学家 W. 列昂惕夫等人在提供的有关未来世界经济发展战略的研究报告《世界经济的未来》中指出，重工业包括机器设备和工业原料的增长是发展中国家的“一般规律”，它虽然会在投资率增长的同时引致个人消费在最终支出中比重下降，但“着重发展重工业对这广阔地区的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是重要的。”（商务印书馆 1988 年版，第 23 页。）



办法来创造新的经济平衡。具体措施一般采取如下两种：

(1) 向农业倾斜：在增加农业投入时缩减工业投入，但减少部分并非完全与增加部分相等，工业投入下降速度快于农业投入增加的速度。在这种情形下，结构调整与总量衰退一致。

(2) 向外围产业倾斜：在扩大电力、原材料、能源和其他基础工业投入的同时，收缩加工制造业和建筑业等产业的投资和生产规模，当后者强于前者时，总量衰退也会发生。

就是说，在周期低潮的调整中，采取的是与高潮期非均衡趋势相反的非均衡办法，我们可以把这种调整叫做“向下越位调整”。政府希望通过“向下越位调整”来达到积极的平衡，它的意义在于经济从低落转向回升的过程中，曾经发生在上一个高潮期的非均衡不会马上出现，因为从“向下越位”回复到结构均衡位置有一段距离，不会马上达到。在现实过程中，也存在“刚好到位”和“不到位”的调整。一般来说“刚好到位”只不过是一种特例，而“不到位”多发生在分权程度比较高的时期，例如1986年的所谓“软着陆”就属于调整“不到位”的例子。当然，在我国目前的体制下，调整到位不到位主要不在于体制的分权程度，而主要在于政府的耐心和调整政策的持久性。

3. 生产过剩的两种类型

前面的分析假定产业集群是封闭的，仅仅研究封闭的产业集群内核心产业与外围产业之间关系的非均衡趋势。现在我们



放松封闭假定，并将核心产业的买者身份转化为卖者身份，考察核心产业直接生产结果的价值实现问题。

如果政府仍然坚持优先发展制造业(我们模型中的核心产业)和“高积累、低消费”的政策，将大量资本投资投入制造业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外围产业之中，假定核心产业和外围产业之间保持供求平衡。在这种情况下，核心产业的再生产过程不会遇到来自供给一方的“瓶颈”，而问题可能发生在它的需求一方。如果消费市场不旺，不存在买方竞争，边际消费倾向很低，消费需求不足，核心产业的产品就有一部分卖不出去，其价值不能实现，结果引致生产过剩。由于我们假定核心产业和外围产业在资本品的相互供给方面为平衡，所以这种生产过剩不是发生在单纯资本品生产领域中，而是发生在：资本品生产与消费品生产之间，或者消费品生产与消费品的直接消费之间的生产过剩。如果是在第一种涵义上，那么这种生产过剩就是结构性的；如果是在第二种意义上，这种生产过剩则又是总量性的。

关于第一种含义的生产过剩，马克思曾经指出，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来说，它是祸害。因为在再生产过程中，资本家关心的不是实现全社会中的产业平衡发展而仅仅是剩余价值，所以产业(马克思用的是“部类”)之间的结构性生产过剩必然导致危机。马克思又指出，“再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一旦废除”，“这种过剩本身并不是什么祸害，而是利益。”马克思的考虑是，由于固定资产的更新补偿在各年不是均匀进行而是逐年不同的，如果在某一年数量很大，那么在下一年就一定会很小，而消费资料年生产



所需要的原料、半成品和辅助材料的数量不会因此减少,因此生产资料的生产总额在一定场合必须增加,在另一个场合必须减少,“这种情况,只有用不断的相对的生产过剩来补救。”^① 实践中的问题是,由计划者和行政机构来调节这个“过剩”,常常伴随以下后果:一是因为信息传输和反馈的时距拉长而使调整不及时以致过剩被累积起来,而对累积后的过剩作大调整又势必引发大的震荡,产生更严重的衰退;二是调整成本大,导致调整效率下拉;三是在没有灵活的要素流动机制下,危机被隐蔽起来,而公开的总量衰退又达不到“创造性的破坏”的目的。所以,在第一种涵义的生产过剩情况下,衰退和危机不但会照样存在,而且其程度有可能比即期调整下过剩危机更强。

对第二种含义的生产过剩进行调节,其情况更为复杂。这里的问题在于加速工业化与平衡增长的矛盾。一般来说,如果政府发展政策的主要取向是加速工业化,就很难持之以恒地采用平衡增长战略,因为无论是极端的、温和的还是完善的平衡增长战略都要求产业扩展不能有突进或如罗森斯坦—罗丹所讲的“大推进”,而这是与工业化的要求不一致的。不管人们对经济中的不平衡存有多大忧虑,只要是采取加速工业化的行动,实行大推进、让核心产业先行增长就成为必然选择。在“大推进”产业政策下,要求强调收入资本化,选择高投资率,从而消费需求不得不经常受到抑制。这样一来,第二种涵义的生产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526—527页。



过剩就不可能及时弥合，而要等到政府已经感到消费者因抱怨消费需求抑制太强而降低劳动生产率时才会决定用轻度增加消费需求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由于加速工业化是政府的一项主导经济政策，所以只要消费抑制在消费者容忍上限之下，政府就会主动选择不平衡增长战略，加快核心产业成长的“大推进”步伐，而“大推进”又总是会在或强或弱的程度上造成大波动。因为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增长上的“大推进”要求以过度投资为前提，过度投资不但会造成或加剧产业集群中的结构非均衡运动而且会造成和加剧消费需求不足，结果又会重新诱发结构和总量上的失衡，引起新的生产过剩。^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加速工业化对周期波动起了推动作用，成为强波的根源之一。

§ 7.3 产业发展的生命周期

1. 存在产业生命周期吗？

现在我们从纵的角度来研究产业变动与经济波动的关系，其着眼点集中于从产业成长的阶段变化来说明周期波动的形

^① 目前，我国存在相对生产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其原因是：（1）消费结构快速变化，生产结构变化滞后；（2）消费体制障碍，有钱买不到住房等；（3）消费者对未来开支估计过高；（4）控制通货膨胀政策使居民产生市场稳定心理等。



成。

在周期分析史中,我们可以找到大量有关产品生命周期、创新生命周期、技术进步生命周期以及个别商品的市场生命周期的研究文献,但人们对产业生命周期似乎并未引起多大的注意。事实上,有产品生命周期,就有产业生命周期,一种新兴产业出现以后,并不会永无止境地扩展下去,它总是会在或迟或早的时候被另一种或另一些产业所替代,今日的朝阳工业,在明日就可能成为夕阳工业。有始就有终,哲学的道理如此,经济学的道理也如此。唯一的例外似乎是农业,它从产生到现在历经几千年,经久不衰。看来,产业的生命周期取决于可替代性,某一产品以及生产这一产品的产业的可替代程度越高,其生命周期就可能越短。如果由于科技进步发明了一种仅仅由碳水化合物制成的食品可以替代从土地中长出来的粮食,并且已被大众所食用,那么粮食产业的生命周期也就完结了。不过,这个理论要变为现实,并普遍化,还有待于未来。

如果我们的研究不是从产业自无至有又自有至无来定产业的生命周期,而主要从其市场开发的升降变化来确认其存在,那么涉及的层面就会宽泛一些。通常的例子似乎是某一产业的成长可以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然后又从大变小,但最终不会消灭,而会在落到一个较低的水平上以后保持近似水平增长的趋势。这是因为人口增长是一个前后继起的过程,而不会突然停止,人的偏好也必然存在前后延续性和继承性。

由于产业的成长总是依赖于市场的开发,而市场开发需要



经历慢慢的传播和发散，幅射面只能逐渐扩大，不可能同时完成，正如声音不可能同时将波和粒均匀地分布在受体每一个角度一样。市场开发的逐渐扩散导致产业成长也表现为一个过程，只是在现代信息技术下其开发过程会缩短。

如果以主导产业变换为观察对象，我们同样可以看到产业变动的“波”的现象，即某种产业在开始时期所拥有的份额不大，然后逐渐增大，成为主导产业之后又会由另一类产业成为主导产业，致使前一种产业转入衰退，成为次要产业。

从上面的描述，我们可以得到有关产业生命周期的一般图式（图 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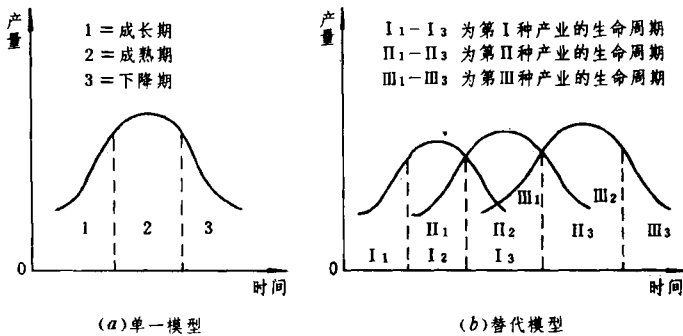


图 7—3 产业的生命周期模型

单一模型表明，一种产业总是会经历成长、成熟和衰退三个时期，产业扩展达到一定规模时势必走向缓慢或急速下降，因此产业发展存在自身的生命周期。



从全社会来看,各类产业不会同时进入成长时期,而是有的产业处于成长期,有的产业处于成熟期,有的产业处于衰老期。这样一来,实际的产业发展模型是一个如上图(b)所表示的替代模型。当然,由于不同产业都有自己的特性,由于经济过程的变化极为复杂,产业的生命周期模型也会复杂多样。荷兰经济学家雅各布·J.范·杜因在描述创新生命周期时将生命周期假设为S型的,并建立四种标准的生命周期模型:(a)替代,(b)生命周期的扩展,(c)技术的变化,(d)扩大的成熟阶段的型式(如图7-4)。

杜因建立的四个简单生命周期模型对于我们研究的产业生命周期也大体上适应,实际中的产业成长过程可以概括为这样四种抽象型式,不过,在进一步的分析中,我们主要依据模型7-3的内容。

产业的生命周期大体可分作三个阶段:^①(1)成长:由于创新和技术发明以及技术引进的推动,少数企业投入生产,市场渗透刚刚开始,只有少量生产之后生产规模逐渐扩展;(2)成熟:生产企业增多,大批生产,规模最大化,总份额越来越大,市场渗透宽、覆盖面最大化;(3)下降:市场渗透受到需求限

^① 美国学者杜因将创新生命周期的进程分作4个阶段:(1)采用:大量产品创新,有不同的技术选择,很少了解关于需求的特征;(2)增长:消费者认可不断增加,产品创新数量不断减少,销售增加导致技术上标准化,出现降低成本的工艺创新;(3)成熟:产出率放慢,竞争激烈,工艺创新转向节约劳动;(4)下降:销售下降,试图通过改变技术而摆脱市场饱和,继续运用节约劳动的工艺创新。(《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10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87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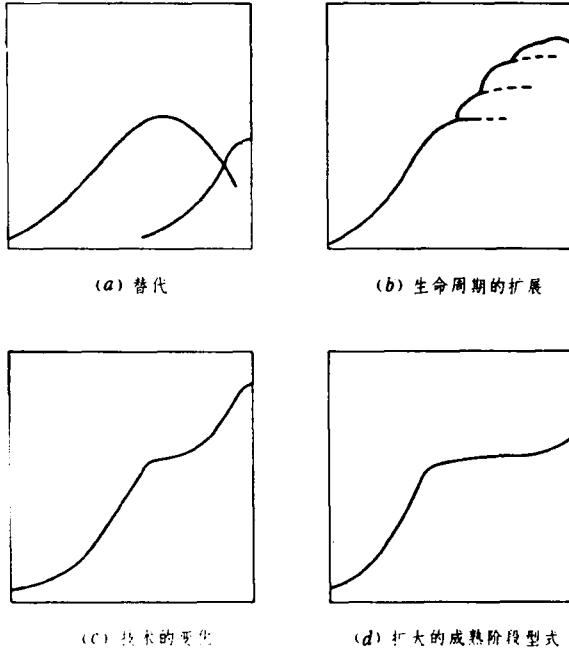


图 7-4 杜因的简单生命周期模型

制，投资和生产规模开始收缩，生产量迅速减少；直至基本上呈现为水平增长，市场占有狭小，小量生产，主要是补市场“基本饱和”后的剩余空间，这一阶段可能延续很长时间。从社会再生产全过程来看，正如罗斯托所说，老的部门可能会衰落，其他的可能会停滞，作为一个整体（像原料生产）另外的可能正在以大约平均的工业生产速度向前发展。然而，将有一个或更多的领先部门比平均速度发展得更快。从世界产业成长的历史进程来看，领先产业的次序是：棉纺、铁路和铁、钢、化学、



电和汽车工业，之后又有电子计算机工业。所有领先产业在完成了成熟阶段之后，都将先后呈现下降趋势，但并未陷入停滞，因为它们都是现代工业体系中的重要构成部分，有的甚至还未走出成熟阶段。因此产业的生命周期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

2. 制造业生命周期

现在，我们来对新中国产业发展的生命周期趋势作具体分析。先看作为工业化领先部门的重制造工业的增长特征。

本书第3章第3节按10年平均增长率研究了重制造工业与纺织业在近40年中的增长趋势。在总体上，两类产业于50年代都有相当强的扩张倾向，其中重制造工业由于具有明显的产业兴建特征，所以增长速度非常之高，而纺织业的生产基础比较好，其扩张率较重制造工业为低。在60年代两类产业的增长速度都放慢，70年代重制造工业增长率继续放慢（除钢铁和矿山设备外），而轻纺织业的6种主要产品中有两种继续放慢（纱、布）另4种增长加速。到了80年代，重制造工业的6种主要产品中除发电设备增长加速外，其余5种（钢铁、矿山设备、发电设备、金属切削机床、汽车和拖拉机）的增长率均下降，而纺织业6种商品中除化纤和丝的增长率下降外，其余4种增长加速。所以，在总趋势上，我国重制造工业与纺织工业的增长呈现为“摇摆式增长”（Rolling growth）的特征；当重制造工业急速扩张时，纺织业增长路线相对平缓一些。但是重制造工业



不能永恒不变的扩张下去，在它的成熟期已基本完成时，增长速度就会出现下降后的平缓伸展，与此同时，纺织业生产又再度加速。单就重制造工业而言，我们可以看到其增长路线不是直线上升，而呈现为一个含较长时间长度的“波”的型式，先是处于成长期，很快就转入成熟期，经过加速发展后开始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进入稳中有降的发展时期。由于新中国成立前 100 多年重制造工业一直是在低水平上的波浪式发展，没有形成具有较高完整性的机器生产体系，到 1949 年，现代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仅仅只有 10% 左右，机器制造业总产值占工业总产值只有 2.7%，所以新中国重制造工业是从其成长期开始的，只不过没有多久就从成长期进入成熟期。这个转折点在“一五”计划期间，以加速扩张为特征的制造业成熟期，大约持续了 35 年左右。从 80 年代中期开始，制造业份额的变化趋势是由升转降（表 7—3），虽然这并不意味着制造业绝对规模扩充中止，但很显然制造业的增长速度慢于非制造业的增长速度。

表 7—3 告诉我们，从 1952—1989 年，我国国民收入增长中工业贡献的增长最快，工业增长中重工业贡献的增长最快，在重工业中制造工业贡献的增长最快。1952 年，三种贡献的比重分别只有 19.5%、35.5% 和 41.9%，1989 年达到 47.6%、51.1% 和 48.6%。在长期趋势上，新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制造业的贡献率表现为上升，1952 年为 41.9%，1985 年达到 53.5%，13 年中共增加近 13 个百分点，年均递增 0.8923 个百分点。但是这一

表 7—3 制造业对工业、国民收入贡献的增长(%)^{*}

项 目	年 份	1952	1957	1978	1980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 $\frac{IN}{Y}$	19.5	28.3	49.4	48.9	45.1	45.5	45.8	46.1
(2) $\frac{HI}{IN}$		35.5	45.0	56.9	52.8	52.6	52.4	51.8	50.7	51.1
(3) $\frac{MI}{HI}$		41.9	47.4		50.9	53.5	52.9	48.5	50.1	48.6

* IN 为工业总产值, Y 为国民收入, HI 为重工业产值, MI 为制造业产值。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0)》,第 37、59 页;国家统计局工业交通物资统计司编:《中国工业经济统计资料(1987)》,中国统计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35 页。

加速过程并不是永无止境的,它有自己的转折点。在我国,制造业贡献率从升到降的转折点大约在 1985 年前后。之前表现为从低到高,之后表现从高至低。由于观察的时间还不够长,我们还很难找到制造业贡献率下降的时间位置,但从国际资料来看,工业发达国家的制造业份额(占 GDP)平均在 30% 左右,之后表现为稳中有降或波浪起伏。据此可以认为,由于非制造业尤其是服务产业的快速扩张,我国制造业份额还会从 1989 年进一步下降,最后转入一个相对稳定的份额变化轨道。这样,我们就可以将我国制造业发展的生命周期模型描述如图 7—5 所示。

图 7—5 中,“工业化转折点”表示从制造业扩展为中心的“前工业化”开始逐步转向以服务业扩展为中心的“后工业化”阶段转变;在此之前,工业增长以外延型扩张为主,在此之后,工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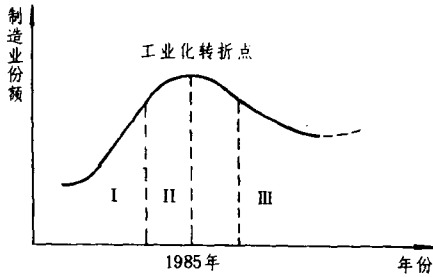


图 7-5 制造业生命周期

增长将以内涵型发展为主。因此，就其产业份额而言，制造业的扩张在 80 年代中期就开始放慢。由于 第三产业将以更快速度发展，制造业发展在份额上会进一步下降，最后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

3. 产业生命周期与长波

前面指出，从系统的角度看，所有各类产业不会在同一个时点上进入和完成生命周期，相反，它们会从不同的时点上出发，从不同的量级，从成长期进入成熟期，然后又从成熟期进入下降和停滞期，不同的产业必然有不同的生命周期长度，不同的产业生命周期必然都是各自自身的历史个体。一些产业处在成长期，另一些产业都可能处在成熟期为经济繁荣作出主导贡献，而还有一些产业却又可能恰恰转入下降或停滞阶段。这



些参差不齐的运动，构成经济结构的形态，并且会在经过大量抵销和积聚后促成经济的总量波动。另一方面，由于产品、产业的众多性，在某一个给定的时期内，有可能出现若干产品或产业同时进入或处在成长、成熟期的情形，这势必推动总量经济的繁荣；在另一个给定的时期内，亦有可能产生若干产品或产业同时转向衰老或停滞阶段，而这又会引致总量经济增长走向衰退。产业生命周期同时成熟或同时衰老的频数越大，对总量经济的“共振”影响亦会越大。因为产品生命周期涵盖一个较长的时期，所以它主要是对长波发生影响。但是，根据图7—3模型(b)以及图7—4的模型(a)和(b)，容易理解，产业生命周期在其不同阶段同样会对即期的短波和中波产生影响，下面就来验证我们的论点。

根据对59种主要工业产品产量1949—1989年历年数字的观察，我们发现，在产品的成长特征上有两类不同的产业。一类是以轻纺、加工食品和工业原材料为组成部分的产业，这一类产业在经过从成长期到成熟期的转变后一直处于趋势性上升发展阶段，除了个别总量衰退年份出现产量的绝对下降外，其余年份几乎是逐年递增的，还未出现趋势性衰退。其所以如此，是因为：(1) 人口逐年递增，使得市场上的基本消费需求规模逐年扩大从而推动生产扩大，产量绝对增加，这主要体现在化学纤维、纱、布、毛线、呢绒、丝等轻纺产品，日用精铝制品、灯泡和合成洗涤剂等家庭日用品(必需具备的)，以及原盐、糖、卷烟、罐头、啤酒等加工食品以及作为交通生活用具的自



行车；(2) 工业规模扩大，工业品市场上对原材料和交通运输的需求亦随之扩大，从而促使其产量逐年增长，这主要体现在原煤、原油、天然气、电力、生铁、钢、成品钢材、铝合金、水泥、平板玻璃、木材、硫酸、碱、乙烯、电石和塑料等工业原材料以及机器设备及铁路机车上。这些产品的产量总是随工业规模的扩大而增加。

另一类主要由家庭耐用品和某些生产资料构成，是工业制造品的典型形态。这些制造品尤其是家用电器产品的生产和销售由于受消费者的收入水平、偏好选择以及市场渗透速度等因素的影响，在其长期增长过程中，不仅会经历从成长期到成熟期的转变，而且一旦成熟期发展到产品市场需求趋向或接近饱和就会向生命周期的下降阶段转变。造成家用电器产品产量由升转降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我国城乡居民的消费偏好差异，一般来说，家用电器例如电冰箱、烤箱、洗衣机对于城市居民比对于乡村农民更为重要而又必需，加上城市居民没有购置房产的开支预算（至少迄今为止是这样），除了吃穿行的生活资料以外就是购买家用电器，而这一购买过程容易集中在一个不很长的时期内完成；与此同时，农民在收入水平提高后的主要任务是在改善吃穿的质量的同时建造房产，对家用电器尤其是电冰箱和洗衣机的消费倾向较低，加上收入和基础生活资源如电不充足，就会在大多数城市居民的购买需求实现后出现某种具有相对意义的“市场饱和”，导致进一步的购买力不足，结果产量也因此而缩减；最终产业成长的“由升转降”就成为事实。



表 7—4 中描述的 13 种产品存在比较明显的生命周期，其中，缝纫机、收音机和手表的生命周期以及农业生产资料如大型拖拉机和化学农药的生命周期的形态更为完整，其他家用电器虽然在 1988 年 1989 年达到生产高潮，并且显现出下降趋势，但下降的路线还很不确定。从这个表我们得到如下初步印象：

(1) 50 年代的经济繁荣在一定程度上与新产品出现或者新产品开始批量生产有关，表中所列 13 种产品中有 9 种是在 50 年代进入成长期的。处于成长期的产品生产必然要求扩大外延投入，加速投资增长，同时又会使总产量增长更快。

(2) 由于新产品在生产上的开发和扩散以及市场渗透要一个过程，加上供给形成还未产生增长惯性，所以相对地说，产品、产业的成长期对于总产量的贡献远不如成熟期显著，相反，成熟期由于市场渗透加快，供给形成的增长惯性产生，必然以强的程度推动总量繁荣。在表中，有 8 种产品（占 13 种产品中的 62%）在 60 年代末和 70 年代初脱离成长期进入成熟期，这可以对前面所提到的 70 年代的工业增长比 60 年代要快作出部分解释。

(3) 表中所列 13 种产品中有 12 种分别在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达到最高产量值，进入成熟期的最旺盛时期。毫无疑问，它们为 80 年代的经济繁荣作出了直接贡献。

(4) 从 80 年代末开始，不少产品的生产已进入生命周期的下降期，而用刺激消费需求的办法来推动生产，虽然可以在近期抑制下降的深度，但很难恢复到成熟期的最高产量值水平。这



表 7—4 13 种产品的生命周期*

项目	单位	成长期						成熟期						下降期					
		起 点		终 点		起 点		终 点		起 点		终 点		起 点		终 点			
		年份	产量	年份	产量	年份	产量	年份	产量	年份	产量	年份	产量	年份	产量	年份	产量		
缝纫机	万架	1952	6.6	1968	139.2	1969	192.2	1982	1286.0	1983	1087.2	1989	925.6						
表	万只	1957	0.04	1968	183.8	1969	298.6	1986	7332.0	1987	6159.4	1989	6788.9						
家用电冰箱	万台	1956	0.03	1972	0.76	1973	1.00	1988	757.6	1989	662.1	?	?						
家用洗衣机	万台	1978	0.04	1980	24.5	1981	128.1	1988	1046.8	1989	825.4	?	?						
收录音机	万台	1957	0.10	1978	4.7	1979	16.5	1988	2540.4	1989	2418.1	?	?						
收音机	万台	1949	0.4	1968	117.6	1969	257.0	1981	4057.21	1982	1723.9	1989	1623.1						
电视机	万台	1958	0.02	1969	0.10	1970	1.05	1989	2766.54	?	?	?	?						
照相机	万架	1957	0.01	1974	11.1	1975	18.49	1988	312.26	1989	245.18	?	?						
汽车	万辆	1955	0.01	1968	2.51	1969	5.31	1988	64.47	1989	57.37	?	?						
大型拖拉机	万台	1958	0.10	1969	1.34	1970	3.19	1979	12.56	1980	9.77	1989	4.33						
小型拖拉机	万台	1959	0.21	1969	1.94	1970	5.14	1988	133.57	1989	110.45	?	?						
化学农药	万吨	1950	0.10	1964	12.9	1965	19.3	1980	53.7	1981	48.4	1987	16.1						
金属切削机床	万台	1949	0.16	1968	4.64	1969	8.56	1977	19.87	1979	18.32	1989?	16.53						

* “?”表示不确定。

*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1)》,第 422—427 页。



就告诉我们，如果不寻求和开拓新的产品，兴建新的产业，经济的长期停滞或保持在低增长水平上不是没有可能。然而，在最近，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两种有利于增长的例子，一是城市私人房产市场的形成和开发，二是电子计算机产业的成长和发展。当然，在农村加快市场渗透，对于延长产品和产业的生命周期的意义也是极为重大的。

如果将这些印象与本文前面所刻画的中长期波动联系起来，似乎可以得出一个这样的判断：产业生命周期的阶段性转化可能引致中周期的形成，而一次完整的产业生命周期的（单个的或综合的）可能恰好反映一次长波。

§ 7.4 劳动力过剩经济的不稳定性

前面是从产业结构变动和产业成长阶段的角度出发来研究工业化与总量波动的关系，严格说来，那是以“物”的运动为分析基础的。现在我们换一个角度，从“人”的方面来进一步探究中国经济出现强波推进的原因。

我们接受20年前美国刘易斯教授提出的劳动力无限供给假设，用这个假设来刻画中国与其他大国经济不同的特征是不会引起人们的怀疑的，这一特征从新中国成立一直到现在不但未减弱反而有所强化。中国经济始终是一个典型的劳动力过剩经济。



劳动力过剩经济意味着资本和劳动之间存在一个缺口。弥补这一缺口有两个途径：一是加速资本形成，二是降低劳动力增长率，或者说，让资本增长率快于劳动力增长率。但是，在实际国民收入的人均水平很低，并且在短期内不可能出现超常规加速增长的情况下，国内储蓄（我国统计中的总积累）不可能增加很快，如果假定投资/消费比为既定，可供选择的途径就只能是运用钱纳利和斯特劳特提出的“两缺口模型”即： $I-S=M-X$ ，^①通过进口和出口之差（ $M-X$ ）或净资本输入（如向国外借款等）来满足超过真实国民收入的过度投资（ $I-S$ ）的要求，以填补劳动力和资本之间的缺口，实现真正的充分就业（包括用资本吸纳农业中的隐蔽型失业大军）。然而，对于一个生产能力和收入水平不高从而长期偿还能力不可能提高很快的大国经济来说，这一办法不能持久使用。一方面是担心掉入债务陷阱而难于自拔，另一方面是长期的进口大于出口势必削减国内市场的供给能力，加剧矛盾。所以对于一个发展中大国经济来说，靠 $M-X$ 来弥补国内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的缺口，是难以长久为继的。另一个办法是通过改变国民收入的投资/消费比，在公式

^① 这一模型的推导过程是：理论上假定总供给和总需求相等，总供给 Y 为总消费 C 和总储蓄 S 之和，即 $Y=C+S$ ；总需求 Y 为总消费 C 和总投资 I 之和再加上出口 X 减去进口 M 的余额，即 $Y=C+I+X-M$ ；将两个式子合并后得 $I-S=M-X$ 。其经济涵义是：过度投资（左边）要由净资本输入或净进口（右边）来满足，这样才能实现经济均衡。按我的理解，两缺口模式的右端 $M-X$ 不能单纯理解为进口贸易差，而应更为广泛地理解为净资本输入（资本输入大于资本输出）或净要素流入。因此，两缺口模式从过度投资推动工业化的目的出发，试图促使发达国家将资本输入发展中国家，用发达国家的资本过剩来解决不发达国家的资本不足问题。



$Y=C+S$ 中相对缩小消费 C 的份额而扩大储蓄或积累 S 的份额,即通过改变国民收入的分配来消除 $I-S$, 直接让 $S=I$ 。问题是,这种过度抑制消费的政策会带来前几章所论述的结构失衡和消费者抵制,以致造成波动。作为一个既代表生产者利益又代表消费者利益行事的政府,当发现用抑制消费来实现的过度投资造成了结构和效率方面的危机时,它会主动再调整分配政策,削减积累,增加消费,以避免危机扩大和造成更大的震荡。然而,正是在政府进行调整的时候,投资衰退和生产下降却已经发生了。而且,进一步看,政府的向下调整只能是暂时的,紧缩的过程不会拉得很长,因为紧缩时间越长,意味着工业投资增长愈益减速,积累或资本形成越为减少,这将会缓慢或中断工业化进程。而资本增长和工业化减速,又会使已经存在的过剩劳动力规模进一步累积、扩大(如图 7-6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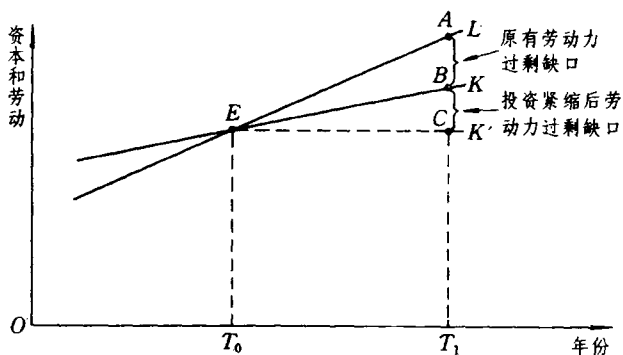


图 7-6 投资紧缩引致劳动力过剩累积



图 7—6 中, L 代表劳动力增长; K 代表不存在投资紧缩时资本的增长; K' 代表存在投资紧缩时资本的增长。

这个模型的经济涵义是: (1) 在不存在投资紧缩的情况下, 我国劳动力增长快于资本增长, 这主要是因为人口增长太快, 所以存在一部分未被资本吸纳的剩余劳动力, 并且劳动力剩余是累积式扩大; (2) 在存在投资紧缩的情况下, 资本增长水平不是 K 而是 K' , 因为资本增长减速, 致使劳动过剩缺口扩大, 例如在时间 T_1 上, 过剩缺口由 AB 扩大至 AC ; (3) 如果调整时间从 T_0 开始, 资本和劳动结合从均衡点 E 出发, 调整时间越长, L 和 K 以及 L 和 K' 的开口越大, 则劳动过剩程度越高, 累积倾向亦越强, 剩余规模则越大。

劳动过剩的累积规模愈益扩大, 会造成两个直接后果: (1) 迫使大批由于投资紧缩而排斥出来的劳动力重新回到农村, 回到土地上, 使土地上的劳动力更为“拥挤”, 由于农业内部的扩张可能性很小, 这些劳动力会直接转化成无人关注的隐蔽性失业大军, 以致于未来的工业化负担更重, 为今后必然发生的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 从乡村向城市迁移浪潮创造力量; (2) 在降低城市在职员工的劳动效率的同时增加国家的财政负担, 因为投资生产紧缩而又不允许企业破产和职工失业既会减少收入又会增加工资开支和企业亏损补贴。面对这两个后果, 政府不得不停止投资紧缩, 推动企业生产在原来的推架内再度转向全面回升。

这样, 在假定工业化的加速不依赖外部途径 (令 $M-X=$



0) 时, 劳动过剩经济的工业化和政府的调整 (向下和向上两种) 就会表现为一个前后连锁的不稳定过程, 见图 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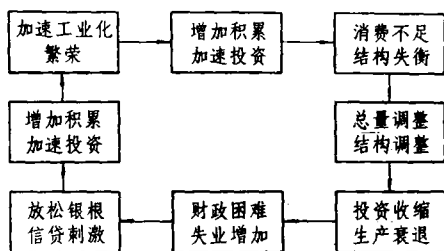


图 7—7 劳动过剩经济的调整过程

在这个前后连锁的过程中, 经济的繁荣和衰退表现为有规律地交替发生, 而整个过程又是以加速工业化为初始发动力的, 在劳动力过剩, 尤其是在农业劳动力过剩的条件下, 如果政府真正实行以效率为基础的充分就业, 就不得不把加速工业化作为发展政策的主题。另外, 如果不加速工业化, 就难以改变只能生产收入弹性较小的初级产品, 这对出口收益不利, 而要增加收入弹性较大的工业制造品的生产, 就只有始终不渝地实行加速工业化的政策。由于工业制造品收入弹性大, 国民收入增长的加速首先取决于工业成长的加速, 所以工业化就必然作为发展的主要目标。然而, 从“目的论”来看, 工业化并不是一个没有成本的赐予, 它不得不付出代价, 也许可以说, 不稳定增长原本就是工业化带来的有收益的代价。不过, 我们这里讲的不是企望和理想追求, 而仅仅是一个客观的趋势。



8

章

转向新增长阶段的周期政策

本书第1章指出，我国从实行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周期波动过程发生了重要变化。一方面，平均经济增长率提高，例如国民收入从1950—1978年的7.9%增加到1979—1990年的8.4%，每年多增0.5个百分点。另一方面，经济增长的波动系数下降，从0.1124下降到0.0329，强波减缓。这说明，在突破了管理上高度集中、体制上纯而又纯以及分配上人人平均的经济模式后，宏观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提高。虽然仍存在起伏波动，但周期形态正在逐步走向常规化，并且周期曲线表现为向高速增长轨道收敛。在体制变革的12年中，各项综合性宏观经济指标都是正增长，消除了古典型衰退。在农业、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和商业五大类产业中，其产值增长仅有建筑业出现过两年古典型衰退。建筑业古典型衰退在1981和1989年，商业在1989和1990年。由于同期不同产业的景气循环存在比较明显的升降交叉，它



们并未诱发总量经济的古典型衰退。另外，即使被称作“过热”增长年份的1984和1985年，其国民收入的增长率也比1950—1953、1956、1958、1964—1966、1969—1970以及1978年要低1—9个百分点，就是说改革时期的周期高峰值下降，“过度繁荣”的趋势得到了抑制。正是由于一方面抑制“过度衰退”一方面抑制“过度繁荣”，才开始了新的周期运动时代，正在从古典型周期向增长型周期的过渡和转变。

那么，为什么能实现这一转变？首先要指出的是，经济学家以及由他们阐述的经济政策理论在周期调节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似乎有理由将中国改革时期的经济学分成两个主流学派：一是平衡学派，它强调协调平衡增长，不赞同用膨胀性的财政货币政策来推动过度扩张，刺激膨胀性高速增长，更多的是强调用平衡和紧缩过度投资需求的办法实现适度增长，并以适度增长政策来为大幅度的机制改革创造一个相对宽松的经济环境。这一学派在政策选择上以主张“需求管理”为其基本特征。另一个是增长学派，它把高速度和增加供给作为理论导向的重点，虽然并不一般地称赞赤字财政和货币膨胀政策，但认为没有一定的适度的通货膨胀不但有可能造成潜在增长的损失，而且还会加剧失业（隐蔽失业率提高）。这一学派的宏观政策倾向是“供给管理”。在面对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的缺口时，“平衡学派”侧重于强调抑制过度需求，让需求曲线往左下移动以适应既定的供给水平，达到总供求均衡；而“增长学派”侧重于增加有效供给，让供给曲线往右下移动去适应既定的需求



水平，以实现向供求均衡的过渡。由于这两个学派的基本理论和政策主张不同，在对待周期波动的问题上，其调节对策也就不同：“平衡学派”偏重于批评“过度繁荣”，当经济出现膨胀和“过热”时，它会首先劝导政府改弦易辙，实行紧缩；“增长学派”偏重于批评“过度衰退”，当政府采纳“平衡学派”所主张的总量紧缩和协调均衡增长的主张导致生产滑坡、增长率下降时，“增长学派”会站出来呼吁政府放松紧缩，用“注水入泵”（增发货币、放松信贷）的办法促使经济回升。正是这种占支配地位的理论交替影响政府的政策行为，起到了在扩张阶段抑制“过度繁荣”、在下降阶段抑制“过度衰退”的作用，从而使经济周期出现了收敛，这是改革以前政府政策以“单一理论”为基础所不可能出现的。所以我认为，经济学派的繁荣带来了经济增长的稳定。理论只不过代表着一种可能意向，即使它直接影响政府政策，但成为现实的行动，都要经由一系列载体，要有来自体制、政策、发展背景和增长格局等一系列因素的变化和调整。我们在本章要努力做的就是集中发现这些变化及其原因，并在这基础上建立一种适合于周期调节的理论“综合”。不过，这一理论“综合”不是来自原则观念而是产生于对实践的概括。



§ 8.1 效率与政策：三个论点

1. 效率的反衰退功能

在长期宏观经济发展的意义上，体制效率的升降变化导致经济增长的起伏波动。对这一论点的进一步发挥，还可以得到一个这样的认识：如果体制效率在某个时期处于上升阶段，那么该时期增长的周期曲线的平均水平则会向上移动；如果体制效率在另一个时期处于停滞或下降阶段，那么该时期增长周期的趋势线会向下移动。在前一种情形下，平均增长率水平高，衰退的程度低；后一种情形则反过来。所以，体制效率提高具有反衰退的功能。

本书第1章已经指出，我国改革时期经济波动减缓，消除了以负增长为特征的绝对衰退。其所以如此，除了政策和机制的改进等原因外，一个重要原因是改革时期的体制效率提高。

表8—1对传统体制时期和改革时期的劳动生产率作了比较描述。容易看出，与传统体制时期相比，改革时期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其中，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从3.9%提高到5.35%，每年多增1.45个百分点；工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从3.89%提高到5.13%，每年多增1.24个百分点。除了速度加快以外，改革时期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在趋势上也比较稳定。改



表 8—1 两个时期劳动生产率增长率比较*

时 期	全社会劳动生产率			工业劳动生产率		
	$L_s(\%)$	L_d	L_f	$L_s(\%)$	L_d	L_f
A. 传统体制时期 1953—1978	3.90	0.27	47.60	3.89	0.42	64.50
B. 改革时期 1979—1989	5.35	0	8.80	5.13	0.09	17.40
B—A	1.45	-0.27	-38.80	1.24	-0.33	-47.10

* L_s = 社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率; L_d = 负增长年数 ÷ N 年; $L_f = N$ 年内劳动生产率增长率最高最低值之差。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1)》,第 65 页。

革时期全社会劳动生产率不存在负增长年份,工业劳动生产率也只有一个负增长年份,因此绝对衰退率只有 0.09,比传统体制时期的 0.42 低得多。所观察时期的全社会和国营工业的劳动生产率最高最低值之差,也分别从传统体制时期的 47.6 和 64.5 下降到 8.8 和 17.4。可见,改革期间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波动幅度明显降低。由于效率波动幅度缩小了,总产量的波动幅度也就随之缩小了。效率提高可以看成是一种无形的投资,如果投资波动是总量波动的解释变量,那么效率波动亦是总量波动的解释变量。容易理解,当效率波动收敛时,总产出的波动也会收敛。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得到第一个经验认识:要使经济增长转入长期稳定增长的轨道,就需要建立一个保证效率稳定提高的体制。



2. 双向微调

在完全分权的体制还没有建立以前，体制效率的提高常常是和政策的改进紧密联系在一起，因为在纵向协调的框架内改革体制首先是一个由政府操纵的政策行动，政策导向的转变引发体制的转变。比如，新的农业政策导致了农业生产经营体制的改造，价格政策调整促进价格机制转换，等等。因此，要解释改革时期经济周期运动的新变化，就应当对政策指导的改进有所认识。

如前所述，我国 80 年代的周期调节政策有两个值得注意的改进：

(1) 向下微调。当经济处于低谷后的上升阶段时，政府奉行的不是“大干快上”政策，不是任意让经济走上过度繁荣阶段，不是无限制地膨胀下去，而是微调，在经济增长开始出现膨胀、“过热”苗头时，尽早施加一些平抑高峰的措施。

(2) 向上微调。当经济走出高峰阶段后进入低谷时，政策奉行的不是用“动手术”的办法，不是下猛药，而是施加一种力量让经济增长率不要下落太深，以致于衰退受到一定的抑制。

这种双向微调，是政府采取的“先周期”（Precycle）行动，它们的反周期效应十分明显。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这种“先周期”行动可以产生直接效果，这是单纯市场经济所不能及的。不过，要使“先周期”行动达到预期效果，就必须使政府对形势



的判断不发生错误，同时还要有一个可以减少同向波动的微观基础。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下一节展开讨论。现在我们特别要强调的是“向下微调”的重要性。

由于下述特点，中国经济增长要实现高速增长是比较容易的：

(1) 国有企业因其预算约束比较软，容易产生如匈牙利经济学家所称的企业“投资饥渴”和“扩张冲动”；

(2) 各级地方政府因其地方主义和本位利益的刺激，在计划资源的争夺中，容易产生“示范效应”和“攀比行为”，互相之间推动产值速度竞赛；

(3) 和国有企业、地方政府的行为一样，各部门（包括中央各部委）都认为自己部门的发展更为重要，都要求自己的扩张快于别人的扩张；

(4) 刚性的和普遍的就业制度，迫使政府用增加积累加速投资的办法来创造最大限度的就业机会总量，过度就业必然推动过度投资；

(5) 农业劳动效率提高、农村人口过度增长从而农村劳动力资源过度增长，以及快速脱农化创造出愈益增多的农业剩余劳动力，都要求用加速工业投资，用扩大的工业投资规模来吸纳扩大的农业劳动力剩余的规模；等等。

这些特点决定了中国经济增长内含着一股高速扩张的压力，政府政策有放松，扩张的压力很容易被释放出来，经济繁荣很容易产生。正是基于这一考虑，我国有经济学学家特别劝



导政府不要过份采取人为扩张的行动。因为经济系统内含的扩张压力很大,政府的扩张政策导向容易产生“放大效应”,所以最好是采取“有剩余的扩张政策”来推动经济从低潮转向高潮。所谓“有剩余扩张政策”就是指,如果政府企望经济增长率达到10%,但实际政策指导和操作却只是以8%的增长率为依据,剩余的2%由系统内在的扩张惯性去实现。结果,增长率政策从8%出发却可以实现为10%。而如果政策指导一开始就以10%为依据,那么实际增长率就有可能达到12%,因为由系统内在的扩张惯性带来的2%还是会发生。我国改革以前走的是第二条路,而改革时期基本上走的是第一条路。1984—1985年和1988年虽然出现了相对于前后年份来说表现为“过热”的情形,但过度扩张离系统的最高容忍限度还有一段距离。

因此“向下微调”对于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具有尤为重要的意义,它实际上是用抑制经济中的“大起”来避免“大落”。这是我们提出的第二个经验性认识。

3. 开放政策的稳定作用

前面曾指出过,对于一个大国经济来说,“两缺口模型”具有一定局限性。但是现在进一步作如下补充:如果一个大国经济多年来走的是一条使“独立自主,自立更生”极端化的道路,那么一旦改变路线,用有限外资扩充和进口扩大的办法来缓解国内储蓄不足和高技术供给短缺,也会起到一定程度的调节国



内经济周期的作用。因为靠用抑制消费需求和增发货币的办法来弥补 $I-S$ 之差，或者会加剧结构失衡，或者会加剧总量失衡（通货膨胀），而用 $M-X$ 之差来弥补， $I-S$ 之差则可以至少是在短期内避免前面两个失衡的加剧。顺便要指出的是， $M-X$ 是用“牺牲未来支持当前”，似乎不可取，但是用“借入”（外资和净进口）来扩充当前的能力所创造出的收益会大于用未来还债表示的成本，即动态的收益大于动态的成本。如果“借入”所付的利息率低于国际通货膨胀率的平均水平，动态收益会更为明显。所以这里的“时间差”成为一种无形的净资本投入。

在具体操作上，要用开放政策来调节国内经济周期的运动，有一个用开放对周期阶段实行“对应调节”的技巧问题。一般来说，在周期高潮阶段，因为 $I-S$ 会趋向于更大，投资加速快于储蓄加速，所以 $M-X$ 应当大一些；在周期的低潮阶段，由于 $I-S$ 趋向于缩小，投资加速可能等于、低于储蓄的加速， $M-X$ 就应当小一些。但是，这种“对应调节”的前提是开放，而不是封闭。在一个封闭的系统中，周期波动更容易自我强化、累积，它得不到借用外部系统来稀释内部波动的机会。当然，开放也会带来国际波动的传递问题。要找到稀释和传递的平衡关系，需要根据大量经济观察来作出模型解释，然而，这是本书所不能及的，我们目前的任务是对开放和波动的关系作出一般的论证和考察。

改革以前，我们实行的基本上自我循环（对“独立自主更生”的极端化）的贸易政策，1952—1977 年期间，我国进



出口、出口、进口的依存度分别平均只有 3.2%、4.2%、4.1% 的水平。改革以来经济的开放程度大大提高,这三种依存度在近 12 年中每年平均分别上为 18.98%、8.85% 和 10.14%。很明显,与改革以前相比,改革时期由进出口贸易测度的开放程度提高幅度相当大。除此之外,自 1979 年以来,我国外资引进也以很快的速度增长。这样,在国内储蓄、积累和消费比率为一定的前提下,用 $M-X$ 之差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 $I-S$ 之差。这也就是我国改革时期为什么能在相对稳定的条件下实现高速增长的原因之一。据此我们提出第三个经济性认识:一个较为开放的经济可能实现较为平缓的周期波动。

§ 8.2 后工业化阶段的周期运动

1. 从“工业化”到“后工业化”

我们现在从发展背景变化的角度来研究改革时期周期运动的新特征。为了便于叙述,我们先界定概念。

到目前为止,我国经济学界一直把“脱农化”或“非农业化”(Non-agriculturalization)笼统地称之为“工业化”。如果说在 10 几年以前这个笼统提法还不会有什么问题的话,那么现在仍旧沿用这一提法就不确切了。因为中国的“非农业化”过程已经出现了阶段性变化:以制造工业的加速扩展为主题的“工



业化”开始向以服务业快速成长为主题的“后工业化”转变。

我们观察五大类产业的产出和收入构成在 1952—1989 年期间的变动。工业总产值所占份额，1977 年达到最高份额，为 62.05%，之前呈上升趋势，之后呈下降趋势，这个下降趋势一直持续到 1987 年，1988 和 1989 年又转入回升，分别达到 61.14% 和 63.63%，从总体上看工业总产值份额下降将成为一种趋势性特征，1988 和 1989 年回升只是一个短暂现象。因为从工业的国民收入份额来看，它的最高值在 1978 年，为 49.4%，之后存在趋势性下降，下降趋势在 1989 年有所减缓（为 47.4），但 1990 年再度降到 45.8%，低于 1978 年。再从按三次产业口径进行统计的 GNP 的构成来看，第二次产业份额在 1978 年达到 48.6% 以后一直呈下降趋势，1990 年为 44.27%，比 1978 年低 4.33 个百分点。由于我国第二次产业的劳动系数比较高，大量就业机会目前仍主要是由工业来创造，致使第二次产业的就业份额一直到 1988 年都是上升的，但是 1989 年和 1990 年出现连续下降。中国大约是在 1978 年开始非农产业化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转变，开始从“工业化”向“后工业化”阶段转变。

在这一转变中，农业份额继续下降，工业份额也开始下降，取而代之的是服务业份额上升，而且它的上升快于农业和工业任何一个的份额的下降速度。从国民生产总值三次产业构成看，在 1979—1990 年的 12 年（1978 年为基年）中，我国第一产业份额基本未变，1978 年为 28.4%，1990 年为 28.5%；但第二次产业份额从 48.6% 下降到 1990 年的 44.3%，而第三产业份额从



23%上升到27%。经济增长进入第三次产业加速扩张阶段。

在西方产业结构经济学中,经济学家将第一次产业份额下降,第二次产业上升后趋于稳中有降和第三次产业一直上升的趋势叫做“配第——克拉克趋势”。我们根据库兹涅茨提供的25个国家1801—1965年间就业的三次产业结构变动的资料,和世界银行提供的90个国家(从121个国家中选出动态资料完整的那些国家)1965—1988年间GDP的三次产业结构变动的资料,验证了上述“产业结构趋势”的理论。但对于我国来说,实际的过程与这一趋势理论以及国际产业结构变动的总趋势有某些差异。这个差异主要在于第三次产业份额不是“一直上升”。按照国家统计局提供的资料,1978年GDP中三次产业的份额分别为28.4%、48.6%和23%,1989年分别为26.8%、46.7%和26.5%。可以看出,第一次产业份额“一直下降”,而且第二次产业份额也是“上升后稳中有降”,但第三次产业1978年以前反而是“下降”。这是因为该时期政府对第三次产业的成长和发展采取了人为的抑制,那个时期在第三次产业的发展政策上没有遵循国际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转换的共有规律。由于国家统计局没有提供1978年以前按三次产业分类的各产业产值比例变化的连续数据,这给我们的比较观察带来了困难。但是我们可以从就业的三次产业结构变动来弥补这个资料困难。从就业结构变动来看,1952—1976年,第一次产业份额“一直下降”,第二次产业份额“一直上升”,但第三次产业则基本上是不变的,1952年为9.1%,1976年只不过是9.7%。50年代第三次产业就业份额



曾出现急剧上升,但仅仅持续了4年,以后一直在1952年的水平上轻微波动。与此不同,1977—1990年期间,第三次产业份额才在一个相当低的水平上开始“一直上升”;1977年为11%,1990年达18.6%。

从历史统计的观察和比较中,我们获得一个印象:新中国工业就业的成长和发展,既有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贡献,又有来自对服务业就业份额扩大趋势的抑制,这与国际上先行工业化国家所走过的路不同。中国工业化走的是一条特殊的道路。然而,如果我们不是作价值判断,而仅仅考虑其客观结果,那么可以说,正是由于对第三次产业的抑制,新中国才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基本完成了“工业化”的任务。在此之后又不得不补发展第三次产业的课,回到国际产业成长及其结构变动的一般轨道上来,开始“后工业化”的发展进程。同样,中国的“后工业化”起步很晚,今后同样有可能走上加速扩张的征途。

2. “后工业化”与稳定增长

非农产业化发展过程从“工业化”转向“后工业化”,对经济增长周期的直接效应是使产生于过度投资的强震荡减小。这是由“后工业化”阶段服务业的增长特征决定的。

(1) 从要素的投入来看,服务业不同于制造业的基本特征是,它的劳动投入系数较大,资本投入系数较小。尤其是在我国目前服务业的技术构成还很低,许多行业的劳动替代资本非



常突出的情况下，服务产业规模的扩大很大程度上是靠增加粗放劳动的投入。因此，相对说来，服务业是一个劳动密集型产业。例如商业、饮食业、美发业、小修理业、金融保险业、律师行业、教育业以及各级党政文工的行政事业等，其产值和收入的增长主要来源于劳动贡献，来源于劳动要素。它与制造业增长主要依赖于资本要素投入形成鲜明的区别，而这一区别会使得制造业和服务业对经济波动产生不同的影响。

一般来说，在所有生产要素都处于充分流动状态的经济中，要素构成的差异通常不会直接造成不同产业的波动形态的差异，因为在宏观经济出现景气循环的情况下，无论是资本要素还是劳动力要素都会随之发生变动。在高潮期，投资率上升，就业率也上升（或失业率下降）；在低潮期，投资率下降，就业率也下降。两个要素发生同向变动，具有不同要素组合的不同产业都会产生同样的景气变动后果。但是，在我国，两种生产要素的调整的灵活性存在相当大的差异，相比之下，资本要素存在一定的调整灵活性，至少在紧缩时期资本投资可以削减，而劳动要素几乎完全缺乏调整灵活性，在扩张期它和资本要素一起扩张，在收缩期资本可以向下调整而劳动就业却是刚性的。正是这种“短边紧缩”给制造业和服务业造成了不同的周期运动：在紧缩时，制造业资本要素大幅度下调，伴随而来的是产值和收入的下降，因为当存在“资本空位”时“在业”的劳动力实际上是不生产的，表现为在职失业；但是服务业因其资本要素份额较小，下调的资本可以忽略不计，这时原来形态的资本和



劳动力结合结构没有破坏,生产照样进行。结果,紧缩时期服务业仍保持良好的增长势头。从总体上看,服务业份额越大,它对由投资减缩而引起的经济衰退的抑制力则会越大。假定第一、二、三次产业的份额分别为 0.4、0.4 和 0.2,第一次产业增长率保持不变的情况,第二次产业为负增长率 2%,而第三次产业为正增长率 4%,那么加总后的总量就可以维持在原来的水平上,不会产生衰退。其他情况可以类推。

(2) 从更新需求来看,制造业的更新需求大,服务业的更新需求小。这是由前一个特征决定的。不难理解,产业的固定资本或不变资本规模越大,或如马克思所说的资本有机构成越高,则更新投资占总投资的份额则越大。根据加速原理,更新投资份额越大,增长过程中的投资加速效应会越大,而较大的投资加速效应必然引致较大的投资波动。服务业因其劳动投入份额较大,资本有机构成低,由更新而形成的投资需求就低,由加速效应而创造的投资波动就会小一些。

(3) 从派生需求来看,我们在本书第 7 章第 2 节已经指出,制造业的派生需求很大,与其它产业的前后连锁程度很高,当其它产业中某一产业发生较小的升降波动时,会在制造业这里派生出较大的波动同时引致总量经济产生更大的波动;反过来,制造业有一个微小波动也会连锁外围产业较大波动,总量经济更大的波动。与此不同,服务业与其他产业连锁的范围比制造业所连锁的范围要小一些,它创造的派生需求也会小一些,服务业的起伏波动对其它产业的波动效应小一些。



(4) 在我国,服务业与制造业相比,更倾向于选择非国有制或个体所有制模式,而现实中非国有制尤其是个体所有制比国有制具有更大的要素流动性和组织灵活性,从而更倾向于即期调整,经济波动的累积倾向亦低一些,因此产业内部的同时同向波动的程度也会较低。

总之,服务业比制造业在增长过程中的稳定性要高一些。在产业结构中,如果服务业份额比较大,国民经济增长就更容易出现稳定。从我国第三次产业的就业份额看,1952—1978年均为10.39%,1979—1989年年均为16.8%,改革时期第三次产业的就业份额比改革以前的集中计划经济时期每年高出6.41个百分点。毫无疑问第三次产业的快速成长同样是改革时期经济增长逐渐走向稳定的解释因素之一。根据先行工业化国家发展的经验,第三次产业的份额大体要达到55%左右才会逐步稳定下来。我国目前第三次产业份额还只有25%左右,我们还处在“后工业化”的开始阶段,今后第三次产业份额将会出现持续上升和加速发展,这会对“持续稳定增长”作出直接的贡献。

顺便要指出的是,西方市场经济在1929—1933年那次令人记忆犹新的大危机以后,虽然也出现过一些衰退,但危机的深度和长度都缩短了,繁荣(中低速繁荣)期延长,波动幅度也有所下降,这里面也有制造业份额稳中有降、服务业份额一直上升的原因。西方市场经济虽然不存在前面所讲的“短边紧缩”和国有制约束的情形,但是服务业比制造业具有更低的更新需求和派生需求则是一个普遍现象。



3. 向服务业适度倾斜

我们说我国今后第三次产业份额将会出现持续上升和加速发展，这只不过是揭示一种趋势，是根据经验观察和国际比较作出的一个预测。趋势和预测能否变成现实，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因为集中计划经济的运行常常表现为某种主观意志的推动，它可以顺应趋势，按一般规律行事；同时又可能完全不顾一般规律。改革以前的 20 多年，我们采取重工业优先增长政策，不但在投资和消费的选择上用消费不足来支持过度投资，而且用抑制第三次产业的成长来实现第二次产业的加速扩张，这是一个典型的“大推进”式不平衡增长模式。毫无疑问，这一模式的重大贡献在于缩短了我国“工业化”的进程，但我们也付出了十分昂贵的代价。从今后的产业发展来看，我们应当取代这种过度倾斜的政策，迅速实现向服务业适度倾斜的政策导向转变。这是由于：

(1) 向服务业适度倾斜符合从“工业化”向“后工业化”转变的一般趋势和规律。在重工业尤其是制造工业的产业体系一经建立，不仅可以腾出较多的资本投资用于服务业开发和兴建，从而为加速扩展服务业提供了资本供给可能性；而且制造业体系基本建立后，它需要有相应的派生产业来扩大其联带生产；同时制造业本身也有从广度转向深度、从外延转向内涵、从数量型转向效益型的任务。而在制造业进行自我调整的时期，实际



上可以为服务业的加速扩展留有相应的余地。

(2) 我国人口、劳动力规模在近 20、30 年内将按累进的方式扩大，迫切需要有就业机会的快速增长。考虑到服务业的劳动投入系数比较大，单位资本创造出来的就业机会较制造业为大，在国内储蓄（总积累）和资本输入又不可能增长太快的情况下，有必要采取向服务业倾斜的中长期政策，以缓解隐蔽性失业的压力，提高全社会（包括农村）的总就业水平。

(3) 采取向服务业倾斜的政策，也是基于对近 10 多年来居民收入水平急速上台阶、消费结构快速转换、家庭耐用消费品增加、消费者的饮食行为发生变化以及农村服务市场存在愈来愈大的潜在需求的考虑。面对所有这些变化，如果不采取向服务业倾斜的政策导向，我们就有可能丧失一些增长机会。

根据我们的分析，向服务业倾斜，不仅可以加速经济增长，提高供给水平，而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国民经济运行系统的平衡性能和稳定性能。相对于第二次产业而言，我国第三次产业的发展现在是相当滞后的，它属于“短线”产业，所以，向服务业倾斜实际是符合产业平衡协调增长的要求的。

§ 8.3 稳定增长政策的体制基础

实现从强周期波动到常规波动的过渡，避免由过度繁荣和过度衰退构成的大起大落，不仅需要调整经济发展战略，在增长



率选择、工业化导向、积累和消费比的确定以及贸易策略等方面,政府政策应当从主观愿望出发转向从实际可能出发,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消除造成强波运动的体制缺陷,通过体制革新来为国民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准备一个牢固的基础。

改革以前,我国经济增长过程经常出现非常规波动,产生比其它发展中国家更强的大起大落现象,一个重要的经验教训是:在机制构造和组织上脱离实际,违背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用行业、部门和地方政府的行政指令排斥市场调节,过分夸大实际上受长官意志支配的指令性计划对经济发展的决定作用,过分追求收入结构的均等化,将非常时期实行的自上而下的纵向配给制常态化等。实践证明,传统的政治化经济管理体制内生着一种很强的非均衡倾向,因为它取消了在市场机制条件下经常发生的即时调节和随机波动,日常的变化和波动累积起来,而且由于行政化计划指令是同时发布、同时贯彻,企业在投资和生产方面以及消费者在收入消费方面的行为往往是同步的,微观主体行为的同时、同步性必然导致宏观经济的强烈震荡。加上国有企业比其它小公有企业和私人企业的预算约束程度低,在投资上缺乏自我约束,以及各级党政领导盲目的投资热和扩张冲动,就使得全社会滋生着极为强劲的投资膨胀压力并推动总量经济扩张。等到政府发现经济总量和结构已失衡进而实行全面的紧缩政策时,经济过程中的普遍短缺已经发生,紧张已达到极限,加上政府的有计划紧缩通常是全社会范围内的全面紧缩并且是在缺乏及时的存量调整下的单纯增量调整,或者即使有存量调整



也是在同一个人时候按照同一个方式一齐实行关、停、并、转，结果“过度繁荣后的过度衰退”就成了不可避免的事实。因此，集中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强波增长，是与“机制缺陷”紧密相关的。

改革以来，经济机制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其表现是：

(1) 微观经济运行中开始逐渐出现随机价格调整。虽然迄今为止的相对价格结构的形成还主要是由国家计划推动，价格的上调和下跌依然接受政府物价部门的直接控制，但是无论是集市贸易价还是国营商业价都存在一定程度的随机波动和瞬时调整，价格的扭曲不是在长期冻结的状态下不断累积起来，而是在政府协调下大体按供求趋势的变动而部分地被稀释和消化。由于价格的随机波动和瞬时调整开始出现，这就减缓了价格变化过程中的累积压力。

(2) 收入结构开始转向多层次化。这就相对扩大了买者在市场购买上的选择空间，收入的分流使买者不是象以前一样同时急购同一个稀缺商品而是在不同消费偏好指导下购买与不同收入预算线相应的不同消费品，从而使市场波动分散化。

(3) 虽然还没有建立充分自由的要素流动机制，纵向分配流程还未根本改变，就业的刚性制度几乎还未能作出什么改动，但商品交易的市场份额已经达到了 50% 左右，当配额紧张时，买者可以从市场上寻找他所需要的东西，尽管这些东西比配额品价格要高一些，但可以解决急时需要。这一交易行为的变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止由过份开工不足而造成的衰退。

(4) 由于经营权分散化以及规模还不大的小公有制经济和



个体经济的较快发展,^①使微观经济的目标取向和行为多样化。当政府采取总量紧缩政策时,国有企业尤其是那些未进行经营权改革的国有企业,往往会随紧缩政策的实施而出现急速收缩;与之不同,个体或私有制经济有可能在紧缩时期继续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或者即使减速,其进度和幅度都不如国有企业那么明显,而在整个个体或私有经济领域中会出现有的企业生产上升而有的企业不得不破产的交叉变动的情况,从而不易出现象国有企业那样的同步收缩。在经济回升时,非国有企业特别是乡镇企业、合资企业和个体企业因其对市场反映灵敏,信息反馈快,经营调整过程容易完成,所以常常比国有企业回升要早一些、快一些,这无疑对抑制总量衰退有重要意义。

上述这些机制性变化,是改革时期宏观经济周期形态发生转变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是近 10 多年来,中国经济机制的变化,还主要是在“外壳”层次,并未真正深入到“内核”层次。所谓“外壳”变化是指处于国营经济外围的集体经济、三资企业经济和个体企业经济在其形成和扩展过程中主要接受市场调节,其要素(包括资本和劳动力)流动是经常性的,投入组合是经常变动的,其周期行为趋向于规范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厂商的周期行为。但是处于“内核”

^① 从工业总产值中非“全民”和非“集体”工业所占份额来看,1965—1979 年为零值,1980 年为 0.6%,1985 年为 2.1%,1989 年为 8.25%,所以近 10 年来表现为逐渐增长。从社会零售商业、饮食业、服务业的就业份额看,1978 年既非“全民”又非“集体”的就业份额只有 4.3%,1989 年达到 51.1%。



层次的国有制经济的周期行为还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其扩张和收缩主要不是取决于横向协调的市场参数,而是依赖于纵向的行政协调。上面要求增加投资、扩大生产,国有企业就不得不这样做;上面要求收缩,国有企业就会随之紧缩。因此,国有企业的周期行为依然是和计划者及宏观决策者的周期行为混然一体的,没有转向“微观化”。其关键问题所在主要有二:

(1) 国有经济领域的存在没有成本约束的过度扩张倾向。改革以来,国有企业大多实行了承包经营责任制,这一新的经营形式比原来“国有”和“国营”合二为一的形式的优越之处在于,它可以通过与国家分享利益(实际上是分享利润)给承包人一个刺激,提高经营效率和劳动效率,但后来人们发现承包的效率曲线并不是直线上升而是在承包前期上升后期转向下降,形成一个“效率生命周期”。其实,承包不仅未能最终解决效率问题,更为重要的是没有解决平衡问题,它在一定程度上反而强化了企业投资需求的膨胀和工资收入的膨胀倾向。前几年,我国学者喜欢用科尔内的“预算约束软化”假设来论证传统的国有制模式的不合理性及其改革的必要性。其实,传统的国有制企业在投资和工资行为上都受到限制,企业投资和工资规模都是由行政机构先行决定了的,讨价还价的余地比较小。在现行的承包下,无论是承包基数的确定还是投资和工资水平的决定,可谈判余地反而扩大了,加上承包通常是“负盈不负亏”,从而承包企业不是按严格意义上的成本—收益分析行事,缺乏硬性的成本约束,所以承包企业更容易产生“投资饥渴”和“扩张冲动”,结果更有可能导



致过度投资需求的形成。根据承包收益预期, 承包人将选择那些最容易赢利的处于景气上升阶段的企业, 而对那些生产可能不景气的企业则不愿意承包。这样一来, 承包的起点也就是企业开始扩张的起点。在总量紧缩阶段, 尽管承包企业不得被迫降低开工率, 但为了对工人负责, 他会想尽一切办法维持甚至提高工资。所以, 承包具有抑制衰退的功能, 同时也具有更强的推动扩张、膨胀的功能。这就是为什么改革时扩张容易紧缩难(不能到位)的缘故。

(2) 刚性就业制度造成需求膨胀再生。我们在前面多次指出, “短边紧缩”不但存在于改革以前而且存在于改革过程之中。这种“短边紧缩”也有双重效应: 一是阻止企业生产长时期开工不足, 给政府推行的投资和生产紧缩政策一种逆反力量。二是迫使政府提前采取促使生产回升的政策。因为在企业不能破产、职工不能失业的情况下, 政府如果想坚持紧缩, 就必须增加企业亏损补贴, 让那些开工不足的企业照样发工资。^① 政府用补贴来维持病态企业运转, 既无助于即期的总量紧缩以改变总量不平衡状况, 又为结构调整制造了障碍, 同时也会引起效率下降, 最后结果是新一轮再度扩张和膨胀打下基础。

可见, 在微观经济领域中, 改革时期一方面在机制的“外

^① 1989年, 国家财政提供给亏损企业的补贴达599.76亿元, 增长率为34.34%, 比补贴规模本来就很大的1988年的亏损补贴增长率(18.6%)高出15.74个百分点。1989年国家财政收入的总规模只有2919.2亿元, 对企业的亏损补贴为这个总规模的20.6%。在这样一个格局下, 财政赤字必然产生, 财政负担将不堪忍受。因此, 即使是从事财政角度考虑, 加快资产存量机制改革也是刻不容缓的。



壳”层逐渐创造出可以实现即期调整的自动均衡条件，另一方面是在机制的“内核”层次上强化了膨胀的趋势，因此微观不平衡的体制根源还存在，造成强周期波动的微观基础还存在。如果我们将强波的主因集中概括为“政策不当”和“机制缺陷”两方面，即使我们解决了“政策不当”的问题也难以使国民经济真正从强波动转向常规波动，难以实现长期稳定增长，因为政策是一个短期问题，而机制却是一个长期问题。如果我们要达到长期稳定增长（实际上是包含常规波动的增长）的目标，避免大起大落，防止出现强周期波动，唯一的途径就是通过深化改革来建造一个保证长期稳定增长的新机制。由于本文的任务主要不在于提出改革建议而在于就强波经济提供一个基于实证研究的分析体系，所以有关“怎样改革”的问题我们就不讨论了。



附录

中国的工业化与长波

为补正文之不足，本附录拟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与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通过调查中国工业化发展的历史特征来帮助理解中国经济周期运动的背景。

I. 引言

我国经济史学家几乎一致地把 1840 年鸦片战争确定为中国“近代史”的发端，它实际上也是中国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开始的起点。在此之前，虽然也有与种植和畜牧业为主的“农业”不同的“工业”，发展了以纺织为主要内容的家庭手工业，但是其一，“工业”与“农业”还没有发生分离，“工业”始终是农业的副产品，而且在家庭内实行耕织结合；其二，纺织品主要是为了自给，为了家庭成员自己做衣服穿，自用后拿去出



卖的剩余品数量很小，从而未形成商业性工业。所以，那时的“工业”只不过是一种“史前工业”。或者属于“原始工业化”范畴。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由于外国工业资本的输入，上述单纯“耕织结合”的产业垄断格局开始慢慢突破，逐渐发生以下变化：

- “工业”和“农业”分离；
- 消费和生产分离；
- 在家庭化手工制造之旁逐渐形成工厂化大工业；
- 自给性工业之旁逐渐形成商业性工业；等等。

这些变化意味着原始工业化开始向资本主义工业化过渡。而通常所说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在我国实际上只经历了大约110年时间，从1840—1949年。^①之后进行的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到1990年为止，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包括以服务产业发展为中心的“后工业化”）过程并未完成。现在，我们还不能算是一个发达的工业国家，而是一个工业化中的国家。

中国工业化进程，并不是一个持续均匀递进的上升过程，不是直线运动，而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变化。除1840年前的“原始工业化”阶段以外，最近150年（1840—1990年）的工业化发展大体上可分出三个阶段：

^① 将1840年作为我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起点，是从我国总体上来看的。实际上，在1840年开始的头三四十年中，在中国大陆上兴起的“新式工业”主要由外国资本控制着，只是从19世纪70年代下半期开始才正式出现华人自己在煤炭、钢铁和纺织等领域创办的厂矿。



第一阶段是1840—1949年。在这一阶段，工业成长虽然出现过快速扩张时期，但从长期趋势上看，由于战争的破坏和外资利润的“回流”，并未导致整个国民经济活动中的产业突变和持续高速增长，工厂化大工业并未从根本上取代家庭化半农半工的经济结构，形成明显的二元工业经济结构。这里所讲的“二元工业经济结构”与刘易斯提出、后来由拉尼斯和费景汉加以发挥的“二元经济”模式不同，它不是指“传统农业”和“现代工业”并存的经济结构，而是指依附于农业的家庭化手工制造业和直接受商业调节的工厂化大工业并存的经济结构，这一结构在中国1840—1949年获得了典型存在形式。

第二阶段是1950—1985年。这也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的特征是，工业成长加速，存在明显的产业突变，工业成为主导产业群，以制造业、重工业和整个生产资料生产行业急剧扩张为核心的现代工业体系基本形成，期间虽有明显的短期衰退，工业化进程出现短期中断，但扩张和高潮是主流。典型特征是农业份额较快下降，工业份额尤其是重工业份额较快上升。这一阶段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经由行政式农业集体化，农村中工业和农业出现鲜明的分离，不过工业的独立发展不是接受商业调节而是接受实际上受制于行政约束的计划调节，因此工业化过程不是由市场而是由行政推动。

第三阶段从1985年开始，大约要到2030年结束。由于制造业的突进式增长，以生产资料生产为主体的重工业体系的建立都在上一阶段已基本完成，工业化将在继续量的变化的同时



进入质的变化阶段。主要内容是在加速消费资料生产的基础上服务产业的扩张加快，因此伴随农业份额下降的是服务业份额更快上升，制造业的绝对量仍会以较高速率持续增长但相对份额将呈现渐略下降的趋势。这一阶段又可叫做“后工业化”阶段。

中国工业化过程的发端很晚，它是在欧美先行工业化国家已进入如刘易斯和库兹涅茨所称的“持续增长”或“现代增长”阶段，这些国家正在兴建和组织现代工业体系的时候才开始的，晚了大约两个世纪。而且，即使是在19世纪中期，也并不意味着中国从原始工业化转变的过程已经完成，事实上，我们在后面将论及的“新式工业”只不过是依附于农业的家庭手工制造业“之旁”得以发展，甚至后者严重的制约着前者的扩张。中国的原始工业化几乎延续到本世纪50年代初期。一般来说，后行工业化国家可以通过跳越方式获取“后发效益”，缩短其工业化进程。然而，在1840—1950年期间，我们并未充分发挥这种“后发效益”。虽然上述第二阶段凭藉政府的力量在比较短的时间里实现了产业突变，发挥了“后发效益”，但由于人口、劳动力过剩和效率下降，又使得工业化的深化步履艰难。

II. 原始工业化

德国哥廷根麦克斯—普兰克历史研究所的三位学者，皮特·克里德特、汉斯·梅狄克和朱根·施卢姆那姆在他们合著的《工



业化前的工业化》(Industrialization before Industrialization)一书中,系统研究了欧洲的“原始工业化”(Proto-Industrialization)过程。在他们看来,原始工业化是资本主义工业化之前的一个准备,或如理查德·迪里等学者所说,它是“工厂体制之前的工业化”。在原始工业化中,存在一种“小屋工业”(Cottage Industry,或译作村舍工业),其特征是劳动、消费和人口的再生产统为一体;生产活动的目的不是为了利润最大化,不是为了交换价值,而是为了自身消费,追求使用价值;劳动和收入、工业收入和农业收入不必分开;生产和消费统一于家庭单位内部;生产过程简单,发展缓慢;经济活动的波动起源于由气候引起的农业丰歉状况和政治原因,而不是根源于资本运动。因此,在原始工业化阶段,社会经济的主体是家庭经济,工业活动托依于分散独立的农业和家庭,还没有发展到商业化、工厂化。问题是,欧洲国家特别是英法等国,在经过以“羊吃人”为特征的原始积累以后,原始工业化阶段便随之结束。如果说欧洲经济在简单协作和工场手工业阶段还有或多或少的原始工业化痕迹的话,那么到了机器大工业阶段,特别是自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初以来,这种痕迹基本上微乎其微了。

但是在中国,尽管1840年已翻开了近代工业史的篇章,但是传统的自给性家庭工业经济仍处于不断自我循环的运作之中。近代工业不是从经济结构体系的内部革新它,而是在它的外部延伸和扩展。工业和农业高度统一的家庭经济型式,总是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近代“新式”工业的快速成长。



在近代工业兴起之前，中国原始工业化的特征是，“男耕女织，以织助耕”，“耕稼纺绩，比屋皆然”。工厂工业出现后，这种经济结构并未发生根本变化，1952年，英国侵略者密切尔在广州给他上司的报告中仍描述到：“中国每个小康之家都有织布机，……自清、自纺、自织”，“农夫不仅是一个农夫”，“而且还是园艺家、制造家合而为一的人物”，同时其他家庭成员在家亦从事纺织，因此，以耕织结合为主要形式的工农业高度统一依旧如故。他在谈到英国的布在中国推销遇到很大障碍时说：“第一，中国人牢不可破的勤劳节俭的习惯，……第二，劳动的经济利用，使每一农民都成为制造者，换言之，即农产品与衣着原料的生产密切配合，农民以农闲劳动用于这种衣料的生产；第三，土布中，不论粗细所含原料特重，而其生产成本之低，足抵制一切外来的严重的竞争”^①。马克思在写《资本论》第三卷手稿（1863—1865）考察商人资本的历史时也注意到，中国由于在家庭经济内部实现工农业生产的高度统一而滞延了大工业的成长。他说：“在中国，……因农业和手工制造业的直接结合而造成的巨大的节约和时间的节省，……对大工业产品进行了最顽强的抵抗。”^②

我国以农业和手工制造业相结合的近代家庭经济，具有很大的封闭性，因为家庭既是消费单位，又是生产单位：生产目

^① 彭泽益：《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卷，第505—50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373页。



的是自给，生产工具是自有，生产方式是“自清、自污、自治”，生产剩余又很少，“雇主”和“雇员”同时就是家庭成员自身，这种封闭家庭经济的直接后果是，简单的生产方式不断地自我循环，个别的技术发明和生产过程革新不易传播和扩散，市场的空间和容量都很小，使工业从与农业的结合转向与商业结合的过程十分缓慢，从而“货币转化为资本”的进程总是难于伸延。农户家庭用剩余品换回来的只是货币，而不是资本，因为没有形成完全将自己的劳动力作为商品来卖的“自由人”。虽然农民是在封建地主占有的土地上耕作，但他毕竟可以依靠其租赁的小块土地维持最低生活，他与土地未发生完全的分离。另外土地所有者从农民那里得到的地租（货币形式和实物形式的）也主要是为了消费而不是积累成生产资本，从而也未转化为资本。中间的商人资本成为工业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源泉之一，但由于封闭的家庭经济解体缓慢，它的成长也受到限制。加上中国工业资本的原始积累，不但没有走西欧 15 世纪开始的“羊吃人”和“人吃人”^①的道路，反而有一大部分成为工业资本源泉的利润被侵略者掠夺走了。从而中国工业资本的成长不但先天不足（原始积累不足），而且由“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

^① 马克思在考察资本的原始积累时，引用了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一书中所说的“羊把人吃了”这句话，以描述西欧资本主义通过剥削农民，“把耕地变为牧场”来实现资本原始积累的情景。在《资本论》第二十五章“现代殖民论”中，马克思又描述了殖民主义者如何在殖民地进行剥夺，积累资本。可以说这实际上是一个类似于“羊吃人”的“人吃人”。（见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第 787、833—843 页。）



所形成的积累也因外部掠夺而受到极大的限制。

政治经济学原理和各国经济史表明，现代工业的成长至少要有三个基本条件：一是自由劳动者大军，二是广阔的商业和市场，三是资本的形成。从1840年以来，中国这三个条件（特别是第三个条件）长时间没有准备充足，结果工业化发展十分缓慢。与我们的社会文化背景近似的日本在明治维新初期第一次产业的就业份额就只有83.6%，而我国直到1952年还在83.5%的水平。这表明我国在本世纪50年代以前的工业化没有多大作为，与日本上个世纪60年代末以前的工业化水平近似。

这不是说1840—1950年这110年间的工业化无所作为，不是说近代大工业没有进取，把新中国工业体系的形成完全说成是从无到有也不符合历史事实。实际上，从19世纪下半期以来，我国工业化发展有过一些繁荣和扩张时期，以工厂体制为依托的大工业有了一些发展。不过，这一扩张和发展并未从内部根本改造工业和农业合而为一的家庭经济模式，甚至常常受到后者的约束，加上外国资本并非真想发展而是力图控制中国工业，就使得中国现代工业的成长遇到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双重限制。

Ⅲ. “新式工业”的成长：扩张与衰退

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我国在家庭手工制造业之旁逐渐发展起一种“新式工业”（严中平语）。这种“新式工业”不仅



与农业分离，生产目的是为了利润最大化，为了交换和货币价值，劳动和收入分开，雇主和雇员分离，生产成果不是直接提供给消费者而是提供给商业或市场；而且以一定的先进技术为基础，实行工厂化生产。这种“新式工业”主要包括新式采矿业、工厂化制造工业及工厂化纺织业。就工业经营方式而言，主要包括三种：一是以鸦片和大炮开路的外国资本工业，二是以官权为基础的官僚资本工业，三是以民营为主体的民族资本工业。而就产业性质而言，又可分为以煤、钢、铁和交通枢纽建设为主要内容的重工业，和以纺纱、纺线和织布为主要内容的轻纺工业。前者主要作为生产资料生产，后者主要作为消费资料生产。在1840—1944年，前者基本上由外国资本垄断，官僚资本掌握了一部分；后者主要由民族资本掌握，但在1914—1944年间，外国资本也控制了轻纺工业的一半。1945—1949年，官僚资本几乎垄断了全部工业，民营或商办轻纺业占的比重很少。

外国资本与重工业的扩张

外国资本的侵入是我国1840—1949年这100多年“新式工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在刺激中国大工业（尤其是以军事工业为中心的重工业）成长的同时又限制和阻碍中国大工业的正常扩张和繁荣，这在中国以钢铁为中心的重工业的发展上尤其如此。对于中国工业化在这一个多世纪的进程来说，外国资本既有刺激“新式工业”成长的一面，又有剥夺我国工业资



源和占有工业发展成果的一面，而后一方面又是主要的。这是理解新中国成立之前工业化进程为什么举步艰难，为什么“新式工业”的发展并未推动我国国民经济持续繁荣并进入“现代增长”时代的重要原因之一。

“新式工业”的发展首先是外国资本所控制的工业的发展。从1843年英国伦敦传教会在上海开办印刷所开始，到英国人于1876年在吴淞擅自建筑第一条15公里长的吴淞铁路为止至少开设了23家外国工厂和馆所。而在1843—1894年期间，英国、葡萄牙、美国、法国、俄国、德国和日本等国家，先后在我国共设厂馆108家，^①实行规模不断扩大的垄断性工业生产。1895年“马关条约”正式规定允许外国人拥有在中国的设厂权，随后外国资本输入更甚，控制中国工业的规模愈来愈大，其工业产量占我国工业总产量的份额急速提高。例如，外国资本生产的煤炭产量，1912年为474.9万吨，占全国906.8万吨的52.4%（其中直接投资部分为24.3%，合营投资部分为21.5%）。生铁产量1900—1925年基本上全都是由外国资本垄断的生产所提供，1926年外资生铁产量份额下降到94.6%，1937年又回升到98.4%，铁矿产量的外资控制份额1912—1925年一直是100%，1926—1937年仍在99—99.7%之间波动。棉纱、棉布、火柴、卷烟、水泥和电力这六大工业生产中的外资份额分别为

^① 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116—122页。本附录所引资料，除另加注释外，均出自严中平先生等编的这本资料辑。



29% (1936年)、64% (1936年)、11% (1935年)、58% (1935年)、27% (1931年)和55% (1936年)。并且,在重工业领域,外国资本掌握的工业生产主要是“机械方法”,而民族资本部分主要是“土法”。以煤矿机械开采产量为例,1912年,外国资本拥有份额占91.9%,之后逐渐下降,但到1937年仍为72.5%。

如果说1894年前侵入中国的外国资本主要来自先行工业化的欧美国家的话,那么可以说1894年7月由日本发动中日甲午战争开始了日本对中国的工业扩张和全面性经济侵略。据严中平先生等统计,1912—1925年日本完全垄断了中国铁矿生产(100%),1926年为99%,1937年增至99.7%;煤矿生产,日本1913年占24.7%,1937年达88.3%;1937年日本在东北产钢24.6万吨,占全国钢总量5万吨的83%以上;而且中国生铁生产的95%以上为日本所控制。而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其扩张和侵略加快。“九一八”前夕,它在我东北直接企业投资为55.02万美元,1936年增到132.423万美元,总控制资本达145.523万美元,垄断了整个东北的工业生产。1937年7月7日,日本挑起“芦沟桥事件”并实行全面侵华政策后,扩张和侵略更为加速,其爪牙从东北伸至“关内”。以煤、电力、生铁、钢、水泥、棉纱、棉布、麻袋八种工业品产量为例,以1933=100,1937年分别为132、755、187、2600、158、198、127和281,其中钢和电扩张最快;1944年分别为244、2123、273、2350、210、108、62和154,其中电的扩张更为加速。显然日本控制的主要是重工业,这是为它的“以战养战”的侵华政策服务的,其工业扩张并不是为



了中国国民的生活需要。

与此同时,美国在中国的工业扩张也在加速,并逐渐成为在华进行工业掠夺的主要国家。1936年,美国在华投资只占所有外国资本的8%,而1948年猛增到80%。^①同样,它的目的亦不在于促进中国现代大工业的正常成长和发展,而是按所谓“适地适产主义”策略旨在让中国成为它的原料产地或“原始商品”输出国,所以其投资开发的重点是在矿业、交通和军用工业方面,而不是发展有利于中国国富民强的加工制造业。

铁路是推动工业化的枢纽,亦是现代工业经济成长的动脉和神经。然而,中国在从1876年开始有第一条铁路起,到1948年止,72年中共建立了58条铁路干线,全长为23·433.21公里,连同各路附设支线,总长达24 945.52公里,而由民族资本营造的铁路不过375公里,并且只是一些极不重要的短程支线。所以,外国资本实际上控制了中国的铁路建设。总之,中国工业中的“现代”部分主要由外国资本所控制。而外国工业资本的侵入,并不是真心实意想扶植和开发中国工业,不是想使中国走上具有自我生产能力的现代工业道路,不是为了加速起步很晚的中国工业化进程,而只愿意让中国这个资源大国成为其原料产地。因此,外国资本实质上阻碍着中国工业化进程的深化。

^① 吴承明:《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50—151页。



官僚资本对工业发展的两面性

我们在观察 1840—1949 年中国工业进程时,应当注意的另一个重要资本形式是民族资本。19 世纪 60 年代,满清政府就有一批“洋务派”官僚开始创办“新式工业”;80 年代后,“官办工业逐渐扩充到一些有利可图的民用工业,同时一部分商人、地主、官吏也开始投资于新式工业;”到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商办的新式工业,有了一些增加”。根据“全部新式采矿业(煤及金属矿)和资本在 1 万元以上的制造工业”的历史统计口径,1872 年的民族工业资本增加额只有 36 000 元,1911 年增加到 7 462 190 元,40 年增加 206.3 倍,每年平均增长 518.25%。1912 年,煤、铁矿和生铁三项混合加总只有 9 969.281 吨,1937 年达到 42 009 320 吨,净增 3.2 倍。其中,1912 年的煤产量为 9 067 862 吨,1937 年为 37 230 946 吨,增长 3.1 倍;铁矿从 723 430 吨增至 3 819 691 吨,增长 4.3 倍;生铁从 177 989 吨增至 958 633 吨,增加 4.4 倍。25 年,三项混合产量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12.8%。由于上述外国资本尤其是 1895、1931 和 1937 年 3 次以炮火开路的日本资本的侵入,严重阻碍了我国民族工业的成长,拖延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日本投降后,三年多内战又妨碍了工业发展。直到 1950 年,中国才真正进入没有战争干扰的独立的和平工业化时期。

在上述国内工业资本的发展中,官僚资本或官办工业占有尤其重要的地位,每一次战事紧张的更是如此。在从 1872—1911 年期间,在历年设立厂矿所拥有的资本规模中,官办、官督



商办和官商合办所占份额为 28.8%。以煤矿工业为例,1876—1897 年基本上都是官办、官督商办或者为官商合办,之后,商办工业才有较快发展。1895—1927 年间,官僚资本在军用工业、民用工业和银行业方面有所发展。但从 1912—1927 年,官僚资本控制的份额有所下降,主要是因为外国工业资本扩张的影响。以机械开采煤的产量为例,1912 年占总产量的 82.2%,以后年份逐渐下降,1927 年只有 41.4%。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抗战的前夕。但在抗战开始后,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迅速膨胀。它在蒋管区拥有的工矿业资本占全国官营民营资本的份额 1935 年为 10%,1944 年为 50.5%,而战后达到 70—80%。以煤、电力、钢铁为例,从 1944 年至 1947 年,分别增加的百分点是:26.4、69.1 和 13 以上,石油、铁矿、有色金属则全部为官僚资本所垄断;^① 这期间只有轻纺(如纺纱)的官僚资本份额下降,即说明民营纺纱业的份额在扩大。此外,官僚资本还独占了全国的铁路和公路网、轮船和航空公司,控制了过经济动脉。很显然,在日本战败后,中国的“新式工业”尤其是重工业掌握在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手下。

上面的分析表明,官僚资本在旧中国整个国内资本中占主导地位,它的波动受外国资本变动的影 响,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官僚资本的“买办性”和动摇性。虽然,它在客观上对中国的工业发展作出了一定程度的贡献,从而对工业化产生了实际影响;但

^① 《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第 125—126 页。



是,它的发展依赖于政治上的特权,并且是以军事工业为中心。而不是从民用的目的出发,因此它将中国“工业化”引入了歧途。当然,这有其客观原因。在外国资本以武力为后盾企图按照它们本图的利益来“帮助”中国搞“工业化”时,从而实行工业掠夺时,弱小的民间资本较为缺乏抗争性。这就是说常常以政府名义发展起来的官僚资本实现对“新式工业”的控制,有其历史必然性。只是在一定的历史阶段走到它的终点之后,我们这些以历史资料为研究对象的学者才会作出自认为恰当的判断:官僚资本实际上是将中国的工业化引入了歧途,因为工业化的实质不是要创造出更多的枪炮,而是创造出实现民富国强的新生产能力。

民营资本与中国的工业化

前面指出,侵入中国的外国资本主要掌握和控制了包括煤、铁、钢和交通枢纽在内的重型工业的发展,这并不意味着外国资本没有插手轻纺工业的生产。以纱、线、布三类主要轻纺工业生产而论,线的生产直到1924年基本上由华人经营,1925年开始洋人进入并且所占生产份额在60%左右,抗战胜利后才完全由中国人掌握;布的生产,外国资本于1913年侵入,直到抗战前所占份额也一直在50%左右;纱的生产,外国资本侵入早得多,1877年就拥有16万枚纱锭,占中外纱锭总数(约40万枚)的40.7%,1898—1912年有所下降,份额在35%左右,但1913—1936年期间平均每年份额为42.4%,高于1897年,自抗战胜



利后纱的生产基本上由中国人自己控制。然而,即使是在抗战之前,外国资本控制轻纺工业也不象它控制重工业那样严重,这就是说在那时民营资本在发展轻纺工业方面还是有一席之地。

历史上,英国的工业化是从轻工业开始的,当轻工业在急速扩张中实现产业突变后,它既改变了消费结构,扩大了新的消费需求,同时也刺激生产结构转换,向重工业尤其是机器制造业提出新的发展要求,从而推动重工业发展。这是英国式的工业化道路。美国有所不同。在产业成长上,它具有一定的跳跃性,其特征是重工业发展不是在轻工业完全成熟之后,而是同时扩张。如果不是外国工业资本的侵入,中国工业成长可能会走类似于英国的道路,因为原始工业化中的家庭工业主要是轻纺业。但要使原始工业化中的纺织业变成为工厂化、机器化的大工业,将会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外部工业冲击”可能起到一定的催化作用,缩短了这一过程。问题是,外国工业资本无论是发展重工业还是发展轻工业,其首要目的不是培养中国的现代工业生产能力,而是为了资源掠夺和抢占市场。这就是为什么外国资本的投资主要不是机械制造业而主要是冶矿业的缘故。与此同时,官僚资本由于其买办性,既想抵制外侵又想发战争财,在工业投资的选择上也走上了差不多和外国资本投资一样的道路。

在1872—1911年期间,历年新设厂矿拥有的民族(包括官营和民营两部分)工业资本变动中,官僚资本和中外合营资本主要集中于矿冶工业投资,而商办资本主要集中在纺织、食品



加工和其他工业的投资上。1883年和1907年两次模较大的机械工业投资也是由商办资本提供的。从1912—1949年，我们没有找到口径一致的统计资料，但从大量中国经济史分析的文献来看，民营（商办或民办）资本一直经营的是纺织、食品加工和其他与民生直接有关的民用工业。由于外国资本和官僚资本的挤压，民营工业的成长和发展道路始终是曲曲折折、时断时续。严中平先生等学者在广泛研究了“新式工业”的成长史后深刻地指出：“中国的民族（实际是指民营——引者）工业是在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双重压迫下艰苦地生长起来的。它一方面受着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的阻碍；一方面由于基础的脆弱，又和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发生一定的联系”。“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以前，中国民族工业一般的有了一些缓慢的发展，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帝国主义势力暂时退出中国的时期中，民族工业曾经有一个短期的繁荣”。“到了进入三十年代以后，当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堵塞了民族工业发展的任何空隙时，民族工业才呈现出显著衰落的状况”。

民营资本工业的缓慢成长和走向衰退的过程，基本上反映了中国1950年前工业化发展的状况。在此前的100多年时间里，中国的工业化虽然一度出现扩张和繁荣，但都因战争的破坏而被中断了，尤其是1937—1949年期间，不仅轻工业而且重工业出现了萎缩。与1936年相比，1947年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业生产量下降了10%；到1949年工业进一步衰退。1949年和1936年比，轻工业生产量下降30%，其中棉纺业下降25%以



上；重工业生产量减少70%，其中煤减少50%以上，铁和钢减少80%以上。如果作一国际比较，我们可能会知道，我国1949年钢、铁、煤这三大工业产品的产量只相当于英国、美国和法国19世纪中后期和日本20世纪初期的水平，而发电量相当于这四个国家本世纪初的水平。因此到1949年止，中国工业发展距离先行工业化国家还差得很远，这还是从总产量来看的，如果用人均工业产量进行比较，差距就更大了。在1840—1949年期间，中国的工业化经历了十分艰难的里程。

IV. 中国工业发展的长波过程

长波是工业化开始以后才有的周期现象，最早研究长波的是康德拉季耶夫就是以欧洲（主要是英国）开始进行工业化的时期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长波的起点的，因此经济学所讲的长波实际上是工业发展的长期波动。

按照康德拉季耶夫的最初研究和中村大夫的补充，在从1784年至现在，资本主义工业发展已完成了三次长波，目前正处在第四次长波的下降阶段（图1）。那么，中国工业化发展或工业成长是否存在长波？如果存在，是如何界定的？它和先行工业化国家的长波变换有什么联系和区别？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工业的长期波动在形态和成因上是否有不同的地方？我们能否用先行工业化国家的长波因素来解释后行工业化国家的长波过程？下面就来讨论这些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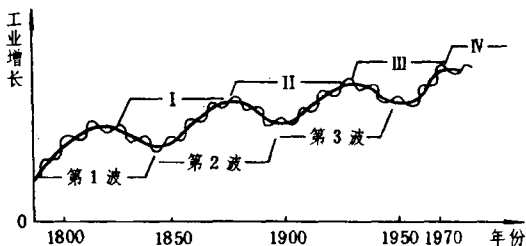


图1 资本主义长波模型*

* 实线1、2、3波为康德拉季耶夫模型,虚线及I、II、III、IV是中村大夫补充模型。

资料来源:《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十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98页。

长波界定

我们根据煤炭、生铁和纺织这三大行业实物量数列的变动,来界定新中国成立前工业长波的变换,而且只考察民族工业的发展,不讨论“外国资本控制的中国工业”。从鸦片战争外国资本侵入开始到19世纪80年代,中国“新式工业”实际上是由外国资本控制着。大约从1890年以后,中国人自己创办的新式工业才有了发展。所以,我们不把1840—1890年这50年“外国资本控制着的中国工业”的发展包括在我们的长波分析之中,而以1890年作为中国工业长波过程的起点。

先看煤炭生产的长期趋势。从1878年河北开平矿务局最早开办新式煤矿开始,中国的煤矿业出现了近30年的上升发展,尤其是“一战”期间发展较快,直到1920年达到最高产量。1921



年出现萧条，虽然 1922—1924 年产量回升，但 1925—1929 年又陷入衰退和停滞，直到 1930 年的煤炭产量才超过 1924 年的水平。从 1930—1942 年又出现加速增长，期间只有 1932 和 1938 年的短暂下降，没有形成停滞和萧条区间，13 年中年均递增 19.9%。从 1943 年开始出现急剧衰退。1942 年煤炭产量为 6 569 万吨，1947 年只有 1 949 万吨，后者为前者的 29.7%，5 年中平均每年递减 14.06 个百分点。随后的 1948 和 1949 年略有回升，如 1949 年原煤产量达 3 243 万吨，但仍属于煤炭生产增长的低谷时期。因此，新中国成立前我国煤炭生产的长期趋势表现为两个长波周期：

第一次长波：上升阶段为 1878—1920 年；

下降阶段为 1920—1929 年。

第二次长波：上升阶段为 1929—1942 年；

下降阶段为 1942—1949 年。

再看生铁产量的长期趋势。1874 年前，我国炼铁工业生产一直沿用旧式方法，1874 年 4 月李鸿章试办磁州煤铁等代表政府注重新式矿业生产的开始，但因运道很远，向英商订购熔铁机器未能成交，不久，新式生产停止。而张之洞创办的汉阳铁厂于 1893 年才建成投产。从 1893 年开始，新式化铁炉产量 1902 年出现负增长，1910 年产量猛然提高，1911 年又回到趋势性生产水平，1912 年出现负增长，因此生铁产量比煤炭产量较为不稳定一些，但直到 1919 年都属于趋势性上升发展阶段。从 1920 年开始生铁产量逐年下降直到 1924 年，1925—1928 年逐年回升，



但 1925 年的产量(25.5 万吨)仍低于 1919 年(27.7 万吨),只是从 1929 年开始其产量水平(30.8 万吨)^①才超过 1919 年。所以生铁生产第二次上升发展开始于 1929 年。前面是根据陈真先生的数字,但是如果根据严中平先生的数字,生铁生产第一次长波的高峰值不是在 1919 年而是在 1920 年,即不是下降 4.2%而是上升 5.4%,并且低于 1920 年峰值的年份只是到 1927 年,从 1928 年开始稳定回升而繁荣进入第二次长波的上升阶段。因为有关生铁产量的连续时间序列数据,陈真先生的统计到 1931 年为止^②,严中平先生的统计到 1937 年为止,所以不易于准确判断 1937 年以后我国生铁产量的趋势性变动。但可以指出两点:其一,如果包括外国资本控制的部分,那么产量是加速上升的,因为日本侵略者和其他外国资本家于 1937—1945 年期间为军事需要在中国境内加速扩张钢铁工业;其二,如果不包括外国资本控制的部分,那么从 1937—1949 年钢铁工业生产属于趋势性下降。^③我们讨论的是第二种情形。所以,1893—1949 年期间,我国生铁产量的长波周期是:

第一次长波:上升阶段为 1893—1919(1920)年

① 这里的生产产量都是指新式化铁炉产量,不包括用土法生产的产量。如果将土法产量加进来,按陈真先生的统计,1919、1925、1928 和 1929 年的生铁产量分别为:44.7、37.0、43.4 和 43.4 万吨。

② 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四辑,三联书店 1961 年版,第 746 页。

③ 1947 年国统区的工业产量,大致比 1936 年降低 10%;到 1949 年,重工业生产量比战前减少 70%,其中煤减少 50%以上,钢和铁产量减少 80%以上。(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下册,人民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186 页)。



下降阶段为 1919(1920)—1928(1927)年；
第二次长波：上升阶段为 1928(1927)—1936 年
下降阶段为 1936—1949 年。

最后看纺织工业生产的长期趋势。自从 1840 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对外贸易的入超尤其是纺织品的入超越来越大，这对传统式男耕女织的家庭纺织业构成巨大威胁，为了不让外国人控制中国纺织业的发展，1882 年 3 月，郑官应等人兴办上海织布局，1890 年投产。之后民族纺织工业迅速发展。由于外国资本侵入中国主要是为军事服务，所以重点是控制中国重工业的发展。尽管 1937—1945 年日本侵略者借用“重要产业统制法”扩大工业侵略（规定 21 种较重要的重工业置于其直接控制下），但其轻工业产品的增长速度很慢甚至下降（1937 年后五种轻工产品速度下降）。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使中国人可以有更多的力量发展自己的轻纺工业。也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中国纺织业一开始与新技术和新生产方法相结合就出现了持续增长势头。尤其是“一战”爆发，外货入侵减少，我国国内棉纺织业便开始突飞猛进，出现扩张繁荣。但战后各国经济多不安定，工业，特别是纺织工业因而亦遭受影响，于 1920 年秋季呈现出萧条状态，^① 1924 年萧条达到顶点。直到 1927 年才稍有转机。从 1931 年开始纺织工业又进入繁荣发展时期，直到 1936 年。由于战争的破坏，我国棉纺织业又于 1937—1949 年陷入增长低潮和萧条期。由此可见，

^① 参见《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四辑，第 200 页。



中国解放前的纺织业生产的长波也有两次：

第一次长波：上升阶段为 1890—1920 年

下降阶段为 1920—1927 年；

第二次长波：上升阶段为 1927—1936 年

下降阶段为 1936—1949 年。

综合起来看，我国近代工业生产发展（1949 年以前）经历了两次长期波动：

长波 I：19 世纪 80、90 年代—1919—1920—1927—1929 年；

长波 II：1927—1929—1937—1949 年。

如果将 1949 年以来的社会主义工业发展的长波过程考虑在内，那么中国整个工业发展的长期波动可以概括如表 1。

表 1 中国工业发展的长波*

资本主义经济的长波			社会主义经济的长波		
I	19 世纪 80—90 年代—1919—1920	↑	II	1949—1959	↑
	1919—1920—1927—1929	↓		1959—1980	↓
II	1927—1929—1936	↑	IV	1980—2000?	↑
	1936—1949	↓			

* “↑”表示长波的上升阶段，“↓”表示长波的下降阶段。

从表 1 可以看出，中国社会主义工业生产已完成一次长波，大约在 1980 年前后的调整时期结束。调整时期结束后，进入第二次长波，目前还处在第二次长波的繁荣时期。根据我们在本附录的“长波解释”，第二次长波的繁荣时期可能要延续到 2000 年左右；在 2000 年以后，由于耐用消费品和住宅产业在快速扩



张后将减速,新的消费热点还未出现,从而新的主导产业还未出现,致使第二次长波转入下降阶段。由于本书的任务不是研究周期预测,所以,有关未来经济的长波趋势,在这里就不多述。

长波比较

如果将中国工业发展的长波与先行工业化经济的长波作一比较,我们容易看到,由中国人自己创办和发展起来的机器大工业生产的长波要比欧洲先行工业化国家的长波少两次,中国第一次长波的上升阶段的起点和终点大体与欧洲第三次长波上升阶段的起、终点一致(见表2和表3)。但是中国工业发展的长波在时间长度上不规则,第一次持续约45年,第二次约20年,第三次约40年,第四次还没有结束。从三次完整周期的平均长度看大约为36年左右,比欧洲每一个长波都包括6个为期9—10年朱格拉周期不同,持续时间缩短了。

表2 先行工业化经济的长波——康德拉季耶夫的划分

	第一波		第二波		第三波	
	↑	↓	↑	↓	↑	↓
批发物价	1789—1814—1849		1849—1873—1896		1896—1920—?	
利息率	1792—1813—1844 (1845)		1844—1870—1897 (1848)(1874)		1897—1921—?	
综合	1780—1810—1844 (1790)(1817)(1851)		1844—1870—1890 (1851)(1875)(1896)		1890—1914—? (1896)(1920)	

资料来源:《现代外国经济学论文选》第十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11、



表 3 先行工业化经济的长波——熊波特的划分

波次	T—T'	成因特征
I	1783—1842	工业革命
II	1842—1897	蒸汽机、钢铁、世界铁路化
III	1897—?	电、化学、汽车

资料来源：《现代外国经济学论文选》第十辑，第 32—35 页。

长波缩短，对于后行工业化经济来说几乎是一种必然的趋势。这是因为后行工业化国家可以直接利用先行工业国家的科技创新成果，缩短创新的成果发育过程，或者是经由外国资本冲击或者是通过技术和创新成果引进来使国内新科技成果转化成新生产工艺的时间缩短，从而新型企业的集群很快形成，创新生命周期亦随之缩短。另外，对于先行工业化国家来说，由创新部门构成的主导产业的变更通常遵循传统顺序：棉纺、铁路、铁、钢、化学、电、汽车工业和电子计算机。然而，对于后行工业化国家来说，他们虽然未能“按时”进行工业革命，未能和先行工业化国家一起实现创新部门和主导产业的变换，未能“按时”分别实现由棉纺业、蒸汽机和钢铁推动的第一、二次长波的繁荣，但是在先行工业化国家按传统顺序实现以化学、电和汽车工业推动的长波发展时，后行工业化国家不得不以浓缩的形式进行这些技术和生产的变革。正是由于过程的浓缩，加上本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外部冲击，就使得后行工业化国家的长波过程在一系列内外因素的影响下而缩短。

日本的工业化进程虽然较我国略早一些，但比欧洲资本主



义国家晚，而日本经济发展的长期波动也明显地表现出持续时间缩短。按照日本学者的划分，日本经济长波的长度平均在20—25年左右（见表4）。我们似乎可以作出一个这样的判断：日本正是因为长波缩短才导致了它的工业化加速，才出现了一次紧接着一次的高速繁荣，因为长波越长意味着创新部门交替出现的时间间隔越长，反之则越短。这又进一步验证了我们的“后行工业化经济的长波缩短”假说。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第一次长波（整个中国工业发展的第三次长波）下降时间达21之久，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在这期间的工业化遇到了非常规干扰，它丧失了后行工业化国家应当获得的“后发效益”。

表4 日本经济的长波——六种观点

1. 本船久雄划分	2. 大川、罗索夫斯基划分	3. 筱原划分	4. 大川与其他人划分	5. 藤野划分	6. 南亮进划分
1899(峰)	1897(峰)	1882(谷)	1887(谷)	1884(谷)	1889(谷)
1908(谷)	1901(谷)	1888(峰)	1897(峰)	1897(峰)	1896(峰)
1922(峰)	1917(峰)	1902(谷)	1904(谷)	1901(谷)	1903(谷)
1932(谷)	1931(谷)	1915(峰)	1919(峰)	1904(峰)	1918(峰)
1943(峰)	1937(峰)	1922(谷)	1930(谷)	1911(谷)	1928(谷)
1953(谷)	1956(谷)	1936(峰)	1938(峰)	1916(峰)	1936(峰)
1970(峰)	1962(峰)		1953(谷)	1929(谷)	1956(谷)
			1969(峰)	1936(峰)	1969(峰)
					1975(谷)

资料来源：《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十辑，第133页。

对新长波类型的解释

把先行工业化经济的长期波动叫做“古典长波”而把后行



工业化经济的长期波动叫做“新型长波”，对于我们的分析是方便的，同时也可以刺激我们努力去寻找两种长波类型在成因上的差异。

就古典长波而言，战争始终是一个外部因素，是第二位的，甚至战争只是加入波动的节奏中，而不是战争诱发长波。因为早先的战争首先是由一些先行工业国家在经济的成长受到需求约束和市场空间限制以及为了争夺和抢战资源而引起的，或者说是由其创新部门的成长和扩展受到限制而引起的。因此，“战争假设”并不适合古典长波，在这一点上，康德拉季耶夫和熊彼特的解释表现出科学的诚实，而不是简单地屈从于政治辩护。

但对于新式长波而言，“战争假设”并不是没有解释力。我们在前面指出，外国资本在枪炮的掩护下侵入后行工业化国家，其目的是掠夺资源、抢占市场、掠夺利润。但是战争又往往会在扼杀人类的同时促使以钢铁为中心的重工业的畸型发展，使后行工业化经济出现虚假的工业繁荣，当战争结束，这种虚假工业繁荣就会停止，使经济陷入衰退和萧条。我国第一次长波过程反映了这一趋势。当然，如果一个国家成为了直接的战场，许多别的国家都利用这一战场来相互争夺资源、利润和抢占市场，那么这个国家的经济就会直接蒙受损失，不会产生工业繁荣，取而代之的是全面衰退和萧条。中国第二次长波的下降阶段证明了这一点。这就是说，解释我国1949年前的长波运动，更有说服力的不是“创新假设”而是“战争假设”。

当然，在解释社会主义和平发展时期的长波现象时，我们



需要以新的理论假说为基础。那么是不是可以直接利用“创新假设”？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先来看创新理论的主要贡献者熊彼特和杜因关于创新推动长波的见解。在回答创新如何造成长波这个问题时，杜因是用创新按S型生命周期模型发展这一论点来论证的。在他看来，有些主要的或基本的创新的集群导致新的工业部门出现，随着创新生命周期从“采用”、“增长”到“成熟”再到“下降”，这些部门的生产和增长亦会顺序地经过回升、繁荣、衰退和萧条四个阶段，从而造成宏观水平上有规则地发生长期波动。^①我们不想验证“创新假设”对解释资本主义经济长波的可靠程度，而要指出的是，“创新假设”用来解释我国社会主义工业经济的长期波动趋势并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因为严格的“创新假设”是一个以市场发育充分、企业家自由经营、消费者和劳动者自由选择、要素自由流动并且存在一个健全的货币均衡系统为背景的，其创新活动是“微观化”的，并且要求投资和生产者的行为服从于利润最大化和获取超额利润的引诱。每一次创新都伴随新的发明和技术变革，而新的发明和技术变革的经济应用带来的直接后果是超额利润形成，在利润追逐下，与创新结合的企业群集，造成宏观经济繁荣；而企业群集达到一定限度又会使超额利润从而平均利率下降，结果企业群集过程停止或收缩，宏观经济增长随之停滞或下降，等待新的创新出现和新的超额利润产生。这就是说，“创新波动”

^① 《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十辑，第85—100页。



（杜因的创新生命周期）和“平均利润率的波动”（曼德尔的发现）实际上是一致的。问题是，在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企业行为的动机不是追逐超额利润而是追逐上级指令，超额利润机制被行政指令机制所取代，创新与否或者利润的多寡对企业来说并不重要。所以，用“平均利润率波动”和“创新波动”来解释社会主义工业发展的长波现象，并不很妥切。

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经验观察来看，推动长波形成的原因有两个：一是经济体制的变革，就是说，每一次经济体制的巨大变革和调整，总是伴随着经济增长的较强波动；二是以主导产业转换为主要内容的产业结构的变迁。关于第一个原因，我们在“导论”第4节和第7节已作过论述，这里不再重复。关于第二个原因，则有必要作一展开论述。

图2展现了主导产业变迁与长波趋势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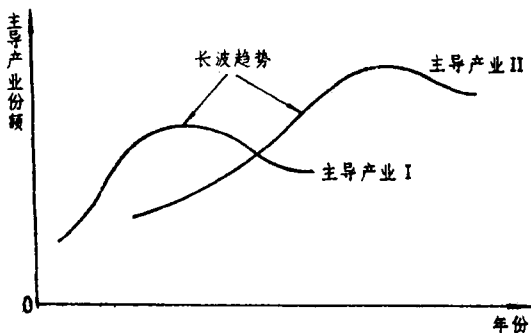


图2 主导产业变迁与长波趋势

由图2可知，在时间序列中，主导产业有其发育、成熟和衰退时期，形成如我们在本书第7章所论述的主导产业生命周



期。在第Ⅰ种主导产业进入成熟和转入衰退期时，第Ⅱ种主导产业可能正处于形成和发育时期。第Ⅰ种主导产业处于成熟期时，经济活动的创新和扩张处于高潮，形成为长波的高峰期。而在第Ⅰ种主导产业转入衰退，第Ⅱ种主导产业还处于发育期，甚至整个经济活动还未真正出现“主导产业”，这时正是长波运动的低潮。只有当新的“主导产业”即我们所说的“主导产业Ⅱ”出现时，经济发展的长波才进入了新的高潮期。因此，主导产业的前后替换就诱发出宏观经济层面上的长期波动。

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1980年之前，基本上完成了第一次长波。那次长波历时约30年，发展的主导产业是重化学工业，其他产业都是围绕着这个主导产业而发展的。政府产业政策亦正是在“重工业优先发展”原则下制定和实行的。从历史的观点看，在几乎“一穷二白”（主要是现代工业生产水平极为低下）的基地上，以重化学工业为主导产业，大力扩张以钢铁和制造业为核心的重工业生产，的确给中国经济带来了空前的繁荣，它也为加速工业化作出了巨大贡献。可惜，这个繁荣时期只持续了大约10年，即从1950—1959年。后来由于超越现实的过度扩张以及不正常的政治运动尤其是10年文化大革命，使工业的正常繁荣期过早中断，结果出现了10年的停滞。

1980年后，开始进入第二次长波时期。这次长波的主导产业，已不是重化学工业，不是钢铁和制造业的更快扩张，而是与消费紧密相依的耐用消费品产业和住宅产业。从较细小的阶



段看，80年代工业部门中的主导产业是耐用消费品产业，包括收录机、电视机、洗衣机、冰箱、录相机、空调等的生产，它们的加速生产给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第二次长波带来了第一阶段的繁荣。由于家庭住宅空间的限制，作为主导产业的耐用消费品工业的进一步扩张受到限制，为消除这个限制，政府将在90年代通过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大力发展住宅产业，使第二次长波运动中出现第二个10年的繁荣，其中耐用消费品工业将继续快速发展。然而，以耐用消费品和住宅为主导的产业扩张在时间上必然会有一个极限，它们在加速发展后势必走向稳中有降的发展阶段，这样，第二次长波的衰退阶段就会来临了。而新的长波繁荣期又依赖于新的主导产业的形成和出现。



主要参考文献

统计资料

1. 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86—1991年各年。
2. 国家统计局工业交通物资统计司编：《中国工业经济统计资料》，1949—1984、1987年，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
3.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平衡统计司编：《国民收入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5）》，中国统计出版社1987年版。
4. 国家统计局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司编：《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资料（1950—1985）》，中国统计出版社1987年版。
5. 国家统计局编：《“六五”期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概况》，中国统计出版社1986年版。
6. 国家统计局编：《伟大的十年》，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7. 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



8. 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四辑，三联书店 1961 年版。
9. 世界银行：《1987 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87 年版。
10. 世界银行：《1990 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0 年版。
11. IMF,《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Yearbook》，1988.
12. 国家统计局编：《国际经济和社会统计资料(1987)》，中国统计出版社 1988 年版。
13. 《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统计集(1948—1960)》，世界知识出版社 1962 年版。
14. 《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美国经济顾问委员会年度报告，华盛顿 1989 年版。
15. 〔苏〕尤·瓦尔加主编：《世界经济危机(1848—1935)》，世界知识出版社 1958 年版。
16.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编：《国外经济统计资料(1949—1976)》，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78 年版。

学术专著

1. 马克思：《资本论》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
2. 马洪、刘国光、杨坚白主编：《当代中国经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 年版。
3. 刘国光：《社会主义再生产问题》，三联书店 1980 年



版。

4. 刘国光主编：《体制变革中的稳定增长》，第二、三章，中国计划出版社 1990 年版。

5. 刘树成：《中国经济的周期波动》，中国经济出版社 1989 年版。

6. 张风波主编：《中国宏观经济结构与政策》第三章，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88 年版。

7. 陈东琪：《东欧经济学概论》第二、六、八章，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8.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上、下册，人民出版社 1976 年版。

9. 宋承先、陈招顺、张荣喜主编：《当代西方经济思潮》第七章，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10. 〔日〕小林实：《论中国经济发展之关键》，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 1987 年版。

11. 〔美〕阿瑟·刘易斯：《增长与波动》，华夏出版社 1987 年版。

12. 〔美〕西蒙·库兹涅茨：《各国的经济增长》，商务印书馆 1985 年版。

13. 〔德〕于尔根·库钦斯基：《生产力的四次革命：理论和对比》，商务印书馆 1984 年版。

14. 〔日〕石川滋：《发展经济学的新格局：进步与展望》经济科学出版社 1987 年版。



15. 〔美〕哈伯勒：《繁荣与萧条》，商务印书馆 1980 年版。
16. 〔美〕弗·L·普瑞尔：《东西方经济体制比较——研究指南》第四章，中国经济出版社 1989 年版。
17. 〔匈〕科尔内：《短缺经济学》上、下卷，经济科学出版社 1986 年版。
18. 〔日〕香西泰：《高速增长的时代》，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19. 〔日〕佐贯利雄：《日本经济的结构分析》，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20. 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华中工学院出版社 1984 年版。
21. 孙尚清主编：《论经济结构对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 年版。
22. 〔瑞典〕魏克赛尔：《利息与价格》，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
23. 〔瑞典〕米尔达尔：《货币均衡论》，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
24. 〔英〕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 1981 年版。
25. 〔美〕里昂惕夫等：《世界经济的未来：联合国的一项研究》，商务印书馆 1988 年版。
26. 毕大川、刘树成主编：《经济周期与预警系统》，科学出版社 1990 年版。



-
27. 《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商务印书馆 1986 年版。
 28. Victor Perlo, 《The Unstable Economy: Booms and Recessions in the U. S. Since 1945》,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New York, 1973.
 29. Dale G. Bails and others: 《Business Fluctuations: Forecasting Techniques and Applications》, Prentice—Hall Inc, Englewood Cliffs, New Jersey, 1982.
 30. Peter Kriedte and others, 《Industrialization before Industrializ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31. W. C. Mitchell, 《Business Cycles》, NBER, New York, 1927.
 32. J. A. Schumpeter, 《Business Cycles》,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Inc, New York & London, 1939.
 33. J. S. Duesenberry, 《Business Cycles & Economic Growth》, McGraw—Hill, New York 1958.
 34. P. A. Klein, 《Business Cycles in the Postwar World》, Washington, 1976.
 35. Branko Horvat, 《Business Cycles in Yugoslavia》, New York, 1971.
 36. S. A. Lewis: 《Socialism & Economic Growth》, London, 1971.



学术论文

1. 杨坚白：“价值规律和计划管理”，《学术月刊》1990年第1期。

2. 姚耐等：“谈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高速度及其波浪式前进的趋势”，《解放日报》1959年8月7日。

3. 斯捷：“自觉地掌握国民经济波浪式发展的规律”，《湖北日报》1962年1月29日。

4. 刘树成：“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周期性初探”，《经济研究》1986年第2期。

5. 〔美〕W. H. 劳得豪斯：“政治经济周期”，《经济研究评论》1975年4月号。

6. 〔美〕D. J. 史密斯等：“社会偏好、通货膨胀、失业与政治经济周期：对里根政府的计量经济学的证明”，《南方经济杂志》，1989年10月号。

7. 卢建：“我国经济周期的特点、原因及其机制分析”，《经济研究》1987年第4期。

8. 陈彩虹：“投资与经济周期”，《经济研究》1988年第2期。

9. William H. Nordhaus, “The Political Business Cycl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April, 1977.

10. C. Duncan Macrae, “A Political Model of the Business Cycle”, 《Review of Economics Studies》, April, 1975.

11. David J. Smyth, “Social Preferences, Inflation, Unem-



ployment and Political Business Cycles: Econometric Evidence for the Reagan Presidency”, 《Southern Economics Journal》, Vol. 56, No. 2, October, 1989.



后记

1987年春，在完成《东欧经济学概论》一书时，我就对经济周期问题产生了浓厚兴趣。经过整整3年的努力，终于完成了本书的写作。

中国经济的增长与波动，是我国经济学界近几年来研究的热点问题，成果不少。如何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将理论研究推进一步，是我考虑的重点。我的努力主要集中在寻找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特征现象，并深究其特殊成因，据此设计一个特有的周期理论分析的框架。根据统计观察和比较研究，我发现这一特征现象就是强波，即强周期波动，其形成过程存在着很难用标准的市场经济周期理论解释得清楚的因素，这些因素交织地寓于政策、体制和发展背景之中。由于我的分析着眼于特征因素，并且从经验概括中确立了一些新的理论假说和政策主张，就可能使读者感到作者竭诚立想标新立异。不过，我坦诚地



说，研究的最初动因以及写作中不断萌发的冲动，正是基于这种标新立异的刺激。若没有这种刺激和冲动，我的写作就很有可能掉入人云亦云的泥潭。当然，为了理论的创新，甚至企望独树一帜，在范畴的设定、论点的推演以及对于某一现象的解释时，有可能显露出思维粗糙的痕迹，正如探路者不可能走出一条平坦而又光滑的路来一样。这倒不是为了书中的可能错误辩解，而只是提醒读者，作者在这里贡献的只是一个未经精雕细琢的作品，许多方面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探索和完善。

本书理论观点的形成，许多方面得益于我的老师和同仁们的帮助和启发。1987—1988年，作为主要执笔人，我参加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科片共同完成的《中国经济体制中期(1988—1995)改革纲要》的研究和起草。期间，我从刘国光教授、张卓元教授那里得到了许多有助于本书观点形成的教益。在美国学习期间，我在同刘树成教授进行有关周期问题的讨论和交流中获得了一些重要的认识。特别要强调的是，老前辈杨坚白教授，为我的研究和写作付出了很多心血。他不仅就我的研究思路予以直接指点，而且对本书各章节作了逐字逐句的修改。我从这位80高龄的老教授身上，既看到了中国老一辈知识分子知和德统一的形象，又进一步体会到学问的崇高性和严谨性。还要提到的是，刘国光教授、黄范章研究员、齐洪教授、余广华教授、黄孟藩教授、田江海研究员和支道隆研究员，为本书的一些部分的修改提出了宝贵意见。让我在这简短的“后记”中，向以上提到的老师们表示由衷谢意。



我还应向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金碚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梁晶女士表示谢忱。在目前我国学术书刊销售不景气、一些出版社对学术专著敬而远之的情况下，若没有他们的热心举荐和无私辛劳，我的这本书恐怕还要一段时间才能与读者见面。

陈东琪

1991年7月10日于北京报国寺